

194



27452
MG
A266
2

幹部必讀

列寧 斯大林
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 上 冊 ·



解 放 社



3 2285 0779 8

林大斯 寧 列

設建濟經義主會社論

• 冊 上 •

編輯例言

本書是爲了便利閱讀和研究列寧、斯大林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和政策而編印的。所列諸時期，是依照蘇聯共產黨（布）歷史劃分的。因篇幅的限制，所選錄的只是列寧、斯大林在各個時期的關於這個問題的最主要的著作、報告或節錄。譯文除註明來源的以外，其餘都是採用自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所出列寧文選和列寧主義問題兩書。各文引證下面所註頁碼，是指各該著作俄文版本而言。全書分上下兩冊。

解放社編輯部

一九四九年三月

目 錄

一 準備和實現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

列寧·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至十四日）	一七
飢荒逼近	一七
政府之毫無作為	一九
監督辦法是衆所共知和輕而易舉的事	三三
銀行國有	三五
新迪加國有	三三
取消營業秘密	三六

強迫合併於組合中.....	四
調節消費.....	四
政府破壞民主組織底工作.....	五
財政破產和挽救之法.....	五
害怕走向社會主義，能否前進呢？.....	六
消除經濟破壞與戰爭問題.....	六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無產階級.....	六
列寧：關於工人監督條例草案（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三日）.....	七
列寧：關於國民經濟社會化的法令草案（一九一七年十二月）.....	七
實行銀行國有及其必要辦法的法令草案.....	七
列寧：關於消費公社之命令草案（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至十日）.....	七
列寧：怎樣組織比賽（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至十日）.....	八
列寧：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草案（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八
列寧：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狀況與社會主義革命底基本任務〕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八

現時的總口號·····	104
與資產階級鬭爭的新階段·····	107
爲全民統計和監督而鬭爭的意義·····	117
提高勞動生產率·····	123
組織競賽·····	125
『嚴整的組織』與專政·····	130
蘇維埃組織底發展·····	141
結論·····	145
列寧·在各地蘇維埃財政部代表全俄大會上的演說詞（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147
列寧·給國有化企業底代表會議的信（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155
二 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	
列寧·論飢荒（致彼得城工人的信，一九一八年五月）·····	155
列寧·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黨綱的報告（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157

列寧：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二七
列寧：偉大的創舉 <small>(論後方工人底英勇精神。論「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small> ……	二二〇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二二三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二二三
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	二五三
列寧：與燃料恐慌作鬪等(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給各地黨組織的通告)……	二五七
列寧：在農業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二五九
列寧：論義務星期六(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俄共莫斯科全市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二六五
列寧：論勞動紀律(一九二〇年初)……	二五五
列寧：從破壞歷來的舊制度到創造新制度(一九二〇年四月八日)……	二五九
列寧：土地問題提綱初稿(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日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	二六九

三 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工作時期

列寧：論物品稅（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三二七
列寧：論糧食稅（新政策底意義及其條件，一九二二年四月十一日）	三三〇
代引言	三三三
關於俄國現時經濟	三三〇
論糧食稅，自由貿易，租課制	三三三
政治總結和結論	三三六
結論	三六五
列寧：現時和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後金子底作用（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五日）	三六八
列寧：新經濟政策下職工會底作用與任務（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決議案）	三六九
一 新經濟政策與職工會	三六九
二 無產階級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與職工會	三七〇
三 轉到所謂經濟核算制的國家企業與職工會	三七一
四 承認土地工廠等私有制而由資本家階級掌握政權之國家中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與不	三七一

承認土地和多數大企業私有制而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國家中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道

兩者間的根本區別

五 職工會中恢復自願會員制

六 職工會與企業管理方面

七 職工會參加無產階級國家經濟機關與管理機關的作用

八 與羣衆的聯繫是職工會一切工作底基本條件

九 無產階級專政下職工會內部情況的矛盾

○ 職工會與專門家

一 職工會和對工人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影響

列寧：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三十一日）……四三

列寧：俄國革命五週年與世界革命底前途（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四七

列寧：論合作制（一九二三年一月四日至六日）……四九

列寧：寧肯少些，但要好些（一九二三年三月一日）……五〇

斯大林論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摘自『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五章『農民問題』，一九二四年四月）……………三三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工作底總結』摘錄（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在莫斯科黨組織積極份子會議上的報告）……………三〇

四 論蘇聯社會主義底命運……………三〇

五 黨在鄉村中的政策……………二九

六 論五金工業……………二九

斯大林論蘇聯底內部形勢（摘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聯共（布）中央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二六

一 國民經濟全貌……………二六

二 工業與農業……………二六

三 貿易問題……………二六

四 各階級，它們的積極性，它們的相互關係……………二九

五 列寧關於農民問題的三個口號……………二六

六 關於農民問題的兩種危險與兩種偏向……………二二

七 黨底任務……………二七

斯大林論新經濟政策及國家資本主義
（摘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關於聯共（布）中央在第十四次大會上政治報告的結論』）…………… 六三

一 論新經濟政策…………… 六三

二 國家資本主義…………… 六三

簡要註釋…………… 六二—六四

一 準備和實現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時期

列寧：災禍臨頭和防止之法

——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至十四日——

飢荒逼近

必至的災禍逼臨到俄國頭上。鐵路運輸紊亂不堪，而且日益加劇，勢將完全停頓。供給工廠的原料和煤炭的運輸行將停止。糧食運輸快要中斷。資本家故意加緊對生產怠工（損壞、停閉、搗毀和阻礙生產），指望以空前的災禍來使共和國和民主制度，蘇維埃和一般工農團體陷於破產，來促進帝制復辟和恢復資產階級地主的專政。

空前大規模的災禍和飢荒勢所不免地逼臨到頭上了。這在所有一切報紙上都已千番百次地說過。各政黨，各工兵農蘇維埃所通過的不可勝數的決議案也都承認，災禍難免，並已逼近眼前，

必須拚命設法防止，人民必須「英勇努力」來挽救滅亡等等。

這一點是大家都談論的。這一點是大家都承認的。這一點是大家都決定了的。

可是絲毫的辦法也沒有採取。

革命已有半年，災禍逼臨得更近。大批工人失業。祇要想想：國內百貨俱空，國家在有充裕糧食和豐裕原料的情形下，竟因食品缺乏和工力缺乏而感受着滅亡危險，——可是在這樣的國家中，在這樣危急的時機，竟造成了大批失業現象！這個事實顯然證明在革命（有些人稱之為大革命，可是暫時也許稱之為腐朽的革命要比較公正些）半年中，既有民主共和制度，又有許許多多傲然自稱為「革命民主」團體、組織和機關的情形下，實際上真是沒有採取絲毫認真防止災禍，防止飢荒的辦法。我們之臨近破產，愈來愈速，因為戰爭是不平等的，而它所造成之民衆生活各方面的紊亂狀態也就日益加劇起來。

其實祇要稍微加以注意，稍微思索一下，便足可相信，防止災禍和飢荒的辦法是有的，這種辦法是十分明顯簡單，是完全可以實現，是民衆力量完全能够做到的；其所以不採取這些辦法，祇是因爲，唯一是因爲實行這些辦法，就會觸犯一小羣地主資本家底駭人利潤。

真的，可以担保說，在任何一個演說中，任何一個派別的報紙上任何一篇文章中，任何一個

會議或機關底任何一個決議案中，沒有不十分明白肯定地承認那防止災禍與飢荒的基本主要辦法。這個辦法就是：由國家實行監督、監察、統計和調節，規定生產中勞動力的正確分配和食品的正確分配，愛惜民力，消除對民力的任何浪費，一一加以節省。監督、監察、統計——這就是防止災禍和飢荒的首要辦法。這是不容爭辯而為衆所公認的。這也正是人們所不作的，其所以不作，是因為害怕觸犯地主和資本家底專政，觸犯他們用抬高物價和供給軍需品（而現時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間接為戰爭「工作」）所獲得的空前巨大、駭人聽聞的利潤，這種利潤是衆所共知，衆所共見，衆所驚駭喟嘆的。

而國家方面竟沒有採取絲毫辦法來實行多少認真的監督、統計和監察。

政府之毫無作為

全國各處對國家施行的任何監督、監察、統計，以及調整這些辦法的任何嘗試，都實行經常一貫的怠工。祇有幼稚到了極點的人才不懂得，祇有雙倍虛偽的人才假裝不懂：這種怠工是從何處發端，並用何種手段進行的。因為這種由銀行家和資本家實行的怠工，他們這種破壞任何監

督、監察、統計的舉動，都適應着民主共和政體，適應着「革命民主」機關底存在。資本家老爺們完全明白領會了一個真理，這個真理本是一切贊成科學社會主義者都在口頭上承認的，但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當其友人一攀上總長次長等等高位之後，就立刻把它忘掉了。這個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政體來代替君主政體是分毫也不觸犯資本主義剝削底經濟本質的，因而反過來說，祇須把那保護資本主義利潤之神聖不可侵犯權的鬭爭方式加以改變，就可以如同在君主專制政體下一樣，來在民主共和政體下順利保持這種權利。

在民主共和政體下對任何監督、統計、監察實行怠工的現代的最新手段，就是資本家在口頭上「熱烈」承認監督「原則」及其必要（所有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當然也是一樣），不過主張這種監督的施行應是「逐漸的」，按部就班的，「由國家調節的」。其實這種好聽的詞句祇是用來掩蓋對監督的破壞，把它化爲烏有，變爲空中樓閣，掩蓋那以監督爲兒戲而把任何切實認真的步驟擱延不行，建立各種非常複雜龐大，毫無生氣的官僚監督機關，這些機關全以資本家底意志爲轉移，絲毫無所作為，而且不能有所作為。

爲了免遭空口無憑之譏，我們且從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中找出幾個證人來，而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正是在革命頭半年內在蘇維埃中佔有多數，參加過「聯合政府」，因此他們對於

庇護資本家的政策，對於資本家破壞任何監督的行爲，都要在政治上對俄國工業負責的。

在「革命」民主派所謂「全權」（莫開玩笑！）機關中的最高機關之正式機關刊物中央執委（即全俄工兵農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新聞報，於一九一七年九月七日發行的第一百六十四期上，登載有關於監督問題的專門機關底決議，這個專門機關也是由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建立，並在他們把持之下。這個專門機關就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經濟部」。在它的決議上正式承認，「政府所設調節經濟生活的中央機關毫無作爲」，全係事實。

難道證明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政策破產的證據，有比他們親手簽字的這個文件更好的麼？

還在沙皇制度時代，就已承認有調節經濟生活之必要，並已建立了一些負此責任的機關。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經濟破壞狀況繼續增高，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革命共和政府底任務，本是要一開始就採取嚴重堅決辦法來消除這種破壞現象。當有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參加的「聯合」政府組成時，在五月六日發表的昭告國人的鄭重宣言中，曾約許負責施行國家監督和調節辦法。那時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輩以及一切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首領們賭咒發誓，說他們不祇對政府行動負責，而且他們所掌握的「革命民主全權機關」也在切實監視並檢查政府底工作。

從五月六日以後已經過去四個月了，在這長漫漫的四個月中，俄國因舉行帝國主義的荒謬「進攻」而葬送了幾十萬兵士，經濟破壞和災禍飛速地逼近起來，況且夏季時無論在水運方面，農業方面以及調查礦藏等等事業方面，都有作出許多成績的極大可能，——而過了四個月後，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認說：政府所設監督機關「毫無作爲」！！

這班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儼然以國家要人的態度，在現時（我作此論文時，恰當九月十二日民主會議（二）的前夜）高談什麼祇要與工商業界的啓特·啓對奇輩（三）即梁布申斯基、布伯力科夫、特勒青科之流成立聯合政府來代替那與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政府，便可挽救時局呀！試問何以解釋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種可驚的盲目病呢？難道他們是些因極端愚鈍幼稚而不知道所作何事，自甘迷誤的政治嬰孩麼？或者是他們佔據總長、次長、督撫、政治專員等等高位過多的事實，才必然產生一種特殊的「政治上」的盲目病麼？

監督辦法是衆所共知和輕而易舉的事

可能發生一個問題，也許監督方法和辦法是一種極端複雜、困難、未經試驗、甚至是人所不

知的事情吧？其所以久延未行，也許是因爲立憲民主黨中，工商業者階級中以及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中的國家要人雖已汗流浹背、勞累半載來探求、研究、發現實行監督的辦法和方法，但是這個任務過於困難，所以仍未解決吧？

真可嘆惜！竟有人把事情說成這樣，來努力蒙混不識字和不開通的愚昧農夫以及那些輕信人言而毫不留心考查的庸夫俗子。其實甚至沙皇政府，甚至「舊制度」，在建立軍事工業委員會時就已知道實行監督的基本辦法，主要方法和手段：使居民按各種職業，工作目的，勞動部門等等聯合起來。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聯合，所以極力設法限制，故意排斥這種衆所共知，輕而易舉，全可施行的監督方法與手段。

一切交戰國家受到戰爭所造成的極端嚴重的困苦災難時，或多或少地受到經濟破壞和飢荒時，早已擬定，決定，採用，並已再三實驗過許多多的監督辦法，所有這些辦法，幾乎總是歸結於把居民聯合起來，歸結於在有國家代表參加之下，在國家監察之下等等來建立或獎勵建立各種各類的團體。所有這些監督辦法都是衆所共知，千番百次地說過寫過的，各先進的交戰國所頒佈的關於監督的法律也已經譯成俄文，或在俄國報章雜誌上詳細記載過了。

假使我們的國家真想切實認真實行監督，假使它的機關不是因猷媚資本家而自陷於「毫無作

爲」的地步，那末國家祇須一舉手之勞就可以從現有的無數監督辦法中找到已經知道，已經施行過的辦法。這裏的唯一障礙，即爲立憲民主黨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向民衆隱瞞了的障礙，始終是因爲實行監督就會暴露資本家底駭人利潤，就會損害這些利潤。

爲了把這一最重要的問題（實質上就是關於任何一個願意挽救俄國，使其擺脫戰爭和飢荒的真正革命政府底政綱問題）解釋得更加明顯起見，且把這些最主要監督辦法列舉出來，而逐一加以考查。

我們會看見，政府如果不祇是以革命民主的稱號來引人發笑，那它只須在其成立的最初一星期中，頒佈實施最主要監督辦法的法令，規定認真而嚴重的懲罰辦法來處分那些用欺騙手段迴避監督的資本家，並號召人民自己來監視資本家，監視他們是否誠實執行關於監督的法令，——這就足能使監督制早已在俄國實現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監督辦法：

(一) 把一切銀行合併爲一，由國家監督它的營業，或實行銀行國有。

(二) 把各個新迪加，即資本家底最大壟斷公司（糖業、煤油業、煤業、冶金業等等的新迪加）收歸國有。

(三) 取消營業秘密。

(四) 強迫工業主，商人以及一般企業主新迫加化（即是強迫他們合併爲各種組合）。

(五) 強迫人民聯合於各種消費協社中，或獎勵這種聯合並監督之。

凡來把這些辦法逐一加以考查，看看在用革命民主手段來實行的條件下究有何種意義。

銀行國有

大家知道，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底中心，全部資本主義國民經濟系統底神經中樞。談「調節經濟生活」而避開銀行國有的問題，這就無異是暴露自己絕頂愚昧無知，或者就是以華麗詞句和漂亮的約許來欺騙「老百姓」，而預先立意不執行這種約許。

監督並調節糧食底運載，或者監督並調節一般產品底生產和分配，若不監督和不調節銀行營業，便是荒謬可笑。這好像是捉取偶然賺得的「幾個哥比」，而不理會那成百萬盧布的橫財。現代銀行已與商業（糧食及其他一切商業）和工業密切結合而不可分離，所以不「干預」銀行，便絕對不能作出絲毫認真，絲毫「革命民主」的事情。

然而，也許這種由國家「操縱」銀行的事情是一種非常困難複雜的手續吧？人們通常都是努力以這種情景來恐嚇庸夫俗子，而努力這樣作的，當然是資本家及其衛士，因為這是對於他們有利的。

其實，銀行國有絕對不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底一個哥比，絕對沒有任何技術上和組織上的困難，而僅僅是被極少一些富人底卑污貪慾底利益所阻撓。銀行國有其所以常常被人與沒收私人財產混爲一談，是由於那些利於欺騙民衆的資產階級報紙故意散佈這種混淆概念所造成的結果。

銀行所操縱的那些集中於銀行裏的資本所有權，是有印刷的和書面的字據爲之證明的，這些字據就叫做股票、債券、期票、收條等等。在實行銀行國有時，即是把所有的一切銀行合併爲一個國家銀行時，這些字據一個也不會作廢，一個也不會改變。誰按儲蓄券擁有十五個盧布，在銀行國有後，他仍舊是十五盧布的所有者，誰擁有一千五百萬盧布，在銀行國有後也仍然享有由股票、債券、期票、貨物證等等所表現的一千五百萬盧布。

那末銀行國有的意義究竟何在呢？

就在於對各單個銀行及其營業，是任何真正監督（即令取消了營業秘密等等）都無法實行的，

因爲無法察覺在編製決算時，在建立空牌企業和分行時，在使用冒名人等等時所採取的一切極複雜、極紛繁、極狡猾的手段。祇有把一切銀行合併爲一，——這種合併的本身絲毫也不改變私有財產關係，重說一遍，不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底任何一個哥比，——才有可能實行真正的監督，當然要在施行上述其他各種辦法的條件之下。祇有實行銀行國有，才可以使國家知道幾百萬以至幾十萬萬盧布往來流通的處所，以及這種流通是怎樣發生和在什麼時候發生的。祇有監督銀行，監督這個資本主義流通過程底中樞及其主要軸心和基本機構，才可以不僅口說，而且真正辦好監督全部經濟生活，監督重要產品生產和分配事宜，才可以辦好「調節經濟生活」的事情，否則，這種事情必然始終會是閹部欺騙老百姓的空話。祇有在把各個銀行合併爲一個國家銀行的條件下，實行監督銀行營業，加上施行往後那些容易實現的辦法，才可以辦好真正徵收所得稅，不致有隱瞞財產和收入的事情，至於現在的所謂所得稅，則大半是空中樓閣而已。

實行銀行國有，祇要下道命令，就可以使銀行經理和職員自己來執行。並不需要由國家方面設立任何特殊機關，採取任何特殊準備步驟，這個辦法正是用一道命令，「一舉手」就可以實現的。因爲既然資本主義發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債券等等的程度，那它就恰巧造成了實行這種辦法的經濟上的可能性。這裏剩下的事情只有統一簿記而已；如果革命民主國家決議立刻用電報

通知，在每個城市中召集銀行經理職員的會議，在每省和全國範圍內召集他們的代表大會，以便立刻把各銀行合併爲一個國家銀行，那末這一改良在幾星期內就可以辦好。自然正是那些經理和高級職員將要設法抵抗，極力欺騙國家，故意攔延等等，因爲這班老爺們會喪失他們收入特別優裕的位置，會喪失其獲利特別豐厚的欺詐營業的可能；全部實質就在於此。可是合併銀行的事情，並不會有絲毫技術上的困難；如果國家政權不祇在口頭上是革命的（即是不害怕打破一切因循慣習），不祇在口頭上是民主的（即是保護大多數人民底利益，而不是一小羣富人底利益），那末祇須發佈一道命令，以沒收財產和監禁來懲治那些稍敢延攔和企圖隱瞞文據、賬目的銀行經理，董事和大股東；祇須——舉例說——把貧窮職員單獨組織起來，並對於凡是揭發富人方面底欺騙和攔延行爲者均給以獎金，就可以極順利極迅速地把銀行國有事業實行起來。

銀行國有對於全體人民，特別是對於農民和小工業者大眾，而不是特別對於工人（因爲工人很少與銀行有來往），是會有非常巨大的利益。勞動力方面的節省會是不可計算的，假定國家保存銀行原有職員數量，那末，這就會是向普遍利用銀行方面，向廣泛增加分行數目，擴大銀行營業大眾化方面的莫大進步。正是對於小業主，對於農民說來，信貸之大眾化及簡易化，將大大增長起來。而國家方面就第一次有可能起初考察一切主要的金融營業，而不會有任何隱匿，其次

就監督這種營業，然後就調節經濟生活，最後就獲得幾百萬以至幾十萬萬的巨款來進行巨大的國家設施，並不要因所謂「中介」而付給資本家老爺們巨大的「酬勞」金。正是，而且祇是因爲如此，所以一切資本公司，一切資產階級教授，整個資產階級，以及所有替它服務的普列漢諾夫輩，波特列索夫之流，都涎沫直噴地拚命力爭，反對銀行國有，臆造出無數遁詞來反對這個最容易而最迫切的辦法，其實甚至從「國防」觀點，即是從軍事觀點來看，這個辦法也有莫大的優點，它可以大大提高國家底「軍事實力」。

這裏也許會有人反駁說：那末，何以如像德美這樣先進國家實行了極好的「調節經濟生活」辦法，而沒有想實行銀行國有呢？

我們回答說：這是因爲這些國家雖有君主民主之別，可是兩者都不僅是資本主義的，而且是帝國主義的。它們既然是這樣的國家，所以在實行其所必須的改革時，就採用反動官僚的方法，而我們在這裏說的，則是革命民主的方法。

這個「小小的差別」確有極重大的意義。關於這個差別常常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這個名詞在我國（特別是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那裏），幾乎成了一句通常套話，如像「謝謝上帝」一語，就是那些並非愚昧無知得相信上帝的人也常說的，又如像「可敬的公民」一

語，有時甚至用來稱呼那些在畫報或統一報上的撰稿人，雖然幾乎所有的人都可猜到這些報紙是由資本家爲了資本家本身利益而創辦而維持的，因而所謂社會主義者之參加這些報紙，本來是少有『可敬』的地方。

若是不把『革命民主』這個名詞當作鋪張的詞句，當作流行套語來用，而思考它的意義，那末要做一個民主主義者，就要真正顧及大多數民衆底利益，而不是少數人底利益；要做一個革命者，就要最堅決最無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過時的東西。

據我們所聽見的，無論在美國或德國，無論是政府或統治階級，都不覬覦『革命民主』這個稱號，而我國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却覬覦這個稱號（其實是侮辱這個稱號）。在德國一共祇有四個有全國意義的私人大銀行，在美國祇有兩個：這些銀行中的財政大王覺得在實行聯合方面較爲容易，較爲方便，較爲有利的，是用私下、秘密、反動手段，而不是用革命手段，是用官僚手段，而不是用民主手段，這樣就可以收買官吏（這無論在美國或德國都成了通例），保存銀行底私有性質，而這正是爲了保持營業秘密，正是爲了從國家方面榨取千百萬『額外利潤』，正是爲了保障能在財政方面來幹種種欺詐把戲。

無論美國或德國，其『調節經濟生活』的方式都是給工人（和一部分農民）造成軍事苦工營，

給銀行主和資本家造成天堂。這些國家的調節辦法就在於使工人「緊張」到挨餓地步，而（用秘密，反動官僚手段）保障資本家獲得比戰前還高的利潤。

這樣的方式，在共和制帝國主義的俄國也完全可能；而這一方式也就不僅由米留可夫和盛加略夫輩實現着，並且也由克倫斯基協同特勒青科、涅克拉索夫、伯爾納茨基、普羅科坡維奇之流實行着，後面這班人也是用反動官僚手段來掩蓋銀行之「不可侵犯性」，及其獲得駭人利潤的神聖權利。不如說句真話吧：人們是想要在共和制度的俄國用反動官僚的方式來調節經濟生活，可是由於有「蘇維埃」存在，「常常」難於實行，第一個科爾尼洛夫曾想驅散蘇維埃而沒有成功，可是第二個科爾尼洛夫又會努力設法驅散它的：

這才是真話。這個雖很苦辣，却是簡單的真話，對於啓迪民衆方面，要比說什麼「我們的」，「偉大的」，「革命的」民主等等好聽的騙語有益得多：

★

★

★

銀行國有，就會大大促進同時實現保險事業的國有，即是把一切保險公司合併爲一，集中它們的活動，由國家加以監督。在這裏，保險公司職員代表大會，也可以把這種合併立刻實施而不會有何種困難，祇要革命民主國家下令這樣辦，並嚴令各保險公司底各個經理和大股東務須負責

毫不遲延地實行這種合併就行了。資本家投在保險事業方面的資金有幾萬萬，全部工作都是由職員進行的。把這一事業合併起來，就可以減低保險費，使一切保險者獲得極大的便利，並減輕他們的負擔，可以在原有人力和資金的條件下擴大這種業務底範圍。除了極少一些收入豐裕者的因循慣習和私利目的以外，決沒有任何其他的情況阻礙這種改良，加之這種改良又能提高「國防力」，節省國民勞動，展開許多有極嚴重意義的真正「調節經濟生活」的可能，而不僅是口頭上說說而已。

新迪加國有

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以前的舊國民經濟體系的區別，就在於它造成了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密切聯繫與相互依賴。要是沒有這一點的話，則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都會是在技術上不能實現的。由銀行統治生產的現代資本主義，把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這種互相依賴性引伸到了極點。銀行和各大工商業部門已緊密結合而不可分離了。這在一方面就是說，不實行由國家壟斷工商業新迪加（糖業、煤業、鐵業、煤油業等等新迪加）的步驟，不把這些新迪加收歸國有，而單把銀

行收歸國有是不行的。另一方面，這就是說，要認真實行調節經濟生活，就須同時把銀行和新迪加一概收歸國有。

且拿糖業新迪加來作例證吧。這個新迪加還在沙皇時代即建立起來，那時就已將許多設備極好的工廠合併爲一個極大的資本主義組合，這種合併自然全是按照最反動的官僚方式實行的，它保障資本家獲取駭人聽聞的利潤，而使工人和職員處於絕對無權、卑賤、萎靡、奴隸的地位。那時國家就已實行監督並調節生產，以便使財閥和富豪獲得利益。

這裏要做的事情，祇是頒佈一個召集職員、工程師、經理、股東底代表大會，實行統一會計，由工會實行監督等等的簡單命令，來把反動官僚的調節變爲革命民主的調節而已。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然而正是這件事情至今還沒有實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事實上仍保留着按反動官僚方式對製糖工業的調節，一切都仍舊：濫費國民勞動，因循守舊，讓波布林斯基和特勒青科輩大發其財。要號召民主派表現自動創造精神，而不是號召官僚，要號召工人和職員表現自動創造精神，而不是號召「糖業大王」，這就是能够而且應當在幾天內一舉而成的事實，——假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不用恰恰是與這些糖業大王實行「聯合」的計劃來蒙蔽人民意識的話，並且恰恰是由於這樣與富人聯合，其結果就使政府在調節經濟生活方面「毫無作爲」的現象，成爲

絕對不可免的了①。

再拿煤油業來看吧。先前資本主義發展的結果，已把煤油業大規模「社會化」了。兩三個煤油大王——這就是操縱幾百萬以至幾萬萬資金，專剪息票爲生，而從那在實際上、技術上、社會意義上，都已經是在全國範圍內組織起來並已經是由幾千幾百職員和工程師經營的「業務」中獲取驚人利潤的人。煤油工業國有是可能一舉而成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國家所應該做的事情，特別是當國家遭受着極大的危機，無論如何都要節省國民勞動，增加燃料生產的時候。當然，官僚式的監督在這裏不會有絲毫結果，不會絲毫改變情況，因爲「煤油大王」無論對付特勒青科輩也好，克倫斯基輩也好，亞甫克森鐵夫輩也好，斯科別列夫輩也好，都如同對付沙皇總長一樣的容易，而對付的方法就是推延、支吾、約許，以至直接和間接收買資產階級報紙（這就是所謂「社會輿論」，而克倫斯基和亞甫克森鐵夫之流正是「重視」這種「輿論」），收買官吏（即由克倫斯基和亞甫克森鐵夫輩留在不可侵犯的舊國家機關中舊位置上的官吏）。

① 當我寫到這裏時，我在報紙上看見克倫斯基政府宣佈實行糖業壟斷，自然是按反動官僚的方式來實行，而不召集職員和工人代表大會，不昭告大眾，不制裁資家！！

要想做點認真的事情，就必須從官僚制過渡到民主制，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來實行這種過渡，就是說，要向煤油大王和股東們宣戰，發佈命令：如果他們阻延煤油業國有事業，隱瞞收入和賬目，對生產怠工，不採取辦法提高生產的時候，即沒收他們的財產並處以徒刑。應當喚起工人和職員底首創精神，立刻召集他們來舉行會議和代表大會，當他們建立了周到完備的監督制並增加了生產時，便把一部份利潤撥給他們所有。如果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就立刻實行了這種革命民主的步驟，那末世界上燃液蘊藏最豐富國家之一的俄國，就可能於夏季中利用水運，在供給人民以必需數量燃料的事業上作出很多成績。

無論資產階級的政府，或社會革命黨人、孟塞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政府，都是什麼事情也沒有作，僅僅玩了一套官僚主義的改良把戲而已。一個革命民主的步驟也不敢採取。煤油大王如故，因循停滯如故，工人和職員對剝削者的怨恨如故，在這基礎上產生的場台現象如故，濫費國民勞動如故，一切都如在沙皇時代一樣，所改變了的，祇是「共和國」秘書廳收發文件上的印信而已。

煤炭工業所具有之技術上、組織上實現國有的「現成」條件並不薄弱些，那班掠奪人民的強盜，即煤碳大王在管理上的無恥程度也並不輕微些；在這裏，我們看見有工業主公然怠工，公然

損壞設備，公然停止生產等許多最明顯不過的事實。連孟塞維克的內閣機關刊物工人報都承認這些事實。結果怎樣呢？也是連什麼也沒有作，僅僅舉行了幾次由工人和煤業新迪加中強盜們各派「半數」代表參加的舊的反動官僚式的會議而已！沒有採取任何革命民主步驟，沒有絲毫企圖建立唯一切實的監督制，即從下面由職員工會，由工人，用恐怖手段對待那班危害國家、停止生產的煤炭工業主的辦法來實行的監督制！怎麼可以這樣作啊，我們「大家」不都是主張建立如果不是與立憲民主黨人聯合，便是與工商業界聯合的「聯合政府」嗎，而聯合政府的意義也就是把政權留在資本家手裏，讓他們橫行無忌，讓他們阻礙事業，把一切都壓到工人頭上，加緊經濟破壞，這樣來準備新的科爾尼洛夫的叛亂！

取消營業秘密

若不取消營業秘密，則監督生產和分配的辦法，不是仍舊成爲祇供立憲民主黨人用來愚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又用來愚弄勞動階級的空洞約許，便是這種監督祇有用反動官僚的方法和手段才可實現。不管這一點對於凡屬沒有成見的人都是如何明顯，

不管真理報主張取消營業秘密如何堅決（替資本服役的克倫斯基政府之封禁真理報，大半就是因爲這件事情），但我們的共和政府以及「革命民主全權機關」還是絲毫也沒有去想這「實行真正監督的首要步驟」。

這裏正是實行任何監督的關鍵。這裏正是那搶劫人民並對生產怠工的資本底致命處。正因爲如此，所以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也就害怕觸及這個地方。

資本家所通常提出，而爲小資產階級不加思考地重複着的理由，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經濟一般地絕對不容許取消營業秘密，因爲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個別企業對市場的依賴，使得必須保持商業簿記和商業週轉——當然銀行週轉也在內——之「神聖不可侵犯權」。

凡是這樣或那樣重複這種理由或類似這種理由的人，都是自甘受欺，又以其欺騙人民，都是閉眼不看現代經濟生活中兩個衆所共知的極重大的基本事實：第一個事實就是大資本主義，即銀行、新迪加、大工廠等等經濟底特點。第二個事實就是戰爭。

到處都成爲壟斷資本主義的現代大資本主義，恰恰根本排除那保持營業秘密的合理性，使它成爲虛偽，成爲只是掩蓋財政欺詐行爲和使大資本獲得駭人利潤的工具。大資本主義經濟，單按其固有的技術本性來說，就已是社會化的經濟，即是它爲千百萬人而工作，並以其營業來直接間

接地聯合着幾百、幾千以至若干萬的家庭。這並不是那種小手工業經濟或中農經濟；這兩種經濟完全無所謂商業簿記，所以取消營業秘密也與它們無關！

在大經濟中，其營業情形反正有幾百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持營業秘密的法律在這裏並不是爲了滿足生產或交換上的需要，而是用來掩蓋投機和極不正當的謀利方式，掩蓋公然欺詐的行爲，大家知道，在股份公司中，這種欺詐行爲是特別流行，是足以欺騙大眾的偽造賬目和決算書辦法來特別巧妙地掩蓋着的。

在那些生產本身沒有社會化，還是零碎分散的小商品經濟中，即在小農和小手工業者中，還可說保持營業秘密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大資本主義經濟中保持這種秘密，便是保持極小一羣人底特權和利潤而反對全體人民的利益。既然規定了股份公司必須公佈賬目的制度，那就是說，法律也承認了上述這個事實，不過這種監督——這是在一切先進國家以及在俄國都已在實現着的——正是反動官僚式的監督，這種監督並不讓人看清真象，不讓人民知道股份公司營業底全部真情。

在這裏，若按革命民主方式來作，就應立刻頒佈另一種法令，取消營業秘密，着令大企業和富人公佈最完備的賬目，讓任何一部份在民主意義上說來有充分數量（譬如一千或一萬選民）的公民，都有權審查任何一個大企業底一切文據。這樣的辦法祇須頒佈一道命令就完全可能而容易

實行起來；祇有這個辦法才會開展民衆監督的首創精神，經過職員工會，經過工人工會，經過一切政黨來實行；祇有這個辦法才會使監督成爲認真的和民主的事業。

此外還要加上戰爭這點。絕大多數工商企業現在不是爲『自由市場』工作，而是爲的供給國庫，供給戰爭。所以我在眞理報上說，那些用什麼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的理由來反對我們的人是撒謊，是加倍的撒謊，因爲這裏所說的，不是要現在立刻直接施行社會主義，而是要揭發盜竊國款的事實。

『供給戰爭』的資本主義經濟（即直接間接與供給軍需品有關的經濟）在這裏賺得了空前的利潤，立憲民主黨人老爺們連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也藉此發財，他們反對取消營業秘密，而表明自己不過是盜竊國款的幫辦和庇護者。

戰爭使俄國現在每天耗費五千萬盧布。這個每天五千萬的數目，大部份都是付給軍需品供給者。在這五千萬中至少每天有五百萬，也許有一千萬以至更多的數目成了資本家和多少與之勾結的官吏們底『正當收入』。特別是那些貸款去經營軍需品供給事業的大公司和銀行，在這裏賺得了空前未聞的利潤，這正是用盜竊國款的方法來發財，因爲對於這種乘戰爭災難的『機會』，乘幾十萬、幾百萬人死亡的『機會』來欺詐人民和掠奪人民的行爲，決不能給以另一種稱呼。

關於這種從軍需品供給事業中獲得駭人聽聞的利潤的情形，關於爲銀行所隱匿了的各種「保證信件」，關於利用百物騰貴發財的是些什麼人等等，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這是「社會人士」都用嘲笑態度談論着的，甚至那些照例把「不愉快的」事實隱瞞不說，把「礙難」的問題迴避不談的資產階級報紙都對這點也有不少的個別的確切指陳。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說，大家都忍受，大家都容忍那專說「監督」「調節」「調節」漂亮話的政府！！

革命民主派，如果他們真是革命和民主主義者，那他們就會立刻頒佈法令，取消營業秘密，責成軍需品供給者和商人公佈賬目，禁止他們任意行動，非得政府允許，不能放棄其所經營的業務，用沒收財產和槍斃^①的辦法來懲治那些隱瞞與欺騙民衆的人，組織自下的檢查和監督，即由人民自身，由職員和工人底工會以及消費者團體等等用民主方式從下面來實行檢查和監督。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足配稱爲嚇慌了的民主主義者，因爲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完全重複着所有那些嚇慌了的市儈們的話，說什麼採用「過嚴」辦法時，資本家會「逃走一空」的，

① 我有一次已在布爾塞維克刊物上指出過，祇有當剝削者用死刑來對付勞動羣衆時，才應承認

反對死刑的理由正當。不用死刑來對付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恐怕是任何一種革命政府都行不通的。

說沒有資本家，「我們」就會幹不好，說也許英法百萬富翁會因之「見怪」，而他們是「贊助」我們的咧，諸如此類等等。竟令人覺得，似乎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見的辦法，從來沒有試行過的「烏托邦」，其實早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在法國就有那些真是「革命民主主義者」，真相信他們所進行的戰爭是正義的防衛性的戰爭，真是依靠誠意相信這些辦法的民衆的人們，已善於建立對富人的革命監督，並達到舉世傾服的結果。而在這一百二十五年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已造成了銀行、新迪加、鐵路等等等等，就使工農對剝削者，對地主資本家實行真正民主監督的辦法容易百倍，簡單百倍了。

按實質上說，關於監督制度全部問題都歸結於誰監督誰，即哪一階級是監督階級，哪一階級是被監督階級。直到現在，在我們共和制的俄國，在所謂革命民主「全權機關」參加之下，仍舊承認地主和資本家爲監督者，並讓他們爲監督者。結果就必然造成了激起民衆公憤的資本家盜劫行爲，以及資本家用人爲方法支持着的經濟破壞現象。應當不怕打破舊的，不怕大胆建設新的，而堅決澈底地實行由工農對地主資本家的監督。而這却正是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所害怕得要死的事情。

強迫合併於組合中

強迫實行新追加化，例如，強迫把工業主合併於組合中，是在德國早已實行了的。這裏絲毫新東西也沒有。這裏，由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的罪過，又使共和制的俄國完全停滯不振，這些不名譽的政黨竟在此時和立憲民主黨人，或者和布伯力科夫輩，或者和特勒青科及克倫斯基跳起雙人舞來「款待」俄國。

強迫新追加化，一方面是一種由國家推進資本主義發展的辦法，這種發展到處都使階級鬭爭組織起來，使組合數目增加，式樣紛繁，意義增長。另一方面，強迫「組合化」是任何一種多少認真的監督辦法和任何一種節省國民勞動辦法之必要的先決條件。

例如德國法律責成同一地方或全國的皮業工廠主合併為一個組合，而且由國家派代表參加這個組合的董事會，以實行監督。這種法令絲毫也不直接——即就法令本身而言——觸動私有制關係，不剝奪任何私有者的一個哥比，並且還沒有預決到，究竟這種監督會用反動官僚的方式，方向和精神來實現，還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向和精神來實現。

這種法律可以而且應當在我國立刻頒佈，決不要荒費一個星期的寶貴時間，而要讓社會環境本身去解決實行法令的更具體的方式、速度、及監察方法等等。爲了頒佈這樣的法律，國家並不需要什麼特設機關，什麼特別研究，以及任何預先調查，祇須有決心與那些「不慣受」這種干預，不願意喪失額外利潤——保障這種額外利潤的，除了毫無監督狀態外，還有照舊法擅自經營的情形——的資本家底某些私人利益斷絕關係而已。

爲了頒佈這樣的法令，並不需要任何機關，任何「統計」（切爾諾夫想用它來代替農民底革命首創精神），因爲這種法令的實行，應當責成工廠主或工業主自身，責成現有的社會力量來作，並由這些現有的社會（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來加以監督，不過這種社會力量一定要是屬於所謂「下層等級」，即屬於被壓迫、被剝削階級的，這些階級按其能作英勇舉動，能作自我犧牲，能遵守同志紀律方面來說，在歷史上總是表現得比剝削者高得無可比擬。

假定說我國有真正革命民主政府，假定它決議要每個生產部門中凡是僱用有——舉例說——兩個工人以上的工廠主和工業主都必須聯合於縣組合和省組合之中。切實執行法律的責任，首先加於工廠主、經理、董事、大股東（因爲所有這些人都是現代工業底真正首領，真正主人）身上。如果他們規避立刻執行法律的工作，便認作是逃避軍役而以軍法治罪，實行連環保，各自以

其全部財產爲担保，一人有罪，大家負責，大家有罪，各人分担。其次，要一切職員也担負執行這個法律的責任，務使他們也組織爲一個團體，再就是一切工人及其工會也要担負這個責任。「組合化」底目的，就是要樹立最完備、最嚴格和最詳細的賬目報告制，而主要是在購買原料，推銷產品，節省國民資金和勞力方面實行聯合營業。這種節省，在把各自分立的企業聯合爲一個新迪加時，就會達到極大的規模，經濟學上是這樣指示，而一切新迪加、卡特爾、托拉斯的例子也是這樣說明的。我再重述一遍，這種合併爲一個新迪加的辦法，其本身是一點也不會改變私有制關係，不會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底一個哥比。這一情況其所以必得再三着重指出，是因爲資產階級報紙經常「恐嚇」中小業主，說什麼一般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布爾塞維克想「剝奪」他們的財產；這種說法顯係撒謊，因爲社會主義者甚至在完全社會主義革命時也不想，也不能並且也不會剝奪小農財產的。而我們所常說的，始終只是那些要立刻實行的最迫切的辦法，這些辦法已在西歐實現了，凡是多少澈底的民主派都應當立刻在我國實現起來，以便防止已逼近眼前的勢所不免的災禍。

如果要把握極小業主和小業主合併爲各種組合，那就無論在技術上或組織上都會遇到嚴重困難，因爲他們的企業極爲零散，技術極爲簡陋，業主本人又不識字，或不開通。然而正是這些企

業可以不包括在此項法律之內（在我們上面假設的例證中已經指出這點了），縱令不把他們合併，更不用說合併較遲，也不會造成什麼嚴重妨礙，因為數量極大的小企業在生產總量中的作用，在對於整個國民經濟的意義上說都是微小不足道的，除此而外，它們常是或多或少依賴於大企業的。

有決定意義的只是大企業，在這裏已具備有實行「組合化」之技術上組織上的資料與人力，其所缺乏的，祇是革命政權爲了發動和運用這些人力和資料，而嚴厲無情地對待反革命勢力的這種堅決首創精神。

國家愈缺乏通曉技術的人材以及一般知識幹部，就愈加迫切需要儘可能迅速，儘可能堅決地下令實行強迫合併，而且首先要從大企業和最大企業開始，因爲正是合併才可以節省知識幹部，才有可能完全利用並更正確地分配這些幹部。如果甚至在沙皇政府之下，俄國農民在其窮鄉僻壤，也能於一九〇五年後，戰勝沙皇政府所造成的千百障礙，而在建立各種組合專業上大進了一步，那末大工商業和中等工商業的合併，當然可以在幾個月內實現，或者還要實現得更快些，祇要真正革命民主政府憑靠着「下層」民衆，民主勢力，即職員工人之擁護、參加、同情及其利益所歸，強迫這樣做，並號召他們起來實行監督就行了。

調節消費

戰爭迫使所有交戰國以及許多中立國都實行了調節消費的辦法。麵包證出世了，而且成了通常的現象，接着又有其他各種購物證出現。俄國亦非例外，也施行了麵包證制。

然而，正是利用這個例子，我們也許可以最明顯地來把防止災禍的反動官僚辦法與革命民主辦法作一比較，前者力求以最低限度的改造為限，而後者爲了不喪瀆自己的稱號，就應當認定自己的直接任務，是用強力與一切老舊過時的東西斷絕關係和儘快地促進運動前進。

麵包證制是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中調節消費的主要標本辦法，其目的，其所實現的事情，祇有一點（至多也祇是實現這一點）：就是分配現存食糧，使之够大家吃。規定了最高消費額的，遠不是所有一切東西，而祇是主要的「民衆」食品。不過如此而已。再不關心的事情了。用官僚方式計算現有的存糧，把它按人口分配一下，規定每日糧額，把它實行起來就完事。奢侈品是毫不涉及的，因爲「橫豎」這些東西貴得很，「民衆」是買不起的。所以毫無例外地在所有交戰國中，甚至在德國，在這個可以說無疑是最準確、最精密、最嚴格調節消費的模範國家裏，我們

都看見富人經常規避任何消費「類」的法律。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大家」都帶譏笑態度說着，並且在德國社會主義的報紙上，有時甚至在資產階級的報紙上，不管德國那嚴似軍紀的檢查機關如何橫暴，還是經常登載有評述富人「菜單」，富人在某個療養地方（凡是……有錢的人都可以冒稱病人到那裏去療養）可以任意領得多少白麵包，富人用山珍海味的奢侈食物代替平民食品等類的消息和短評。

反動的資本主義國家害怕損壞資本主義底基石，僱傭奴隸制底基石，富人在經濟上的統治基石，害怕發展工人以及一般勞動羣衆底自動性，害怕「煽起」他們的嚴正要求；這樣的國家除了麵包證外是什麼也不需要。這樣的國家隨時隨地都不會忽略自己反動的目的：鞏固資本主義，不使它受人損害，在一般地「調節經濟生活」，尤其是調節消費方面，僅限於採用那些爲贖養人所絕對必需的辦法，並不圖謀這樣真正調節消費，就是說，監督富人，把更多的戰時担負加到那些在平時享有特權，養尊處優，既醉且飽的富人身上。

用反動官僚方式來解決戰爭向人民提出的任務，就是祇限於施行麵包證，平均分配那些爲營養所絕對必需的「民衆」食品，一點也不放棄官僚主義和反動政策，即是說，一點也不放棄原來的目的：不發動窮人、無產階級、民衆（「平民」）底自動性，不容許他們監督富人，而把那使

富人可以享受奢侈品的漏洞留得更多一些。在所有一切國家中，重複一句，甚至在德國，——更不消說俄國了，——這樣的漏洞是留得極多的，「老百姓」忍飢受餓，富人却常到療養所去，用另外的各種「附加物」來補充國家規定的低微的消費額，並且不讓別人監督自己。

剛在自由平等的旗幟下作過反沙皇制度革命的俄國，按其實際政治制度說來，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國的俄國，這裏，這種衆所共見的富人容易規避「麵包證」制的現象，是特別使人民刺目，特別引起民衆不滿，憤慨，怨恨和義憤的。這種容易規避的程度特別的大。暗裏的價格特別之高，尤其是依靠「交情」（而這祇有富人才有），什麼都可以得到，而且得到的很多。人民却忍飢受餓。調節消費的辦法僅僅以極狹窄的官僚反動的範圍爲限。政府方面一點也不想到，一點也不關心到用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則來實行這種調節。

「大家」都感受站隊購物的痛苦，可是……可是富人却派自己的僕人去站隊，甚至僱傭專僕來做這件事情！這也叫做「民主制度」！

當國家空前貧困的時候，革命民主政策爲了防止臨頭災禍，不會僅僅限於實行麵包證制，而會加上以下的辦法：第一，強迫全體居民聯合爲消費協社，因爲沒有這樣的聯合，就無法實行完備的消費監督；第二，要富人執行勞動義務，使他們無報酬地在這些消費協社中作書記等類的勞

動；第三，真正把所有一切消費品平均分配給居民，使戰爭的困苦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實行真正由居民中貧苦階級去監督富人消費的監督制。

在這一方面建立真正民主制度，在組織正是由人民中貧苦階級來實行的監督制方面表現真正的革命精神，就是使每個現有的知識幹部都奮發起來，使全體人民底真正革命毅力都發展起來的莫大推動力。而此刻呢，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俄國中的閣員們，也如他們在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中的同僚們一樣，專說什麼『全體都為造福人民而勞動』，什麼『振奮一切力量』的漂亮話，可是人民却看見，却感觸到這些話全是虛偽。

結果是踏步不前，而經濟破壞的程度却不可阻遏地增長着，災禍日益逼近，因為仿照科爾尼洛夫的榜樣，仿照與登堡的榜樣，仿照一般帝國主義的榜樣來對工人施行軍事苦役制，是我國政府所不能做的，因為革命底傳統、記憶、痕跡、習慣和組織，還是活生生地存在於民衆中；而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作些真正嚴重的步驟，又是我國政府所不願意的，因為它全身從頭到腳，都為依賴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聯合』的關係，以及害怕觸犯資產階級實際特權的心理所貫注所束縛住了。

政府破壞民主組織底工作

我們考察了防止災禍飢荒的各種方法和辦法。我們到處都看見民主派方面和政府及擁護政府的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聯盟方面兩者間不可調和的矛盾。爲了證明，這些矛盾不僅在我們的敘述中寫着，而是實際上存在着，這些矛盾之不可調和是爲有全民意義的實際衝突所證實了的，——爲了證明這點，祇須從我國革命半年來的歷史中，指出兩個特別標本的「總結」和教訓也就够了。

帕里琴斯基「統治」的歷史，就是第一個教訓。壁舍浩諾夫之「統治」及其倒台，就是第二個教訓。

其實，上面所述各種防止災荒的辦法都歸結於從各方面鼓勵（直到強迫）居民「組合化」，首先是鼓勵民主派，即大多數居民，——就是說，首先是被壓迫階級，工人、農民、特別是貧苦的農民「組合化」。而居民自己爲了克服戰爭所造成的空前困難、苦痛和災禍，已自發地走上這條道路了。

沙皇政府會極力阻撓居民自動地和自由地「組合化」。可是沙皇帝制崩潰後，民主組織就已在全俄各地開始發生並迅速發展起來。自動成立的民主組織，各種供給委員會，糧食委員會，燃料會議以及諸如此類的組織，都來進行防止災禍的鬭爭了。

在我國革命半年來的全部歷史中，關於本問題最可注意的事實，就是自稱爲革命共和的政府，即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革命民主全權機關」名義所擁護的政府，竟進行了反對民主組織的鬭爭，並打敗了這些組織！！

帕里琴斯基因進行這個鬭爭而獲得了傳遍全俄的臭名。他藏在政府後台活動，而不在人民面前公開講話（正與一般立憲民主黨人所愛用的活動方法一樣，他們樂意推出策烈鐵里來「對付人民」，自己却暗地包辦一切重要事情）。帕里琴斯基阻礙並破壞了自動成立之民主組織所進行的一切嚴重辦法，因爲任何一個嚴重辦法都不能不「損害」到啓特·啓對奇底無限制利潤和專橫氣焰。而帕里琴斯基正是啓特·啓對奇最忠實的衛士和奴僕。結果竟弄到這樣的地步——這是在報紙上公佈過的事實，——帕里琴斯基竟公然下令取消過各自動成立的民主組織底指令！！

帕里琴斯基「統治」的全部歷史，——而他「統治過」數月之久，並恰恰是在策烈鐵里、斯科別列夫、切爾諾夫當「閣員」的時候，——始終都是爲了迎合資本家及其醜態私利而破壞民意

和破壞民主派決議之醜不堪聞的歷史。自然報紙上所能發表的僅是帕里琴斯基「功業」的極小一部份，至於要把他阻難防止飢荒的罪惡澈底查明，這是祇有當無產階級奪得政權後所成立的真正民主政府才可辦到，那時無產階級會把帕里琴斯基及同類人物底案件，毫不隱匿地提交人民裁判的。

也許會有人反駁說，帕里琴斯基祇是一種例外而已，你看，他不是被趕走了麼？可是問題正在於帕里琴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例，把帕里琴斯基趕走後，情形絲毫也沒有改善，代替他的祇是一些另具姓名，同樣的帕里琴斯基罷了，資本家底全部「影響」，為迎合資本家底利益而破壞防止飢荒辦法的全部政策，是絲毫也沒有被觸犯。因為克倫斯基一流人祇是保衛資本家利益的屏障而已。

這種情形之最明顯的證據，便是糧食總長璧舍浩諾夫退出內閣的事實。大家知道，璧舍浩諾夫是個極端溫和的民粹派份子。可是他在組織糧食事業方面很想誠意作事，想與民主組織發生聯繫並依靠這些組織來作。璧舍浩諾夫工作底經驗及其退出內閣的事件，其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為這個最溫和的民粹派份子，這個「人民社會」黨黨員，雖決意儘量與資產階級妥協，畢竟還是不得不退出內閣！其原因是由於克倫斯基政府為迎合資本家、地主和富農底利益，竟提高了糧

食定價!!

請看斯米特在九月二日出版的自由生活報〔三〕第一期上對這個『步驟』及其意義的描寫吧：

『在政府決定提高定價的幾天以前，全國糧食委員會裏發生了如下的情景：右派代表羅洛維奇是個頭強擁護私商利益，無情反對糧食壟斷和國家干涉經濟生活的人，他帶着自滿自足的笑容當衆聲明說，據他所知道的消息，糧食定價很快就要提高了。

工兵蘇維埃代表回答說，他絲毫也不知道這樣的事實，當俄國革命尚在繼續下去的時候，決不能有這樣的舉動，不管怎樣，政府非與民主派全權機關——經濟委員會和全國糧食委員會商議，是決不能有這種舉動的。農民蘇維埃代表也同意這個聲明。

可是，不幸得很！事實給了這個反聲明一個非常殘酷的修正：說對了的，原來不是民主派底代表，而是富豪份子底代表。原來他對於預備侵犯民主派權利一事，消息極為靈通，雖然民主派底代表曾以憤懣態度，否認了發生這種侵犯事件的任何可能性。』

總之，無論工人代表或農民代表都以絕大多數人民名義肯定地聲明了自己的意見，而克倫斯基政府却為資本家利益，幹着恰恰與此相反的勾當！

資本家底代表羅洛維奇原來是個對於那些隱瞞了民主派的消息極為靈通的人，——正如我們

所始終看到的資產階級刊物論報和交易所公報〔四〕對克倫斯基政府中消息最爲靈通的情形，完全一樣。

這種消息極爲靈通的事實說明什麼呢？顯然是說明資本家有自己的「門徑」，而把實際政權握在自己手裏。克倫斯基是個傀儡人物。當他們需要他的時候，就把他使用起來，要怎樣使用，便怎樣使用。千百萬工農底利益竟爲了一小羣富人底利潤而被犧牲了。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怎樣回答這種令人憤恨的欺侮人民的舉動呢？也許他們向工農發表了宣言，說克倫斯基及其同僚幹了這種事情後，祇有把他們逮捕下獄吧？

當然不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僅僅用他們所把持的「經濟部」的名義通過了一個我們已在上而提到過的嚇人決議案而已！在這決議案中，他們聲明說，克倫斯基政府提高糧食價格是一種「誤國辦法，使糧食事業以及全國經濟生活遭受莫大的打擊」，並指出這些誤國辦法之實施是公然「違」法的！！

這就是妥協政策所造成的結果，就是與克倫斯基勾結並想「寬宥」他的政策所造成的結果。政府違法，爲了富人、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採取這種危害全部監督事業、糧食事業以及整理那極度恐慌的財政事業的辦法，——而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却繼續說什麼與工商業界妥

協，繼續去同特勒青科輩開會商議，寬宥克倫斯基，而僅限於通過一紙使政府可以安然置之高閣的決議！！

這裏就特別明顯地表明了下面這個真理，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叛賣了人民和革命，而布爾塞維克則成爲羣衆底真正領袖，甚至原來擁護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的羣衆也在內。

因爲祇有布爾塞維克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奪得政權，才能肅清克倫斯基之流所幹的那些豈有此理的勾當，並恢復那被克倫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壞着的管理糧食、供給等等事宜的民主組織底工作。

布爾塞維克底行動——這是從上述例證中可以極明顯地看出的——是代表着全體人民底利益，代表着保證糧食和供給事業底利益，代表着滿足工人和農民最迫切需要的利益，而反對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那種動搖、不堅決、真正叛賣性的政策，這個政策已把國家弄到作出提高糧食價格這類可恥事情的地步！

財政破產和挽救之法

提高糧食定價問題還有另一方面的影響。這就是使濫發紙幣的現象更加擴大，使物價更加抬高，使財政更加紊亂，使財政破產更加逼近起來。大家都承認，濫發紙幣是最壞的一種強迫公債，它正使工人和貧民底生活狀況最爲惡化，它是財政混亂的主要罪因。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所擁護的克倫斯基政府，却正是採用這種辦法。

爲要認真消除財政紊亂和防止勢不可免的財政破產，除了用革命手段去與資本利益斷絕關係，並實行真正民主監督，即是由工人和貧農「從下面」對資本家實行監督的道路，亦即上文中文始終論述的那條道路而外，別無他途。

無限制的濫發紙幣就是鼓勵投機勾當，使資本家可以用投機手段賺得億萬橫財，並對於急需進行的擴大生產事業造成莫大困難，因爲原料、機器等等的價格因此愈益昂貴，而且急劇飛漲。當富人把藉投機獲得的財富隱瞞起來時，要採取什麼辦法才有濟於事呢？

可以徵收所得稅，對巨額收入和最大收入規定很高的累進稅率。我國政府繼其他帝國主義政府之後實行了這個辦法。可是這個辦法大半仍是空中樓閣和死的條文，因爲第一，紙幣價格愈跌愈快；第二，投機獲利的來源愈多，營業秘密的保持愈加可靠，遂使隱瞞收入的現象愈益厲害起來。

要使累進稅成爲實在的，而不是空中樓閣，就必須厲行實在的，而不是紙上虛文的監督。如果監督仍然是官僚主義的，那末，對資本家的監督便無法實行，因爲官僚有千百條綫索與資產階級聯繫着和糾纏着。所以在西歐各帝國主義國家，不管是君主國也好，共和國也好，整理財政都是由實行那種使工人作軍事苦役，或成爲軍事奴隸的「勞動義務制」才達到的。

反動官僚式的監督，就是帝國主義國家——包括民主共和制的法國和美國在內——把戰爭重担卸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身上的唯一手段。

我國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於不得不採用反動官僚式的監督，以免和資產階級爭鬧，以免破壞同資產階級的「聯合」；同時爲了可以隨時欺騙人民，又把它叫做「革命民主式的」監督，因而就激起剛把沙皇制度推翻的民衆底憤怒。

其實，祇有施行革命民主的辦法，祇有把被壓迫階級，工人和農民，把羣衆聯合爲各種團體，才有可能來實行對富人的真正監督和極順利地打破隱瞞收入的現象。

現時正在努力獎勵用支票流通的辦法來防止濫發紙幣。這種辦法對於貧民是毫無意思的，因爲貧民橫豎是朝不保夕，橫豎他們的「經濟週轉」是每星期完成一次，而把他們所賺得的很少幾文錢交還給資本家。對於富人，用支票流通則能有莫大意義，特別是在同時實行如像銀行國有和

取消營業秘密等類辦法的時候，因為這使國家可以真正監督資本家底收入，真正向他們抽稅，真正把財政體系「民主化」（同時就加以整理）。

可是阻礙實行這種辦法的，正是害怕損害資產階級特權，害怕和它破裂「聯合」的心理。因為若不實行真正的革命辦法，不實行極認真的強迫手段，那資本家是不會服從任何監督，不會公開自己的賬目，不會將他們所儲藏的紙幣交給民主國家「存記」的。

已聯合為各種團體的工農，若把銀行收歸國有，施行一切富人所必須依法執行的支票流通制，取消營業秘密，規定以沒收財產來懲治隱瞞收入的罪行等等，就能極易使監督成為普遍化的實在監督，正是對富人的監督，而實行這樣的監督時，就能使凡是握有國庫所發行的紙幣的人，凡是隱藏這種紙幣的人都把紙幣交還給國庫。

爲了這，就必須有革命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民主派底革命專政，就是說，爲了這，民主制必須成爲真正革命的民主制。這就是問題全部的中心所在。這正是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所不願意做的事，他們用「革命民主」的幌子來欺騙人民，實際上則擁護資產階級反動官僚政策，而資產階級却總是以下列規則爲其行動方針：“après nous le déluge”——祇要我們安全，那怕是洪水滔天！

我們通常甚至不覺得，對於資產階級私有制之「神聖不可侵犯性」的反民主的習慣和成見，如何深刻地侵蝕了我們的心靈。當某個工程師或銀行主公佈工人收支賬目，公佈關於工人工資及其勞動生產率的統計時，一般人認為這是極正當而公道的事情。誰也不想把這認作是侵犯工人「私人生活」，認作是工程師底「偵探或告密」行爲。資產階級社會把僱傭工人底勞動與工錢看作是自己的公開賬簿，任何一個資產者都有權隨時拿來察看，隨時揭曉，說這樁是工人過於「奢侈」，那樁似乎是工人「偷懶」等等。

可是反過來的監督呢？如果職員、辦事員、僕役等底團體被民主國家邀請來檢查資本家底收支，公佈這種材料，幫助政府來反對隱瞞收入的現象，那又會是怎樣呢？

那資產階級該會如何狂吠起來反對「偵探」，反對「告密」呵！當「老爺」監督僕役，資本家監督工人時，一般人就認為這是理所當然，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私人生活並不認爲是不可侵犯的，資產階級有權要求每個「僱傭奴隸」作報告，隨時把他的收支公佈出來。而被壓迫者企圖監督壓迫者，把他的收支清算明白，揭露他的奢侈生活，那怕是在戰爭期間，當這種奢侈生活會使前綫軍隊簡直遭受飢荒死亡的時候，都是不行的，資產階級是不容許有「偵探」和「告密」行爲的！

問題又是歸結於這一點：資產階級底統治是與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制度不可調和的。在二十世紀的時代，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如果害怕走向社會主義，便不能做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害怕走向社會主義，能否前進呢？

以上所述，很易於引起那些受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之流行機會主義思想浸潤的讀者的反駁，說這裏所論述的辦法，其實大多數不是民主主義的，而已經是社會主義的辦法！

這種在資產階級報紙，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報紙上常見的（用這樣或那樣形式）流行駁議，是用司徒盧威式的武裝來保衛落後資本主義的反動思想。他們說，我國還沒有成熟到實行社會主義的地步，『施行』社會主義還太早，我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所以該做資產階級底奴僕（雖然法國偉大的資產階級革命家在一百二十五年以前由於採用了恐怖手段去反對一切壓迫者，也反對地主，也反對資本家，而使自己的革命成了偉大的革命！）。

那些替資產階級服役的冒牌馬克思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也轉到了他們行列中，——其所以這樣主張，是由於不懂得（照他們這種意見底理論基礎來看）什麼是帝國主義？什麼是資本

主義的壟斷？什麼是國家？什麼是革命民主制？因為懂得了這些東西的人，就不能不承認，不走向社會主義便無法前進。

大家都談論着帝國主義。可是帝國主義祇不過是壟斷的資本主義而已。

俄國資本主義也成了壟斷的資本主義，這是有「煤炭銷售公司」、「五金銷售公司」〔五〕、糖業新迪加等等充分證明了的。這個糖業新迪加又顯然表明了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

什麼是國家呢？這就是統治階級底組織，——例如在德國便是容克和資本家底組織。所以德國的普列漢諾夫輩（謝德曼、連奇等人）稱之為「軍事社會主義」的東西，實際上就是軍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或者說得簡明些，就是使工人作軍事苦役，而對資本家利潤實行軍事保衛。

你試試用革命民主的國家，即用那採取革命手段來破壞一切特權，不害怕以革命手段實現最完備民主制度的國家去代替容克資本家的國家，代替地主資本家的國家，那又會怎樣呢？那你就會看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中，就會必然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以至一些步驟！

因為資本主義的最大企業既然成了壟斷的，那就是說，它供應着全體人民的需要。既然它成

了國家的壟斷，那就是說，由國家（國家在實現了革命民主制度的條件下，就是人民底武裝組織，首先是工農底武裝組織）來指導全部企業，究竟爲着誰的利益呢？

——或者是爲着地主和資本家底利益；那末就不是革命民主制的國家，而是反動官僚制的國家，帝國主義的共和國；

——或者是爲着革命民主派底利益；那末這也就是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因爲社會主義不過是由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制前進的最近一步而已。或者換句話說，社會主義不過是把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制轉過來服務於全體人民底利益，於是也就不復是資本主義的壟斷了。

在這裏，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客觀的發展進程表明：不走向社會主義，就不能從壟斷組織（戰爭更把這種組織底數目、作用和意義增加十倍）前進。

或者是成爲真正的革命民主主義者，那末就不能害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或者是害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而照普列漢諾夫、唐恩、切爾諾夫之流的理由來非難這種步驟，說什麼我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不能「施行」社會主義等等，那末就必然墮落到克倫斯基、米留可夫、科爾尼洛夫等的立場上，即是用反動官僚手段來鎮壓工農羣衆底「革命民主」趨

向。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我國革命底基本矛盾也就在於此。

站着不動是不行的——在一般歷史上是這樣，特別在戰時是這樣。必須走着，不前進，便後退。在二十世紀的俄國，在用革命手段奪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國，不走向社會主義，不有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由技術和文化水準所制約，所決定的步驟：在農民所經營的農業中是不能「施行」大機器經濟，而在糖業生產中則不能把大機器經濟取消），是不能前進的。

害怕前進，便是後退，而克倫斯基輩在米留可夫和普列漢諾夫之流的欣然嘆賞下，在策烈鐵和切爾諾夫之流的愚蠢贊助下所作的事情，正是這樣。

戰爭既非常加速了使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因此也就使人類非常接近於社會主義了，這就是歷史底辯證律。

帝國主義戰爭是社會主義革命底前夜。這不祇是因為戰爭所造成的慘痛產生出無產階級的起義，——如果社會主義在經濟上尙未成熟，那末任何起義也不會創造出社會主義，——而是因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滿的物質準備，是進到社會主義的門階，是歷史梯子上這樣的

一級，即從這一級到稱爲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級段的。

★

★

★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對於社會主義這問題是以學理主義的態度，即是根據他們讀得爛熟却不很瞭解的學理來觀察的。他們把社會主義想像爲一種遙遠而不可知的模糊的將來。

其實，社會主義現已出現於現代資本主義底一切窗牖內，在這最新資本主義基礎上每前進一步的巨大設施中，社會主義都實際地直接地顯現出來了。

什麼是普遍勞動義務制呢？

這就是在最新壟斷資本主義基礎上一個前進的步驟，進到按照一定的總計劃來調節全部經濟生活的步驟，進到節省國民勞動，防止資本主義濫費國民勞動的步驟。

在德國，是由容克（地主）和資本家施行普遍勞動義務制，所以它就必然成爲使工人作軍事苦役的制度。

可是，你試想想，這一制度由革命民主國家來實行的時候，會有怎樣的意義吧。

由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所施行，所調整，所指導的普遍勞動義務制，這還不是社會主義，但這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了。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巨大步驟，在完全民主制存在的條件下，除非對

羣衆施行空前殘忍的暴力手段，決不能從這樣的步驟退回到資本主義去。

消除經濟破壞與戰爭問題

既說到防止臨頭災禍的辦法問題，我們就要把另一個極重要的問題說明一下：這就是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的聯繫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與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間，即萬惡強盜戰爭與正義民主戰爭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我們已經指出過，我們所闡明的一切防止災禍的辦法，是會大大加強國防能力，換言之，即加強國家軍事實力，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若不把掠奪戰爭變爲正義戰爭，把資本家爲了自己利益所進行的戰爭變爲無產階級爲了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利益而進行的戰爭，則這些辦法是不能實行的。

的確，把銀行和新迪加收歸國有，同時取消營業秘密和實行工人對資本家的監督，不僅會使國民勞動大大節省，不僅可能節省人力和經費，而且也會使勞動大衆，即大多數居民底生活狀況改善。大家知道，在現代戰爭中，經濟組織是有決定意義的。在俄國，糧食、煤炭、煤油、鐵都

很充分，——在這一方面，我國底狀況比歐洲任何一個交戰國都要好些。當用上述辦法消除經濟破壞，鼓勵羣衆來自動參加這個鬭爭，改善羣衆生活狀況，實行銀行國有和新迪加國有，俄國便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民主制度來把全國在經濟組織方面提到更加高得無比的程度。

假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不與那阻礙一切監督辦法，對生產怠工的資產階級成立「聯合政府」，而在四月間就使政權轉歸了蘇維埃，並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作「倒閣組閣」的把戲，不把自己的力量用作爭得與立憲民主黨人並列盤踞一些總長次長等等的高位來過官僚生活，而是把力量用作領導工農實行對資本家的監督，領導工農進行反資本家的戰爭，那末，俄國現時就會已在經濟上完全改造的國家，就會實現了土地農有，銀行國有，即是說，在這些方面（而這是現代生活極重要的經濟基礎）就會比所有其餘的資本主義國家都要發展得高些。

實現了銀行國有的國家，其國防能力，其軍事實力定比銀行留在私人手中的國家高些。土地已歸農民委員會所有的農民國家，其軍事實力定比土地仍歸地主所有的國家高些。

人們常常援引法國人在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時的英勇愛國精神和軍事義勇奇蹟。可是他們常常忘記當時唯一可能造成這種奇蹟的物質的，歷史經濟的條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毀那過時的封建制度，使全國過渡到更高的生產方式，過渡到自由的農民土地所有制，並且是用真正革命

民主主義的速度，堅決手段，毅力和忠誠精神來實現這種過渡，——這就是那些以「神奇」速度挽救了法國，而把它的經濟基礎改造革新了的物質經濟條件。

法國底例子告訴我們一件事，唯一的一件事，這就是要使俄國成爲具有國防能力的國家，要在俄國也達到羣衆英勇的「奇蹟」，那就必須用「雅可賓式的」無情手段掃除一切舊的東西，而在經濟上革新俄國，改造俄國。這在二十世紀時代是不能單用推翻專制制度（法國在一百二十五年前已不僅限於此）來達到的。這甚至不是單用革命手段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我們連這一點也沒有做到，因爲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叛變了農民！），單是把土地轉交農民所能做到的。因爲我們處在二十世紀的時代；單有對土地的統制，而沒有對銀行的統制，是不能使人民生活改造和革新的。

在十八世紀末，法國在物質方面，即生產方面的革新是與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連繫着，是與革命民主派和革命無產階級底專政（當時民主派還沒有和無產階級分開，而無產階級還幾乎是和民主派溶合在一塊）連繫着，是與向一切反動勢力作無情的戰爭連繫着。全體人民，特別是羣衆，即被壓迫階級，都充滿着無限的革命熱情；大家都認爲當時的戰爭是正義的，防衛的戰爭，而且事實上也是這樣的戰爭。革命的法國防禦了反動君主歐洲的侵犯，並不是在一七九二至一

七九三年，而是在多年以後，當國內反動勢力獲勝以後，拿破崙的反革命專政才把法國所進行的戰爭由防衛的戰爭變成了侵略的戰爭。

在俄國怎樣呢？我們繼續進行着帝國主義的戰爭，這戰爭是爲着資本家利益，與其他帝國主義者結成聯盟，遵照沙皇與英國等等資本家所訂秘密條約來進行的，在這些條約上答應俄國資本家劫掠他國，佔領君士坦丁堡、里沃夫、阿爾明尼亞等等。

當俄國還沒有提議締結正義和平並與帝國主義斷絕關係的時候，則俄國所進行的戰爭，仍舊是非正義的、反動的、侵略的戰爭。戰爭底社會性質，它的真正意義，並不是由敵軍駐在什麼地方來決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就是這樣想法，而墮落到了無知村夫底庸俗見解之中）。戰爭底性質是由戰爭所繼續的是什麼政策（「戰爭是政策底繼續」），是由哪一階級爲了什麼目的才進行戰爭的事實來決定的。

引導羣衆去作履行秘密條約的強盜戰爭而指望羣衆表現熱情，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國底先進階級，即無產階級，日益明白覺悟到戰爭底罪惡性質，資產階級不僅不能打破羣衆底這種信念，恰恰相反，他們對戰爭罪惡性質的悟解力正在增長着。俄國兩都無產階級已澈底成爲國際主義的無產階級了！

這裏怎麼還談得到擁護戰爭的羣衆熱情咧！

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是彼此緊結而不可分離的。沒有人民在大胆堅決實行偉大經濟改造時所表現的莫大英勇精神，便不能使國家成爲有國防能力的國家。而不與帝國主義斷絕關係，不向各國人民提議締結民主和平，不以此來把侵略、強盜、犯罪的戰爭變爲正義、防衛、革命的戰爭，便不能喚起羣衆底英勇精神。

祇有對內對外政策上都忠誠澈底地與資本家斷絕關係，才能挽救我國的革命，才能挽救我們被帝國主義鐵磨壓榨着的國家。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無產階級

現代俄國底民主派要想成爲真正革命的，就應該與無產階級最密切地聯合前進，擁護它這個唯一革命到底的階級所進行的鬭爭。

對於防止勢所不免的空前災禍的方法加以分析之後，所得出的結論，就是如此。

戰爭既造成了莫大的危機，使人民的物質和精神力量都緊張到極限，使全部現代社會組織受

到莫大的打擊，於是就使人類祇能二一擇一：或是死亡，或是把自己的命運付託給最革命的階級，好來最迅速、最急進地過渡到更高的生產方式。

由於許多歷史原因——俄國比其他國家更爲落後，俄國所遭受的戰爭困難特別之大，存在着最腐朽的沙皇制度，一九〇五年革命傳統之生氣勃勃，——就使俄國比其他國家先爆發革命。革命所已做到了的，是俄國按其政治制度說來，在幾個月以內便趕上先進國家了。

可是這還不夠。戰爭是鐵面無情的，它用毫不容情的嚴厲方式提出問題：或是滅亡，或是在經濟方面也趕上並超過先進國家。

這是可能的，因爲在我們面前擺着有許多先進國家底現成經驗，有它們在技術和文化方面的現成結果。有在歐洲高漲着的反戰抗議，有日益發展着的全世界工人革命環境給我們以精神上的幫助。有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極少見到的革命民主自由督促着我們，驅策着我們。

或是滅亡，或是開足馬力向前猛進。歷史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在這樣的時機，無產階級對農民的關係證實着——在形式上有相當的改變——布爾塞維克的老原則：要把農民從資產階級影響下奪取過來。祇有這才是挽救革命的保證。

而農民在全部小資產階級羣衆中是人數最多的。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負起了反動的作用：把農民阻留在資產階級影響下，引導農民去與資產階級聯合，而不去與無產階級聯合。

革命經驗迅速教導着羣衆。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底反動政策已在破產：他們已在兩都蘇維埃中被打敗了。在這兩個小資產階級民主黨中都有「左」的反對派增長着。一九一七年九月十日在彼得堡舉行的社會革命黨市代表會議上，趨向於與無產階級聯盟，而拒絕與資產階級聯盟（建立聯合政府）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獲得了三分之二的大多數。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重複着資產階級最愛說的把資產階級與民主派對立起來的論調。可是這種對立其實是毫無意識的，正好像尺與斗之不能對比一樣。

有民主派的資產階級，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派：祇有絲毫不懂歷史和政治經濟學的十足蠢才，才能否認這點。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之所以需要這種荒謬的對立，是爲掩蓋一件無可爭論的事實：即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站着有小資產階級的事實。小資產階級由於它在經濟上的階級地位，是必然要動搖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把小資產階級拉去與資產階級聯盟。他們的全部「聯合政策」底實

質，整個聯合內閣，標本的半立憲民主黨人克倫斯基底全部政策底實質就在這裏。在這半年的革命中，這個政策已遭到完全破產了。

立憲民主黨人幸災樂禍地說：革命遭受了破產，革命既沒能消除戰爭，也沒能消除經濟破壞。

這是謊話。遭受破產的乃是立憲民主黨人與社會革命黨人加上孟塞維克，因為這個聯盟統治了俄國半年，在這半年中，使經濟破壞狀態加強了，使戰爭局面弄得更混亂，更困難了。

資產階級與社會革命黨人及孟塞維克的聯盟破產得愈充分，則人民也就學會得愈迅速。人民也就會更易於找到正確的出路：這出路就是貧農，即大多數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盟。

一九一七年十月末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二卷，第四七一至五一四頁

列寧：關於工人監督條例草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三日——

(一) 在僱用工人職員共計五人和五人以上，或每年資金週轉在一萬盧布以上的一切工業、商業、銀行、農業等等企業中，施行由工人監督一切產品和原料之生產，保存和買賣事宜的辦法。

(二) 工人監督，在小企業中則由全體工人和職員直接實行，在其他情況下則經過其所選出的代表實行之，此種代表應立刻在全體大會上選出，須有選舉記錄，並須把被選人姓名通知政府和當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三) 非經工人職員所選代表之同意，絕對禁止具有全國意義的企業或工廠（參看第七條）停工，以及對生產進程作任何改變。

(四) 一切賬簿文件及一切倉庫和儲存的原料、工具、產品等，應一無例外地向工人和職員選出的代表公開。

(五) 凡工人和職員選出的代表底決定，企業主必須服從，祇有職工會和代表大會才有權取消這種決議。

(六) 在一切有全國意義的企業中，一切企業主和一切由工人職員選出行使工人監督權的代表，概應對國家負維持嚴格秩序、紀律和保護財產之責。凡犯有玩忽怠慢，隱瞞存貨和賬目等等罪行者，除沒收全部財產外並處以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七) 凡為國防事業工作以及與生產民衆生活必需品有關的企業，概認為是有全國意義的企業。

(八) 工人監督辦法細則，由各地工人代表蘇維埃以及工廠委員會代表會議和職員委員會之全體代表會議規定之。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六日（舊曆三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一百七十八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三一七至三一八頁

列寧：關於國民經濟社會化的法令草案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

糧食恐慌情形，以及由於資本家和官吏底投機、怠工和一般經濟破壞所造成的飢荒威脅致使必須採取非常的革命辦法來反對這種禍害。

爲了使全國公民，首先是一切勞動階級在其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領導下，能立刻從各方面毫無顧忌地採取最革命的手段來進行這種鬭爭並着手調整全國正常的經濟生活起見，特議決下列法規：

實行銀行國有及其必要辦法的法令草案

(一) 一切股份企業概行宣佈爲國有財產。

(二) 各股份公司底董事和經理以及屬於富有階級（即全部財產在五千萬盧布以上或每月收入在五百萬盧布以上者）的一切股東必須有條不紊地繼續經營業務，執行關於工人監督的法令，把一切股票交給國家銀行，每星期應將自己的活動情形向當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報告。

(三) 所有國家內外公債一律宣告作廢。

(四) 握有債券和各種股票的小私有者，即屬於居民中勞動階級的小私有者底利益，予以完全保障。

(五) 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即從十六歲起至五十五歲止的一切男女公民，都必須執行當地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或其他蘇維埃政權機關所指定的工作。

(六) 規定下列辦法爲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的第一個步驟：凡屬於富有階級的人（參閱第二條）都必須備有工作人消費摺或工作人收支摺並正確記載之，必須把這些摺交到相當工人機關，或當地蘇維埃及其機關去登錄各人已執行的工作情形，每星期登錄一次。

(七) 爲了使糧食及其他必需品有正確的統計和分配起見，國內全體公民都必須加入某一個消費協社。糧務局，供給委員會及其他類似機關，以及鐵路工會和運輸工會，都必須在工兵農代

表蘇維埃領導下實行監督本法令之執行。特別是富有階級的人，在組織和進行消費協社業務方面，必須執行蘇維埃所指定的工作。

(八) 各鐵路職工會必須火速製定並立刻開始實行各種非常辦法來更正確地辦理運輸事業，特別是載運糧食，燃料及其他最緊要的必需品，其行動準則首先是工兵農代表蘇維埃的定單和發車證，其次是由各蘇維埃及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所委託的機關發出的定單和發車證。同樣實成各鐵路工會協同各地蘇維埃採取最積極的辦法以至採用革命手段來反對投機小販，並無情取締一切奸商。

(九) 各工人組織，職員工會和地方蘇維埃，必須毫不遲延地把快關閉的和要復員的企業以及失業工人動用去進行有益的生產，製造必需品，着手尋找定貨、原料和燃料。各地工會和蘇維埃必須無論如何都不攔延這種工作，同時在尚未牽到上級機關特別指令之前，即開始實行城鄉產品底交換，但須嚴格遵守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底指示和指令。

(一〇) 凡屬富有階級的人必須將其所有現金存入國家銀行或分行以及各儲金社中，每星期領作消費需要的數目不得超過一百至一百二十五盧布（按當地蘇維埃底規定），而領作生產和商業需要的，必須有工人監督機關所發給的證書。

爲了監視本法令之切實執行起見，將頒佈用現行紙幣兌換其他紙幣的規則，凡犯有欺騙國家和人民的罪行者應受沒收全部財產的處分。

(一一) 凡不服從本法令的人，怠工者、罷工官吏以及投機商人均受上述處分並加以拘禁或押往前綫，或罰作苦工。各地蘇維埃及所屬各機關，必須趕急擬定最革命的辦法來反對這些真正的人民公敵。

(一二) 職工會及其他勞動者組織應協同地方蘇維埃組成飛行監督團，其中須有黨和其他組織所推薦的最可靠的人參加，監督團底責任就是監視本法令執行的情形，檢閱工作底數量和質量，並將違犯法令或迴避法令者提交革命法庭審判。

刊載於一九一八年國民經濟雜誌第十一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四三至四四五頁

列寧·關於消費公社之命令草案

——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至十日——

資本家之間爲瓜分其掠奪物的鬭爭所引起的戰爭，其結果已造成了難以形容的破壞與毀滅。罪惡的投機與利潤之角逐——特別是在富有階級之間——更使這種破壞和毀滅加劇了，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的人民，都由於此種結果而遭受到飢餓與失業底痛苦。採取非常手段以救濟飢餓者和無情制止投機者之必要，就使得工農政府決意製定下列的條例，作爲俄羅斯共和國底一種法律：

國家底每一個公民，都須加入地方上的消費公社（村、鎮、小村落、市區、街道等等）。

各家庭之集合而爲消費公社，須是自由的，僅有這樣一個限制，即每個公社中，非富有階級的成份（即工人，不使用僱傭勞動的農民，等等），不得少於社內家庭數目底三分之二。

除採購與分配生產品之外，每個消費公社，都須管理土產品底銷售事宜。消費公社理事會，

必須設立供給委員會；如無相當的供給委員會之書面的證明，則任何生產品之運輸，皆不得予以通行。

現存的消費公社，茲宣佈收歸國有，此等公社須容納其所在地之全體居民——毫無例外——加入該社。

私人，可以不在他們地方上的商店而到中央商店去購買生產品，但祇有在下列條件之下，即把這筆賬亦記入該地方上的消費公社底賬簿中。

生產品底運輸、以及購買與出賣，如無供給委員會之證明書，則將受到如下的處罰，即沒收犯罪者之全部財產，加以爲期不得少於六個月之監禁，並須從事強迫勞動。

批准生產品運輸或購買與出賣之證明書，須繕寫兩份，並須經相當的供給委員會三個委員（不得少於此數）之簽署；一份須交理事會之文件案卷中保存之。

每一證明書，皆須指明：生產物係由某一消費公社運出而送交那一消費公社，電報局對於供給委員會之電報，須立即拍出，不得依次積壓。

一切供給委員會，其行動皆須在地方上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底監督之下，並須按照該蘇維埃底指示爲之。

每一個人皆有權利在其消費公社中自由取得生產品，而不受任何限制，但有爲舶來品入口而規定的限制條例，自不在此例。

爲出賣而生產之生產品，必須按照自由的價格，送交地方上的供給委員會，但在法律已規定固定價格之場合，不在此例。支付生產品之錢款，須記入生產品所有者在人民銀行賞地（村、鎮、城市、工廠或其他）支行底流水賬中。

每一個工兵農代表蘇維埃都須委任一批監查員、查賬員及教導員，以協助人民組成消費公社（供給委員會），並檢查其賬目及其一切經營活動。

關於供給委員會賬目管理與通信來往之指示，將另行頒佈之。

列寧：怎樣組織比賽

——一九一八年一月七日至十日——

資產階級的作家在過去以至現在都耗費着無數紙筆，來頌揚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制度底競爭及私人進取心等等壯舉和素質。責備社會主義者不願意瞭解這些壯舉底意義，不顧及「人底天性」。其實，資本主義早已把那能使競爭在相當廣闊範圍內培植進取心、毅力和大胆倡首精神的小商品獨立生產排倒下去，而代之以大工廠生產、股份公司、新迪加及其他壟斷組織。在這樣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競爭就是空前殘暴地壓制居民大眾的，即居民中絕大多數，百分之九十九的勞動者底進取心、毅力和大胆倡首精神，競爭也就是排斥比賽而代之以財政上的欺詐行爲、專橫霸道和對社會上層份子的卑鄙逢迎。

社會主義不僅不窒息比賽，反而是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大規模地、真正廣闊地運用比賽的

可能，吸引真正大多數勞動羣衆來參加這種工作，在這工作中，他們可以顯現自己的身手，可以發揮自己的能力，可以表露出自己的才幹，這種才幹在民衆中是尙未開掘的泉源，可是它們被資本主義成千成萬以至成百萬地壓抑、蹂躪和窒息了。

現在當社會主義政府執政時，我們的任務就是要組織比賽。

資產階級底傭僕和食客們把社會主義描寫成爲枯燥的、官場的、單調的、死氣沉沉的軍營生活。資本家底看門狗，剝削者底奴僕，即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老爺們，總是用社會主義來「恐嚇」民衆，而民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却正是陷於勞苦不堪、半飢半飽、極端貧困的苦工牢獄和軍營生活的境況中。使勞動羣衆擺脫這種苦工牢獄的第一個步驟，就是沒收地主土地，施行工人監督制，實現銀行國有。往後的步驟將是實行工廠國有，務使全體居民加入消費協社（同時這種協社也就是產品推銷會社），由國家壟斷糧食及其他必需品的貿易。

祇有現在才真正使羣衆有廣泛的可能來表現進取心、比賽和大胆倡首精神。趕走了資本家或至少是實行真正工人監督來制裁他的每個工廠，趕跑了地主剝削者並已奪去其土地的每個農村，現在，而且祇有現在，才是使勞動者可以表現自己能力，可以稍爲揚眉吐氣，可以覺得自己是人的這活動場所。千百年來都是替別人勞動，替剝削者做奴隸式苦工的人，經過了這樣的時光之

後，現在才第一次有可能來爲自己工作，而且是憑靠一切最新技術和文化的成果來工作。

當然，自爲勞動代替了奴役勞動，這種人類史上最偉大的交替，是不能不遇到摩擦、困難和衝突，不能不採用強力手段來對待那些頑梗不化的寄生蟲及其傭僕的。對於這一點任何一個工人也不會有什麼幻想：工人和貧農們，既受了積年累歲替剝削者做苦工時的無數欺侮凌辱所鍛鍊，既受了苦重難堪的貧困生活所鍛鍊，他們也就知道要打破剝削者底反抗定是需要時間的。工人和農民絲毫也沒有沾染知識份子老爺們，所有這些新生活報派以及其他敗類等等底情感主義幻想，這般老爺們『高喊』反對資本家，喊得喉嚨嘶啞，並『指手畫腳』『痛斥』資本家，可是一到要真正做事，要實現自己的威脅，要在實踐中來真正撤銷資本家的時候，他們便痛哭流涕起來，好像挨了打的小狗兒一樣。

用自爲的勞動，即用在全國的（在相當程度上也是在國際的，在世界的）巨大規模中有計劃有組織的勞動來代替奴役勞動，這種偉大更替，除了要用『軍事』辦法來鎮壓剝削者底反抗之外，還需要無產階級和貧農施展出組織上和組織家的巨大努力。組織任務是與採用軍事辦法無情鎮壓昨日的奴隸主（資本家）及其奴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老爺們的任務溶爲一體而不可分割的。昨天的奴隸主及其在知識界中的傭僕們總是這樣想，這樣說：我們從來都是組織者和長官，

我們曾號令一切，我們想仍舊當這樣的人物，我們不會來聽從那些「老百姓」，那些工人和農民，我們不會服從他們，我們要把知識變作保護資本特權和資本對人民統治的武器。

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總是這樣說着，想着，行動着。從自私自利的觀點上看來，他們的行爲是很自然的：農奴地主所豢養的那些食客和寄生蟲，果戈里所描寫的那些典型牧師、司書、官吏等類人物，痛恨拜林斯基〔六〕的那些「知識份子」，也「很難」與農奴法分離。可是剝削者及其在知識界中的奴僕們底事業決毫無希望。工人和農民正在打破他們的反抗——可惜還打得不十分堅決無情，——並且一定會打破這種反抗的。

「他們」以爲「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貧農，決辦不好社會主義革命所加到勞動羣衆肩上的那種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真正英勇偉大的組織任務。「沒有我們是不行的」——那些慣於替資本家和資本主義國家効勞的知識份子這樣安慰自己說。他們這種厚顏無恥的打算決不會實現：富有學識的人現在就已分化出來，轉到人民方面，轉到勞動羣衆方面，幫助民衆來打破資本僕役們底反抗。而具有組織才能的人物在農民和工人階級中是很多的，這些人材現在剛剛才自覺有力，醒悟起來，趨向於生動的、創造性的偉大工作，獨立從事於社會主義社會底建設事業。

現在最主要任務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最主要任務的話，——就是要儘量廣闊地發展工人

以及所有一切被剝削勞動羣衆在組織工作的創舉中所表現的自動倡首精神。無論如何都要打破那種荒謬、妄誕、卑鄙齷齪的舊成見，似乎管理國家，管轄社會主義社會底組織建設工作，祇有所謂「上等階級」，祇有富人或受過富有階級教育的人，才能勝任。

這是成見。支持這種成見的，則是那些腐敗慣例，頑固守舊，奴才習氣，尤其是資本家齷齪的私利觀念，這些人正是有利於藉管理來搶劫，爲搶劫而管理。這樣不行。工人們一分鐘也不會忘記自己需要知識力量。工人們在求知方面表現得非常熱心，又恰恰是在現時，這就證明無產階級對於這一點沒有迷誤，也決不會有迷誤的。可是組織家的工作是凡能識字，善於知人，有實踐經驗的普通工人和農民都可以勝任的。這樣的人，在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所藐視鄙稱的「老百姓」中，是多得很多的。這樣的人才，在工人階級和農民中，有如毫末開掘的泉源，並且是一個最豐富的泉源。

工人和農民還有些「胆怯」，還未領會到他們現在是統治階級，他們還不够堅決。革命是不能在學生都迫於飢餓貧困而不得不在鞭笞威脅下工作着的千百萬人中，一下子就造成這種品質的。可是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正是喚醒着這些品質，打破一切舊障礙，斬斷陳腐的桎梏，把勞動羣衆引上獨立創造新生活的大道，十月革命底力量就在這裏，它的生命力就在這裏，它的不可

戰勝性也就在這裏。

實行統計與監督，這就是每個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每個消費協社，每個供給會社或委員會，每個工廠委員會或一般工人監督機關底主要經濟任務。

人們有一種舊習慣：總是用不自由人底眼光來觀察勞動標準，觀察生產資料，祇想擺脫多餘的重担，祇想從資產階級那裏奪得一點東西。必須與這種陳舊習慣作鬥爭。這種鬥爭已由先進的有覺悟的工人開始了，他們正在給工廠工人中的異己份子以堅決的回擊，這種份子在戰時出現得特別多，而現在還想照舊用怎樣能「多撈一塊就跑」的唯一想法來對待人民工廠，對待那些已轉為人民財產的工廠。農民中和勞動羣衆中所有一切覺悟的、誠實的、有思考力的份子，都會在這一個鬥爭中站到先進工人方面來。

既然無產階級底政治統治已經建立，已有保障，則實行統計與監督，——如果這些辦法是由工兵農代表蘇維埃以最高國家政權機關的資格來實行，或者依照這個政權的指示和委託來實行的話，——即到處實行普遍的，包括一切的統計與監督，實行對勞動數量和產品分配的統計與監督，這便是社會主義改造實質之所在。

為過渡到社會主義所必需的統計與監督，祇能是由羣衆來實行的。祇有由工農羣衆自願而誠

意地帶着滿腔革命熱情來共同進行這種對富人，對騙子，對懶漢，對流氓而實行的監督和統計，才能克服可惡資本主義社會底這些餘孽，才能克服人類中的這些糟粕，這些無可救藥的、腐敗的、僵死了的成份，這種由資本主義遺留給社會主義的惡疾、瘟疫和毒癩。

工人和農民們，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們！土地、銀行、工廠都已轉爲全民財產了！大家親自來統計與監督產品底生產和分配吧，——這就是，而且祇有這才是達到社會主義勝利的道路，才是社會主義勝利的保障，才是戰勝一切剝削和一切貧窮困苦的保障！因爲俄國有足夠全體人民享用的糧食、鐵、木料、羊毛、棉花和麻，祇是要正確分配勞動和產品，祇是要對這種分配建立全民認真切實的監督，祇是要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經濟生活中戰勝那些人民公敵：富人及其食客，其次是騙子、懶漢和流氓。

對於這些人民公敵，社會主義底公敵，勞動者底公敵，是不容有絲毫寬恕的。要對富人及其食客即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作殊死的決戰；要對騙子、懶漢、流氓決戰。無論前者或後者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資本主義底兒子，都是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社會底餘孽，在這種社會中，一小羣人掠奪人民，欺侮人民，在這種社會中，貧窮困苦的現象使成千累萬的人走上邪路，忘記自己的人格，去幹無賴流氓、賣身受賄、欺騙詐取的勾當，在這種社會中，必然養成勞動者這樣一種心

理：祇要能逃避剝削，那怕用欺騙伎倆也好；祇要能設法避免可惡的工作，那怕是一分鐘都行；祇要能避免飢餓，能使自己和家口飽足一下，便想盡方法，不擇手段來奪得麵包，那怕是一小塊也不錯。

富人和騙子是同胞兄弟，這是資本主義養育成的兩種主要的寄生蟲，這是社會主義底兩種主要敵人，對於這些敵人應當由全體人民加以特別監視，當他們稍一違犯社會主義社會底規則和法令時，便應無情地加以懲治。在這方面表示任何軟弱，任何動搖，任何憫惜，都是對社會主義的莫大罪行。

爲要使社會主義社會免除這些寄生蟲的危害，就應當組織對勞動量，對物品生產和分配的全民統計和監督，即由千百萬工農羣衆自願、努力、帶着滿腔革命熱情來擁護的統計和監督。統計和監督是十分簡易的，是每個誠實、精明、能幹的工人和農民都能勝任的，要組織這種統計和監督，就必須喚起工農自己的，即從他們中間產生的組織人才，就必須喚起他們在組織成績方面實行比賽，——並在全國範圍內佈置好這種比賽，——就必須使工農份子明白懂得，要向有學識的人徵詢意見是一回事，要由「簡樸的」工農來監督那些「有學識」人所常有的疏懈行爲，却是另一回事。

這種疏懈、粗忽、大意、草率、舉動急躁，愛用討論來代替作事，用空話來代替工作的惡習，無事不幹而一事不成的惡習，是「有學識人」底特性之一，這根本不是由於他們天性惡劣，更不是由於他們心懷惡意，而是由於他們的一切生活習慣，由於他們的勞動環境，由於疲勞過度，由於智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非常態的分離現象等等所產生出的。

由於我們隊伍中知識份子這種可悲的，但在現時是不可避免的特性，由於工人對知識份子底組織工作沒有實行充分的監督所產生的那些錯誤等等，在我國革命進程內所常有的那些錯誤、缺陷、過失中，的確起了不少的作用。

工人和農民還有些「胆怯」，他們應該免除這種毛病，而他們定會脫掉這種毛病，若沒有有學識的人、知識份子、專家底意見和指示是不行的。每個多少精明的工人和農民對於這點，都知道得很清楚，我們人中的知識份子決不能抱怨說工農方面不充份注意他們的意見，對他們的同志尊敬態度不够。但意見和指示是一回事，組織切實的統計和監督却是另一回事。知識份子往往能提供極好的意見和指示，可是到了要實行這些意見和指示，要真正切實監督來把言論變成事實時，他們却「笨手笨腳」，無力得可笑，無力得可恥，無力得荒謬絕倫。

所以在這一方面，若沒有從「人民」出身，從工人和勞動農民出身的實際組織家的幫助，沒

有這些人底領導作用，是無論如何也行不通的。『萬事皆人爲』，——工人和農民應當把這個真理記得爛熟，他們應當懂得，現在最主要的應當是實踐，現在已經進到了這樣的歷史關頭，這時，理論要變爲實踐，理論要由實踐來鼓舞，要由實踐來糾正，要由實踐來檢閱，這時，原來馬克思所說的這句話是特別正確的：『一步實際運動勝於一打綱領』〔七〕，——在實踐上對富人和騙子加以切實約束、制裁、加以完全統計和監督的每一步驟，都勝過一打關於社會主義的漂亮談論。因爲『朋友啊，理論是暗淡的，而生活之樹却是常青的』〔八〕。

必須在工農出身的實際組織家們中間組織比賽，應當反對知識份子所愛好的一切死板公式以及想從上面規定統一模型的企圖。死板公式和從上面規定統一模型的辦法是與民主集中制和社會主義的集中制沒有任何共同之點的。在細則方面，在地方特徵方面，在處事方式方面，在實踐監督的方法方面，在消滅和制裁寄生蟲（富人和騙子，知識份子中的懈怠者和狂人等）的階段方面的多樣性，在基本上，根本上，主要問題上，不僅不會破壞統一性，反而會保證統一性。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下層的首倡、自動精神、自由機動、宏偉毅力和那自願實行而與死板公式絕不相容的集中制配合起來的偉大模範。我們的蘇維埃現在也是遵循着這些道路。可是它們還有些『胆怯』，還沒有開展自己的能力，還沒有『浸入』到自己建立社會主義秩序的新的偉大創造

工作中去。必須使各地蘇維埃更大胆、更有自動精神地來進行工作。必須使每個「公社」——每個工廠，每個鄉村，每個消費協社，每個供給委員會都能來實際組織對勞動和產品分配的統計與監督，都能來互相比賽。這種統計和監督底綱領是簡單明瞭，誰都懂得的：就是要使每個人都有麵包吃，每個人都不穿壞鞋子和破衣服，都有溫暖的住宅，誠實工作，使任何一個騙子（其中也包括不願作工的懶漢）都不致逍遙法外，而是坐在牢獄裏，或受到最苦重的強迫勞動的處分，使任何一個違反社會主義規則和法令的富人都不會逃脫騙子所遭受的命運，而這種命運照道理也是富人所應該遭受的。「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就是社會主義實踐的訓條。這就是要在實踐上辦好的事情。我們的「公社」，我們由工農出身的組織家，尤其是知識份子出身（其所以說尤其，是因為他們太慣於，過分慣於以自己的普泛指示和決議案自豪）的組織家是應以這樣的實踐成績來自豪的。

公社和城鄉小支部，都應當自動製定出成千的對富人、騙子和懶漢作實際統計和監督的方式與辦法，並在實踐中把它們試驗好。在方式與辦法方面底多樣性，是生命力底保障，是勝利地達到共同一致目標的保證，這個共同一致的目標就是肅清俄國土地上的一切害蟲，肅清跳蚤般的騙子，臭蟲式的富人等。在一個地方拘禁幾十個富人，一打騙子，半打偷懶的工人（如像做

得城裏，特別是黨印刷局裏的排字工人懶於作工，這同樣也是流氓式的行爲）。在另一個地方叫他們去清掃廁所。在第三個地方，叫他們坐了監牢之後，給他們一張黃紙證書，使全體人民在他們悔過以前，把他們當作危害份子來加以監視。在第四個地方，從十個偷懶罪犯中拿出一個來就地槍斃。在第五個地方，想出各種不同方法來配合運用，例如用有條件釋放的辦法來使富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騙子和流氓中那些可以改正的份子迅速自新過來。方式愈紛繁愈好，共同的經驗就會愈加豐富，社會主義的成功就會愈加可靠而迅速，實踐就會愈加容易規定出——因為祇有實踐才能規定——最好的鬭爭手段和方法。

究竟做到了在哪一個公社裏，在大城市中哪一個街坊裏，在哪一個工廠裏，在哪一個鄉村中，沒有飢餓者，沒有失業者，沒有富足的懶漢，沒有資產階級奴僕中的惡徒以及自稱爲知識份子的怠工者；哪裏對於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事情作得多些；哪裏對於爲貧人建造良好的新房屋，把貧人安置到富人房屋裏去居住的工作作得多些；哪裏對於正常供給貧家每個小孩一瓶牛奶的事情作得多些；——正是在這些問題上，各公社、村社、消費生產協社、共耕社和各工兵農代表蘇維埃應當開展比賽。正是在這種工作上，組織家的才幹應當實際顯現出來，並提拔去參加全國範圍的管理事業。組織家的人才在民衆中是很多的。不過他們被壓抑住了。應該幫助他們發揮起來。

他們，而且祇有他們，在羣衆贊助之下，能够挽救俄國，挽救社會主義的事業。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日刊載於真理報第十七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六八至四七六頁

列寧：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草案〔九〕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

立憲會議決議：

(一)

(一) 俄國宣佈爲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和地方全部政權均歸蘇維埃掌握。

(二)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建立於各自自由民族之自由聯盟基礎上，而成爲各民族蘇維埃共和

國聯邦。

(11)

立憲會議之基本任務是消滅任何人對人的剝削，完全消除社會之劃分為各階級的現象，無情鎮壓剝削者底反抗，建立社會主義的社會組織，使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獲得勝利，茲決議如下：

(一) 廢除土地私有制。全部土地連同一切建築物、農具及其他農業生產上的附屬物，均宣佈為全體勞動人民底財產。

(二) 批准蘇維埃關於工人監督和關於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的法令，以便保證勞動人民對剝削者實行統治的權力，並作為使工廠、礦山、鐵路和其他生產資料及運輸機關完全轉歸工農國家所有的第一步驟。

(三) 批准將一切銀行收歸工農國家所有的法令，作為使勞動羣衆擺脫資本壓迫的條件之一。

(四) 為了消滅社會中的寄生階層起見，施行普遍勞動義務制。

(五) 為了保證勞動羣衆掌握全部政權和消除恢復剝削者政權的任何可能起見，特令實行武

裝勞動者，建立社會主義工農紅軍並完全解除有產階級底武裝。

(11)

(一) 立憲會議表示具有不屈不撓的決心，要把人類從造成此次空前罪惡戰爭以致殺人遍野的財政資本和帝國主義底血爪下解救出來，因此完全贊同蘇維埃政權所執行的下述政策：廢除秘密條約，與交戰雙方軍隊中的工農進行最廣泛的聯歡，無論如何都要用革命手段來達到各國人民間以民族自由自決為基礎的不兼併不賠款的民主和平。

(二) 爲了同一目的，立憲會議主張與資產階級文明世界底野蠻政策完全斷絕關係，這種政策是以奴役亞洲和一般殖民地以及弱小國家中數萬萬勞動民衆為基礎，造成少數特殊民族中剝削者底幸福。

立憲會議表示歡迎人民委員會宣佈芬蘭完全獨立，開始從波斯撤退軍隊，宣佈阿爾明尼亞有權自決的政策。

(三) 立憲會議認為宣告廢除歷來沙皇、地主和資產階級政府所訂債款的蘇維埃法令是對國

際銀行和財政資本的第一個打擊，並深信蘇維埃政權定會堅定地遵循這條道路前進，一直達到國際工人起義反對資本壓迫的完全勝利。

(B)

立憲會議係根據十月革命前各黨所提出名單選出，當時民衆還不能全體奮起反對剝削者，還不知剝削者在捍衛其階級特權時實行反抗的力量多麼巨大，還沒有動手在實踐上來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所以立憲會議認爲，如果將自己與蘇維埃政權對立起來，那就甚至從形式觀點上說，都是根本不正確的。

按實質說，立憲會議認爲現在當人民與剝削者作最後鬭爭的關頭，在任何一个政權機關中都不能有剝削者插足的餘地。政權應當唯一屬於勞動羣衆及其全權代表機關——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立憲會議擁護蘇維埃政權和人民委員會頒佈的法令，並認爲自己的任務應僅限於規定社會之社會主義改造底根本原則。

同時，立憲會議力圖創立俄國各民族勞動階級間真正自由自願的聯盟，因而也就是更加密切鞏固的聯盟，所以它認定自己的任務僅在於規定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聯邦底根本原則，而讓每個民族中的工農羣衆在自己的全權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去獨立決定，究竟他們是否願意，並在何種基礎上參加聯邦政府及其他聯邦蘇維埃機關。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七日（舊曆四月）刊載於真理報第二期

選自一九一七年列寧文集，一九三七年版，第三卷，第四八五至四八七頁

列寧·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底國際狀況與社會主義革命底基本任務)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由於達到了和平，——雖然是極其苛刻和極不堅固的和平，——就能够在相當期間內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到社會主義革命之最重要和最困難的方面，——即集中到組織任務上來。

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在莫斯科舉行的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第四段(或第四部)中，——即在論勞動者底自我紀律，以及無情地反對混亂現象和搗亂組織現象的這一段(或這一部)中，已經將這個任務向一切被壓迫勞動羣衆明顯而確定地提出來了。

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所已得到的和平之所以不穩固，自然不是由於這共和國現在圖謀恢復軍

事行動：——除資產階級革命派及其應聲蟲（孟塞維克等等）以外，沒有一個頭腦健全的政治家會想到這種事情。和平之所以不穩固，是由於在東西兩方與俄國接壤的，擁有強大軍力的帝國主義國家內的主戰黨，隨時能佔得上風，這些主戰黨因看見俄國暫時衰弱而垂涎，並且是受着仇視社會主義和酷嗜搶劫的資本家們的慫恿的。

在這種情勢下，對於我們說來，和平之真實的而不是紙上的保證，祇是由於帝國主義列強間有已達到最高限度的爭執，其表現，一方面是西方國家間帝國主義戰爭之重新繼續進行，另一方面是日美互爭太平洋及岸其沿統治權之極端尖銳的帝國主義競爭。

很明顯的，防禦力如此薄弱的我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是處於非常不穩固而絕對危急的國際狀況中。必須把我們的一切力量極度緊張起來，以便利用全部客觀情勢所給予我們的這個喘息期間，來醫治戰爭所禍及俄國整個社會機體的極重創傷，來達到國家底經濟高漲，沒有這個條件，則國防力之多少嚴重的增高，都簡直無從說起。

同樣很明顯的：我們對於西歐那因為種種原因而遲遲尚未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所將給予的嚴重協助，這就全看我們解決我們面前組織任務的程度如何而定。

使我們當前首要的組織任務得以順利解決的基本條件，就是要民衆底政治領導者，即俄國共

產黨（布爾塞維克）黨員們，其次是勞動羣衆中一切有覺悟的份子，能够完全理解以前資產階級革命和現在社會主義革命間在這一方面的根本區別。

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勞動羣衆底主要任務，是在於實行消滅封建制度、帝制政體和中世紀關係這種消極的或破壞的工作。組織新社會之積極的或建設的工作，則是由佔人口少數的有產者或資產者來執行的。他們之所以能够不顧工人和貧苦農民底反抗而比較容易地執行此種任務，這不僅因爲當時受資本剝削的羣衆所作的反抗，由於自身的散漫性和不開通而表現得極其微弱；而且也因爲那建築在無政府狀態上的資本主義社會，有在深度和廣度方面都是自發發展着的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爲其基本的組織力量。

反之，無產階級和它所領導的貧苦農民，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因而也在已由我們於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開始進行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中的主要任務，却是積極的工作或建設的工作，就是要把包括千百萬人生存必需品之有計劃生產和分配的這一極繁雜而極精密的新組織系統辦理就緒。這種革命，祇有當人民大多數，首先是勞動羣衆大多數表現出有歷史意義的獨立創造精神之下，才能順利實現。祇有在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能够表現充分的自覺性、理智性、犧牲精神和堅定精神的情形之下，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然後才有保障。我們建立了使被壓迫勞動羣衆能够積

極參加獨立建設新社會事業的新形式，即蘇維埃形式的國家，但這還祇解決了困難任務的一小部份。主要的困難是在經濟方面：對產品底生產與分配上實行普及全國的最嚴格的統計與監督，提高勞動生產率，使生產在事實上社會化。

★

★

★

現時已在俄國執掌政權的布爾塞維克黨底發展過程，特別明顯地表明構成目前政局特點的現時歷史轉變究竟何在；這個歷史轉變，使蘇維埃政權必須抱定新的方針，即是要以新的方法來提出新的任務。

任何負有遠大使命政黨底第一個任務，原是說服大多數民衆，使他們相信這個黨底綱領和策略是正確的。在沙皇制度時代以及在切爾諾夫輩和策烈鐵里輩與克倫斯基和基什慶妥協的時期中，這個任務都佔着首要地位。現時這個任務，它雖顯然還遠未完成，而且無論何時都不會完成到底的，但大體上是已經解決了，因為在莫斯科舉行的最近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已經無可置辯地證明：俄國大多數工農顯然是站在布爾塞維克黨方面的。

我們黨底第二個任務，原是奪取政權並鎮壓剝削者底反抗，而這個任務也還沒有澈底完成，並且不能加以漠視，因為帝制派和立憲民主黨人以及他們的走卒孟塞維克與右派社會革命黨人，

仍然繼續在企圖聯合起來，以求推翻蘇維埃政權。可是，鎮壓剝削者反抗的這個任務，已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到（大約說來）一九一八年一月間或是到博加也夫斯基二〇投降的時期內，大體解決了。

現時提到了日程上而構成目前時局特點的，有第三個迫切任務，就是組織對俄國的管理。當然，這個任務，我們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底第二天，就已提出並努力解決過，可是在剝削者底反抗還採取公開的國內戰爭形式的時候，這個任務，曾不能成爲主要中心任務。

現在它已成爲這樣的任務了。我們布爾塞維克黨已經說服了俄國。我們奪得了俄國——從富人手中奪給窮人，從剝削者手中奪給勞動者。現在我們應管理俄國。目前時局底全部重心，全部困難，就在於要明瞭由說服民衆和用武力鎮壓剝削者的主要任務轉到管理的主要任務這一過渡底特點。

社會主義黨在世界歷史上第一次得以大體完成了奪取政權和鎮壓剝削者的這一事業，得以緊接近到管理的任務。務須使我們成爲確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底這個最困難（而且是最高尚的）任務的人。應該澈底想清：要有成效地實行管理，除了善於說服民衆以外，除了善於在國內戰爭中獲得勝利以外，還須善於實際地進行組織工作。這是一個最困難的任務，因爲這裏是要用新方

法去糾纏千百萬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經濟基礎。而且這是最高尚的任務，因為祇有在解決這個任務以後（在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解決以後），才可以說，俄國不僅成了蘇維埃共和國，而且成了社會主義共和國。

現時的總口號

由於極端苛刻而不穩固的和約，由於戰爭和資產階級底統治（其代表為克倫斯基和擁護他的孟塞維克以及右派社會革命黨人）所遺留給我們的極痛苦的經濟破壞、失業和飢荒，——由於這一切所造成的上述客觀情勢，必然產生出廣大勞動羣衆底極端疲憊，甚至精疲力竭的現象。他們極力要求——也不能不要求——相當的休息。現時擺在日程上的任務，就是要：恢復被戰爭和資產階級統治所破壞的生產力；醫治由戰爭、失敗、投機業和資產階級企圖恢復已被推翻的剝削者政權等所造成的創傷；促進國內經濟復興；牢固地維持起碼的秩序。蘇維埃政權現時縱然有資產階級、孟塞維克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底反抗，也只有在實踐上正是解決維持社會秩序的這些初步和最初步的任務，才能使俄國穩固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一點，看來好像是很奇怪的，而其

實因爲上述種種客觀條件，成爲毫無疑義的了。由於現時情勢中具體的特點，由於蘇維埃政權及其關於土地社會化與工人監督生產等法令存在的情形下，實際解決這些最初步的任務與克服走向社會主義之初步工作中組織上的困難，這在現時乃是一物底兩面。

精確而誠實地計算金錢，節省經濟，不懶惰，不盜公肥私，在勞動中遵守最嚴格的紀律——正是這些口號，從前資產階級用以掩飾自己這剝削階級的統治地位時，曾爲革命的無產者所正當譏笑過的，而現時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却已變成目前迫切的主要的口號了。一方面，勞動羣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便是挽救被帝國主義戰爭和帝國主義強盜們（以克倫斯基爲首）弄得半死半活的國家的唯一條件；另一方面，由蘇維埃政權，用自己的方法，根據自己的法令來切實執行這些口號，又是社會主義澈底勝利所必要的和足夠的條件。那班竟然拒絕將這些似乎是極其「陳腐」和極其「庸俗」的口號當作首要任務的人，正是不善於瞭解這層道理。我們這個小農國家僅在一年以前才推翻沙皇制度，僅在上半年以前才肅清克倫斯基之流，當然遺留下了不少的自發的無政府主義，而那種必然與長期反動戰爭伴隨而來的殘忍行動和野蠻行爲更把這種無政府主義加強了，同時就造成了很多失望情緒和無端憤恨的情緒，如果再加上資產階級走狗們（孟塞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等等）底挑撥政策，那末，非常明顯地，優秀的和最有覺悟的工農要使羣

衆底情緒完全轉變，並引導他們過渡到正確的、堅忍的、紀律化的勞動，就必須有如何長期堅強的努力。祇有由貧民羣衆（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實現的這種過渡，才能完成對於資產階級，尤其是對於最頑強和人數衆多的農民資產階級的勝利。

與資產階級鬥爭的新階段

資產階級在我國已被擊敗，可是還沒有根除，沒有消滅，甚至於還沒有澈底摧破。因此，在日程上便提出反資產階級鬥爭底新的最高形式，由繼續剝奪資本家的極簡單的任務，轉到一個更複雜和更困難得多的任務，就是要造成使資產階級既不能存在，也再不能產生的條件——很明顯的，這個任務是要高得不可測量，如不解決這個任務，那就還沒有社會主義。

拿西歐革命底規模來比較看，我們現時大約處於一七九三年和一八七一年所達到了的水準。我們完全有權來以達到了的這種水準而自豪，可是有一方面，我們毫無疑義還走得更遠一些，這就是：我們在全俄境內宣告並成立了最高式樣的國家——蘇維埃政權。但是，我們絕對不能因已得的成績而自滿，因為我們僅僅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而在這方面我們還沒有達到什麼有決定意

義的事情。

有決定意義的事情，就是對產品底生產和分配上建立最嚴格的全民統計和監督。然而，在我們已從資產階級那裏奪來的那些企業和經濟部門中，我們還沒有實行統計和監督，若不做這這一點，便絕對談不到去實現社會主義的第二個同等重大的物質條件，即在全國範圍內提高勞動生產率。

因此，決不能以繼續向資本進攻這個簡單公式來決定現時的任務。資本雖顯然還沒有被我們澈底擊敗，無條件地必須向勞動者底這個敵人繼續進攻；可是這樣來決定任務終究是不精確的，不具體的，其中並沒有估計到現在時局底特點，即是爲了保障往後繼續進攻能取得勝利起見，便應當在目前『停止』進攻。

關於這點，可以拿我們在反資本戰爭中的狀況與一個常勝軍隊底狀況作一比較來加以說明，譬如這個常勝軍隊，已奪取了敵人一半或三分之二的領土，此時它却不能不停止進攻，以便聚集力量，增加武器彈藥儲藏，修理並鞏固交通綫，建築新的軍需庫，調集新的後備軍等等。在這種條件之下，停止進攻，正是常勝軍隊爲了奪取敵人其餘的領土，即是爲了取得完全勝利所必需的。現時客觀情勢所要求於我們的，正是要這樣『停止』向資本進攻，誰不懂得這一點，那他就

完全不瞭解現時的政局。

當然，祇有加上括弧，即是祇是用比喻的說法，才能講到「停止」向資本進攻。在通常的戰爭中，可以下停止進攻的總命令，可以真正停止前進。而在反資本的戰爭中，却不能停止前進；因此，要我們放棄繼續剝奪資本，這是決然談不到的。這裏所講的，是改變我們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底重心。迄今以前，是直接剝奪剝奪者的設施，佔着首要的地位。現時佔着首要地位的，則是在資本家已被剝奪的那些企業和其餘一切企業中組織統計和監督。

如果我們在現時，仍然想用以前的速度繼續剝奪資本，那我們定會遭受失敗，因為每一個肯費思索的人都明白知道，我們組織無產階級的統計和監督的工作，顯然落後於直接「剝奪剝奪者」的工作。我們現在祇有用一切力量去辦好組織統計和監督的工作，我們才能解決這個任務，才能彌補所沒有做到的事情，才能在反資本的「戰役」中獲得勝利。

我們承認應該彌補沒有做到的事情，但這是否就等於承認以前犯了某種錯誤呢？絕對不是的。我們再拿戰爭作比喻吧。如果能够單用輕騎隊擊潰並壓退敵人，那就應該這樣幹去。如果這個動作祇能在相當限度內獲得戰果，那末，在這個限度以外，自然要調來重砲隊。我們承認現在應彌補以前沒有作的調來重砲一事，這絕對不是承認輕騎隊底勝利攻擊是一個錯誤。

資產階級底奴僕們常常責罵我們採用了『赤衛隊』來攻擊資本。這種責罵是荒謬絕倫的，祇有財庫守們狗才說得出口。因為用『赤衛隊』攻擊資本，是當時各種情況所絕對要求的：第一，當時資本會以克倫斯基和克拉斯諾夫、沙溫可夫和郭茨、杜托夫和博加也夫斯基等人為代表，實行軍事反抗（而黑格啓科利現時仍在作這種反抗）。要打破軍事反抗，除了用軍事手段以外，別無他法，赤衛隊正是作了這一使勞動者和被剝削者擺脫剝削者壓迫而得到解放之最高尚最偉大的歷史事業。

第二，當時我們其所以不能將管理方法擺在首要地位來代替鎮壓方法，還因為管理的藝術並不是人們生來就有，而是要從經驗中得來的。當時我們還沒有這樣的經驗。現在却已經有了。第三，當時，我們還未能使各種具有知識和技術的專門家受着我們的支配，因為他們或者參加在博加也夫斯基之流底隊伍中作戰，或者還能用怠工方法進行有系統的頑強的消極反抗。現在我們已經把怠工打破了。『赤衛隊』對資本的攻擊有了成效，獲得了勝利，因為我們既戰勝了資本地軍事反抗，又戰勝了資本地怠工反抗。

這是不是說用『赤衛隊』攻擊資本，在什麼時候都是適當的，在任何情勢之下都是適當的，此外我們再沒有別種同資本作鬥爭的方法呢？如果這樣設想，那就是幼稚病。我們雖用輕騎隊獲

得了勝利，可是我們也有重砲隊。我們雖用鎮壓方法獲得了勝利，可是我們也能够用管理方法來取得勝利。當情勢改變的時候，應該善於改變反對敵人的鬭爭方法。我們連一分鐘都不會拒絕用『赤衛隊』去鎮壓沙溫可夫輩和黑格啓科利輩先生們以及其他一切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派。可是我們並不會如此蠢笨，竟在須用『赤衛隊』攻擊時代大體已告結束（而且勝利地結束了）的時候，在由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利用資產階級專門家來精耕土壤，使這土壤上絕不能再生長出任何資產階級來的這種時代已經到臨的時候，還將『赤衛隊』的攻擊手段擺在首要地位。

這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別時代，或者更確當些說，這是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特別階段，爲了澈底戰勝資本起見，就要善於使我們的鬭爭形式適合於這種階段底特別條件。

沒有在各種知識、技術方面富有經驗的專家底指導，便不能過渡到社會主義，因爲社會主義需要有廣大羣衆自覺地在資本主義已達到的成績基礎上前進到比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社會主義應該照自己的特別形式，用自己的方法，——更具體些說，照蘇維埃的方法，——來實現這種前進步驟。而專家，因爲受了過去培養他們成爲專門家的那種社會生活底全部環境的影響，其大多數必然是資產階級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後，很快就在全國範圍內解決了統計、監督和組織的任務（當時由於戰爭和俄國落後底緣故，這是無法實現的），那末，我們打

破了怠工以後，就能用全盤統計和監督的方法，而使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完全服從我們了。由於一般統計和監督工作，都『遲延』未作，所以我們雖然已經戰勝了怠工，但還沒有造成那種使資產階級專門家受到我們支配的環境；大多數怠工者雖『到職服務』，但國家要利用優秀的組織者和最高明的專門家却祇有兩種方式：或是按照舊的方式，資產階級的方式（即是付給高度薪俸），或是按照新的方式，無產階級的方式（即造成自下的全民統計和監督的環境，有了這種環境，就必然和自然制服這些專門家，並吸收他們來參加工作）。

現時我們却不得不採用舊的資產階級的方式，同意付給最高明的資產階級專門家以很高的『酬』金。一切熟悉情形的人們，都知道這點，可是並不是大家都仔細思考到了無產階級國家採用這種辦法有什麼意義。顯然，這個辦法是一種妥協，是離開巴黎公社和任何無產階級政權底原則的，這些原則要求把薪俸降到中等人工資的水準，要求在事實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同陞官發財思想作鬭爭。

不僅如此。這種辦法，顯然不祇是停止在相當部門內，在相當程度內對資本進攻（須知資本並不是一批貨幣，而是一定的社會關係），而且還是我們社會主義蘇維埃政權向後退了一步，因為這個政權一開始就宣佈過並實行過把高度薪俸降低到中等人工資水準的政策。

自然，資產階級底走僕，尤其是像孟塞維克，新生活派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這樣下賤的走僕，會因我們承認後退一步而來幸災樂禍地譏笑我們。可是我們絕對用不着去理會這種譏笑。我們應該研究達到社會主義這極端困難的新道路底特點，不要掩蔽我們的錯誤和弱點，而要努力及時地完成尚未做到的事情。我們用非常高的薪金來吸收資產階級專家一事是離開公社原則，如果我們對羣衆隱瞞這點，那就無異是墮落到資產階級政治家的水準，並欺騙羣衆。公開宣佈我們怎樣和爲什麼後退了一步，然後公開討論，有什麼方法來彌補沒有做到的事情，——這就是訓練羣衆，並在實際經驗上同他們一塊來學習建設社會主義。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勝利的戰役中，勝利者未必沒有犯過個別的錯誤，未必沒有遭過局部的失敗，未必沒有因某種原因而在某地暫時退守過的。而我們所舉行的進攻資本主義的『戰役』，比較最困難的戰役還要困難一百萬倍，如果因爲部份的和局部的退守，就垂頭喪氣，那便是愚蠢而可恥的了。

現在從實踐方面來考察問題吧。假設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需要一千個在各種知識、技術方面富有實際經驗的頭等學者和專門家來指導國民勞動，以謀國內經濟儘可能迅速地高漲起來。假設這些『頭等明星』——自然，其中大多數，愈是狂烈地叫喊工人們腐化，則他們受資產階級道德的腐化也就愈深——每人每年應付以二萬五千盧布。假設這個薪金總額（二千五百萬盧布）還加

多一倍（假定因成績特別優良和特別迅速地完成了組織上和技術上最重要的任務，還要給以獎金），或者甚至再加多三倍（假定還要聘請幾百個要求更加苛刻的外國專家），試問每年花費五千萬或一萬萬盧布來根據最新技術和科學改組國民勞動，能不能說這項費用對於蘇維埃共和國是過多的或担負不起的呢？當然不能這樣說。絕大多數覺悟的工農會贊成這種費用，因為他們從實際生活中知道：我們底落後使我們不能不受到千百萬盧布的損失，然而我們在組織、統計和監督方面，則還沒有達到能引起資產階級知識界「明星」全體自願來參加我們工作的那種程度。

當然，問題也有它的另一方面。高度薪金對於蘇維埃政權的腐化影響（尤其是當革命迅速成功時，不會沒有相當數量的野心和騙子混入這個政權，他們連同各種委員當中那些無才或鮮恥之輩，是會願意去充當盜竊國庫的「明星」：的）以及對於工人羣衆的腐化影響，是無可爭辯的事。可是，工人和貧農中一切善於思考和居心誠實的人們，都會同意我們，都會承認：我們無力一舉擺脫資本主義底遺毒，要使蘇維埃共和國免除每年五千萬或一萬萬盧布「貢獻」的負擔（這是因為我們自己在組織全國統計和實行自下而上的監督這專業上落後之故所付出的貢獻），除了自己組織起來，在自身隊伍內整頓紀律，清除自己行列中一切「保存資本主義遺傳」，「遵守資本主義傳統」的人們，即是清除一切懶漢、寄生蟲、盜竊國庫者（現在一切土地、一切工廠、一切鐵

路、都是蘇維埃共和國底「國庫」以外，別無辦法。如果有覺悟的先進工人和貧農能在一年以內，在蘇維埃機關幫助之下，自動組織起來，紀律化起來，振奮起來，並建立強固的勞動紀律，那末，一年以後，我們便能擺脫這項「貢款」，而且隨着我們工農勞動紀律和組織性所達到的程度，甚至還能更早地：縮減這種「貢款」。我們工農自己能愈快地利用資產階級專家來學會優良的勞動紀律和最高的勞動技術，則我們就能愈加迅速地免除繳給這些專家的一切「貢款」。

我們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組織對產品生產與分配的全民統計和監督的工作，大大地落後於我們直接剝奪剝奪者的工作。這種情形是瞭解目前時局特點以及由此產生的蘇維埃政權各種任務的基本關鍵。反資產階級鬭爭底重心，要移到組織這種統計和監督的工作上來。祇有從這點出發，才能正確決定在實行銀行國有，壟斷對外貿易，由國家監督金融流通方面，在舉辦從無產階級觀點看來足可滿意的財產稅和所得稅方面，以及在實行勞動義務制方面，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的當前任務。

在這些部門的社會主義改造工作上，我們還極為落後（而這都是極關緊要的部門），其所以落後，正因為統計和監督一般地就沒有充分組織好。自然，這個任務是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在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破壞情形下，祇有經過長時期才能解決這一任務；可是不能忘記，資產階級，尤

其是人數衆多的小資產階級和農民資產階級，恰恰是在這方面向我們進行最嚴重的戰鬥，他們破壞正在整頓中的監督辦法，例如破壞糧食壟斷，奪取陣地來作投機事業和投機買賣。我們所已頒佈的法令，還遠沒有充分實施，而現時主要任務，正在於集中一切力量，來切實在實踐上實現。那些已經定爲法令，可是還沒有見諸實施的改造事業的各原則。

爲要繼續向前實行銀行國有，並不屈不撓地去把銀行變爲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簿記底樞紐，首先就要極力在下列各事中達到實際成效：增加國民銀行分行底數量，吸收存款，改善存款取款的手續，使之便利於人民，消除那裏的「排隊」現象，捉拿並槍斃受賄者和騙子等等。起初的事情切實把最簡單執行，把現有的事情好好組織起來，然後再準備作比較複雜的事情。

將那些已經施行的國家壟斷（如糧食壟斷、皮革壟斷等等）加以鞏固，加以整理，藉此準備實行由國家壟斷對外貿易；若不實行這種壟斷，那末專靠繳納「貢款」，我們就不能擺脫外國資本的羈絆。而社會主義建設是否可能，就全看我們能否在相當的過渡時期內，用向外國資本繳納某些貢款的辦法來保護自己國內經濟獨立性這點爲轉移。

在徵收一般的國稅，尤其是財產稅和所得稅的工作上，我們也非常落後。向資產階級徵收罰款，在原則上雖是絕對容許並值得無產階級贊同的辦法，但它表明我們在這一方面所採用的，多

半像是從富人手裏（將俄國）奪來交給窮人的方法，而很少像是實行管理的方法。可是，要加強自己的力量和鞏固自己的地位，我們就應該轉而採用這第二種方法，就應該用經常正確徵收財產稅和所得稅的辦法來代替向資產階級徵收罰款的辦法。前一種辦法，能給無產階級國家更多的好處，並要求我們有更大的組織性，有更完善的統計和監督。

我們實施勞動義務制過遲，這就再一次地表明，準備工作與組織工作成了當前的迫切任務；這種工作，一方面爲了澈底鞏固已得的勝利，應當這樣作，另一方面爲了準備「包圍」資本並強迫它「投降」的行動，必須這樣作。我們本該馬上開始實施勞動義務制，可是，我們在實施這個制度時，應當極其審慎，逐漸進行，用實際經驗來審查每一步驟，當然，第一步就是要對富人們實施勞動義務制。對於每個資產者——鄉村資產者也在內——施行工作、消費簿制，將是進到完全「包圍」敵人和建立對產品生產與分配上之真正全民統計和監督的一個嚴重步驟。

為全民統計和監督而鬥爭的意義

千百年來，國家都是壓迫人民和掠奪人民的機關，它給我們留下了這種遺產：即羣衆們對一

切國政之極端仇視和不信任的心理。克服這種心理，是非常困難的任務，這一任務祇有蘇維埃政權才能勝任，然而就連蘇維埃政權也須花費長久的時間和表現極大的堅毅精神才能完成這一任務。這個「遺產」底影響，在統計和監督問題上，即在推翻資產階級後第二天就成爲社會主義革命之根本問題上，表現得特別厲害。那些在推翻地主和資產階級之後第一次覺得自己得到了自由的羣衆，必然要經過相當的時間，不是根據書本，而是根據親身經歷的蘇維埃經驗，才能瞭解並感覺到：如果對於產品之生產與分配不實行極周到的國家統計和監督，則勞動者底政權，勞動者底自由，便不能維持，則資本主義壓迫制度底復辟便是無可避免的。

資產階級尤其是小資產階級底一切習慣與傳統，也是反對國家監督，而要求「神聖私有財產制」和「神聖」私有企業底不可侵犯性。現在我們特別明顯地見到，馬克思主義說無政府主義和無政府工團主義係資產階級思潮的理論是如何正確，它們對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是處於如何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力求將蘇維埃的，即由國家實行統計和監督的思想灌注到羣衆底意識中，力求實現這種思想，力求打破養成人們把獲得衣食看作「私人」事情，把買賣看作「祇是與我有關」的這種舊時惡習，——這便是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偉大鬭爭，這便是社會主義自覺勢力反對資本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發勢力的鬭爭。我們已將工人監督制定爲法律，可是這

種制度還剛剛開始浸潤到生活中，甚至還剛剛開始浸潤到無產階級廣大羣衆底意識中去。至於說，在產品之生產與分配方面不實行清算清報制，便會使社會主義幼芽陷於滅亡，便是盜竊國庫，——因爲現在一切財產都是屬於國庫的，而國庫也就是蘇維埃政權，即大多數勞動羣衆底政權；至於說，在統計和監督上表現疏忽，便是直接幫助德國的和俄國的科爾尼洛夫派，這些敵人祇要我們一不執行統計與監督的任務，便能乘機推翻勞動者底政權，他們現時正在農民資產階級全體幫助之下，在立憲民主黨人、孟塞維克、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幫助之下，「窺伺」着我們，待機而動，——關於這一切，我們在自己的鼓動中沒有充分說明，先進的工農份子沒有充分地加以思索，加以討論。可是在工人監督還沒有成爲事實以前，在先進工人還沒有辦好監督事宜，沒有實行勝利的和無情的進攻動作去反對破壞這種監督或不關心這種監督的人們以前，便不能由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即工人監督）進到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二步，即實行由工人調節生產。

社會主義國家祇有當它是由許多生產消費公社構成的體系，而這些公社都誠實計算自己的生產和消費，節省勞動，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並因而能够減少每日勞動時間到七小時或六小時以至於更少的時間，——祇有在這種形式之下，社會主義國家才能產生。在這裏，若不辦妥對糧食和糧食生產（隨後，再對一切其他必需品）實行最嚴格的，包括一切的全民統計和監督，是不行

的。資本主義遺給了我們一種羣衆組織，能便於我們對產品分配實行廣泛的統計和監督，——這就是消費協社。在俄國，這種組織比之先進國家裏發展得微弱些，可是它們還是包括有一千萬以上的社員。日前頒佈的關於消費協社的法令，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現象，它鮮明地表明出現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狀況底特點和任務。

這個法令，是對資產階級合作社以及仍舊站在資產階級觀點上的工人合作社的一種協定。這個協定或妥協就是：第一，上述這些機關底代表不僅參加了該法令的討論，而且實際上還取得了表決權，因為法令中有遇到這些機關堅決反對的一部份條文，是被刪掉了的。第二，這種妥協，實質上就是蘇維埃政權放棄了免費加入合作社的原則（這是唯一澈底的無產階級原則），同樣也就是放棄了某地全體居民都要加入一個合作社的原則。我們放棄了這個與消滅階級的任務相適合的唯一社會主義的原則，而允許了「工人的階級合作社」（這些合作社之所以稱爲「階級合作社」，祇是因爲它們服從資產階級底階級利益）仍舊存在。最後，蘇維埃政權所提出的要把資產階級完全從合作社管理處內摒除出去的條文，也大大放鬆了，祇有私人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商業主，才被禁止加入合作社管理處內。

假使無產階級經過蘇維埃政權而行動，已經辦妥了全國範圍內的統計和監督，或者至少是辦

妥了這種監督底基礎，那就決不會有作這種妥協的必要。那時我們就能經過各蘇維埃底糧食部，經過各蘇維埃附設下的供給機關，將居民聯合爲各個統一的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合作社，而不要資產階級合作社底協助，不要對純粹資產階級的原則實行讓步，這種原則，促使工人合作社仍舊是與資產階級合作社同時並存的工人合作社，而不是把兩種合作社合併起來，以便由自己掌握全部管理權，由自己監視富人底消費，這樣來使資產階級的合作社，完全服從自己。

蘇維埃政權同資產階級合作社成立這種協定時，具體確定了自己在現今發展階段上的策略任務和特殊的行動方法，這就是說：領導資產階級份子，利用他們，對他們作某些局部的讓步，這樣來造成向前發展的條件，此種進展，雖然比我們最初預定的要緩慢些，可是比較切實些，比較可靠地保證我們的根據地和交通綫，比較完善地鞏固我們已經奪得的陣地。蘇維埃現在能够（而且應該）用非常明顯、簡單而實際的設施尺度來測量自己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的勝利。就是要看有多少地方（公社或村落、街坊等等）並在何種程度上，合作社底發展已接近於包括全體居民的地步。

提高勞動生產率

在任何社會主義革命中，在已經解決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以後，隨着剝奪剝奪者的任務在大體上和基本上得到解決的程度，必然把創造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根本任務，提到首要地位；這個根本任務就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因此（並且爲此）就要有更高形式的勞動組織。我們蘇維埃政權現時正處於這種狀態中，它因爲戰勝了剝削者，——由克倫斯基起到科爾尼洛夫止，——就已經獲得有直接從事解決這個任務，直接着手執行這個任務的可能。這裏馬上就可以明白看出，我們曾在幾天內就能奪得國家中央政權，在幾個星期內就能在一個龐大國度內到處去壓服剝削者底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而現在要切實解決提高勞動生產率的任務時，那就至少（尤其是在極其痛苦的和帶有極端破壞性的戰爭以後）也需要幾年的工夫。這工作底長期性質，無條件地是客觀環境所預決了的。

提高勞動生產率，首先就要保證大工業底物質基礎：提高燃料、鐵、機器製造業、化學工業等等的生產。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所處的条件非常優越，因爲它甚至在布列斯特和約以後還擁有

極大的富源：鐵礦（烏拉爾一帶），燃料（西伯利亞西部的石炭，高加索和俄國東南部的煤油以及中部的泥炭），極豐富的森林、水力、化學原料（加拉步格茲灣）等等，用最新技術來開採這些天然富源，就能造成生產力空前發展底基礎。

另一種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條件，第一，就是民衆文化教育程度底高漲。這種高漲，現時正在突飛猛進，這是那些被資產階級陳腐慣習蒙住了眼睛的人們所看不到的，這些人不能瞭解，現在因有蘇維埃的組織，民衆『下層』中的求知熱潮和首創精神，該是如何廣闊地發展着；第二，就是提高勞動者底紀律，提高工作藝能，提高勞動技巧和勞動強度，改善勞動組織，這也是經濟高漲底條件。

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情形，特別不好，而據那些甘受資產階級恐嚇，或貪圖私利而替資產階級服務的人們說，甚至是沒有希望的。這些人不懂得：世界上從來沒有，而且也不能有不被舊社會擁護者罵爲崩潰現象和無政府狀態等等的革命。自然，剛才脫離空前殘酷壓迫的羣衆，是充滿着深刻而廣泛的狂放熱潮和激暴心情，自然，造成勞動紀律底新基礎是一個非常長期的過程，在沒有完全戰勝地主和資產階級以前，這種造成勞動紀律新基礎的工作，甚至是不能開始的。

我們固然絕對不要被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已經喪盡保持舊有特權希望的人）所散佈的那種往往是假裝的絕望情緒所迷惑，但同時我們却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掩蔽顯係惡劣的現象。恰相反，我們要揭發這種惡劣現象，並加強反對這些現象的蘇維埃鬥爭方法，因為如果無產階級自覺的紀律性沒有戰勝那真正保證克倫斯基派和科爾尼洛夫派有復辟可能的自發的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則社會主義底勝利便無從設想。

俄國無產階級最有覺悟的先鋒隊，已經抱定目的，要來提高勞動紀律。例如五金工會中央委員會和全國總工會中央局，已在開始製定相當的辦法和法令草案。這種工作，應該加以贊助，應該用全力去推進它。應該把實際採用和試行按件工資制，採用太羅利制中許多合乎科學的進步方法，以及根據各工廠製出的產品總量，或鐵路運輸業及水道運輸業底運載結果來決定工資之多寡等等，作為當前的急務。

同先進民族比較起來，俄國人是較劣的工作者。而在沙皇制度統治下和農奴制殘餘存在的時候，是不會不這樣的。學習作工，這是蘇維埃政權應該向民衆盡量提出的一個任務。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發明，即太羅利制——也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一樣——包含着兩種成份，一種是資產階級剝削底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另一種是許多最豐富的科學成就，即按科學來分析勞動中的

體力動作，消除多餘的笨拙的動作，製定最精確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統計和監督制等等方面所獲得的成就。蘇維埃共和國，在這方面無論如何都要採用科學和技術上一切有價值的成就。社會主義實現的程度如何，正是要靠蘇維埃政權和蘇維埃管理組織與資本主義最新進步相結合這方面的成功來決定。應該在俄國研究與教授太羅利制，有系統地試行這個制度並使它適應於我國條件。同時，在提高生產率的時候，還須注意到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這個過渡時期的特點；這些特點，一方面，要求奠定組織社會主義競賽的基礎，另一方面，要求採取強迫手段，使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口號，不致為無產階級政權軟弱的實踐所玷污。

組織競賽

說社會主義者否認競賽底意義，這是資產階級所樂意散佈來誣蔑社會主義的妄談之一。其實，社會主義既然消滅階級，因之也消滅對羣衆的奴役，也祇有它才第一次開闢真正大規模競賽的坦途。正是這由資產階級共和國底形式民主制過渡到勞動羣衆實際參加管理工作的蘇維埃組織，才第一次廣泛地提出競賽。在政治方面實行競賽，比在經濟方面容易得多，可是爲了社會主

義的勝利，重要的正是在經濟方面實行競賽。

我們拿組織競賽的一個方法，如公佈的方法來講吧，資產階級共和國祇是在形式上保證此種方法的實行，實際上，它使報紙刊物受資本的節制，用引人入趣的政治瑣談來玩弄「老百姓」，以保護「神聖私有財產制」的營業秘密來掩蔽作坊裏、商業契約裏、交貨手續裏及其他等等當中所有的黑幕。蘇維埃政權已經取消營業秘密，已經走上新的道路，可是利用公佈法去進行經濟競賽，我們還幾乎是毫無成就。應該有系統地從事這種工作，以便除了無情打擊純係欺騙和無恥造謠的資產階級刊物之外，還能努力去創辦這樣一種刊物，它不以政治趣語和瑣談來玩弄和愚弄羣衆，而正是將日常經濟問題，提交羣衆裁判，幫助他們認真來研究這些問題。每個工廠，每個鄉村，都是生產消費公社，都有權並應該照自己的方法去施行一般的蘇維埃法規（所謂「照自己的方法」，並不是說破壞法規，而是說用各種不同的形式實施這些法規），照自己的方法來解決產品生產和分配底統計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是個別資本家、地主和富農底「私事」。而在蘇維埃政權下，這不是私事，而是國家大事。

我們差不多還沒有着手進行那種巨大而困難的，同時却是富有結果的工作，即組織各公社間的競賽，將工作報告制和公佈法實行到出產衣服糧食等等的生產過程中去，把乾燥的，死板的官

僚主義的工作報告變成活的榜樣——壞的使人討厭，好的使人羨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個別榜樣底意義，比如說，某個生產組合榜樣底意義，必然是極其有限的；祇有滿懷小資產階級幻想的人，才能够夢想以慈善機關榜樣的影響來『糾正』資本主義。在政權轉歸無產階級掌握以後，在剝奪者已被剝奪以後，情形就根本改變了，榜樣底力量——如最著名的社會主義者所多次指示過的那樣，——第一次有可能來表現自己的廣大影響。模範公社應該成爲，而且必將成爲落後公社的訓導人、教師和提攜者。報章刊物應該成爲社會主義建設的工具，介紹模範公社所獲成績的一切詳情，研究它們成功底原因以及它們經營的方法；另一方面，將那些堅決保持『資本主義傳統』，即無政府狀態、偷懶、亂無秩序、投機行動等等的公社登上『黑板』。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統計純粹是『公務人』或本行專家底事務，我們却應該將它貫輸到羣衆中去，把它通俗化，使勞動羣衆逐漸地學會親自瞭解並看到應該如何工作，工作多少，怎樣休息，休息多久，使各個公社間經濟成績底比較，成爲大家注意和研究底對象，使優良的公社，立即得到獎賞（如在相當時期內縮短勞動時間，提高工資，獎賞大量文化的或美術的貴重物品等等）。

當新階級以社會首領和指導人的資格走上歷史舞台的時候，從來不會不經過最強烈的『動盪』、震撼、鬭爭和風浪時期的，這是一方面；而在另一方面，又不會不經過在選擇適合新客觀

環境的方法上發生無把握的步驟、試驗、動搖和猶豫時期。以前，趨於滅亡的封建貴族，當報復那些排擠自己並已在獲勝的資產階級時，不祇使用各種陰謀手段，企圖暴動與復辟，而且還滔滔不絕地譏笑「暴發戶」「無恥漢」底笨拙、魯鈍和錯誤，說這些人既沒有王侯、貴族、世家所有過的長期執政訓練，竟胆敢執掌國家「神聖大權」——現在，科爾尼洛夫和克倫斯基，郭茨和馬爾托夫輩，所有這些資產階級滑頭主義或資產階級懷疑主義的英雄們，對於那「胆敢」企圖奪取政權的俄國工人階級，也正是採用這種報復手段。

當然，新社會階級，而且是迄今以前受壓迫的，被貧困與黑暗所高壓過的階級，必須經過長期的年月，——而不是經過幾個星期，——才能夠把握新的情勢，看清環境，辦妥自己的工作，造就出自己的組織者。當然，領導革命無產階級的政黨，過去是不能造成從事大規模的，預計到包括千百萬公民的組織設施底經驗和技能，而要把舊的，差不多純係鼓動家的技能改造過來，這是一件很長久的事。可是這裏並沒有什麼絕不可能的事情。既然我們會明知轉變底必要，並有實現轉變的堅決心，並有達到偉大而困難目的的毅力，——那我們就一定能夠實現這個轉變。「老百姓」中，即工人和不剝削別人勞動的農民大眾中，有極多的天才組織家；資本把這樣的天才組織家成千地摧殘、毀滅和拋棄，而我們呢，却還不會把他們發現出來，鼓勵起來，扶持起來，提

拔出來。可是，如果我們能以全部的革命熱忱——沒有這種革命熱忱，便不會有勝利的革命——去着手學習這種工作，那我們就一定能學會這種工作。

在歷史上，任何一個深刻強大的民衆運動都不免帶有污濁的浮泡——都不免有點附於經驗缺少的革新家方面的野心家和騙子，大言不慚和誇口吹牛份子，不免有荒謬的混亂，無謂的舉動，徒然的忙碌，不免有個別『領袖』企圖百事承當而一事無成的現象。讓資產階級社會底哈巴狗——由別洛魯梭夫起到馬爾托夫止，在我們砍伐古木老林的時候，對每一塊多餘砍去的木屑去嘶聲狂吠吧！既是些哈巴狗，也就祇能向無產階級這巨象狂吠。讓他們去狂吠吧！我們走自己的道路，力求盡量謹慎，盡量耐心地試驗並辨識真正的組織家，即那些具有清醒頭腦和實際本領的人才，他們既忠實於社會主義，而又能毫不喧嘩地（並不顧別人的忙亂和喧嘩）做到使蘇維埃組織範圍內的大批人衆都能團結堅牢，和衷共濟地工作。祇有這種人才，在經過多次試驗之後，才應該提拔起來，由最簡單的任務進到最困難的任務，使之担负要職，充當民衆勞動底領導者，管理工作的領導者，我們還沒有學會這點，我們定能學會這點的。

「嚴整的組織」與專政

最近在莫斯科舉行的蘇維埃代表大會底決議案，提出建立「嚴整的組織」與提高紀律，作為現時最主要的任務。現在，大家都樂意「表決」和「簽署」這樣的決議案，可是關於實施這些決議案需要採用強迫手段，而且正是要採用專政形式的強迫手段，——這一點，人們通常却不去思索一下。其實，如果認為可以不用強迫手段，不用專政手段，便能使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那就是絕頂愚蠢和最荒唐的空想主義。馬克思底理論，在很久以前就已十分確定地反對過這種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和無政府主義的妄談。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俄國事變，已經非常明顯，觸目、動人地證實了馬克思這種理論，祇有絕頂愚鈍或硬不承認真理的人，才能在這方面依然執迷不悟。或者是科爾尼洛夫專政（如果把科爾尼洛夫看作爲俄國式的資產階級的卡芬雅克的話），或者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在這經過了幾次非常急劇轉變而達到非常迅速發展的國家裏，在由最痛苦的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絕頂破壞情形下，別種出路簡直是談不到的。一切中間的解決辦法，若非資產階級對民衆的欺騙，——資產階級不能講真話，不能說出他們需要科爾尼洛夫，——便是

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切爾諾夫輩、策烈鐵里輩、馬爾托夫輩（他們高談什麼民主派的統一，民主派專政，民主聯合戰綫以及諸如此類的胡說）底愚蠢想法，誰要是經過了一九一七至一九一八年的俄國革命事變，却還沒有懂得決不能有中間的解決辦法，那麼對於這樣的人，就只好置之一笑。

另一方面，不難瞭解，在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任何過渡中，由於兩個主要原因，或者說在兩個主要方向上，必須有專政制度。第一，若不無情地鎮壓剝削者底反抗，便不能戰勝和剷除資本主義，因為不能一下子就把這些剝削者的財產，把他們在組織上和知識上的優勢完全剷除掉，所以在一個相當長的期間，他們必然會企圖推翻他們所仇視的貧民政權。第二，任何大革命，尤其是社會主義革命，即令不發生對外戰爭，也決不會不經過國內戰爭，而國內戰爭比之對外戰爭會造成更大的經濟破壞，國內戰爭中會發生千百萬種動搖和倒戈事件，會造成極不確定、極不穩定和混亂的狀態。而舊社會中的一切腐化份子，其數量必然極多，大半都與小資產階級有聯繫（因為一切戰爭和一切危機，首先就使小資產階級破產，首先就是摧殘他們），這些份子，在這種深刻轉變的時候，自然不能不『顯露頭角』，而除了增多犯罪行為、流氓行為、賄賂、投機及作出各種壞事以外，這些腐敗份子是不能以別種方法來『顯露頭角』的。爲要消除這

種現象，就必須花費時間，必需有鐵的手腕。

在歷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民衆沒有不能地感覺到這一點，沒有不表現其除惡決心而把盜賊就地槍決的。從前各次革命中的不幸，就在於使羣衆保持緊張心情而能無情鎮壓腐化份子的那種革命熱忱，未曾長久支持下去。當時羣衆革命熱忱之所以這樣不穩固，其社會原因，即階級原因，就是無產階級本身薄弱，而祇有無產階級（如果它已經有充分的數量，充分的覺悟和充分的紀律），才是唯一能夠將大多數被剝削勞動者（如果更簡單更通俗些說，就是大多數窮人）吸收到自己方面來，能夠充分長期地執掌政權，來完全壓服一切剝削者和一切腐化份子。

歷次革命中這個有歷史意義的經驗，這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經濟的和政治的——教訓也就爲馬克思所確認了，他給了一個簡單、嚴格、精確、明顯的公式：無產階級專政。至於俄國革命之正確地實現這個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任務，這是蘇維埃組織在俄國所有一切民族中的勝利傳佈所證明了的。因爲蘇維埃政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先進階級專政底組織形式，這個先進階級，把千百萬被剝削勞動者提高到實行新民主制，提高到獨立參加國家底管理，而他們根據自身經驗正在學習認識這有紀律有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確爲自己最可靠的領袖。

然而專政是一個大字眼。而大字眼是不可以隨便亂說的。專政就是鐵一般的政權，是有革命

勇氣的和行動敏捷的政權，是無論對剝削者或流氓都實行無情鎮壓的政權。而我們的政權却柔軟極了，往往不大像鐵，却很像漿糊。我們一分鐘也不應忘記，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從兩方面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一方面，是從外部來動作，其方法為沙溫可夫聲、郭茨聲、黑格、喀科利聲、科爾尼洛夫聲所採用的陰謀和暴動手段以及立憲民主黨、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刊物上之不斷的造謠誣蔑，努力傳播這些人的醜觀『思想』；另一方面，是這種自發勢力從內部來動作，利用各種腐化成份，利用一切弱點來實行賄賂，來助長無紀律性、放蕩性和混亂現象。我們愈是用軍事辦法完全壓服資產階級，則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底自發勢力對於我們也就愈加危險。要與這種自發勢力作鬭爭，決不能祇靠宣傳和鼓動，祇靠組織競賽，祇靠選拔組織者，——還必須用強迫手段來進行這個鬭爭。

當政權底基本任務已逐漸由軍事鎮壓轉為管理工作時，鎮壓和強迫手段底標本表現，也會逐漸由法庭審判來代替就地槍決。在這一方面，革命羣衆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就走上正確的道路，並證明出革命底生命力，他們在尚未頒佈解散資產階級官僚司法機關的任何法令以前，就已開始組織自己的，即工農的法庭。可是我們的人民革命法庭還極端軟弱。還可以感覺到，民衆把法庭看作是一種異己的官場東西，這種由地主資產階級壓迫所遺傳下來的觀點，還沒

有澈底打破。民衆還沒有充分意識到，法庭正是吸引全體貧民參加國家管理的機關（因爲司法事務是國家管理機能之一），法庭是無產階級和貧農底政權機關，法庭是訓練人民遵守紀律的工·具。民衆還沒有充分意識到這樣一個簡單明顯的事實：俄國底主要不幸是在於飢荒和失業，而要戰勝這些苦難，不是用任何一時的熱情所能奏效，而祇有用各方面的，包羅一切的，全民的組織和紀律來增加生產人民所需要的糧食以及工業所需要的燃料，及時運輸並正確地加以分配，才能達到這個目的；——所以無論在哪種經濟中，無論在哪件事情上，凡是破壞勞動紀律的人，就是造成飢荒痛苦和失業痛苦的罪人，對這種罪人，應該善於查出，提交法庭，嚴懲無貸。我們現在要與之作最堅決鬪爭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正表現在人們很少意識到飢荒和失業現象是與一切人和每個人在組織上紀律上所犯的放蕩行爲，有着國民經濟上與政治上的聯繫，——人們牢固地保持着小私有者的觀點：祇要我能多抓一把，哪管它寸草不生。

鐵路事業，可說是最顯明地體現着大資本主義所造成的機體之經濟的聯繫，在這裏，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自發勢力反對無產階級組織性的這個鬪爭，表現得特別鮮明。「管理」份子中產生出大量的怠工者和受賄人；優秀的無產階級份子却在爲遵守紀律而鬪爭；可是，在前後兩種份子當中，自然有很多動搖的，「軟弱的」人，他們無力抵抗投機、賄賂和私人利益的誘惑，而取得

這種個人利益的代價，就是敗壞整個機關；但要消除飢荒和失業現象，則恰恰有賴於這個機關底正確工作。

在最近頒佈的關於鐵路管理的法令，即賦與個別領導人以獨裁全權（或「無限」全權）的法令問題周圍所開展起來的鬭爭，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生的，這個鬭爭很可表明一切。自覺表現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份子（而大部份大概是不自覺的），當時想把賦與個別人員以「無限」（即獨裁的）全權的法令，看作是離開委員制原則，離開民主制以及蘇維埃政權底其他原則。有些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正進行着簡直是流氓式的煽動，即是利用惡劣天性，利用小私有者「抓取」的慾望來進行煽動，反對關於獨裁制的法令。這裏發生了具有真正巨大意義的問題：第一，這是一個原則問題，即一般講來，委任負有獨裁者無限全權的個別人員的辦法是否與蘇維埃政權底根本原則相容；第二，這件事情，——也可說是這個先例，——對於目前政權底特殊任務，有什麼關係。我們對於前一問題和後一問題，都應該非常細心來加以研究。

無可爭辯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在革命運動史上，個人獨裁之成爲革命階級專政底表現者、代表人和執行者，是極常見的事。個人獨裁與資產階級民主制，毫無疑義是彼此相容的。可是在這一點上，咒罵蘇維埃政權的資產階級份子，以及他們的小資產階級應聲蟲總是表演圓滑手腕：

一方面，他們宣佈蘇維埃政權不過是一種荒謬的，無政府式的粗野東西，而極力漠視我們爲證明蘇維埃是最高形式的民主制，甚至是社會主義民主制底開端所引用的一切歷史上的比擬和理論上的證據；另一方面，他們却向我們提出比資產階級民主制更高的民主制要求，而說：個人獨裁是與你們布爾塞維克的（即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社會主義的）蘇維埃民主制絕不相容的。

這種議論簡直壞透了。如果我們不是無政府主義者，那我們就應該承認必須有國家，即是說，承認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必須採用強迫手段。強迫手段底形式，是取決於當時革命階級發展底程度，其次是取決於某些特別情況，例如長期反動戰爭底遺毒，以及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反抗底形式。所以蘇維埃的（即社會主義的）民主制與實行個人獨裁之間，絕無任何原則上的矛盾。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之間的區別，就在於無產階級專政是打擊佔少數的剝削者以謀佔大多數的被剝削者底利益，其次在於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由被剝削勞動羣衆——經過個人——來實現，而且由一種組織來實現，這種組織之構成，正是便於喚醒和喚起這種羣衆去從事具有歷史意義的創造工作（蘇維埃的組織就是這類的組織）。

關於第二個問題，即從現時特殊任務看來，個人獨裁制有何意義的問題，我們應該說，任何大機器工業——即社會主義之物質的和生產的泉源和基礎——都必須有無條件的和最嚴格的統一

意志，來指揮幾百人，幾千人以至幾萬人底共同工作。這一點的必要，無論從技術上，經濟上或歷史上看來，都是非常明顯的，——一切對社會主義思索過的人，始終承認這是實現社會主義底一個條件。可是怎樣才可以保證意志之最嚴格的統一呢？這就祇有使千百人底意志服從於一個人底意志。

在參加公共工作的人們有盡善盡美的自覺性和紀律性的情形下，這種管制就會很像音樂指導人底柔和領導一樣。如果在沒有盡善盡美的自覺性和紀律性的時候，管制可以具有嚴厲的獨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樣，爲要使這種按照大機器工業式樣組成的工作過程獲得成效，則無條件地服從統一意志，便是絕對必要的了。在鐵路業上，此種服從，更是加倍必要的。這種由一個政治任務轉到另一個政治任務的過渡，——在表面上看來：後一種任務與前一種任務是全不相像的，——就是現在時局底特點。革命剛剛才打破了使羣衆在鞭笞威嚇之下受其管制的那種最陳舊、最堅牢、最沉重的鎖鏈。這是昨天的事，而在今天，同是這個革命，而且正是爲着社會主義底利益，却要求羣衆無條件地服從勞動過程指導者底統一意志。當然，這個過渡是不能一下子做到的。祇有經過極大的動盪、震撼、復舊以及那領導民衆建設新生活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極度緊張自己的精力，這個過渡才會實現。那些沾染了新生活、前進、人民事業和我們時代各報「二」底庸

尋求出路的羣衆，引導他們走上正確的道路，走上勞動紀律的道路，走上這種把經常開羣衆大會討論工作條件的任務與在工作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人——獨裁者——底意志的任務協調起來的道路。

資產者、孟塞維克和新生活派嘲笑「開羣衆大會」的辦法，更常常惡意地指謫「羣衆大會」，認爲這裏祇是混亂現象，無謂之舉和小私有者利己主義的衝動。可是，不舉行羣衆大會，則被壓迫羣衆永遠也不能由剝削者強制他們遵守的紀律，轉到自覺的和自願的紀律。羣衆大會，這也就是勞動羣衆底真正民主制，這是他們揚眉吐氣之際，這是他們向新生活醒覺起來，這是他們在親自既已掃除毒物（剝削者、帝國主義者、地主、資本家）的活動場所中的初步行動，現在他們又想親自本着這個不是別人的，不是貴族的，不是資產階級的，而是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底原則，按自己的方式，爲自己的利益，去學會整頓這個活動場所。正需要有勞動羣衆戰勝剝削者的十月革命勝利，需要有勞動羣衆自己初期討論新生活條件和新任務的整個歷史時期，才能够穩固地過渡到更高形式的勞動紀律，過渡到自覺地領會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的思想，過渡到在工作時間內絕對服從蘇維埃政權代表底獨斷命令。

這個過渡現在已經開始了。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一個任務，我們看見過勞動羣衆怎樣在自己隊伍中造成了革命勝利底基本條件：這就是大家一致努力去反對剝削者，以求推翻他們，像一九〇五年十月以及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這樣的階段，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

我們已經勝利地解決了革命底第二個任務：這就是喚醒和喚起那些過去被剝削者抑壓下去了的社會『下層份子』，他們祇是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才得到完全的自由來推翻剝削者，並開始認清環境，按照自己的方式來佈置生活。這些最受壓迫、最遭抑壓、最少知識的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他們之轉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他們到處建立起自己蘇維埃的組織，——這便是革命底第二個偉大階段。

現時正在開始第三個階段。必須把我們所業已奪得的東西，把我們所已經下過了命令，已經定爲法規，已經討論過，已經擬定了的東西鞏固起來，——必須把這些東西鞏固成爲日常勞動紀律底堅固形式。這是一個最困難而又最有成果的任務，因爲祇有解決這個任務，才能樹立起社會主義的秩序。應該學會將勞動羣衆舉行羣衆大會的這種洶湧澎湃有如春潮泛濫一切隕障的民主精神，與在工作時間內實行鐵的紀律，及絕對服從蘇維埃領導者一個人意志的精神聯成一氣。

這件事我們還沒有學會。

我們一定會把它學會的。

昨天，我們會遇到資產階級剝削復辟的危險，其表現就是科爾尼洛夫、郭茨、杜托夫、黑格洛科利、博加也夫斯基之流的行動。我們戰勝了他們。今天，這個復辟，同是這個復辟的危險，又表現於別種形式上，表現於小資產階級放蕩性和無政府主義底自發勢力以及小私有者這『與我無關』心理底自發勢力，表現於這個自發勢力對無產階級紀律性在進行日常的，細小的，可是數量極多的進攻和襲擊。我們應該戰勝這種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底自發勢力，而且我們一定會戰勝它的。

蘇維埃組織底發展

蘇維埃民主制，即目前具體實施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底社會主義性質就在於：第一，選舉人爲被剝削的勞動羣衆，而資產階級則不在其列；第二，廢除了選舉上一切官僚主義的形式手續和限制，羣衆自己決定選舉手續和期限，選舉人有召回被選舉人的完全自由；第三，建成勞動者先鋒隊，即大工業無產階級底最優良的羣衆組織，此種組織，使這先鋒隊能够領導最廣大的被剝削羣

衆，吸收他們參加獨立的政治生活，根據他們自身的經驗給他們以政治訓練，——因而是空前第一次着手來使真正全體人民都學習管理國家，並且已開始管理國家。

這就是已在俄國實施的民主制底主要特徵，這是更高式樣的民主制，是與資產階級對民主制之曲解完全背馳，是過渡到社會主義民主制，過渡到使國家能夠開始消亡的條件。

當然，小資產階級反組織性底自發勢力（在任何無產階級革命中，這種自發勢力都必然或多或少地表現出來，而在我國革命中，因為我國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因為我國落後以及由於反動戰爭所造成的惡果，更表現得特別厲害），也不能不影響到蘇維埃方面。

必須毫不鬆懈地去進行發展各地蘇維埃組織和蘇維埃政權組織的工作。現在有一種使蘇維埃代表變爲『國會議員』，或在另一方面變爲官僚的小資產階級趨勢。必須用吸收全體蘇維埃代表實際參加管理工作的方法來同這種趨勢作鬭爭。在許多地方，蘇維埃底各部變成逐漸與各辦事處融合一塊的機關。我們的目的，是要吸收全體貧民來實行參加管理工作，而實現這個目的的一切步驟，——其形式愈多愈好——應該詳細地登記起來，加以研究，使之系統化，以更廣泛的經驗來從事審查，並定爲法規。我們的目的，是要使每個勞動者，除作完八小時生產工作的『功課』以外，無報酬地執行國家義務。過渡到這個制度，是特別困難的，可是祇有實現這種過渡才可保

證社會主義澈底鞏固起來，這種過渡乃是一種創舉，是一件難事，這當然要引起許多所謂摸索行進的步驟，許多錯誤和動搖，——不經過這種現象，決不會有任何急劇的前進。在許多願意自認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們看來，目前情況底全部特點就是人們已慣於抽象地把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對立起來，而在兩者之間安上一個意味深沉的名詞：『躍進』（有些記得恩格斯著作底片段的人，更補上一句意味深沉的話語：『由必然界躍進到自由界』）。可是大多數所謂社會主義者，即祇『在書本上讀過』社會主義而從來沒有認真領會過事實的人們，都不善於想到：社會主義底這位導師所說的『躍進』，是指全世界歷史變遷上的轉變關頭，並且這種躍進，往往包括十年或更多的年代。自然，在這種時候，在鼎鼎大名的『知識界』中，會出現無數的哭喪婦；有的哭立憲會議，有的哭資產階級紀律，有的哭資本主義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國主義的大強國精神以及諸如此類等等。

偉大躍進時代底真正足以注意的地方，就在於舊制度底碎片極多，並且有時比新制度幼芽（不是常常可以一眼看到的）底數量還積累得更快些，這就使我們要善於從發展路綫或鏈條中抽出最重要的環節。有這樣的歷史時機，這時為謀革命底勝利，最重要的是在多積累些碎片，即是多破壞些舊機關；也有另一種時機，即在破壞已經足夠的時候，當前的事情是一些『平凡的』工

作（在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看來，是『枯燥無味』的工作），即清除碎片的工作；此外還有一些時機，這時最重要的是在瓦礫還沒有清除淨盡的土壤上，殷勤地看護着從碎片下生長出來的新制度底幼芽。

僅僅一般地做個革命家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鏈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這個環節是爲了把握住整個鏈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同時，在事變發展的歷史鏈條裏，各個環節的次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關連，它們彼此間的區別，都不像鐵匠所製成的普通鏈條那樣簡單，那樣笨拙。

蘇維埃與『人民』，即是與被剝削勞動者之間有鞏固的聯繫，有着靈活的和伸縮自如的聯繫，這就足以防止官僚主義惡化蘇維埃組織的現象。貧民無論何時都不把資產階級的國會，那怕是世界上最完善的——按民主制說來——資本主義共和國底資產階級國會，認爲是『自己的』組織。而蘇維埃在工農羣衆看來，則是『自己的』，而不是異己的。無論是謝德曼式的，或幾乎是同爲一邱之貉的馬爾托夫式的現代『社會民主派』之厭惡蘇維埃，他們之羨慕威儀十足的資產階級國會或立憲會議，正和六十年前屠格涅夫之羨慕溫和的、帝制的和貴族的立憲制，而厭惡多布洛留波夫和契爾內舍夫斯基所主張的農夫民主主義一樣。

正是由於蘇維埃與勞動「人民」接近，才造成一種特別式的召回制和另一種的自下監督制，現在應該極力使這些形式發展起來。例如，國民教育委員會是蘇維埃選民及其代表爲討論並監督蘇維埃政權在這方面的活動而舉行的定期代表會議，這種委員會是值得享受完滿的同情和擁護的。若是把蘇維埃變爲一種凝固的和閉關自大的東西，那就再愚蠢不過了。現在，我們愈堅決主張無情強硬的政權，愈堅決主張在某種工作過程中，在某種純粹執行的職能方面實行個人獨裁制，則我們便應該有愈加紛繁的自下的監督形式和方法，以便杜絕惡化蘇維埃政權的任何可能性，以便再三不倦地剷除官僚主義的莠草。

結 論

國際方面的情形，是非常嚴重、困難而危險的，必須隨機應變和實行退守，等候西歐革命新爆發的時期，這個革命成熟過程竟長久得人難耐；在國內，是緩慢建設，無情「督促」的時期，是無產階級的森嚴紀律性與那小資產階級放蕩性及無政府狀態之險惡自發勢力作長期堅決鬥爭的時期；——簡略說來，這就是社會主義革命中現今特殊階段底特點。這就是歷史事變鏈條中

這樣一個環節，即現時我們必須用全力抓住，以便在過渡到下一環節前能於順利解決任務的這個環節，至於下一環節，却正以特別的光輝，即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底光輝，引人注目。

我們試將『革命家』通常流行的概念，與根據現今階段底特點而產生的口號比較一下，這些口號就是：隨機應變，退守，等候，慢慢建設，無情督促，森嚴紀律，撲滅放蕩性等等。有些『革命家』，聽到這些口號以後，不覺義憤填膺，開始『痛斥』我們，說我們忘掉了十月革命底傳統，說我們主張與資產階級專門家妥協，與資產階級調和，說我們贊成什麼小資產階級性，改良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等等，這是不足驚奇的。

這些可憐的革命家底不幸，就在於他們中間連那些抱有世界上最高尚的動機而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絕對忠誠的人們，都不能了解落後的國家，為險惡的反動戰爭所毀壞的國家，遠在先進國以前開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國家所應該經過的這個特別的和『特別不愜意的』狀況，都沒有毅力經受任困難過渡中的困難關頭。對我們黨持這種『正式』反對態度的，自然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集團代表人物和階級代表人物中，個人的例外，自然是有的，而且永遠會有的。可是社會的代表人物始終存在。在小私有者人口比純粹無產階級人口佔有莫大優勢的國家內，無產階級革命家與小資產階級革命家之間的差別，必然會顯露出來，而且有時會極端劇烈地顯露出來。小

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在事變底每一轉變關頭都動搖着，游移着，由一九一七年三月間的激烈革命態度，轉到五月間的頌揚「聯合政府」，轉到七月間的仇視布爾塞維克（或者說，轉到嘆惜布爾塞維克底「冒險主義」），又轉到十月末的竭力迴避布爾塞維克，再轉到十二月間贊助布爾塞維克，最後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四月間，這種人物，最愛做出目中無人的樣子：說「我並不是歌頌「機構」工作、實際主義和漸進精神的人」。

這種人物底社會根源就是小業主，他們因戰爭慘禍、突然破產以及飢荒與破壞的空前痛苦而憤激發狂，他們瘋狂地東奔西竄，尋求出路和救星，動搖不定：一方面想信任和幫助無產階級，另一方面，又時而爆發絕望情緒。應該明確瞭解和牢實認清：在這種社會基礎上面，任何社會主義都是建設不成功的。祇有毫不動搖地遵循自己道路前進，在最困難、最嚴重、最危險的過渡期間不灰心失望的階級，才能領導被剝削勞動羣衆。我們不需要瘋狂般的熱潮。我們需要無產階級鐵軍底整齊步武。

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八日刊載於全俄中央執委會機關報第六十五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二卷，第四三五至四六八頁

列寧：在各地蘇維埃財政部代表 全俄大會上的演說詞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列寧底演說，首先就指出：國家底財政狀況，毫無疑義地極其緊急。在以社會主義的方法去改造社會的時候，必須克服許多困難，這些困難，甚至常常好像是力所不及的。可是我們的任務是這樣的，就是值得爲着牠們而努力從事並同資產階級作最後戰鬥。

列寧說：

——你們比別人知道得更清楚些：由一般的假定和法令過渡到日常實際工作時，我們要來克服一些怎樣的困難。要做的工作是艱苦的，因爲有產者階級會作拚命反抗。可是當我們戰勝資產

階級底反抗並使之服從蘇維埃政權底監督時，我們就不僅是能够克服我們面前的艱難了，不要忘記：如果我們在財政政策上，不能獲得成效，則我們一切澈底的改革，都會遭到失敗的命運。我們所擬定的以社會主義方法去改造社會的偉大事業底勝利，正隨財政政策底勝利為轉移。

蘇維埃政權已擬定的財政上的基本任務，須立即實施，祇有同你們具有經驗並担任實際工作的人們磋商，才能够使我們擬定的改造辦法，不致終於成爲一紙宣言。

我們無論如何應該做到財政上的堅實改造。

我代表人民委員會，請你們注意那些已在許多會議和談話會上討論清楚的任務，並請你們詳細加以研究，以便實施。這些任務爲下述各項：

財政集中。報告人認爲各地方完全脫離中央，是完全自然的現象，他認爲這是民衆對於那種以前在專制政體下面存在過的中央集權制所發生的一種自然的仇視心和嫌惡心。可是，民衆會根據親歷的經驗而認定必須有民主集中制，因爲沒有這種制度，即不能保持財政上的改造，這種改造實現時，每個公民都會有飯吃並過文明的生活。

——每一個地方蘇維埃都創立着獨立的共和國，無論這種破壞現象是如何大，我們都不應趨於絕望，因爲這祇是一個發展病，這是由沙皇制度的俄國過渡到聯合的蘇維埃組織的俄國時一個

完全自然的現象。

施行所得稅和財產稅。我希望你們將這個問題擺在最近的日程上，你們知道，一切社會主義者都反對間接稅，因為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上看來，唯一正確的稅制，就是累進的所得稅和財產稅。我已經講過，在施行這種稅制時，有產階級將會拚命反抗。現時他們利用自己的聯繫和各種醜態的手段（一直到賄賂為止）圖謀避免這個稅制，我們應該採取一切辦法，使他們的圖謀歸於失敗。

在這一方面，我們擬定有很多的辦法，建立基礎的場所已經掃清了，可是這個基礎本身還沒有造成，因為要經過幾許時間，才能找得此項工作所需要的工作人員。現在這個時機已經迫近了。所得稅問題是這樣的：要實行所得稅，光是頒佈法令還是不夠的；要有實際的方法和經驗。我們認為，我們應該過渡到實行按月徵收所得稅的方法。應該採取一切辦法，使得一切從國庫中領得收入的人們所應納的所得稅，由他們所得的薪資中按月扣除。

應該毫無例外地向一切人徵收所得稅，因為至今實施的靠紙幣印刷機來辦理經濟的方法，祇當作一個臨時的辦法才是正當的。

現時這個過渡時期已經結束了，我們應該過渡到施行累進財產稅，並且要有很多徵收次數。

我希望你們詳細研究這種辦法，實際地精確地規定計劃，使我們能够在最近時期以內，將這個計劃變爲法令和訓令。

關於抽特捐的問題，列寧講道：

——我並不反對抽賠款，因爲我深切地知道，在最初時期，無產階級是非抽賠款不行的。這是過渡政權的正確辦法。可是現時過渡時間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過渡到集中地徵收累進所得稅，並且徵收次數很時常。毫無疑義的，資產階級會竭力企圖避免我們的法律，並使用小的欺騙手段。我們應該反對這種企圖，以求完全剷除資產階級底殘餘。

施行勞動義務制和提高勞動紀律。以商業自由與競爭爲基礎的舊資本主義，已大大地爲全歐戰爭所破壞。

戰爭已經使許多國家實行了人民勞動義務制。可是事實上，這個勞動義務制，祇是爲窮人而設的，因爲富人很易於贖免。而我們施行勞動義務制，應該首先不是對付窮人，這些人，就沒有這種義務，已在戰爭的祭壇上受了充分的犧牲，而是首先對付在戰爭中大發其財的富人。我們應該從這種辦法開始。首先對於富人們應該施行勞動收支納稅簿，以便知道，每一個富人担负怎樣一部份有益於本國和保全本國的工作。此種事務底監督將操在各地方蘇維埃手上。

而對於貧民，此種辦法現時是完全用不着的，因為就是沒有這種規定，他們也是要做足夠的工作，——並且職工會，正在採取各種辦法去提高生產率和勞動紀律。

我重說一遍，這種辦法應該首先施行。牠是準備去使捐稅負擔完全落在富人身上，而且也應當這樣才公平。

以現行舊貨幣兌換新貨幣，戰爭底結果之一，就是一切國家內紙幣充斥。在過渡到社會主義時，必須以別種取得社會福利的憑證，來代替現行的貨幣。貨幣，紙幣，——現時稱為貨幣的東西，起腐化作用，而且有危險，因為資產階級存有這些紙幣，即仍然握有經濟權力。我們應該立即採取辦法，以求削弱這種現象。

這些辦法，就是用新貨幣完全更換現行一切貨幣的方法，來嚴格計算現有的紙幣。毫無疑義的，這個辦法進行時，將有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極大困難。這個辦法，需要有詳細的準備工作，可是我們已經開始這種準備工作了。

我們規定一個最短的期限，在這個期限內，每一個存有貨幣的人，應該申明他所有貨幣底數量，並換領新貨幣。如果這個數目並不怎樣大，那末，這個所有人就如數領取新幣。如果這個數目超過了定額，那末，他就祇能領取一部份。這個辦法，毫無疑義的，不僅要遇到資產階級最

的反抗，而且那些在戰爭時期發了財並將紙幣裝滿罈子埋在土裏的農民，也要極力反抗。我們將同階級敵人短兵相接。這個鬭爭，將是艱苦的鬭爭，可是也是光榮的鬭爭，在我們中間誰也不會懷疑：我們應該擔負起這個鬭爭底全部重担，因為，這個鬭爭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

爲施行這個辦法起見，須要有莫大的準備工作：應該製定申明表底格式，應該在各地進行宣傳，規定以舊貨幣換領新貨幣的期限等等，這一切事體，我們都會做到。這是我們與資產階級做最後的戰鬭，這個戰鬭，使我們能夠向外國資本償付債款——在西歐社會革命還沒有到來的時候，——並在國內進行必要的經濟改革。

人民委員會主席，在結束演說時，表示深信他所列舉的設施會得到一切重視文化與革命勝利的人們底同情。他說這幾句話時全場掌聲雷動。

列寧·給國有化企業底代表會議的信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

聽過了由各最大五金製造工廠代表會議上的工人代表團選出來的各同志底通知，並注意到代表會議底決議案，我可以說：如果代表會議，竭力保證工作能有有計劃的嚴整的組織性和提高工作生產率，人民委員會，——據我看來，——大概會一致贊成立刻施行國有化。

所以希望代表會議：（一）立即選舉臨時委員會，進行聯合各工廠的準備工作；（二）給與五金工會中央委員會一種權力，使牠能够經過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之同意，變更各工廠聯合底形式，並補充臨時委員會委員人數，以便把臨時委員會變為一切國有化工廠總聯合底管理局；（三）贊同白梁斯基工廠所施行的廠內規則，或者用決議案形式將這些規則定為法令，以求造成嚴格的勞動紀律；（四）從專門家、工程師以及大規模生產底組織家當中，指定參加管理局的人員，或

者委託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選聘和任命這種人員；（五）最好（由臨時委員會或五金工會中央委員會）把辦理得最完善的工廠中的工人，或在領導大規模生產上最有經驗的工人，派到辦理得比較壞的工廠裏去，以協助一切並正確地辦理事務；（六）只要是能夠爲着勞動生產率來嚴格統計和監督一切材料，那末應該達到，而且能夠達到原料和勞動上極大的節省。

我想，代表會議和代表會議所選出的各組織要是努力工作，人民委員會，在最近幾天就會決定施行國有化。

二 外國武裝干涉和國內戰爭時期

列寧·論飢荒

——致彼得城工人的信，一九一八年五月——

同志們！日前有你們的一個代表來見過我，他是普梯洛夫工廠底工人，我黨黨員。這個同志把彼得城內極端嚴重的飢荒情形詳細講給我聽了。我們大家都知道，在許多工業省區裏，糧食問題也同樣尖銳，工人和一般貧民也是同樣瀕臨於痛苦的飢荒綫上。

同時我們却看見拿糧食和其他食品大肆投機的情形。飢荒並不是由於俄國沒有糧食，而是由於資產階級和一切富人在最重要最尖銳的糧食問題上，對勞動者底統治，即工人國家這蘇維埃政權作最後的決戰。資產階級和一切富人，其中包括有鄉村的富豪和富農，破壞糧食讓斷事宜，破壞國家的糧食分配辦法，這種辦法，正是利於和爲了把糧食供給全體人民，首先是供給工人、勞

動者和貧民。資產階級破壞固定價格，藉糧食投機發財，每普特糧食賺得一百、二百以至更多的盧布，破壞糧食壟斷事宜和正確分配糧食的辦法，它所用的破壞手段，就是賄賂、收買和惡意贊助足以危害工人政權的一切罪行，而這工人政權是在力求實現社會主義底第一個主要根本原則：『不勞動者不得食』。

『不勞動者不得食』，這是任何一個勞動者都懂得的。這是所有一切工人，所有一切貧農以至中農，所有度過貧苦生涯的人，所有靠工錢生活過的人都同意的。十分之九的俄國居民贊成這個真理。社會主義底基礎，社會主義力量之不可湮沒的泉源，社會主義最終勝利之不可摧毀的保障，也就在這個簡單的，十分簡單和再明顯不過的真理中。

但問題的實質却在於：甘心同意這個真理，發誓贊成這個真理，口頭上承認這個真理，是一回事，而善於把這個真理實現起來，却是另一回事。當在自稱為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的國家中，有幾十萬以至幾百萬人遭受飢餓痛苦（在彼得城，在非農業省區，在莫斯科），而那些富人，富農和投機者却把千百萬普特糧食匿藏起來的時候，每個有覺悟的工農都須認真仔細地思考一番。

『不勞動者不得食』——這個原則，怎樣才可以實現呢？顯然，爲要實現這個原則，第一，

就必須實行國家的糧食壟斷制，即絕對禁止任何私人的糧食貿易，務須把所有剩餘糧食按照固定價格繳給國家，絕對禁止任何人保存和隱藏餘糧。第二，就必須嚴格統計一切餘糧，以及有條不紊地把糧食從多餘的區域運往缺糧的地方，還要有供消費、供製造、供播種的存糧。第三，就必須在工人的，即無產階級的國家監督之下，實行正確和公道分配糧食的辦法，按國內全體公民來分配糧食，不給富人以任何的特權和優越地位。

祇要把這些克服飢荒的條件稍微想想，便可懂得那班否認爲了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爲了使勞動者擺脫一切壓迫和一切剝削而必須有國家政權（並且要是對資產階級極端嚴酷，對向政府搗亂者鐵面無情的政權）的無政府主義底可鄙空談家，真是愚蠢到了何等地步。正是現在，當祖國革命已緊接着在實際上具體實現——這也就是這革命不可磨滅的功績——社會主義的任務時，正是現在，並且恰恰是在當前主要問題，即糧食問題上，可以最明顯地看見，必須有鋼鐵般的革命政權，無產階級專政，必須在全國廣大範圍內，組織收集食品，運輸和分配食品的事業，並且要統計幾千萬以至一兩萬萬人的消費，要估計到往後一年以至若干年內的生產條件和結果（因爲要預防歉收的年份，要預計到爲了增加糧食收成，常常要有多年的工作來改良土壤等等）。

羅曼諾夫和克倫斯基遺留給工人階級的國家，是一個被他們所進行的劫掠、犯罪、創深痛鉅

的戰爭弄到極端破產的國家，是一個被俄國和外國的帝國主義者搶劫一空的國家。祇有嚴格地計算每一普特糧食，祇有絕對勻調地分配每一俄磅糧食，才能使糧食够一切人吃。供機器用的「糧食」，即燃料，也是極端缺乏的：如果不用全力來嚴格無情地節省燃料和實行正確分配，那末鐵路和工廠都會停頓起來，全國人民都會受到失業和飢荒現象的危害。災禍就在眼前，它已經逼近到我們頭上。在萬分困難的五月以後，還有更困難的六月、七月和八月。

國家糧食壟斷制，在我國已由法律明文規定，可是實際上它隨時隨地都被資產階級破壞着。鄉村中的富人、富農、土豪，這些把四周鄉里搶劫了好幾十年的人們，寧願藉投機業，藉造私酒來營利，須知這可以使他們自飽私囊，至於造成飢荒的罪過，那他們就推到蘇維埃政權身上。那些在政治上保衛富農的人，如立憲民主黨人、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孟塞維克，也是同樣的作法，他們又公開又秘密地爲反對糧食壟斷制，反對蘇維埃政權而「工作着」。無氣節者的黨，即左派社會革命黨，在這裏也表現自己的毫無氣節性：它甘受資產階級那種自私的叫喊號泣所蠱惑，它大叫反對糧食壟斷制，它提出「抗議」反對糧食壟斷，它甘受資產階級的恐嚇，它害怕反對富農，而瘋狂地搖擺不定，提議抬高固定價格，允許私人貿易等等。

這個無氣節者的黨在政策上反映着某種實際生活中所常有的情形：富農挑唆貧農去反對蘇

維埃的時候，就設法收買貧農，譬如給某個貧農一普特糧食，不要他付六個盧布的價錢，而祇要他付三個盧布，好使這個被腐化了的貧農也去『享受』投機利益，也去以一百五十個盧布，賣出這一普特糧食，『發發小財』，讓他也變成大喊大叫的人，去反對那禁止私人糧食貿易的蘇維埃。

凡是能够思索的人，凡是願意去那怕稍加思索的人，都會明白，究竟鬭爭是按那條路綫進行着：

或者是有意覺悟的先進工人把貧農羣衆團結到自己周圍，建立鐵一般的秩序，建立嚴厲無情的政權，即真正無產階級專政，而獲得勝利來強迫富農服從，並在全國範圍內樹立正確分配糧食和燃料的辦法；或者是資產階級得着富農幫助，得着無氣節和昏頭昏腦之輩（無政府主義者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的間接贊助，而把蘇維埃政權推翻，來擁立一個親德的或親日的科爾尼洛夫，這個科爾尼洛夫就會強迫人民每日作十六小時的工作，每星期領得八分之一磅的麵包，槍殺工人羣衆，在審訊室裏實行拷打，如在芬蘭和烏克蘭一樣。

或者就是那樣，或者就是這樣。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國內狀況危急到了極點。

凡是細心思索政治生活的人都不會不見，立憲民主黨人正在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賽維克互相協商；究竟是親德的科爾尼洛夫，還是親日的科爾尼洛夫「較為愜意一些」；究竟是帝制的科爾尼洛夫，還是共和制的科爾尼洛夫，對於鎮壓革命更好和更可靠一些。

現在已是一切覺悟工人，一切先進工人應該協商的時候了；他們應該即時振奮起來，懂得每一分鐘的遲延，都有使國家陷於淪亡，使革命陷於覆滅的危險。

彌補的辦法是無濟於事的。訴苦是會毫無結果的。各人企圖爲自己，即是爲「自己的」工廠，爲「自己的」企業，「零星」去找得糧食和燃料的辦法，祇會助長混亂狀態，祇會方便投機者所幹的自私自利和黑暗醜惡的勾當。

彼得城工人同志們！我之所以要寫這封信給你們，原因就在這裏。彼得城不是全俄國。彼得城的工人祇是俄國工人中的一小部份。但彼得城的工人是俄國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羣衆中一支優秀的、先進的、最有覺悟的、最革命的、最堅決的、最少受空洞辭句誘惑、最少受無氣節的絕望情緒影響、最少受資產階級威嚇的隊伍。在各國歷史中，當危急關頭，甚至人數不多的先進階級底先進隊伍竟能把全國人民吸引到自己周圍，用革命火焰燃起羣衆的熱情，而實現了偉大歷史功

動，這乃是常見不鮮的事。

彼得城底工人代表向我說：在他們普梯洛夫工廠裏原來有四萬工人，但其中大多數都是「臨時」工人，不是無產者，而是不可靠和軟弱的人們。現在祇剩下一萬五千人，但這都是無產者，都是經過鬪爭考驗和鍛鍊的人。

正是這樣的革命先鋒隊——在彼得城的以及在全國的——應當大聲號召，應當一齊奮起，應當認清，國家命運就操在自己手中，他們必須表現出與一九〇五年一月和十月，一九一七年二月和十月時同樣的英勇精神，他們應當起來組織偉大的「十字軍征伐」，反對糧食投機者，反對富農、土豪、破壞份子、貪贓受賄的人，組織偉大的「十字軍征伐」來反對在收集、運輸和分配糧食與燃料事宜上一切破壞國家嚴格秩序的人。

祇有先進工人大眾熱情底高漲，才能挽救國家和革命。需要有幾萬先進工人，即受過鍛鍊的無產者，他們要具有這樣高的覺悟程度，能夠向全國各地千百萬貧民說明真象，並成爲這千百萬人的領袖，他們要具有這樣大的堅毅精神，能夠無情地摒棄和無情地槍斃一切甘受投機利益「誘惑」——這是常有的事，——甘願從爲人民事業奮鬥的戰士而墮落爲劫掠者的人；他們要具有這樣堅定這樣忠於革命的赤忱，能夠有組織地把應在全國各地進行征伐的一切重荷，担負到底，來

樹立秩序，鞏固各地方蘇維埃機關，在各地監督每一普特糧食和每一普特燃料的消費。

這較之那在幾天之內表現英勇精神，既不要離開久居之地，也不要作長途征戰，而祇限於奮發熱情，舉行起義去反對惡魔和白痴的羅曼諾夫，或反對又愚蠢又自誇的克倫斯基的事情，要困難得多。在全國範圍內進行長期堅毅的組織工作上表現英勇精神，是比在起義中表現英勇精神要困難得無比的，可是也就高尚得無比了。然而工人政黨和工人階級底力量始終是由於它能大膽公開地正視危險，而不害怕承認危險，能清醒地估量哪些勢力是站在「自己」營壘方面，哪些勢力是站在「外人」，即剝削者底營壘方面。革命正在向前發展着，增長着。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也就增長起來。鬭爭也就擴大和加深起來。正確分配糧食和燃料，加緊設法獲得糧食和燃料，由工人在全國範圍內嚴格統計和監督這些事情，這就是進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和主要的門徑。這已經不是「一般革命的」任務，而是共產主義的任務，正是在這個任務上，勞動者和貧民應當向資本主義作一堅決的戰鬪。

爲了這個戰鬪值得獻出一切力量：這個戰鬪底困難是巨大的，然而我們所奮鬥的事業，即消滅剝削和壓迫的事業也是巨大的。

當人民忍飢受餓，當失業現象日益猖獗的時候，凡是在家裏隱藏一普特餘糧的人，凡是使國

家損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窮兇極惡的罪犯。

在這樣的時光，——而在真正的共產主義社會裏，則會永遠如此，——每一普特糧食和燃料都是真正的聖物，比神父們用來愚弄蠢人的聖物還要高尚得多，因為神父們素來是以昇登天堂來安慰在地上過着奴隸生活的人們的。爲要從這種真正聖物上把神父們所認爲的『神聖性』拋棄無餘，那就必須實際掌握這種聖物，必須做到在實際上正確分配這些聖物，必須把所有的餘糧一無例外地搜集盡淨，作爲全國存糧，必須在全國範圍內肅清隱藏餘糧和餘糧尙未收集的現象，必須用工人底堅決手腕做到使人們用最大的努力，來增加燃料採掘量，大大節省燃料，在燃料運輸和消費方面建立極端嚴格的秩序。

須要有先進工人之大規模的『十字軍征伐』，到所有一切生產糧食和燃料的區域去，到所有一切運輸和分配糧食燃料的重要地點去，來提高工作的毅力，使工作毅力增加十倍，來在實行統計和監督事業上幫助各地蘇維埃政權機關，來用武力消滅那些投機、受賄和疏忽大意的現象。這一個任務並不是新的。老實說，歷史並沒有提出新的任務，祇是隨着革命規模的增大，革命困難的增長及其全世界歷史任務之意義的增長，而使舊任務底範圍和規模擴大起來。

十月蘇維埃革命中一個最大而不可摧毀的創舉，就是先進工人以貧民領導者底資格，以鄉村

勞動羣衆領袖底資格，以勞動國家建設者底資格，到「民間」去了。彼得城派出了成千成萬的優秀工人到鄉村裏去，其他無產階級中心也派出了許多優秀工人。爲了同卡列金和杜托夫作鬪爭而組織的戰鬪隊，以及徵糧隊並不是什麼新奇事情。任務祇是，由於災禍逼近，情況艱難，而使我們必須作出比以前更增多十倍的工作。

工人成了貧民底領袖，並不就成了聖人。他領導了人民前進，可是他也就染上了小資產階級的腐化病。工人隊伍中最有組織、最有覺悟、最有紀律和最堅決的工人愈益減少，則這隊伍也就愈易腐化，而代表舊時的小私有者自發勢力，也就愈易戰勝代表將來的無產階級共產主義覺悟性。

工人階級開始了共產主義革命以後，並不能一下子就把自身的弱點和毛病拋棄掉。這些東西都是從地主資本家社會，從剝削者和土豪社會，從少數人醜態地營私致富而使多數人遭受貧困的社會中所繼承下來的。可是工人階級是能夠戰勝——並且歸根到底必然會戰勝——舊世界，能夠戰勝它的毛病及其弱點的，祇要工人階級不斷地派出一批一批人數日增、經驗日富、在困難鬪爭中所受鍛鍊日多的工人隊伍就行了。

現在俄國底情形正是這樣。單獨奮鬪，分散作戰，決不能戰勝飢荒和失業現象。必須有先進

工人之大規模的『十字軍征伐』，出發到幅員廣大的全國各地去。必須增加十倍地派出由有覺悟而矢忠於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組成的鋼鐵般的隊伍。那時我們就能戰勝飢荒和失業現象。那時我們就能把革命引到真正的社會主義門徑。那時我們也就能於進行勝利的防衛戰爭來反對帝國主義強盜。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一〇二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三十三卷，第三六至三二頁

列寧：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 大會上關於黨綱的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十九日——

（鼓掌）。同志們，根據我們和布哈林同志商定的分工報告辦法，我負責來說明委員會對於許多具體而最引起爭論或使黨現時最爲關心的諸條文的觀點。

我首先把布哈林同志在自己報告末尾說到我們委員會內部發生爭論的一些條款，作一簡單說明。第一，這就是綱領總論部份結構底性質。我覺得布哈林同志在這裏把委員會大多數爲什麼絕不同意在黨綱內勾去所有關於舊資本主義條文的理由，敘述得不完全正確。照布哈林同志的說法，有時令人覺得，似乎委員會大多數害怕人們非難這點，害怕人們責備委員會大多數不尊重敬

往事。毫無疑義，這樣來敘述委員會大多數人的立場，那末這種立場就很可笑了。但這與事實遠遠不相符合。委員會大多數之所以否決這種企圖，是因為這種企圖不正確，因為這種企圖不適合於實際情況。不帶資本主義主要基礎的純粹帝國主義從來也沒有過，現在沒有，將來也是不會有的。把財政資本主義描寫為似乎沒有絲毫舊資本主義底基礎，這是關於新迪加、卡德爾、托拉斯、財政資本主義所得出的不正確的總和。

這是不正確的。特別對於帝國主義戰爭時代和帝國主義戰爭以後時代，是不正確的。以前恩格斯在一篇論到未來戰爭的文章中就已寫過，他說，未來戰爭比之三十年戰爭的結果，將要破壞得更加殘暴得多，人類將要大大退化，人工造成的工商業機構將要遭到破產。戰爭開始時，社會主義叛徒和機會主義者曾誇揚資本主義底生命力，而把我們稱為「幻想家或半無政府主義者」來加以嘲笑。他們說：「看呵，這種預言並沒有實現。事變證明，這僅僅對於很少幾個國家並且是在很短時期內才是正確的！」那知現在，不僅在俄國，不僅在德國，並且在各戰勝國中也開始了這種現代資本主義的大破壞，其表現往往是取消着這類人工造成的機構，恢復舊的資本主義。

布哈林同志在委員會裏，說可以來試試把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破壞情景作一完整的描寫，那時我們反駁過他，在這裏我也要來駁斥他的這種意見，說：你去試試看，你也就會知道這是不會

成功的。布哈林同志在委員會裏會作過一次這樣的嘗試，結果他也祇好自行放棄。我絕對相信，假如有人能作到這點，那末布哈林同志便是最適宜不過的了，因為他對這個問題研究得非常多，又研究得非常詳細。我敢斷言，這樣的嘗試決不會成功，因為這裏的任務提得不正確。我們俄國此刻正經歷着帝國主義戰爭結果和無產階級專政開始的情景。同時在俄國許多彼此較前更加隔絕的省區內，我們往往遭逢着資本主義底復活及資本主義最初階段的發展。要想跳出這種狀況是不行的。若照布哈林的心願來寫成黨綱，那末這樣的黨綱便會是不正確的。這樣的黨綱至多也不過是把關於財政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最好的描寫重述一遍，但決不是現實的描寫，因為在我們現實中，恰巧沒有這種完整性。由性質不同的部份所構成的黨綱，是不漂亮的，（但這當然不重要），可是另一樣的黨綱，簡直會是不正確的。不管這種龐雜性，不管這種由不同材料所組成的結構是如何不滿意，如何不整齊，但我們在很長時期內還是跳不出這種狀況。當我們跳出了這種狀況的時候，我們就會製定出另一個黨綱。可是那時我們已經是處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了。而硬說在那時也會像在現時一樣，那就是太可笑了。

我們現在所處的，正是資本主義底許多最原始的基本現象都復活了的時候。就拿運輸業的破產情形來說吧，這是我們切身所極感痛苦的事。這是在其他國家，甚至連戰勝國裏都有的現象。

而在帝國主義制度下，運輸業破產又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就等於退回到商品生產最原始形式上去。我們知道得很清楚，究竟什麼是投機小販。這個名詞外國人以前大概是不懂得的，至於現在呢？你們去和出席第三國際代表大會的同志們談談吧。你們就會知道，原來在德國，在瑞士也有與此相似的名詞發生着。這個名詞是決不能歸進到任何無產階級專政範疇中去的，而一定要把它歸返到最低級的資本主義社會和最低級的商品生產時期中去。

用製定漂亮完整黨綱的辦法來跳出這個可悲的現實，就無異跳上九霄雲外，無異製定不正確的黨綱。決不是像布哈林同志所客氣暗示的那樣，由於尊敬往事，才迫使我們不得不把舊黨綱中的一些條文插進這裏來。結論就是：一九〇三年在列寧參加下所寫的黨綱，無疑義地是不好的黨綱，但因老年人最愛回憶過去，所以爲了尊敬往事，他們也就在新時代製定的新黨綱中重複着舊的東西。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那末這樣的傻子本可以拿來譏笑一頓。我敢斷言，並不是這樣一回事。一九〇三年所描寫的那個資本主義，到現今一九一九年時在蘇維埃無產階級共和國中，恰巧由於帝國主義底瓦解，由於帝國主義底破產而繼續存在着。例如，這樣的資本主義在薩莫斯科並不很遠的薩馬拉省和維亞得卡省內都可以找到。當內戰把國家弄成四分五裂的時候，我們決不會很快就能脫出這種投機小販現象。因此把黨綱構成另一樣式，便不正確。黨綱上應當說到真實的

情形，黨綱內所包括的應當是絕對不容置辯，事實確鑿的東西，祇有這樣的黨綱，才是馬克思主義的黨綱。

布哈林同志在理論上完全瞭解這點，他說，黨綱應該具體，但瞭解是一回事，實行却是另一回事。布哈林同志底具體性是對財政資本主義的資本上的敘述。而在實際情況中，我們看見有各種不同的現象。在每個農業省區內，我們都看見自由競爭與壟斷工業同時並存。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在許多部門中，不與自由競爭同時並存的壟斷資本主義，從來未曾有過，而且也決不會有的。寫出這樣的制度，就是寫出脫離實際生活的不正確的制度。既然馬克思說，手工工場制是普遍小生產底上層建築物，那末帝國主義和財政資本主義便是舊資本主義底上層建築物。把這個上層一破壞，就會暴露出舊資本主義來。認為有不包含舊資本主義的完整帝國主義，這種觀點便是把願望當作現實。

這是容易犯到的一種很自然的錯誤。假如在我們面前真的存在有把資本主義完全改造了的完整帝國主義，那末我們的任務就會輕易千百萬倍了。這就會構成這樣一種制度，那時一切都只會睜一眼從於財政資本主義。那時就祇須把上層拆除，而把其餘一切交給無產階級就行了。這倒是非常常痛快的事情，可惜這是現實中所沒有的。按照現實發展的情形，必須完全作另一種看法。帝國

主義是資本主義的上層建築物。當帝國主義崩潰着時，便發生上層物的破壞和根基的暴露。所以如果能使我們的黨綱成爲正確的黨綱，就應在黨綱中寫出真情實況，存在有舊的資本主義，它在許多部門中成長到了帝國主義。它的趨向祇是帝國主義的。對於各種根本問題祇能從存在有帝國主義的這點來觀察。沒有一個對內對外政策的重大問題可以不根據因存在此種趨向這點來解決的。此刻黨綱上所說的不是這一點。在現實中存在有舊資本主義莫大的基地。存在有帝國主義上層建築物，這上層建築物引起了戰爭，而從這戰爭中產生了無產階級專政底根基。要想跳出這個階段是辦不到的。這一事實也就表明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發展速度的本身，並且在許多年中仍然會是事實的。

西歐革命也許會經過得順利一些，可是爲了改造全世界，爲了改造大多數國家，畢竟還需要很多很多年。而這就是說，在我們現時所處的過渡時期中，也無法跳出這種龐雜紛繁的現實。儘管這個由各種不同部份組成的現實是如何不漂亮，但要一棄了之是決不行的。用另一種方式製成的黨綱，便會是不正確的黨綱。

我們說，我們走到了專政。這是很瞭然的。可是應當知道，我們是怎樣走到了的。舊的事物千頭萬緒地拖住我們，纏住我們，不讓我們前進一步，或者迫使我們前進得壞，正像我們現時的

情形一樣。所以我們說，爲了使人瞭解我們究竟落到了什麼境況中，就必須說出我們是怎樣走來的，是什麼東西把我們引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引我們來的，是原始商品經濟形式的資本主義。必須認清這一切，因爲祇有估計現實，我們才能解決例如對中農態度這樣的問題。的確，試問在純粹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時代怎樣能有中農的呢？須知甚至在普通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沒有過中農哩。如果我們唯一站在存在有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這點上來解決我們對這個幾乎是中世紀現象（即對中農）態度的問題，那我們便絕對不能自圓其說，並且還會碰很多釘子。如果我們要改變對中農的態度，——那就請在理論部份費心說說，中農是從何處產生的，以及什麼是中農。中農是小商品生產者。這是關於資本主義的初步常識，而必須直接說出的，因爲我們終究還沒有瞭解這初步常識。如果藐視這一點，說「我們已經研究好了財政資本主義，爲什麼還要來研究這種初步常識！」——那麼這種態度就極不莊重了。

至於對民族問題的態度，我也要這樣說。布哈林同志在這個問題上也是把願望當作現實。他說，承認民族自決權是不可能的。民族就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一起。我們，無產者，竟要來承認某一可鄙的資產階級底自決權！這真豈有此理！不對，請原諒，這是真情實理。如果勾去這一條，結果你那裏就祇會是幻想。你所藉口的，是民族內部發生的分化過程，即無產階級同資產

階級分化的過程。可是我們且來看看這分化的經過情形怎樣吧。

例如德國是模範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它在資本主義、財政資本主義底組織性方面會超過美國。它在許多方面，即在技術和生產方面，以及在政治方面，都比美國低些，可是在財政資本主義底組織性方面，在把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這方面，會高於美國。看來這可稱為模範。但其實那裏的情形又怎樣呢？德國無產階級是否與資產階級分化了呢？沒有！僅僅有關於幾個大城市的消息，說那裏多數的工人反對謝德曼派。但這是怎樣發生的呢？這是由斯巴達克團與德國那些可惡至極的孟塞維克式的獨立黨人結成聯盟才達到的，這些獨立黨人把一切糟成一團，想使蘇維埃制度和所謂立憲會議結合起來！你看，這就是在這個德國發生的情形。而德國還是先進的國家哩！

布哈林同志說：「我們幹麼要民族自決權？」我應當把他在一九一七年夏季提議取消最低限度綱領而祇留下最高限度綱領時我所駁斥過他的話，拿來重複一遍。我當時回答他說：「不要在上戰場以前來吹，要下了戰場以後來吹吧」。我們首先要奪得政權，再稍微等等，然後我們就要這樣做的。果然，我們奪得了政權，也稍微等了一些時候，現在我同意來這樣做了。現在我們已經完全走進了社會主義建設時代，已經打退了威脅我們的第一次進攻，現在這樣來做是適宜的

了。關於民族自決權也是如此。布哈林同志說：『我祇願意承認各勞動階級底自決權』。這就是說，你所願意承認的，是除俄國以外，實際上在任何一國都還沒有達到的東西。這是很可笑的。請看芬蘭的情形吧：芬蘭是民主國家，是比我們發達一些，文明一些的國家。那裏正在發生無產階級分化的過程，這一過程的進展情形是很特殊的，是比在我國困苦得多。芬蘭人受過了德國專政的壓迫，現在又受着協約國專政的壓迫，由於我們承認民族自決權，而使那裏的分化過程容易進展一些了。我當時在斯莫爾雷必須把正式文書交給那個起過劊子手作用的芬蘭資產階級代表斯潤胡德——意譯就是『豬頭』——的這番情景，至今還記得很清楚。他很客氣地握了我的手，我們互相說了一些恭維話。這是多麼不好呵！但這本是必須做的事情，因為當時遺棄產階級欺騙人民，欺騙勞動羣衆，藉口說是大莫斯科主義者、沙文主義者、大俄羅斯人想撲滅芬蘭人。這本是必須做的事情。

昨天我們對於巴什基爾共和國也不是必須這樣做的嗎？當布哈林同志說：『對於某些民族是可以承認這種權利的』，我也就記下來了，在他所說的這張名單中，包括有霍屯督人、布西門人、印度人。當我聽到他所例舉的這張名單時，我就想到：布哈林同志怎麼忘記了一件小小的事情，忘記了巴什基爾民族呢？布西門人在俄國境內是沒有的，說到霍屯督人，我也沒有聽見過說

他們冀望成立自治共和國，但是在我國有巴什基爾人、基爾吉茲人及其他許多民族，這些民族的自決權，我們是不能拒絕承認的。我們對於任何一個居住在舊俄帝國境內的民族都不能拒絕這點。就假令巴什基爾人在我們幫助下會推翻他們底剝削者，但這祇是在革命已經完全成熟了的地方才能做到。並且要做得很謹慎，以免我們的干涉阻礙着我們所應當促進的無產階級分化出來的過程。試問我們對於那些至今還處在阿洪影響之下的基爾吉茲人、薩爾特人有什麼辦法呢？在我們俄國，居民有過與牧師周旋的長期經驗，所以前者才幫助我們把這些牧師趕掉。但你們知道，新婚姻法至今還執行得很壞。我們是否可以走到這些薩爾特人跟前，向他們說：『我們要打倒你們的剝削者』？我們不能這樣做，因為他們還是完全服從自己的阿洪。這裏必須等待這一民族的發展，等待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成份分化開來，而這種發展過程是必不可免的。

布哈林同志却不願意等待。他急不可耐地說：『爲什麼要等待？既然我們推翻了資產階級，宣佈了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爲什麼我們還要這樣做呢？』這是帶鼓舞性的號召，並含有對我們道路的指示，但如果我們在黨綱中宣佈這樣一點，結果定會不是黨綱，而是一張宣言了。我們可以宣佈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宣佈完全鄙視那些值得加以千百次鄙視的資產階級，可是在黨綱中應當絕對確切地寫出真情實況。祇有這樣，我們的黨綱才會是無可爭辯的黨

綱。

我們是站在嚴格的階級觀點上，我們在黨綱裏所寫的東西，也就是承認在我們寫過一般民族自決權的時代以後所實際發生了的事情。那時還沒有無產階級共和國。當這類共和國已經出現之後，也祇有按它們的實現程度，我們才能寫出像我們寫在這裏的此種條文：「按蘇維埃式樣組織起來的聯邦國家」。蘇維埃式樣並不就是如在俄國已經存在着的蘇維埃，但是蘇維埃式樣已在成爲國際性的式樣。我們所能說到的，僅僅到這裏爲止。再往前去，那怕是再多進一步，再進一寸一分，就已會是不正確的了，所以在黨綱裏也就不能這樣規定。

我們說：必須顧及到這個民族是處在從中世紀制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道路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制到無產階級民主制道路的哪一個階段。這是絕對正確的。一切民族都有權自決，不值得把霍屯督人和布西門人特別提出來說。地球上絕大多數居民，至少十分之九，也許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都適合於這種論斷，因爲所有一切國家都是處在從中世紀制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道路，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制到無產階級民主制的道路上。這是必經的道路。再說多一點便不行了，因爲再多說，便會是不正確，便會是不合乎實際情形。勾去民族自決字樣而寫上勞動者自決字樣，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爲這樣的提法便是不顧及各民族內部的分化經過着如何困難、如何曲折的道路。在德國，

這種分化的進展情形是與俄國不同的：在某些方面進展的快些，而在另一些方面則進展得慢些，並且還是經過流血的道路。在我國，如像把蘇維埃和立憲會議結合起來的這種怪誕思想，是任何一個政黨也沒有接受過的。然而我們還須與這些民族比鄰而居，現在謝德曼派已經在說我們想佔領德國。這當然是很可笑的無稽之談。但是資產階級有他們自己的利益，發行有千百萬份的報章雜誌，向全世界大聲宣傳這一點，而威爾遜爲了自己的利益也擁護這一點。他們說，布爾塞維克擁有很大的軍隊，想用佔領的手段來在德國培植布爾塞維主義。德國的優秀人物——斯巴達克團員——告訴我們，人們挑撥德國工人反對共產黨員說：你們看，布爾塞維克那裏的情形是多麼壞啊！而我們現在也不能說我們這裏的情況是很好的。於是在德國，他們就用這種理由去影響羣衆說，在德國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就會造成與俄國一樣的混亂狀態。我們的混亂狀態是我們綿延不斷的疾病。我們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就必得來克服極大的困難。當德國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或雖是一部份工人，還受着那種說『布爾塞維克想用強力手段建立自己制度』的騙語威嚇時，『勞動者自決』的公式是不會使現狀好轉的。我們應當做到，使德國社會主義叛徒們無法來說布爾塞維克強制人家接受他們的萬有制度，似乎這種制度可以由紅軍的刺刀帶到柏林去。如果我們否認民族自決的原則，那人家就可以作出這樣的結論。

我們的黨綱不應當說勞動者自決，因為這是不正確的、我們的黨綱應當說現有的實在情形。

既然各個民族還處在從中世紀制到資產階級民主制道路或從資產階級民主制到無產階級民主制道路中不同的階段上，那末我們黨綱中所寫的這個原則便是絕對正確的。我國在這條道路上有過許多多迂曲折。每個民族都應當獲得自決權，這也就會促進勞動者底自決。在芬蘭，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分化的過程是進展得非常顯明，強而有力，並且是很深刻的。那裏的全部過程定會與我國有過的完全不同。如果我們說不承認什麼芬蘭民族，而祇承認勞動羣衆，這就是空洞至極的廢話。不承認實在情形是不行的：這種實在情形會強迫你承認它的。在不同的國家中，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分離是各自走着特殊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的動作應當極端謹慎。尤其是對於各國不同的民族要特別謹慎，因為對民族懷着不信任的心理，是最壞不過的事情。在波蘭，無產階級正在進行自決。以下便是華沙工人代表蘇維埃成份最終的數字：波蘭社會主義叛徒三百三十三人，共產黨員二百九十七人。這就表明，照我們的革命年歷看來，那裏很快就到「十月」了。這已經是一九一七年的八月或九月。但是第一，還沒有頒佈過法令，要所有一切國家都遵行布爾塞維克的革命日曆，就即令頒佈了這樣的法令，也是不會執行的。第二，現在的情形，乃是我比我國工人先進，文化程度較高的波蘭大多數工人，都持着社會護國主義和社會愛國主義的觀點。必

須等待一下。這裏決不能說什麼勞動羣衆自決。我們應當宣傳這種分化。這點我們已經在作，但毫無疑義，現在決不能不承認波蘭民族自決。這是十分顯然的。波蘭無產階級運動是與我國無產階級運動走的同樣的道路，即向着無產階級專政前進，可是前進的方式却與俄國的不同。而在那裏，人們用下面的話來恐嚇工人：向來壓迫波蘭人的大莫斯科主義者，大俄羅斯人想在共產主義名稱掩蓋之下把他們的大俄羅斯沙文主義移植到波蘭來。共產主義是不能用強力手段來移植的。有一個優秀的波蘭共產黨員同志聽見我向他說：「你們要用另一個樣式做去」，他便回答我說：「不，我們要同樣的來做，不過要比你們做得好一些」。對於這種說法，我絕對無法反駁。應當讓他們有可能實現這個謙虛的願望：把蘇維埃政權建立得比我們的好一些。不能不顧及到那裏所走的道路帶有特殊性，決不能說：「打倒民族自決權！我們祇讓勞動羣衆有權自決」。這種自決過程非常複雜，非常困難。現時除俄國以外，任何地方都沒有這種自決，必須預先見到其他各國發展的種種階段，決不要從莫斯科發出任何指令。所以這個提議在原則上是不能接受的。

現在根據我們擬定的計劃，我來說到我應當說明的以下各點。我把小私有者和中農問題提在第一位。關於這一點在黨綱第四十七條上說：

「俄國共產黨對於中農的政策就在於有計劃地逐漸吸引他們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工作。黨的任務是要使

中農和富農分離，用仔細關心中農需要的辦法把他們吸引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同時用使思想上影響的手段，決不是用高壓手段去和他們的落後性作鬥爭，凡是觸犯到他們生活利益的地方，都必須力求同他們作實際的妥協，在決定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方法上要同他們讓步。」

我覺得我們這裏所構成的語句是社會主義創始人對中農問題也說過多次的話，這個條文的缺點只是不够具體。在黨綱內，我們未必能寫得更具體一些。但是在代表大會上必須提出的，不僅屬於黨綱的問題。關於中農問題，我們也應當加倍地，再三加倍地注意。恰巧此刻我們得到消息，說在已開始氾濫於俄國諸農業區的暴動中，顯見有一個總計劃，而且這個計劃是與原已決定在三月間舉行總進攻並組織多處暴動的白黨底軍事計劃，顯然有着聯繫。代表大會主席團擬定有一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不久會報告給你們聽的，這些暴動再明顯不過地向我們表明，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一部份孟塞維克——孟塞維克曾在布良斯克組織暴動——充當白黨的直接奸細。白黨的總進攻，農村暴動，斷絕鐵路交通：難道這樣還不能把布爾塞維克推翻麼？這裏，中農所起的作用特別重要，特別生命攸關。在代表大會上，我們不僅應當強調我們對中農的讓步態度，而且要想出許多可以直接給中農某些利益的更具體的辦法。這是爲了自衛起見，爲了反對我們的一切敵人起見所迫切要求的辦法，這些敵人知道中農是動搖於我們與他們之間，而極力企圖引誘中農

離開我們。就我們的現狀看來，我們擁有巨大的後備力量。我們知道，波蘭和匈牙利的革命都在發展着，並且發展得很快。這些革命會給我們以無產階級後備力量，會減輕我們的困難而大大鞏固我國無產階級的基地，這種基地此刻在我們這裏原是薄弱的，這是在最近幾月內發生的事變，可是我們不知道這事變究竟會在哪一天發生。你們知道，現在進到了非常緊張的關頭，所以現在中農的問題也就獲得了極大的實踐意義。

往下我想說到合作社問題，——這就是我們黨綱第四十八條。這條黨綱在相當程度上已經陳舊了。當我們在委員會裏起草這條黨綱時，我國祇存在有合作社，可是還沒有消費公社，但幾天之後便通過了把各種形式的合作社併為統一的消費公社的命令。我不知道這個命令曾否公佈，在這裏出席的大多數人是否已見過這個命令。如果沒有公佈的話，那末，這命令明天或後天定會公佈的。這條黨綱在這一方面是已經陳舊了，但是我覺得這條黨綱仍然需要，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從頒佈命令到執行命令，其中的距離是相當遠的。關於合作社的事情，從一九一八年四月起我們就已費盡心力來料理，雖然我們已經有了很大的成就，但這還不是有決定意義的成就。把居民聯合在合作社裏的事業，有時我們達到了這樣大的範圍，就是在許多縣份中有百分之九十八的農村居民已經聯合起來了。但這些還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就已存在了的合作社，澈頭澈尾地浸透了

資產階級社會的精神，而領導這些合作社的，又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資產階級專門家。我們還無法使這些合作社服從我們，在這方面，我們的任務仍是沒有解決的。我們的法令，在建立消費公社的意義上說，是前進了一步，命令中指出，全俄所有各種形式的合作社都必須合併起來。但是這個命令，即令我們把它完全執行，也還是會把工人合作社保留為將來消費公社中自主的部份，因為熟悉底細的工人合作社代表向我們證明說，工人合作社這較為發展的組織，應當保存起來，因為它的活動是客觀上所必須的。我們黨內關於合作社問題有過不少的紛歧和爭論，合作社裏的布爾塞維克工人與蘇維埃裏的布爾塞維克工人之間，發生過磨擦。我想在原則上，這個問題無疑是應當按這樣的意思來解決：既然這種組織是資本主義在羣衆中準備起來了的唯一組織，是在還處於原始資本主義階段的農村羣衆中從事活動的唯一組織，所以這個組織無論如何都應當保存和發展起來，最低限度也不應該拋棄它。在這裏，任務是很困難的，因為充當合作社領袖的人，大半都是資產階級的專門家，往往還是真正的白黨份子。由此也就發生了對他們的仇恨心理，正當的仇恨心理，由此也就發生了反對他們的鬭爭。但是這個鬭爭當然應該進行得很巧妙：要斬斷合作社工作人員中反革命的陰謀活動，可是這不應成爲是同合作社組織作鬭爭。一面排除這些反革命的活動份子，同時應當使合作社組織本身都服從我們。在這裏的任務也

是與對待資產階級專門家的態度一樣，後者已是我所指出的另一個問題了。

關於資產階級專門家的問題引起了不少的磨擦和意見上的分歧。日前我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作報告時，寫來問我的問題中有幾個是關於薪資定額的問題。有人問我：難道在社會主義共和國裏，薪資可以達三千盧布之多麼？實際上我們在黨綱裏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因為在這一點上發生的不滿已經是很厲害的了。關於資產階級專門家的問題在軍隊裏，在工業裏，在合作社裏都發生着，到處都發生着。這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時期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祇有利用資產階級的科學和技術來把共產主義變成爲大眾所容易接近的東西時，才能建成共產主義。想用別一種方法來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是不行的。而要用這樣的方法來建成共產主義，就必須把機關從資產階級手裏奪來，就要吸收所有這些專門家來參加工作。我們在黨綱中故意把這個問題發揮得很詳細，以使用急進方法來解決它。我們明白知道，俄國文化落後是什麼意思，這種落後性對蘇維埃政權發生怎樣壞的影響；蘇維埃政權雖在原則上給予了高得無比的無產階級民主制，對全世界作出了這種民主制的模範，可是這種文化落後性却玷辱蘇維埃政權並復活着官僚制。蘇維埃機關在口頭上是全體勞動羣衆都能接近的，而在實際上却遠不是他們全體所能接近，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根本不是法律妨礙了這一點，如像在資產階級時代那樣；恰恰相反，法律並促進這

點。但是這裏單有法律還不够。必須有廣大的教育工作、組織工作、文化工作，而這需要長期巨大的工作，決不是法律所能迅速作成的。關於資產階級專門家問題在本屆代表大會上應當有極肯定的解決。這樣的決議就會使那些無疑義是在傾心諦聽這次代表大會的同志們，有可能憑藉代表大會的威信來進行工作，並親眼看見我們遇到了怎樣的困難。這樣的決議會幫助那些隨時隨刻都碰到這個問題的同志們至少是來參加這方面宣傳工作。

到莫斯科來出席代表大會的斯巴達克團的代表同志們告訴我們說，在德國西部工業最發達的區域，即斯巴達克團在工人中影響最大的區域，雖然斯巴達克團在那裏還沒有獲得勝利，可是在許多極大企業裏的工程師和經理們到斯巴達克團員那裏來說：「我們跟你們一塊走」。我們這裏沒有過這樣的情形。顯然那裏由於工人的文化水準高些，技術人員更無產階級化些，也許還有許多我們所不知道的其他原因，便造成了這種與我國情形多少不同的關係。

無論如何，這裏正是我們繼續前進中的主要障礙之一。我們應當立刻，不等待其他國家的援助，馬上提高生產力。要做到這點，沒有資產階級專門家參加是不行的。應該這樣肯定不移地說。當然，這些專門家中大多數人都浸透了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必須由工人政治委員們和共產黨支部造成同志合作的氣氛，來包圍他們，要使他們無法脫去，但同時應當讓他們有可能獲得比在

資本主義下更好的工作條件，因為不如此，則這個由資產階級培養出來的階層就不會替我們工作。想用強迫手段迫使整個階層來工作，是不行的，在這方面我們已經有了很好的經驗。可以迫使他們不去積極參加反革命陰謀，可以恐嚇他們，使他們害怕伸手去拾起白黨的宣言。在這一方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動作得很積極的。這是可以作到的事情，這也是我們作得很充分的事情。我們大家都學會了這樣作。但是，要用這樣手段來強迫整個階層來工作，是不可能的。這批人慣於文化工作，他們在資產階級制度範圍內推進過文化工作，就是說，使資產階級獲得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無產階級所分受的份量却渺小得不足道了，——但是他們總算推進了文化，這也就是他們的職業。當他們看見工人階級中湧現出有組織的先進階層，這些階層不但重視文化，而且在羣衆中幫助推行文化工作，那時他們就會改變對我們的態度。當醫生看見無產階級喚起勞動羣衆自動來進行防疫事宜時，他就會用完全另一樣態度來對待我們了。在我國這種由資產階級的醫生、工程師、農業技師、合作社所組成的階層是很廣大的，當他們在實踐上看見無產階級吸引愈益增多的廣大羣衆參加這種事業的時候，他們就會在精神上完全折服，而不僅在政治上斬斷與資產階級的關係而已。那時我們的任務就會容易些了。那時他們就會自然而然的被吸收到我們機關中來，而成爲它的組成部份。爲了這點，必須作相當犧牲。爲了這點，那怕付去二十萬萬盧布

都是渺小不足道的。害怕這種犧牲便是孩稚氣，因為這就是不懂得擺在我們面前的那些任務。

運輸業解體，工業和農業解體就破壞着蘇維埃共和國的整個生存。這裏我們應當採取最積極的辦法，使全國所有一切力量都極度緊張起來。對專門家，我們不應當採取吹毛求疵的政策。這些專門家不是剝削者的傭僕，而是文化工作者，他們在資產階級社會裏會服務於資產階級，而全世界社會主義者都說，這些人在無產階級社會裏是會向我們服務的。在這一過渡時期中，我們應當盡可能給他們較好的生活條件。這將是頂好的政策，這將是最合理的經營辦法。否則我們節省了幾萬萬盧布，却可能喪失甚至幾千萬萬盧布所不能恢復的東西。

當我們和勞動人民委員施米特同志討論薪資定額問題時，他舉出了以下的事實。他說，我們在平衡工資水準方面作了很多工作，這種工作是何種資產階級國家所沒有作過，並且是它們在今後幾十年中所不能作到的。例如戰前的薪資定額：粗工每天一個盧布，每月二十五盧布，而專門家的薪資每月是五百盧布，更不待說那些領得幾十萬盧布薪資的人了。專門家領的薪資比工人多過二十倍。我們現在的薪資定額，是從六百盧布起到三千盧布止，高低相差祇到五倍。關於平衡工資一層我們作過很多的事。不錯，我們現在是對專門家付給了高的薪資，但爲了受到教益才付給他們多餘的薪資，這不僅值得，而且是應當的，在理論上是必須的。我以爲這個問題在黨綱上

規訂得充分詳細。必須加倍着重指出這個問題。在這裏，不僅要在原則上解決這個問題，而且要使所有參加代表大會的人回到各地去時，在向自己組織作報告和在各人的全部活動中，都能把這
一點加以實現。

我們已經在動搖不定的知識份子中獲得了巨大的轉變，如果我們昨天說過使小資產階級政黨合法化，而今天却逮捕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那末，在這種擺動中我們是執行着完全肯定的路線。這種擺動裏貫徹有一條最堅決的路線，就是斬斷反革命活動，以及利用資產階級文化機關。孟塞維克是社會主義的最兇惡的敵人，因為他們披上了一層無產階級的外皮，但實際上是個非無產階級的階層。在這個階層中祇有極少數上層份子是无產階級出身，而這個階層本身却是由小知識份子所組成的。這個階層已在趨向於我們。我們要把這整個階層都爭取過來。每當他們趨向於我們時，我們都說：「請你們來吧」。每一次這樣的擺動，都有這個階層中的一部份人走到我們這方來。孟塞維克和新生活派「三」的情形會是這樣，社會革命黨人的情形也會是這樣，所有這些動搖份子的情形，也將是這樣，這些份子還會在很長時期內，東搖西擺，垂頭喪氣，從一個營壘跑到另一個營壘，對於他們這些人是無法可想的。但是我們會從這一切擺動中得到文化知識份子階層來參加蘇維埃工作人員的隊伍，而摒除那些繼續擁護白黨的份子。

按照分工報告辦法我所要說明的下一個問題，就是關於官僚主義以及吸引廣大羣衆參加蘇維埃工作的問題。老早以前就聽見過對官僚主義的怨聲，這種怨聲無疑是有根據的。我們在反官僚主義的鬭爭中，作到了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作到的事情，那種澈頭澈尾都是官僚主義的和帶資產階級壓迫性的機關，甚至在最自由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中都仍舊是這種性質的機關，已經被我們連根帶蒂剷除了。單就法庭來說吧。自然在這裏的任務是比較輕易一些，在這裏曾不須建立新的機關，因為根據勞動階級的革命法權意識來裁判，這是誰都會作的事情。我們在這方面遠遠沒有把一切貫徹到底，可是在許多方面，我們已把法庭照應有的那樣建成起來了。我們建立了這樣的機關，它們能夠吸收每一個人，不僅男子，而且婦女，即最落後和最不靈便的份子，人人都來參加。

在另一些管理部門中的職員，是更加守舊的官僚。在這裏，任務是要困難些。沒有這種機關便行不通，所有一切管理部門都需要有這種機關。在這裏，我們正受着俄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夠的痛苦。在德國，大概這種痛苦要輕微一些，因為德國的官僚機關經過了很大的考驗，官僚們在那裏絞盡腦汁，可是那裏也強迫他們工作，而不像在我國辦公室的那些人，專門坐在安樂椅上安閑度日。我們已經把這種舊官僚主義份子趕走掉，檢舉過，然後又開始委派他們担任新的職務。沙

皇時代的官僚漸漸轉入蘇維埃機關，實行官僚主義，裝扮為共產主義者，並且爲了鑽營隱遷起見，設法取得俄國共產黨的黨證。所以剛剛把他們趕出大門之後，他們又從窗戶裏鑽進來了！這裏主要是由於文化工作人材不夠。這些官僚本來可以驅散，但是決不能一下子把他們改造過來。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首先就是組織任務、文化任務和教育任務。

祇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澈底進行反官僚主義的鬭爭，才能完全戰勝官僚主義。這在資產階級共和國裏，不僅不可能，並且法律本身也妨礙這樣作去。那怕在最好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儘管那裏民主制如何發展，還是有無數法律上的障礙，阻礙着勞動羣衆去參加管理工作。我們已經澈底掃除了這些障礙，可是我們至今還沒有達到使勞動羣衆能够參加管理工作的地步，——因爲除了法律之外，還有文化水準，而這你是不能使之服從任何法律的。這種低度的文化水準遂使蘇維埃雖然在綱領上是經過勞動羣衆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在實際上，却是經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來爲勞動羣衆而實行管理的機關，但不是經過勞動羣衆本身來從事管理。

這裏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祇有用長期教育工作才能解決。目前這個任務對於我們是困難到了極點，我已屢次指出過，這是因爲担任管理的工人幹部還異常缺乏。我們應當獲得後援，照各種情形看來，國內的這種後備力量正在增長着。莫大的求知慾望以及往往是由校外學習辦法所透

到的莫大教育成績，亦即勞動羣衆在教育方面所獲得的巨大成績，這是絲毫不容懷疑的。這種成績雖非任何學校範圍所能包括，但它確是非常巨大。一切標誌都表明在最近將來就可獲得巨大的後備力量，來代替很感缺乏的無產階級幹部中那些勞累過度的人們。然而無論如何，目前我們在這一方面的情況是非常困難的。官僚已被打敗了。剝削者已被剷除了。但是文化水準還沒有提高，所以官僚們又佔據了舊有的位置。要把他們排擠出去，祇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比迄今以前更大規模地組織起來，同時真正實行吸引工人來參加管理的種種辦法才能作到。這些辦法，你們在每個人民委員部方面都很知道，我也不來詳細說明了。

我必須講到的最後一個問題，就是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和剝奪選舉權的問題。我們的憲法承認無產階級比農民佔有優越地位，承認剝奪剝削者底選舉權。西歐方面的純粹民主主義者攻擊我們最厲害的，就是這一點。我們回答過他們，而且現在還回答他們說，他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的原理，忘記了他們那裏所說的是資產階級民主制，而我們却已進到了無產階級民主制。在吸收工人和貧苦農民參加國家管理這點上，蘇維埃共和國過去幾個月來所做的事情，是任何一個國家連十分之一都沒有做到的。這是絕對的真理。誰也不會否認：我們對於真正的而不是紙上的民主制，對於吸收工農參加管理方面所已經做了的事情，是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共和國在幾百年內

所未會做到，而且也是它們所不能做到的。這就決定了蘇維埃的意義，正由於這一點，蘇維埃就成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底口號。

但是這絲毫也不能使我們擺脫因為羣衆文化程度不鈔所碰到的困難。關於剝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問題，我們絲毫也不是從絕對的觀點來出發，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隨時隨地都還要鎮壓資產階級，但可以不必要剝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這在理論上是完全允許的。這是理論上完全可以想像的事情，所以我們也就不把我們的憲法提作其他國家的模範。我們祇是說，誰認為過渡到社會主義無須鎮壓資產階級，那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鎮壓資產階級這個階級是必要的，但剝奪它的選舉權與平等權却不是必要的了。我們不願意給資產階級以自由，我們不承認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平等，可是我們在黨綱中，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是認為也如工人與農民不平等這類的辦法一樣，就根本不是憲法上所必須載定的。憲法是在這些辦法業已實現以後，才把它們明文規定下來。蘇維埃的憲法甚至不是布爾塞維克擬訂的，而是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布爾塞維克革命以前就擬訂出來，實則是反對他們自己的。他們是按照實際生活所擬訂的那樣來擬訂這憲法，無產階級組織的發展比農民組織的發展快得多，這就使工人成了革命的支柱，而給了工人實際上的優越地位。往後的任務就是要從這種優越地位逐漸過渡到工農間的平等地位。無論在十月革命以前或以

後，誰也沒有把資產階級趕出蘇維埃去。是資產階級自己遠遠離開了蘇維埃。

關於資產階級選舉權問題，情形就是這樣。我們的任務，便是要把問題提得十分明顯。我們絲毫也不會說我們的行動不對，但要完全確切地列舉出真正的事實，我們的憲法，正如我們所說過的那樣，曾不得已才把這種不平等加入進去，因為文化水準低，因為我們的組織弱。可是我們並不把這點看成是理想，恰恰相反，按照黨綱，我們黨定要進行有系統的工作，來消滅這種在較有組織的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不平等，一到我們提高了文化水準，我們就要把這種不平等現象消除掉的。那時我們就可以不要這種限制了。這種限制就在革命勝利後不過十七個月的現時，其實踐意義已經是很微小的了。

同志們，這就是我認為在討論黨綱時所必須說到以供大家今後討論的主要幾點。（鼓掌）。

一九一九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三一至一四七頁

列寧·在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 大會上關於農村工作的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長時鼓掌)。同志們，我要向你們道歉，我沒有可能參加本代表大會所選出的農村工作副委員會的一切會議。所以從開始就參加了該副委員會工作的同志們底發言，會來補充我的報告。副委員會終於擬定了提綱，並交給了委員會，這個提綱，以後還會向你們報告的。我祇想來說說這問題底一般意義，這個問題在副委員會工作結束後怎樣提到了我們面前，以及在我看來，這個問題現在怎樣提到全黨面前的情形。

同志們，在無產階級革命發展的每一階段上，我們必須把社會生活中某種最複雜最重要的問

題提到首要地位，這是完全自然的。革命總是觸動，而且不能不觸動最深刻的基礎和最廣泛的民衆，所以在革命時期，任何一個黨，任何一個甚至最接近羣衆的政府，也絕對不能一下子就顧及到生活各方面，這也是很自然的。我們此刻要來討論關於農村工作問題，並在這問題中特別注意到中農狀況的問題，這從無產階級革命一般發展的觀點看來，是沒有什麼奇怪失常的地方的。當然，無產階級革命會必須從解決兩個敵對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基本關係開始。其基本任務就是要使政權轉入工人階級手中，保證工人階級專政的實現，推翻資產階級，並剝奪資產階級政權底那種經濟策源地，即無條件是一般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障礙的經濟策源地。我們研究過馬克思主義，所以我們都深信這樣一個真理：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由於這社會底經濟結構本身的原因，能起着決定作用的，或者是無產階級，或者是資產階級。現在我們却看見有許多以前的馬克思主義者——例如在孟塞維克營壘中——斷言說，似乎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決鬥期間可能有一般民主制底統治。百般應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孟塞維克就是這樣說着。好像並不是資產階級依據切身利益來自行建立或取消民主制一樣！既然如此，那末在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鬥爭尖銳的時候，就根本談不上什麼一般民主制。所令我們驚訝的，祇是這類馬克思主義者或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例如我們的孟塞維克，如何迅速地揭穿自己，如何迅速地暴露出自己的真面目，即小

資產階級民主派底面目。

馬克思一生鬭爭得最多的，就是反對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和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底幻想。馬克思對於自由平等的空話譏笑得最爲厲害，這些空話所掩護着的，是工人餓死的自由，或出賣勞動力者與那好像是在自由市場上自由而平權地購買工人勞動等等的資產者之間的平等。馬克思在其所有一切經濟著作中，都闡明了這點。可以說，馬克思所著的資本論全專係闡明這一真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力量就是而且祇能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建設人、領導者、推動者，無產階級則是這個社會的掘墓人，是唯一能够代替它的力量。在馬克思底任何一部著作中，沒有一章不是闡明這個問題的。可以說，參加第二國際的全世界各國社會黨人都曾千番百次在工人面前賭咒發誓，說他們瞭解這個真理。但是當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已進到爭奪政權的真正決鬭的時候，我們却看見我國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全世界老社會黨的領袖都忘記了這個真理，而來純粹機械地重複着什麼一般民主制的庸俗詞句。

在我國，有人企圖使這些話表現得似乎更爲「有力」，而說什麼「民主派專政」。這就簡直是荒謬無稽之談了。我們從歷史上明明知道，民主資產階級底專政不過是對起義工人所實行的鎮壓而已。從一八四八年起就是這樣，無論如何也不遲些，但是個別的例子在這時以前也就可以找

到。歷史告訴我們，正是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下，才廣泛而自由地開展着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之最尖銳的鬭爭。在實際經驗中，我們也見到了這個真理底正確。如果說，蘇維埃政府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所採取的一切步驟，都特別表現在各種根本問題上的堅定性，這正是因為我們從來沒有離開過這個真理，從來也沒有忘記過這個真理。祇有一個階級底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才能解決與資產階級爭奪統治權的問題。祇有無產階級專政才能戰勝資產階級。祇有無產階級才能推翻資產階級。祇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羣衆來反對資產階級。

但從此決不應得出結論說，當資產階級已被推翻，政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手裏，而在往後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似乎我們也可以不要中間份子參加；這種說法是極端錯誤的。

自然，在革命，即無產階級革命開始時期，這革命活動家們底全部注意力都要放在解決主要的基本的問題上，就是放在解決無產階級底統治以及用戰勝資產階級來保證這個統治，——保證資產階級不能復辟的問題上。我們明明知道，資產階級至今還佔有這樣的優勢，即它在其他國家內還保存有自己的財富，或者，有時甚至在我國內它還握有巨量的金錢。我們很好地知道，還有許多比無產階級更有經驗的社會成份幫助着資產階級。我們又清楚地知道，資產階級沒有拋棄復辟的念頭，沒有停止恢復自己統治的企圖。

但是遠遠還不僅如此。資產階級所最重視的原則是：「哪裏好，那裏就是祖國」。從金錢意義上說來始終是國際主義的資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此刻還是比我們強些。資產階級底統治是在迅速毀壞着，它看見有如匈牙利革命這樣的例子，——關於匈牙利革命我們昨天已很榮幸的知道了你們，今天又得到證實這點的信息，——它已經開始懂得它的統治是在動搖中。它已經不能毫無掣肘地自由行動了。但是此刻如果估計到全世界範圍內的物質資料，就不能不承認資產階級在物質方面，現在還是比我們強些。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十分之九的注意力和實際活動，本來是而且不能不是放在解決這個基本問題上：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政權，根除資產階級復辟的任何可能。這是完全自然的、合理的、必須的，而且在這一方面，我們已經有成效地作了許多事情。

現在就應當把關於其他階層的問題提到日程上來。我們應當把有關中農的全部問題都提到日程上來：這是我們大家在農村工作副委員會中所得出的結論，而且我們相信全黨工作人員都會同意這一點的，因為我們不過是把他們觀察所得的經驗作了一個總結而已。

當然，也許會有人不去思考我國革命進程如何，不去思考目前擺在我們面前的任務是什麼，反而利用蘇維埃政權所進行的每一步驟來加以譏笑，來進行所謂批評，正如孟塞維克和右派社會

革命黨人這些老爺們所幹的那樣。這些人至今沒有了解，他們終久應當在我們和資產階級專政之間選定自己的立場。我們對於這些人表示了多番容忍態度，甚至是寬大態度，我們再一次地讓他們能來感受我們的這種寬大態度，但在不遠的將來，我們就要改變這種容忍和寬大態度了，而如果他們再不選定自己的立場，那我們就要絕對嚴重地向他們提議，叫他們到高爾察克那裏去。

（鼓掌）。我們並不期望這批人會表現出什麼特別輝煌的本事。（笑聲）。但是可以期望，這批人親身嘗到高爾察克底殘暴滋味之後，定會懂得，我們有權要求他們在我們與高爾察克之間選定自己的立場。如果在十月革命後的頭幾月中，有許多很幼稚的人抱着這類蠢想，以為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一種暫時的偶然現象，那末現在甚至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都應當懂得，這乃是在整個國際資產階級逼攻下所進行的鬭爭中合乎規律的現象。

實際上祇樹立有兩種力量：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誰讀了馬克思底著作而不懂得這點，誰讀了所有一切偉大社會主義者底著作而不懂得這點，那他從來也不會是社會主義者，絲毫也不懂得社會主義，祇不過是自己冒稱爲社會主義者罷了。對於這些人，我們給他們一個短短的考慮期限，要求他們解決這個問題。我之所以提到這些人，是因為他們現在說，或者將來會說：『布爾塞維克提出了中農問題，就是想向他們頻送秋波』。我知道得很清楚，這類論據和更壞的

論據在孟塞維克刊物中是散佈得很廣的。我們不去理會這些論據，我們任何時候也不會把我們敵人的空談胡說看作有什麼意義。這些至今擅長於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跑來跑去的人們，是可以隨便信口開河的。而我們所走的，却完全是另一條道路。

決定我們道路的，首先是對階級力量的估計。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經常發展着。當這個鬥爭還沒有結束以前，我們就要把加倍的注意力，集中到將這個鬥爭進行到底。這個鬥爭現在還沒有結束。在這個鬥爭中，我們已經有了許多成就。現在國際資產階級已經不能毫無掣肘地自由行動了。匈牙利無產階級革命之發生，便是最好不過地證明了這點，所以，我們在鄉村中的建設事業，顯然已超出了那一切都服從於為政權而鬥爭的這基本要求範圍之外。

這一建設事業經歷過兩個主要階段。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我們同全體農民一塊去奪取政權。這是資產階級性的革命，因為當時鄉村中的階級鬥爭還沒有開展起來。我已經說過，鄉村中的真正無產階級革命，直到一九一八年夏季才開始。假使我們不曾善於發動這個革命，那我們的工作便是不完全的。第一個階段是在城市中奪取政權，建立蘇維埃形式的管理制。第二個階段是在鄉村中分出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成份，使之與城市無產階級團結起來，在鄉村中進行反對資產階

級的鬭爭——這點對一切社會主義者說來，都是主要的，不承認這點，則社會主義者便不成其為社會主義者了。這個階段基本上也已經完結了。我們最初爲這個目的而建立的組織，即貧農委員會，已經非常鞏固，以致我們已有可能用正當選舉出的蘇維埃來代替它們，就是說，把鄉村蘇維埃加以改組，使其成爲階級統治的機關，成爲在鄉村中無產階級政權底機關。不久以前中央執委會所通過的，而且當然是大家週知的關於社會主義土地整理以及關於轉到社會主義農業的過渡辦法的法令，從我國無產階級革命觀點上來說，乃是對過去階段所做的一個總結。

成爲無產階級革命之首要基本任務的主要事情，我們已經做到了。正是因爲我們已經做到了這一點，所以在現時日程上便提出了更複雜的任務：對中農的關係。誰以爲提出這個任務，就好像是削弱我們政權的性質，削弱無產階級專政，就好像是改變我們基本的政策，那怕是部份的改變，那怕是稍微的改變，——誰這樣想，誰就是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的任務，共產主義革命的任務。我相信，在我們黨內不會有這樣的人。我祇是想警告同志們一聲，要隄防那些在工人政黨外可以找到的這一種人，他們之所以會這樣說，並不因爲這是從什麼世界觀裏產生出來的意見，而祇不過是爲了損害我們的事業和幫助白匪，簡言之，就是想挑撥中農來反對我們，中農始終是動搖的，他們不能不動搖，而且還會在很長時期內動搖不定的。這種人爲了挑撥中農來反對我們，

便會說：「看吧，他們向你們頻送秋波了！可見他們重視了你們的暴動，可見他們動搖起來了」等等等等。必須使我們所有一切同志在思想上都武裝起來反對這種煽動。我相信，我們現在若能從階級鬥爭觀點提出這個問題，那我們的同志才能在思想上武裝起來。

很顯然的，這個基本問題乃是更加複雜而又同樣迫切的任務，即怎樣確定無產階級對中農的態度？同志們，這個問題，從理論上看來，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是困難問題，因為這種理論已為極大多數工人所領會。你們總還記得，例如，在考茨基著的論土地問題一書中，那時他還是正確敘述馬克思學說並為大眾公認為土地問題上負有絕對權威的人，關於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點，他說道：社會主義政黨的任務就是要中立農民，即是使農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鬥爭中守中立，使農民不能去積極幫助資產階級來反對我們。

在資產階級統治的很長時期內，農民總是擁護資產階級政權，總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祇要注意到資產階級的經濟力量及其統治底政治手段，那麼，這種原因是很清楚的。我們不能指望中農立刻會站到我們方面來。但是我們若能執行正確政策，經過一個時期，這種動搖就會停止，農民也就會站到我們這方面來。

恩格斯嘗與馬克思共同奠定科學馬克思主義基礎，亦即我黨所經常作為南針，特別是在革命

時期作爲南針的學說時，就已確定了農民的分類，他把農民分爲小農，中農和大農，這種分類直到現在對於絕大多數歐洲國家還是合乎實際情況的。恩格斯說：『或許甚至對大農也不是到處都定要用強力鎮壓』。至於說到我們什麼時候可以用強力來對待中農（小農是我們的朋友），這點任何一個有理智的社會主義者從來也沒有設想過。這是恩格斯在一八九四年，即他逝世前一年，當土地問題已擺在日程上時所說的話。這個觀點所表明的真理有時爲人們所遺忘，可是這在理論上我們大家都是同意的。對於地主和資本家，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完全剝奪他們。但是對待中農，我們則不容許採取任何強力手段。甚至對待富農，我們也不能像對待資產階級這樣肯定不移地說：要絕對剝奪富農。在我們黨綱中已載明了這種區分。我們說：鎮壓富農底反抗，鎮壓富農底反革命陰謀。這還不是完全剝奪富農。

我們對待資產階級和對待中農的基本區別，就是完全剝奪資產階級，而與不剝奪他人的中農聯盟，這個基本路線在理論上是大家都承認的。但是在實踐中，人們對這一路線並不一貫遵守，有些地方機關還沒有學會遵守這個路線，當無產階級已推翻資產階級並鞏固了自己政權而從各方面從事建立新社會的時候，中農問題就提到了第一位。世界上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也不否認建設共產主義的情形在大農國與小農國是互不相同的。這是最初步的起碼的真理。從這個真理中就得

出結論說，我們愈接近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我們的注意力在某種範圍內也就會正是集中到中農問題上。

有許多事情都取決於我們如何確定對中農的態度。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已經解決了的。可是我們有過很好的經驗，我們根據自身經驗知道在理論上解決問題與實際上執行決定這兩者間的區別。我們已緊緊接近到了足以作為法國大革命特徵的那種區別，那時法國國民公會宣佈了許多規模浩繁的設施，但却無應有的支柱來實現這些設施，它甚至不知道，爲了執行某種辦法，究竟應該依靠哪一個階級。

我們所處的條件是幸運得無比的。由於有了整整一世紀的歷史發展，我們知道我們要依靠哪一個階級。但我們同樣也知道，這個階級的實際經驗還非常不夠。對工人階級和工人政黨說來，基本任務是很明顯的：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並把政權交給工人。但是要怎樣來實現這一點呢？大家都記得，我們從工人監督工業進到工人管理工業時經過了何種困難，作過了多少錯誤。而這還是我們隨時接觸的，我們階級內部，即無產階級內部的工作咧。現在我們却要確定我們對新階級，對城市工人所不知道的那個階級的態度。我們必須確定對這個沒有一定穩固地位的階級的態度。無產階級大眾是擁護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大眾是反對社會主義的，——確定這兩個階級間

的關係是很容易的事。可是當我們進到對待中農這樣的階層時，就可見到這是一個動搖不定的階級。這個階級一方面是有私有的，另一方面又是勞動者。它不剝削其他勞動份子。它曾須在幾十年內，經受千辛萬苦來保持自己的生活地位，它親身嘗到地主和資本家剝削的苦況，它經受住了一切苦難，而同時它又是私有者。所以在我們對待這個動搖階級的態度中，有着莫大的困難。根據我們一年多來的經驗，根據我們半年多在鄉村中進行的無產階級工作，根據鄉村中已經發生的階級分化情形，我們在這裏首先就要避免急性病，避免死板理論。避免強求把我們正在擬訂的東西，把我們還沒有擬訂的東西，當作是已經規訂好了的現成東西。在副委員會選出的委員會所向你們提出，並且以後還有個報告人會向你們宣讀的決議案中，你們就會看見對這一點已有充分的警告。

從經濟觀點上說來，我們顯然必須幫助中農。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但是在我們實際的習慣中，在我們現有的文化水準下，在我們可以派到鄉村中去的具有文化和技術知識的幹部不夠的情形下，在我們對待鄉村工作常覺軟弱無力的情況下，我們的同志就常常使用強迫手段，因而損害着全部事業。就在昨天，有一個同志交給我一本由俄國共產黨（布）尼什哥羅得委員會印行的叫作尼什哥羅得省黨工作佈置指令的小冊子；我在這本小冊子裏，例如在第四一頁上，看見有

以下的語句：「關於非常稅的法令應當把全部重担加到鄉村富農、投機者以及一般中農身上」。請看，這就算是人們如何「瞭解了」！或者這是一個印錯了的字，但這樣的錯字是決不容許的！或者這是由於工作慌忙，在這種專業上稍一慌忙，該是如何危險。或者這裏簡單是由於不瞭解，而這是最壞的推測，我很不願這樣來推測尼什哥羅得的同志。很有可能，這簡單是由於疏忽的原故。

有一個同志在委員會內敘述到實踐中常發生過的下列情形。有次，許多農民圍繞着這個同志，每個農民都向他問道：「請你斷定斷定，我不是中農？我有兩匹馬和一條奶牛。我有兩條奶牛和一匹馬」，諸如此類等等。你們看，這被派往各縣的鼓動員必須有一隻準確的溫度表，以便放到每個農民身上去測量一下，然後來斷定他究竟是不是中農。要做到這點，就必須知道每個農民經濟的全部歷史以及他對上層農民和下層農民的關係，而我們要確切知道這一點，是不可能的。

這裏需要有許多實踐才幹，要熟知地方情形。這種本領我們還沒有。承認這一點，根本沒有什麼慚愧；我們必須公開承認這點。我們從來都不是空想家，從來也沒有想像過：我們要用純粹共產主義社會中產生和教育出來的純粹共產主義者之純潔的手來建設共產主義社會。這乃是黨

話。我們要用資本主義的殘磚碎瓦來建設共產主義，而且只有在反資本主義鬥爭中受過鍛鍊的那個階級才能做成這件事情。你們明白知道，無產階級並不是沒有沾染資本主義社會底缺欠和弱點的。它爲社會主義而鬥爭，同時也反對本身方面的缺點。無產階級優秀的先進的部份，既然幾十年內在城市中進行了拚命的鬥爭，也就得以在這個鬥爭中接受城市和首都生活中的全部文化，並且在相當程度內已經承受了這種文化。你們知道，甚至在各先進國中，鄉村都注定了黑暗無知的。當然，鄉村的文化會由我們提高起來，但這是多年的事業。這就是我們同志往往忘記了的事情，這也就是據各地來人所說的每一句話中特別明顯向我們表明的情形，他們不是此地的知識份子，也不是機關人員，——這些人的話，我們聽得很多，——而是在實踐上觀察過鄉村工作的人。正是他們所說的話，在土地問題副委員會內對我們特別有價值。我相信現在整個黨代表大會上也會特別重視他們的話，因爲這些話不是從書本上拿來，不是從法令中得來，而是從實際生活中學來的。

所有這一切都迫使我們去研究如何儘量明顯地確定我們對中農的態度。這是件很困難的事，因爲這種明顯性是實際生活中所沒有的。這個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要想立刻一下解決，那它是無法解決的。有人說：『本來用不着頒佈這樣多的法令』，並責備蘇維埃政府，說它只會起草

法令，但不知道如何去執行這些法令。實際上這些人沒有覺察到，他們如何滾到白匪方面去。假使我們會希望頒佈成百個法令就可以改變鄉村的全部生活，那我們就真會是十足的呆子了。但假使我們拒絕用法令來指明道路，那我們就會是社會主義的叛徒。這些在實踐上不能立刻完全執行的法令，本來也起了很大的宣傳作用。以前我們是用一般的真理來作宣傳，現在我們却是用實際工作來作宣傳。這也是一種宣傳，但這是用行動作宣傳，不過不是某些暴發戶底單個行動，對於這種暴發戶，我們在無政府主義者和舊社會主義盛行的時代會多番加以嘲笑過。我們的法令是一種號召，但不是按以前那種精神的號召：如「工人們，起來推翻資產階級啊！」。不是這樣的，而是對羣衆的號召，號召他們去作實際的事情。法令，這是一種號召人們去做廣泛實際事業的指令。這是最主要之點。就讓這些法令中有許多是不中用的，有許多是實際生活中行不通的。可是在這些法令中有供實際事業採用的材料，而法令底任務也就是要教會那些聽從蘇維埃政權的千百萬人去進行實際步驟。這是在鄉村中實行社會主義建設方面之實際行動的試驗。如果我們這樣看法，那末從所有一切法令、命令和決議中，就可以得到極多的益處。我們並不來把它們當作無論如何都要立刻一下執行的絕對的決議。

必須避免所有一切能在實踐上助長個別舞弊現象的事情。有些鑽營份子、野心家，已在某些

地方混入了我們的隊伍內，這種人自稱爲共產主義者來愚弄我們，他們之所以鑽進我們隊伍裏來，是因爲共產黨現在掌握政權，是因爲那些比較誠實的『公務人員』由於他們的思想落後，沒有來到我們這裏工作，而這班野心家却毫無思想、毫無良心。這種人只求陞遷拔擢，他們在各地實行強迫手段，並且以爲這是很好的辦法。在實際上這有時引起農民說：『蘇維埃政權萬歲，祇是打倒康姆尼（即共產主義）！』。這樣的事並不是誰捏造出來，而是由實際生活中，由各地同志報告中得來的實際情形。我們不應當忘記：任何的放肆，任何的急躁和慌忙，都會造成莫大的害處。

以前我們是必須無論如何都要用拚命跳躍的手段，來趕急跳出帝國主義戰爭，因爲這個戰爭把我們弄到破產了，必須拚命努力來擊潰資產階級，擊潰那些想來壓倒我們的力量。所有這一切都是必須的，不這樣，我們當時便不能獲得勝利。但是如果對待中農也採取同樣方式來行動，那就是十足的愚痴，十足的魯鈍，十足地足以顛覆我們的事業，祇有挑撥離間份子才能自覺地這樣做。現在的任務應當完全是另一樣的。現在的任務已不是打破那些顯然是剝削者的抵抗，戰勝他們，推翻他們，如像從前那樣。現在，我們既已解決了這個主要任務，於是在日程上就提出更複雜的任務了。這裏採用強力是什麼事情也做不成的，用強力對待中農，是極有害的。中農是人數

衆多的，數千百萬人的社會階層。甚至在西歐方面，雖然那裏中農勢力無論在什麼地方都沒有這樣巨大，雖然該處技術與文化、都市生活和鐵路交通特別發達，雖然該處本來最易發生用強力對待中農的思想，——可是，無論什麼人，無論哪一個最革命的社會主義者，也沒有主張過用強力手段對待中農。

我們在奪取政權時，曾經依靠了全體農民。那時全體農民只抱有同一個任務，就是與地主作鬭爭。但是直到現在農民中還保存有反對大農莊的成見，農民想到：「如果有了大農莊，那我又要當僱農」，當然這是錯誤的。但農民對大農莊的這種觀念，是由於他們仇恨和回想以前地主怎樣壓迫人民的事實，這種心理還存在着，這種心理還沒消除。

我們所應首先依據的真理，就是這裏採用強力方法其實是什麼也做不到的。這裏的經濟任務，是按完全另外一個方式擺着的，這裏並沒有什麼上層可以拆去，而把整個屋基和整個屋宇都保留起來。這裏並沒有如在城市裏所有過的那種上層，即資本家。在這裏採用強力，就等於葬送全部事業，這裏需要有長期的教育工作。農民不僅在我國，而且在全世界上都是實際主義者，都是務實的人，我們應當向他們作出具體的例子來證明「康姆尼」是最好的東西。當然如果在鄉村裏出現了急忙從事的人，他們從城市裏飛跑來，一度閒談，鬧了幾次知識份子的意氣，有時甚至

非知識份子的意氣，然後吵鬧一頓，就走掉了，這是不會有任何好處的，這是常有的情形，這班人不但不會引起敬意，反而會引起譏笑，而這種譏笑乃是完全合理的。

說到這個問題，我們應當承認，我們是鼓勵建立公社，但應把公社組織得盡善盡美，以便奪得農民的信任。際此以前，我們還是農民的學生，而不是農民的教師，誰對農業及其特點一竅不通，跑到鄉村中去，祇是因爲聽說公營農莊有益，因爲疲於城市生活才想到鄉村去工作，而自認爲在各方面都是農民的教師，那他就是再蠢笨不過的了，誰想在中農經濟關係方面採用強力，那他就是再愚昧不過的了。

這裏的任務不是剝奪中農，而是要顧及農民生活底特殊條件，要向農民學習過渡到優良組織的方法，決不可擅自發號施令！這就是我們爲自己所定下的規章。（全場鼓掌）。這就是我們在決議草案中所力圖說明的規章，因爲，同志們，我們在這一方面真正犯過不少的錯誤。承認這一點絲毫不慚愧。過去我們沒有經驗。我們同剝削者鬭爭的方法本身就是從經驗中得來的。如果有時人們因我們採取這種方法而責難我們，那我們就說：「資本家老爺們，這是你們自己的罪過。假使你們不是這樣野蠻地、這樣狂妄地、這樣厚顏無恥拚死命地抵抗，假使你們沒有去和全世界資產階級聯合起來，那末，革命也就會採取比較和平的形式」，現在我們打退了各方面的瘋

狂逼攻之後，便可以轉到採用另一種方法了，因為我們不是什麼小組，而是領導千百萬人的政黨。千百萬人不能一下子就懂得方針改變，所以原本是用來給予富農的打擊，往往落到了中農頭上。這是毫不奇怪的。祇是必須懂得，這是由於歷史條件所引起，這種歷史條件業已消失，而對於這個階段的新條件和新任務却要求有新的心理意識。

我們關於農民經濟的法令，基本上都是正確的。我們沒有根據來拒絕或惋惜其中任何一個法令。但法令雖然是正確，但若用強力去強迫農民來接受，便是不正確的了。在任何一個法令中都沒有這樣說過。這些法令，作為指明出來的道路，作為進行實際設施的號召，是正確的。當我們說：『鼓勵建立組合吧』，這等於發出指令，這指令是應當經過多次試驗，以便找到實行這些指令的最終形式。既然說必須求得自願同意，也就是說，要說服農民，要在實踐中說服農民。農民不會相信空話，而他們不相信空話，這是做得很對的。要是他們一聽到宣讀法令和鼓動傳單就妄自相信，那倒是不好的事情。假使可以這樣來改造經濟生活，那末這種改造便一文不值。起初需要證明這樣的組合真是好些，把人們組合起來時，要使他們是真正被組合起來，而不是一團而散，要證明這樣組合是有利益的。農民是這樣提出問題，我們的法令也是這樣提出問題。如果我們以前還不善於這樣做，這並沒有絲毫可羞的地方，我們應當公開承認這一點。

我們已經解決了的，暫時還不過是一般社會主義革命中的基本任務，即戰勝了資產階級。這一個任務我們在基本上已經解決了，雖然現在開始了最困難的半年，這時全世界帝國主義者都在最後努力想來壓倒我們，現在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他們自己已經懂得了，過了這半年後，他們的事情便會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了。或者他們現在利用我們疲憊不堪的時機，來戰勝我們這個國家，或者我們將成爲不僅專就我國一國而言的勝利者。在這半年中，當糧食危機和運輸危機都加厲起來，而帝國主義列強又想從幾條戰綫上向我們進攻之際，我們的處境，是非常困難的。但這是最後的困難的半年。必須仍然緊張一切力量，去與侵襲我國的外部敵人作鬪爭。

但說到農村工作底任務時，不管一切困難，不管我們的全部經驗至今是用在直接鎮壓剝削者方面，——我們都應當記得，都不要忘記在鄉村中對於中農的任務乃是另一樣的。

在彼得城、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和莫斯科，所有到過鄉村裏的覺悟工人都向我們舉出若干例子，說有許多看來是無法解決的誤會，有許多看來是非常重大的衝突，可是一當有能幹的工人出來說話時，——這些工人所說的不是書本上的話，而是農民所懂得的話，不是像指揮官一樣擅自發號施令，（雖然他們不懂得農村生活），而是像同志一樣來解釋實際情形，來喚起農民們那種勞動者反對剝削者的情感，——一當這些工人發言以後，誤會和衝突就減弱下去，消除下去

了。這種用同志態度去解釋問題所達到的結果，是成千累百儼然以指揮官或上司自居的人所不能達到的。

這就是我現在向你們提出的全部決議案中所貫注的精神。

我在自己的簡短報告內，是想說明這個決議底原則方面和這個決議底一般政治意義。我想證明，——並且我希望是得以證明了，——從整個革命利益的觀點說來，我們路綫上沒有任何變動，沒有任何變更。白黨份子及其幫手們都在叫喊這點，或者將會叫喊這點，讓他們去叫喊吧。我們是不得去理會他們的。我們要最澈底地發揚我們的任務。我們必須把自己的注意力從鎮壓資產階級的任務，移到安排中農生活的任務上去。我們應當和中農和平共居。祇有當我們真正改進和改善了中農生活的經濟條件時，中農在共產主義社會裏才會站到我們方面來，如果我們明天就能够拿出十萬架頭等拖拉機，給以汽油，給以駕駛員（你們十分知道，這在目前還是一種夢想），那麼中農就會說：『我贊成康姆尼』（即贊成共產主義）。可是，爲要做到這一步，首先就必須戰勝國際資產階級，逼迫它給予我們這些拖拉機，或者我們就要把我們的生產率提高到足以親自製造這些拖拉機的程度。祇有這樣來提這個問題，才是對的。

農民需要有城市工業品的供給，沒有城市工業，農民是不能生存的，而城市工業是握在我們

手裏。如果我們能正確地進行事業，那末農民就會感謝我們從城市裏給了他們這些產品，這類工員和這種文化。把這些東西帶給他們的，不是剝削者，不是地主，而是與他們一樣的勞動同志，他們會非常深刻地珍視這些同志，然而不是從實踐觀點上來珍視，祇珍愛這些同志底實際幫助，却拒絕發號施令和自上而下的『指令』，而這種拒絕是完全公道的。

首先實行幫助，然後去奪得信任吧。如果這件事情能正確地進行下去，如果在縣裏、區裏、在徵糧隊裏、在任何組織裏，我們每個工作團底每一步驟都做得正確，如果我們的每一步驟都會從這個觀點來仔細加以檢閱，那時我們定能奪得農民的信任，祇有那時，我們才能繼續前進。現在我們應當給農民以幫助，給他們以忠告。這應當不是指揮官的命令，而是同志的忠告。那時農民就會完全擁護我們的。

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決議案的內容，據我看來，這也就應當成爲代表大會底決議。如果我們通過這個決議，如果這個決議將決定我們全黨組織的一切工作，那末我們就能完成擺在我們面前的這第二個偉大任務。

怎樣推翻資產階級，怎樣鎮壓資產階級，這是我們已經學會了的，這是我們所足以自豪的。怎樣調整與千百萬中農的關係，用什麼方法去奪得他們的信任，這是我們還沒有學會的，這點我

們應當公開說出。但是我們已經懂得了這個任務，我們已經提出了這個任務，並且帶着全部希望、全部智能和全部決心向自己說：這個任務我們定會完成，那時社會主義便是絕對不可戰勝的了。（長時鼓掌）

一九一九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布）第八次代表大會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一五八至一七一頁

列寧·偉大的創舉

——論後方工人底英勇精神。論「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刊物上披露出紅軍兵士許多英勇奇蹟底例子。工農們在與高爾察克、鄧尼金以及地主和資本家的其他軍隊作鬪爭中，常常表現英勇和堅忍底奇蹟，捍衛着社會主義革命底勝利品。根絕游擊主義殘餘，克服疲勞和廢弛現象，這一過程雖進展得緩慢，且有種種困難，但總在不顧一切地進展着。爲了社會主義事業勝利而自覺承受犧牲的這些勞動羣衆底英勇精神，就是紅軍中新的同志紀律基礎，就是紅軍復興、鞏固和增長底基礎。

後方工人的英勇精神，也值得同樣注意，在這方面，由工人自己倡首所組織的共產主義義務

星期六實有莫大的意義。顯然，這還祇是開端，但已是非常重要的開端。這是比推翻資產階級更困難、更重大、更澈底、更有決定意義的變革底開端，因為這是對自身的因循守舊、放蕩行爲、小資產階級利己主義，對萬惡資本主義所遺留給農的這些積習的勝利。當這一勝利已鞏固，那時，而且祇有那時，新的社會紀律，社會主義的紀律才會建立；那時，而且祇有那時，回返到資本主義才成爲不可能，共產主義才真正成爲不可戰勝的。

五月十七日真理報登載了阿·熱同志那篇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的文章。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們把它完全引證出來：

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一封信，給了共產黨組織和共產黨員以強有力的推動。舉國奮起的高潮使許多鐵路工人共產黨員上了前綫，但大多數鐵路工人共產黨員是不能放棄重要崗位不管，而去尋找按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新方法的。根據各地來的消息，說動員工作緩慢、文案辦理手續遲延，遂使莫斯科、嘉桑鐵路副區不能不注意到鐵路業本身的機構。原來，因爲勞動力缺乏和勞動強度薄

弱，以致緊急定貨和火速修理機車事宜延滯起來。五月七日，在莫斯科，嘉桑鐵路副區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全體大會上，提出了不是口頭上而是實際上來幫助戰勝高爾察克的問題。這提議上說：

『由於國內外的嚴重情況，為要取得對階級敵人的優勢，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又應當猛力加鞭，從自己休息時間內再抽出一點鐘來，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長一小時，將這時間練和起來，在星期六這天一次去作六點鐘的體力勞動，以便立即收到實際的效果。我們認為，共產黨員為保護革命的勝利品，不應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工作應該是無報酬的。提議在全副區內施行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直到完全戰勝高爾察克為止。』

這個決議經過幾許猶豫後，就一致通過了。

五月十日，星期六，晚上六點鐘，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像兵士一樣，都到了場，排成隊伍，毫無擁擠，由工匠分派到各處工作。

以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立刻就有了成效。下表說明工作所在的部門和工作性質。

工作地點	工作名稱	工人數目	工作時間		已進行的工作
			小時	總數	
莫斯科。機車總修理廠	裝載通彼羅沃、木羅馬、阿拉特和西亞羅維上的鋪路材料及修理機車和車箱的裝備器材	二四八 一五	四三五	一六四〇 一〇三〇	裝載了一、五〇〇普特貨物 卸載了一、八〇〇普特貨物

莫斯科。客車廠	機車的複雜臨時修理	二六	五	一三〇	總共修理了一個半機車
莫斯科。調車站	機車的臨時修理	二四	六	一四四	修理好了兩個機車，並拆卸了四個機車應修理的部份
莫斯科。車輛部	旅客車箱的臨時修理	一二	六	七二	兩個三等車的車箱
「彼羅法」總車輛廠	星期六，星期日的車箱修理和 小修理	四六 二三	五五	一三〇 一五	十二個普通貨車箱和兩個敞車箱
總	共	一〇五	一	一、〇一四	總共修理好了四個機車，十六個車箱，裝卸了九、三〇〇普特貨物

工作總值按定額工資計算為五百萬盧布，額外工作酬金要比這多百分之五十。

裝載工作的勞動強度，較普通工人高百分之一百七十。其餘工作的強度，大致也是如此。

消除了因缺乏勞動力而將定貨（緊急的）由七天展至三個月的拖延現象。

工作進行時，因為工具損壞（本容易消除），以致單組工人被攔了三四十分鐘。

管理局派來指導工作的人員，幾乎來不及準備新的工作。一個老匠師說，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做的事等於不自覺的鬆懈工人整整一星期內所做的事，這種說法也許不甚誇大。

因為蘇維埃政權普通的真誠擁護者也參加了工作，並可以指望有大批這樣的人來參加將來的義務星期六，以及其他各區也願意做法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共產黨員的先例，所以我就根據各地來的消息比較詳細地講講工作組織方面的問題。

參加工作的，約有百分之十的共產黨員是經常在該地工作的。其餘的則是鐵路政治委員直到單個部門政治委員這些負責者，以及由職工會或由鐵道管理局和鐵道人民委員部工作人員中提調出來的人。

工作中的熱誠和齊心協力精神是空前罕有的。當工人、事務員、管理局職員不出罵言、毫無爭論，抓着四十普特重的客車輪子，像酷愛勞動的螞蟻似的，滾到一定位置去的時候，心中便油然而發生了一種出自集體勞動的熱烈快感，並堅定了工人階級必勝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奪者決寧死不了勝利者的工人，國內的怠工者也決等待不到高爾察克。

工作完結時，所有在場的人都親眼看到了這樣一幅空前未有的情景：成百的共產黨員雖然身體疲乏，但眼睛裏放出愉快的光芒，而以莊嚴的國際歌聲來歡祝事業的成功，假如這凱旋國際歌的勝利聲浪湧出牆壁向工人的莫斯科流去，好像石頭所激起的水波向工人的俄羅斯盪去，掀動着因疲憊的人們。

河·熱

真理報於五月二十日在所發表的恩·爾同志一篇標題為值得效法的例子的文章中，論到這個卓絕例子時寫道：

『共產黨員這種工作印實例並非罕見。我知道在電站上和各鐵路上也有這同樣的情形。在尼古拉鐵路上，共產黨員作了幾晚的額外工作，來搬起倒在轉盤上的機車；冬季在北方鐵路上，全體共產黨員和同情

者作了幾個星期日的工作，來掃除鐵路上的雪堆；許多貨站上黨支部的全體黨員，爲了同竊貨行爲作鬥爭，乘夜沿站巡查，——但這種工作僅是偶然進行，並不是有系統地進行。嘉桑鐵路上的同志們却有了新的貢獻，把這一工作變成了有系統的經常工作。嘉桑鐵路同志們決議這樣作去：「直到完全戰勝新竊貨行爲爲止」，這也就是他們工作的全部意義。他們決定在整個軍事期間把共產黨員和同情者的工作日延長一點鐘；同時他們又表明出了卓著成效的模範工作。

這個例子業已引起，而且應當引起今後大家來做法。在亞歷山大鐵路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大會上，討論軍事狀況和嘉桑鐵路同志們的決議之後，曾通過如下的決議案：（一）亞歷山大鐵路的共產黨員和同情者決定實行「義務星期六」。第一次義務星期六定於五月十七日舉行。（二）把共產黨員和同情者組織成爲模範隊，它們應當表示給工人們看，應如何工作，以及在目前現有的材料、工具和伙食等情形之下，實際能够作成一些什麼。

據嘉桑鐵路同志們所說，他們的例子在人們中引起了很大的印象，他們預料到下星期六將有大量的非黨工人來參加工作。當我們寫這些話的時候，在亞歷山大鐵路修理廠中，共產黨員的額外工作還沒有開始，祇有預定進行這種工作的傳聞，可是非黨羣衆就已開始激動起來，說「要是昨天我們知道的話，那我們也就準備好了，也就工作過了」，「下次星期六我一定來參加」！聽到到處都有人這樣說。這種工作

所引起的印象，是很大的。

後方所有的共產黨員支部，都應當來做法嘉桑鐵路同志們的例子。不惟莫斯科這鐵路樞紐上的各共產黨支部，並且全俄羅斯的黨組織都應當做法這一例子。至於鄉村中的共產黨支部，首先就應當來組織替紅軍兵士代耕，幫助他們的家屬。

嘉桑鐵路同志們在結束自己第一次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工作時，高唱着國際歌。如果全俄羅斯共產黨組織都做法這個例子，並毅然決然來按照這例子具體實行，——那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就會在全國所有勞動者的洪亮國際歌聲下，渡過臨近的困難月份：

共產黨員同志們，着手工作吧！

一九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真理報上寫道：

「五月十七日在亞歷山大鐵路上舉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星期六」。共產黨員和同情者共九十八人，根據大會決議作了五點鐘無報酬的額外工作，祇享有由各人付錢吃第二次午飯的權利，並且在吃午飯時與一般體力勞動工人一樣，各人由自己付錢領到半磅麵包。」

雖然工作準備得不充分，組織得不甚好，但勞動生產率終究比平常提高到兩三倍。

例如：

五個鑿匠在四點鐘內作了八十個輓輪。生產率等於平常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三。

二十個粗工在四點鐘內，收集了六百普特重的舊材料和七十個各重三普特半的車箱彈簧，總共收集了八百五十普特舊材料。生產率等於平常的百分之三百。

「同志們解釋這種情形時說，平時的工作作厭了沒有趣味，而在這裏，人們工作起來都興奮熱烈。但現時在平常工作中，要是比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時作的少些，那才可恥哩。」

「現在有許多非黨工人都聲明願意參加義務星期六。各機車修理隊都自動地決心要在義務星期六時，把蹲在「墳園」的廢機車拖出一架，把它修好使用。」

接到消息，說在維亞茲瑪鐵路上也在組織這樣的義務星期六。」

阿·嘉靖科同志在六月七日的真理報上，寫到關於這些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的工作情形，現在我們就把他那篇標題為義務星期六短評的主要部份引證如下：

「我和一個同志帶着極大的愉快心情，遵照鐵路副區黨委員會的決議，去參加義務星期六，暫時在幾點鐘內，讓腦子休息一下，讓臂膀來工作。我們被派往鐵路上的木工廠內。我們到達那裏，看見了自家人，彼此問過好，講了些笑話，點查人數共計只有三十人：面前却輪着一個「怪物」——重約六、七百普特的大汽鍋，我們要把它「另移地方」；即差不多要拖半俄里或三分之一俄里遠，拖到殘台跟前。」

心裏疑慮起來：「但我們已動手工作；同志們隨便往鍋爐下安上木料，繫上兩根繩子，工作就開始了；鍋爐很不樂意移動，但終究還是把它拖動了。我們很高興，我們人雖是這樣少：要知道，這個鍋爐曾經有多過我們一倍以上的非共產黨員工人，幾乎拖了兩個星期還沒有拖動，祇是當我們來到後，才把它拖動了：我們在頭目同志多次「一、二、三」的勻調口令下，使勁地齊力地工作了一點鐘，鍋爐也就一步步地移動着。驀地出了什麼事！許多同志突然可笑地往後面倒去，——這裏我們手裏的繩子「變節了」：大約停歇了一分鐘；改用粗索子：天色已開始斷黑，但我們還得拖過一個小崗，那時才會很快把工作完成。雙手酸痛，掌心發燒，周身溫暖起來，使盡全力拖着，——事情也就有了成效。站着的「管理人員」驚於這種成就，也不由地拉着索子：你早就該來幫幫忙的！一個紅軍兵士很入神地瞧着我們工作。他拿着手風琴。他在想什麼？也許他想：他們是什麼人？當星期六大家都坐在家裏的時候，他們却要幹什麼呢？我猜到他的心事，故意說道：「同志！給我們奏奏快樂的曲子吧，我們並不是什麼偷懶的工作人，而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你看，我們做得多麼起勁，並不偷懶，而是努力地拖着」。於是紅軍兵士就小心地放下手風琴，趕快跑來抓住索子：

——「英國人是聰明的！」——武同志拉長宏亮美麗的高音唱着。我們都跟着應和起來，並高聲發出「唉嘿，棒子啊，唉嘿，拖吧，拖吧……」這一工人歌曲的辭句。

由於沒有習慣的關係，筋肉疲乏，肩背酸痛，但是：我們的閒空日子——休息日就在前面，還來得及飽睡一頓。目的快達到了，經過一些小小的周折後，我們的「怪物」就已差不多被拖在棧台跟前：擱下枕木，滾上棧台！讓這個鍋爐去作人們所久已期待於它的工作吧。然後我們驚嘆成聲地走進一間掛滿標語、架有步槍、燈光明亮的房子，也就是地方支部的俱樂部內，很好地唱完國際歌，然後喝過滲了「甜酒」的美茶，甚至吃了麵包，當地同志在我們做完繁重工作後，這樣來款待我們，真是再適當沒有了。爾後我們和同志們親密地告了別，便排成一個小隊走去。夜闌人靜中，革命歌聲響徹着酣眠的街道，勻整的步伐應和着歌聲。「同志們，提高腳步」，「起來，全世界上的罪人」——於是大唱起勞動國際歌來。

過了一個星期。手臂都休息好了，現在我們要駛到九個俄里以外去作「星期六」，修理車箱了。我們是到彼羅沃去。同志們爬到叫作「美國人」的車箱頂上，洪亮而美妙地唱着國際歌。乘客們靜聽着，顯然，是帶些驚異神情。車輪有拍節地響着；我們沒來得及爬到上面去，就圍躡在這「美國人」車箱的各梯板上，儼如「拚命搶上車」的乘客一樣。眼前就是車站。我們已到達目的地了，走過一個長長的院子，就碰見那位親熱的政治委員格同志。

——工作是有，但人太少！共三十個人，六點鐘內要把十三個須得進行中等修理的車箱修理好！面前就是做有記號的雙輪軸，不僅有空車箱，而且也有裝得滿滿的一輛火油車：但不要緊，同志們，我們是

會「應付得來」的！

工作沸騰起來了。我和五位同志用槓桿作工。這些各重六七十普特的雙輪子，在我們肩膀和兩條槓桿推壓下，由「頭目」同志指揮着，迅速地從這道鐵軌上跳到另一道鐵軌上。這對輪子收拾好了，又來收拾另一對輪子。每對車輪都放到了一定的地方，我們就把這些陳舊了的東西，沿路軌迅速「發到」敞棚裏去：一、二、三、——它們就被一架轉動的起重機經空中抓走，軌道上再沒有這些雙輪子了。那裏，在黑暗中鐵錘聲大作，同志們已在自己的「病」車箱前像蜜蜂般的忙碌着。既作木工，又上油漆，也蓋車頂，工作熱烈得使我們和政治委員同志都高興起來。以後，鐵匠們也需要我們幫忙。在一座移動的小熔爐上，放着一個燒紅了的「滑車柱」，即互鉤撞變了的車箱螺拴體。這螺拴體白晃晃的，帶着火花被掛到鐵鏡上，憑着有經驗同志的眼力，加上我們靈巧的錘擊，它就恢復了原狀。它還是明晃晃的，就被我們很快拾到自己位置上，並帶着火花被安進鐵孔裏，——錘了幾下，便安妥就緒了。我們爬到車箱底下。那裏這些互鉤和滑車柱的構造，完全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簡單，那裏有帶帽釘和旋簧的整個系統……工作沸騰着，天快斷黑了，火炬燃的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份同志「蹲靠」在一堆車輪邊緣上，並「慢吞」熱茶。清涼的五月之夜，美妙的新月當空。笑語，笑聲，辛辣的談話。

——格同志，停工吧，算你們修好了十三個車箱就夠了吧！

但格同志却認這還不夠。

喝完了茶，我們就拉長着勝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不僅莫斯科開展了『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運動。六月六日，真理報載道：

『五月三十一日在特維爾舉行了第一次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有一百二十八個共產黨員在鐵路上工作過。在三點半鐘內裝卸了十四個車箱，修好了三輛機車，鑿了十立方俄丈柴火。還作了許多旁的工作。熟練共產黨員工人的工作強度達到平常生產率的十三倍。』

爾後，六月八日真理報上又寫道：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

薩拉托夫，六月五日。鐵路上的工人共產黨員爲回答莫斯科同志的號召，在全體黨員大會上議決：爲幫助國民經濟起見，決於星期六無報酬地額外工作五小時。

★

★

★

我極詳細和極完備地引證了關於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的消息，因爲這裏，我們顯然看得到共

產主義建設事業上極重要的一方面，對於這一方面，我們的刊物沒有充分注意，而且我們大家都還沒有給以充分估計。

少發些政治喧聲，多注意些極平凡的，可是生動的，從生活中取得並為生活檢查過的共產主義建設事實——這個口號是我們全體，我們的作家、鼓動員、宣傳員、組織員等所應該始終不倦重複的。

無產階級革命以後第一個時期，我們首先忙於主要和基本的任務，即克服資產階級底反抗，戰勝剝削者，打破他們的陰謀（如黑幫派，立憲民主黨人以至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律參加過的企圖讓出彼得城的『奴隸主底陰謀』），這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但除了這個任務而外，同樣也不免要提出——愈往前去，便會愈加頻繁地提出——積極建設共產主義，創造新經濟關係，建立新社會這一更重要的任務。

無產階級專政，——我已屢次指出過，例如，三月十二日在彼得格拉蘇維埃代表會議上講話時指出過，——並不僅僅是對剝削者採用的強力，甚至主要不是強力。這種革命強力的底經濟基礎，它富有生命力和必獲勝利底保證，就在於無產階級是代表着並實現着比資本主義更高式樣的社會勞動組織。要點就在這裏。共產主義所具力量底來源及其必然會完全勝利底保證，就在這裏。

農奴制的社會勞動組織是靠棍棒紀律來維持的，當時勞動羣衆極端愚昧，備受抑壓，而橫遭一小羣地主的掠奪和侮辱。資本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是靠飢餓紀律來維持的，當時在最先進最文明民主的共和國內，雖然資產階級文化和資產階級民主有着長足的進步，但極大多數的勞動羣衆，仍舊是一羣愚昧無知，備遭一小羣資本家掠奪侮辱的僱傭奴隸或貧苦農民。共產主義（其初步爲社會主義）的社會勞動組織，則是靠那些既推翻了地主壓迫，又推翻了資本家壓迫的勞動羣衆本身底自由自覺紀律來維持的，而且愈往前去，便愈要靠這種紀律來維持。

這種新的紀律既非從空而降，也不是出自善良願望，而是從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物質條件中成長起來，並且也只能從這種條件中成長起來。沒有這種物質條件，便不會有這種新紀律。而這種物質條件底代表者或傳導人，便是大資本主義所創造、組織、團結、訓練、啓發和鍛鍊出來的一定歷史階級。這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我們把這個科學的歷史學的拉丁名詞譯成更簡單的語句，那就是說：

在謀推翻資本壓迫的鬥爭中，在實行這種推翻時，在爲保持和鞏固勝利的鬥爭中，在建設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這一事業中，在謀完全消滅階級的全部鬥爭中，祇有一個階級，即城市工人

和一般工廠工人，即產業工人，才能領導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我們要在這括弧中指出：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區別，祇在於社會主義是從資本主義成長出的新社會底第一階段，共產主義是這個新社會底更高的、進一步的階段）。

〔伯恩國際（二）〕，即黃色國際底錯誤，就是它的領袖們祇在口頭上承認階級鬭爭和無產階級領導作用，害怕澈底加以思索，恰巧害怕做出資產階級覺得特別可怕，爲資產階級絕對不能接受的那個必然結論。他們害怕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也是階級鬭爭底一個時期，當階級尙未消滅之前，這個鬭爭是決不可避免的，不過它的形式有所改變，並且在推翻資本後第一個時期，成爲更形殘酷和更形獨特的了。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並不停止階級鬭爭，而是繼續着階級鬭爭，——直到消滅階級爲止，——當然，是在另一種環境中，採取另一種形式，運用另一些手段來進行着。

『消滅階級』又是什麼意思呢？凡屬自稱爲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承認社會主義底這個最終目的，但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思考到這個最終目的底意義。所謂各個階級，就是在歷史上一定社會生產系統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對生產資料的關係（這種關係大部份都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領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各不相同的幾個巨大集團。幾個階級就是這樣的幾個集團，由於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佔的地

位不同，而使其中某一集團能够佔有另一集團底勞動。

顯然，爲了完全消滅階級，不僅要推翻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不僅要廢除他們的所有制，並且還要廢除對生產資料的任何私有制，還要消滅城市和鄉村間的區別，以及體力勞動者和智力勞動者間的區別。這是需要很長的時期才可實現的事業。爲要完成這一事業，就必須大大發展生產力，必須克服小生產制無數殘餘底反抗（往往是特別頑強和特別難於征服的消極反抗），必須克服與這些殘餘相關連的極頑強的因循守舊習氣。

若認爲一切「勞動者」都能同樣進行這一工作，那便是最空洞的辭句或遠古的，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底幻想。因爲這種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歷史進程中成長起來，並且祇是從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物質條件中成長起來的。在開始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時期，祇有無產階級才具有這種能力。它之所以能够實現自己所肩負的巨大任務，第一，因爲它是文明社會中最強有力和最先進的階級；第二，因爲它在各個最發達的國家裏佔居民的大多數；第三，因爲在俄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裏，居民的大多數都是半無產者份子，即照例是每年一部份時日度着無產者式的生活，照例是在某種程度內靠在資本主義企業中從事僱傭勞動謀生的人。

誰想根據什麼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勞動民主底平等這類的空泛辭句來解決從資本主義過

渡到社會主義的任務（如像考茨基、馬爾托夫及伯恩黃色國際其他英雄們所作的那樣），誰就祇是以此來暴露他們那種在思想方面奴僕式地跟着資產階級跑的小資產者、庸人和市儈的天性。祇有具體研究已經奪得了政權的那個特別階級，即無產階級與所有一切非無產階級以及半無產階級勞動人民之間的特別關係，才能正確地解決這一任務；並且這種關係不是在虛幻諧和的，「理想的」環境中形成起來，而是在資產階級進行瘋狂和多樣反抗的現實情況下形成起來的。

在任何資本主義國家裏，包括俄國在內，極大多數的民衆，尤其是勞苦羣衆，都是連同自己的親屬千百次地經歷了資本的壓迫，資本的掠奪及其各種各樣的侮辱。帝國主義戰爭，——即爲了解決是英國資本還是德國資本取得掠奪全世界的霸權這一問題，而屠殺數千萬人的戰爭，——把這種經歷異常加劇、擴大和加深了，使人們覺悟到這種經歷。所以極大多數民衆，尤其是勞苦羣衆必然同情無產階級，因爲它用英勇的果敢精神，用毫不留情的革命手段推翻資本束縛，推翻剝削者，鎮壓他們的反抗，用自己的鮮血開闢出建設不容有剝削者存在的新社會的道路。

不管非無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勞動民衆所表現的想倒退到資產階級「秩序」方面去，倒退到資產階級「福蔭」下去的那種小資產階級搖搖離心理如何強大，如何不可避免，但他們終究不能不承認無產階級擁有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威信，因爲無產階級不僅推翻剝削者，不僅鎮壓剝削者

的反抗，而且還建設着嶄新的、更高的社會聯繫，社會紀律，即自覺的和聯合起來了的工作者底紀律，這些工作者是不承認任何束縛的，除了自己聯合體底權力外；除了自己的，更加自覺、勇敢、團結、革命、堅定的先鋒隊底權力外，他們是不承認任何權力的。

爲了取得勝利，爲了建設和鞏固社會主義，無產階級應當解決雙重的或二位一體的任務：第一，用自己反資本的革命鬪爭底無限英勇精神吸引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鼓舞他們、組織他們、指導他們去推翻資產階級和完全粉碎資產階級底一切反抗；第二，把全體被剝削勞動羣衆以及所有小資產者階層引上新經濟建設的道路，引上建設新社會聯繫、新勞動紀律、新勞動組織的道路，這種新勞動組織把科學以及資本主義技術的最新成果拿來共同創造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的自覺工作者底普遍聯合制結合起來。

這第二個任務要比第一個任務更加艱難，因爲解決這個任務，絕對不能靠零星奮發的英勇氣概，而是需要有廣泛日常工作中所表現的最長期、最頑強和最困難的英勇精神。但這個任務同時又比第一個任務更加重要，因爲歸根到底，祇有新的、更高的社會生產方式，祇有爲代替資本主義生產和小資產階級生產而起的大規模社會主義生產，才能成爲戰勝資產階級所必需的那種力量底最大泉源，才能成爲這種勝利堅固不移的唯一保證。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有巨大的歷史意義，就是我們從這中間可以看出工人在提高勞動生產率，過渡到新勞動紀律以及創造社會主義經濟條件和生活條件方面所表現的自覺和自願的倡首精神。

受到一八七〇至一八七一年的教訓之後，未曾轉到沙文主義和民族自由主義方面而是轉到了社會主義方面的一位不可多得，甚至可以說是鳳毛麟角的德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雅可比說過，建立一個工人聯合會，要比在薩多瓦近郊的搏戰「一五」，具有更大的歷史意義。這句話是很公正的。薩多瓦近郊搏戰所解決的，是建立德國民族資本主義國家的霸權究應屬於普魯這兩資產階級君主國中哪一個的問題。建立一個工人聯合會是無產階級在世界範圍內達到戰勝資產階級的一個小小的步驟。因而我們也可以說，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一次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要比興登堡或者福熙和英國人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中所獲得的任何一次勝利，都有更重大的歷史意義。帝國主義者底勝利是爲了英美法三國富豪底利潤來屠殺千百萬工人，是垂死的、快脹死的和活活腐爛着的資本主義底殘暴行爲。而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的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却是爲使全世界各國人民解脫資本桎梏和戰爭慘禍的這種

社會主義新社會底一個細胞。

資本家老爺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慣於自命的『輿論』代表的近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當然要譏笑共產黨人底希望，稱這種希望是『小花鉢裏栽大樹』，譏笑那些與盜竊公物、閒遊浪蕩、生產率低落、損毀原料和產品等慣常現象比較起來是微乎其微的義務星期六底數目。我們回答這班老爺們說：如果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把自己的知識用來幫助勞動羣衆，而不是用去幫助俄國和外國的資本家恢復他們的權力，那麼改革就會進行得更快而更和平。但這祇是空想而已，因為問題是由階級鬭爭來解決的，而大多數知識份子則趨向於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不是藉這些知識份子底幫助，却是不管他們怎樣反抗（至少是在大多數場合下），摒除不可救藥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同時改造和重新教育動搖份子，使之服從自己，漸漸地把動搖份子中的大多數奪到自己方面來，這樣才會獲得勝利。對於改革中的困難和挫折表示幸災樂禍、散佈張惶心理、宣傳開倒車——所有這些都是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進行階級鬭爭的工具和手段。無產階級是不會甘受這種辦法欺騙的。

如果按實質來觀察問題，難道歷史上有過某種新生產方式，不是經過了許許多多的失敗、三反四覆的錯誤，而是一下子發育起來的麼？農奴制顛覆了半世紀後，俄國鄉村中仍保存有不少的

農奴制殘餘。美國廢除黑奴制半世紀後，那裏的黑人往往還處於半奴隸狀態。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連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始終保持着他們替資本服務的本色，總是抱定他們那種完全虛偽的論據：在無產階級革命前，他們責備我們爲空想主義者，而在革命後，他們却要求我們用荒唐妄想的速度來剷除舊制度遺跡！

但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我們知道資產階級「論據」底真實價值，也知道習俗方面舊事物底遺跡在革命後相當時期內還是必然會對新事物底萌芽佔着優勢的。當新事物剛剛誕生出來的時候，舊事物在相當時期內總是比新事物強有力些，這無論在自然界或社會生活中都是常見的現象。譏笑新事物幼芽底軟弱，表示輕浮知識份子底懷疑態度等等，——這實際上都是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的階級鬭爭手段，都是保護資本主義來反對社會主義。我們應當仔細地來研究新事物底幼芽，極仔細地對待它們，盡力幫助它們成長，並「懇懇照顧」這些柔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是不免會死亡的。不能担保說，恰是「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定會發生特別重要的作用。問題並不在這裏。問題是要扶助各種各類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會把這些新幼芽中最富有生命力的東西選擇出來的。既然日本一位學者，爲了幫助人們戰勝梅毒，竟有耐心接連試驗了六〇五種藥品，直到製出了能夠滿足一定需要的第六〇六種藥品時爲止，可見，要想解決戰勝資本主義這一

更困難任務的人，也就應該具有堅忍精神來試驗幾百以至幾千種新的鬭爭方法、方式和手段，直至從中製定出最適當的時候爲止。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爲開始這個運動的，並不是境況特別優越的工人，而是具有各種專門手藝的工人，其中包括沒有專門手藝的工人，即處於通常最困難條件下的粗工。我們大家都很清楚，現在不僅俄國一國，而且全世界各國都有的勞動生產率低落現象，其基本原因就是破產和貧困，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怨恨心理和疲憊，疾病頻仍以及半飢半飽的現象。最後這點最關重要。飢餓——這就是勞動生產率低落的原因。爲了消滅飢餓現象，就必須提高農業、運輸業及工業中的勞動生產率。結果就成了這樣一個循環圈：爲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就得消除飢餓，爲要消除飢餓，就得提高勞動生產率。

大家知道，諸如此類的矛盾在實踐上是以這個循環圈底中斷，羣衆情緒底轉變，個別集團底英勇首創精神來解決的，而首創精神在這種轉變中往往起着決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鐵路工人（當然是大多數，而不是小羣投機家、管理局人員等等白黨份子）是生活絕頂困難的勞動羣衆。他們經常是食不飽腹，而在現時青黃不接和糧食狀況一般惡化的情形下，簡直是經常挨餓。請看，這些處在資產階級、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革命惡意煽惑包圍中忍飢受餓的工

人，雖然他們已經困乏不堪，因為食不飽腹弄得精疲力竭，却來舉行「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從事不領報酬的額外工作，並且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難道這不是極偉大的英勇精神麼？難道這不是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轉變底開端麼？

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條件。資本主義造成了在農奴制度下所沒有過的勞動生產率。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而且一定會被徹底戰勝，是因為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更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這是很困難很長期的事業，但這個事業已經開始，最主要的點就在這裏。既然那些熬過了四年艱苦的帝國主義戰爭，爾後又熬過了一年半更艱苦的國內戰爭的飢餓工人，終能於一九一九年夏季在飢餓的莫斯科開始這件偉大的事業，那末，當我們在國內戰爭獲得勝利並爭得和平時，繼續發展的情形又會是怎樣的呢？

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那些自願、自覺、聯合的工人所創造出來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之所以異常寶貴，因為它是共產主義底實際開端，而這乃是極罕見的事，因為在我們現時所處的階段上，「祇是實行着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初步」（如我們黨綱中完全公正地所說的那樣）。

當一般普通工人起來克服極大困難，奮不顧身地設法增加勞動生產率，設法保護每一普特糧

食、煤、鐵及其他產品，這些產品不是歸勞動者本人及其「近親」所有，而是歸他們的「遠親」，即歸全社會所有，歸千百萬起初聯合爲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後又聯合爲蘇維埃共和國聯盟的人們所有，——這也就是共產主義開始了的時候。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譏笑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人權大憲章」內的浮誇詞藻，譏笑了所有這些妄談一般自由平等博愛的美麗辭句，這些辭句是使各國市儈和庸人，直至現今卑鄙伯恩國際中一般卑鄙英雄們心嚮神往的。馬克思用來和這種華麗人權宣言相對立的，是無產階級一種平凡的、質樸的、務實的、日常的問題提法：由國家縮減工作日，就是這種提法的標本樣式之一。無產階級革命內容開展得愈強烈，馬克思意見底全部正確性和全部深刻性在我們面前也就暴露得愈明顯、愈透澈。真正共產主義底「公式」與考茨基輩、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及其伯恩國際中親愛「兄弟」們底華麗、機巧、堂皇辭藻不同的地方，就是這種「公式」把一切都歸結於勞動條件。少談些什麼「勞動民主」，什麼「自由、平等、博愛」，什麼「民權」等等的空話吧：現代有覺悟的工人和農民在這些誇大詞句裏，容易看出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底欺詐手腕，也如像每個有生活經驗的人，望見「善良君子」極「光澤的」面貌和外表，就能一下子確切斷定他「大概是個騙子」。

少說些漂亮話，多做些日常平凡的事情，多關心每普特糧食和每普特煤炭吧！多設法使飢餓工人和襁褓農民所必需的這每一普特糧食和每一普特煤炭，不是用投機買賣或資本主義方式，而是用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工和鐵路工人一類普通勞動者之自覺、自願與奮不顧身的英勇工作來獲得吧。

我們大家應當承認，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空口對待革命問題的這種態度底遺跡，是在在皆是，甚至我們隊伍裏也有。例如，我們刊物上很少向這些腐爛的、資產階級民主舊制度的這種腐朽殘餘開火，很少對真正共產主義制度底平凡的、質樸的、日常的，但却是活生生的幼芽加以扶助。

拿婦女狀況來看吧。在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個最先進資產階級共和國內的任何一個民主政黨，幾十年來也沒有作出我們在我國政權存立後第一年內所作到的百分之一。我們徹底剷除了婦女不平等權的現象、限制離婚、可惡的離婚手續、不承認私生子、追究私生子底父親等等卑劣法律，此種法律底殘餘，在各文明國內還留下得極多，而這正是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的奇恥大辱。我們十二分有權以我們在這方面所作出的一切來自豪。可是，我們把地基上舊時資產階級法律和制度的廢物掃除得愈乾淨，那我們就能愈益顯明地看出，這祇是為建築物掃清地基，但還不是建築物本身。

雖然頒佈有種種解放婦女的法律，但婦女仍然還是家庭奴隸，因為家常瑣碎事務壓迫她們、窒息她們、愚鈍她們、卑賤她們，把她們禁錮在炊爨和撫育小孩的事務上，而以絕然不帶生產性的、微末的、勞神的、祇是愚鈍人、折磨人的工作浪費她們的勞動。婦女底真正解放，真正的共產主義，祇在反對這種瑣屑家務的普遍鬭爭（為執掌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所領導的），更確切點說，祇是在把煩瑣家務普遍改造為社會主義大經濟的地方和時候才會開始。

試問我們在實踐中對這個理論上是每個共產黨員都無庸爭論的問題注意得充分麼？當然，是注意得不充分的。試問我們對目前在這方面已有的共產主義萌芽關心得够麼？我再說一遍，是非常不夠的。公共飯堂、托兒所和幼稚園，便是這些萌芽的標本，也就是不帶半點浮詞、誇語和堂皇氣勢的平凡日常手段，這些手段實際能够真正解放婦女，減少和消滅她們在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作用上處於與男子不平等的現象。這種手段並不新奇，它們是由大資本主義所產生出來的（也如社會主義所有一切物質前提那樣），但它們在資本主義下，第一，數量極少，第二，——這點特別重要——是營業性的企業，不免有投機、漁利、欺騙、偽造等一切弊端，或是「資產階級慈善事業的把戲」，理應受到優秀工人們方面的憎惡和鄙視。

毫無疑義，在我國，這樣的機關却已經是多得多了，而且它們的性質已開始改變。毫無疑

義，在女工和農婦中間有比我們所知道的要多許多倍的組織人才，她們善於舉辦這類有很多工作者參加以及有更多的享受者參加的實際事業，但卻沒有像往往自鳴萬能的「知識份子」或幼稚的「共產黨員」所常「患」的愛講空話，無謂忙碌，無聊爭吵以及空談計劃、體系等等的毛病。可是我們還沒有認真來慰勸照護這些新事物的萌芽。

請看看資產階級吧。他們該是多麼會宣揚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啊！他們怎樣在自己發行的千百萬份報紙上讚揚資本家所視為「模範的」企業，怎樣把資產階級的「模範」組織當作民族的得意之作呵！而我們的刊物並不注意或幾乎全不注意來描述最好的食堂或托兒所，來日常關心地把其中某些變為模範組織，宣揚它們，並詳細描述：在模範的共產主義工作下，能怎樣經濟人力，怎樣便利需求者，怎樣節省產品，怎樣把婦女從家庭奴役下解放出來，怎樣改善衛生條件，——這一切都是能够做到，能夠通行到全社會，通行到全勞動羣衆中去的。

模範的生產工作、模範的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模範的關懷和忠誠於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糧食的精神、模範的食堂、某個工人住房和某街坊內模範的清潔衛生工作，——所有這些，就是我們刊物以及每個工農組織所應當比現在更加十倍注意和關注的事情。所有這些都是共產主義底萌芽，而關注這種幼芽乃是我們共同的和首要的義務。不管糧食情形和生產狀況怎樣困難，但在布

爾塞維克執政這一年半以來，情形畢竟無疑的是有全面的進展；糧食採辦量從三千萬普特（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增到一萬萬普特（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園藝經濟增加了，未經播種的土地面積減少了，雖然有燃料上的巨大困難，但鐵路運輸業已在開始改善以及其他等等。在這一般情景以及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贊助之下，共產主義底幼芽，不僅不會夭折，反而定會茁壯滋長並發展成爲完全的共產主義。

★

★

★

要好好地思索『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意義，以便從這個偉大創舉中得出一切由此產生並絕頂重要的實際教訓。

從各方面來贊助這一創舉，——這就是第一個主要的教訓。『公社』這名詞，我們這裏常常應用得太輕易了。凡是共產黨員或在他們參加下所創立的一切企業，往往是一下子就被宣佈爲『公社』；同時人們往往忘記，如此光榮的名稱是要以長期和頑強的勞動來爭得的，是要以真正共產主義建設中證實了的實際成效來爭得的。

因此，我以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大多數委員決定廢除人民委員會關於『消費公社』名稱的指令，是完全正確的。讓名稱簡單一些吧，那時新組織工作初步中的缺陷和缺點，就不會推往『公社』

身上，而將落在（這是理所當然的）不好的共產黨員身上。最好是取締廣泛使用「公社」字樣，禁止隨便援用這個字眼，或者祇承認那些在實踐中已真正證明（並由附近全體居民所一致公認）了有按共產主義方式辦理的能力和本領的真正公社，才有權援用這個名稱。你起初要證實自己已有社會利益和全體勞動羣衆利益從事無償勞動的能力，有「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能力，有提高勞動生產率 and 作出模範事業的能力，然後你才有權取得「公社」這個光榮稱號！

在這方面，「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是最寶貴的例外。因爲這裏，莫斯科、嘉桑鐵路的粗工和鐵路工人起初在實際上證明了他們確實能像共產主義者一樣來工作，然後才稱呼自己的創舉是「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今後也要設法做到，並且一定做到，使一切和每個未經艱苦勞動及長期勞動底實際成效以及模範的真正共產主義的辦事方法加以證實，就把自己企業、機關或業務稱作公社的人，都應遭受無情的嘲笑，被人視爲騙子或空談家而受到恥辱。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偉大創舉，在另一方面，即清黨事業中也應當實地運用。在革命後的初期，當時很多「誠實的」和居心庸俗的人特別存着戒心，當時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自然是包括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內，全體怠工，並在資產階級面前趨炎附勢，於是野心家及其他危害份子便乘機混到執政黨裏來，成爲完全是不能避免的現象。任何革命中都避免不了，而且

也不能避免這種現象。全部問題在於依據着健全有力的先進階級的執政黨，要善於清洗自己的隊伍。

在這方面我們早已開始工作。要堅毅不拔孜孜不倦地繼續這一工作。動員共產黨員去作戰這件事會幫助了我們；胆小漢和惡棍逃出黨了。聽便他們往哪裏滾去吧！黨員數量上這樣減少，是意味着黨的力量和比重之大大增加。要利用「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底創舉繼續清黨：比方說，祇有在經過半年的「檢查」或「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候補期」的人，才被接受入黨。凡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後入黨而沒有以其特別勞作或功績證明其絕對可靠、對黨忠實和能於成爲共產黨人的一切黨員，都應當經過這樣的檢查。

這樣以一貫提高黨對真正共產主義工作的要求爲標準的清黨工作，定會改善國家政權機關，並大大促進農民最終轉變到革命無產階級方面來。

「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也就把無產階級專政下國家政權機關底階級性表露得非常明顯。黨中央委員會寫過一封「用革命精神從事工作」的信。這便是擁有十萬至二十萬黨員（我預料在嚴格清黨後，仍然會有這多，因爲現在的黨員要超過這個數目）的黨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主張。這個主張獲得了職工會中工人們的響應。這樣的工人在我們俄羅斯和烏克蘭達四百萬人。他

們絕大多數是擁護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二十萬與四百萬，這就是「齒輪」（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的對比。還有千百萬農民，他們分成三個基本集團：數量最多和最接近於無產階級的集團，即半無產者或貧農；其次是中農；末了，便是數量極少的集團，即富農或鄉村資產階級。

當還有可能買賣糧食和利用飢饉來作投機事業時，農民仍是（這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相當一個時期內是不能避免的）半勞動者，半投機家。一方面，他們是投機家，所以他們仇視我們，仇視無產階級國家，總想去同資產階級及其主張糧食自由貿易的，直至孟塞維克舍爾或社會革命黨人別·切爾寧可夫爲止的忠僕們謀妥協。但另一方面，農民又是勞動者，是無產階級國家底朋友，是工人們在反地主反資本家鬭爭中最忠實的同盟者。作爲勞動者的數千百萬農民大眾，是贊助一二十萬無產階級共產主義先鋒隊所領導並由幾百萬有組織的無產者所組成的國家「機器」的。

世界上還沒有過比這更真正民主，更與被剝削勞動羣衆有緊密聯繫的國家。

正是這樣用「共產主義義務星期六」所表示出來並經過這種方式具體實現出來的無產階級工作，才能澈底鞏固農民對於無產階級國家的尊敬和愛戴。這種工作，而且祇有這種工作，才會使農民最終相信我們正確，相信共產主義正確，才會使農民成爲我們無限忠實的擁護者，因而也就

是把糧食困難完全克服，使共產主義在糧食生產和分配問題上完全戰勝資本主義，無條件地鞏固共產主義。

一九一九年七月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三二五至三四九頁

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

——一九一九年十月三十日（待續）①——

臨到蘇維埃政權第二週年的時候，我本想用本文題目寫一本小冊子，可是因為日常工作忙碌，直到現在還祇初步地準備了個別章節。所以我決定嘗試嘗試，用提綱方式把我認為是本問題中最重要的意思簡略敘述一下。自然，提綱式的敘述是有許多不便和缺點的。但在一篇不大的雜誌論文中，也許總可以達到一個小小的目的，即指出這問題底提法和研究大綱以供各國共產黨員討論。

① 本文未完。

——編者

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橫着一個相當的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含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底特點或特徵。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資本主義與生長着的共產主義彼此鬭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與已經誕生，但還非常脆弱的共產主義彼此鬭爭的時期。

具有這種過渡時期特點的整個歷史時代底必然性，不僅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任何一個有學識的，對於發展論有相當認識的人，都認為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現代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代表（第二國際所有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麥克唐納和龍格、考茨基和阿得列爾之流在內，不管他們掛着社會主義的假招牌，也都是這樣的民主派），關於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一切議論，都完全表明他們忘記了這種顯然的真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根本就厭惡階級鬭爭，幻想避免這種鬭爭，力圖輾平、調和及鈍化這種鬭爭底鋒芒。所以這類民主派或則根本不承認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或則認定自己的任務，不是領導兩種鬭爭力量一方的鬭爭，而是把兩種鬭爭力量調和起來。

俄國無產階級專政，由於俄國很落後和具有小資產階級性質，所以與先進國家比較起來，不免有一些特點。但俄國基本力量及社會經濟底基本形態也是和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內一樣的，所以這些特點祇能牽涉到非最主要的東西。

這些社會經濟基本形態就是資本主義、小商品生產、共產主義。這些基本力量就是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特別是農民）、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俄國經濟，就是表明在幅員廣大的全國統一範圍內按共產主義原則聯合起來的這種勞動底初步形態，與小商品生產，與尚保存着並在小商品生產基礎上復活着的資本主義之間進行的鬭爭。

其所以說勞動在俄國已按共產主義原則聯合了起來，第一，是因為廢除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第二，是因為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在全國統一範圍內組織着國有土地上和國有企業中的大生產，按各經濟部門和各企業來分配勞動力，把屬於國家的大量消費品分配給勞動者。

我們是說俄國共產主義底「初步」（一九一九年三月所通過的我黨黨綱就是這樣說的），因為這些條件在我國還祇部份地實現，換言之，這些條件的實現還處在開始的階段。我們用革命打擊手段，一舉而把一般可能立刻實現的事情實現了：例如，在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天，即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公曆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就把土地私有制廢除了，就毫無報償地把大土地私有者剝奪了。在幾個月內就同樣毫無報償地把幾乎所有大資本家以及工廠、股份公司、銀行和鐵路等等的私有主剝奪了。由國家來組織工業中的大生產，從「工人監督」過渡到「工人管理」工廠和鐵路，——這在基本上大致已經實現了，但在農業方面，這還祇是剛剛開始實行（由工人國家在國有土地上組織「蘇維埃農莊」，即大農莊）。同樣把小農組織成爲各種共耕社，作爲從小商品農業進到共產主義農業^①的過渡辦法一舉，也剛剛才開始進行。至於由國家組織物品分配來代替私商，即是由國家採辦糧食並運給城市，採辦工業品並運給鄉村這件事，也是如此。

● 在蘇俄已經成立的蘇維埃農莊約有三千五百三十六個，農業合作社約有一千九百六十一個，農業勞動組合約有三千六百九十六個。我們中央統計局現時正在把所有蘇維埃農莊和農業合作社作一次精確的登記。登記結果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間就實際開始收到。

下面就關於本問題的統計材料。

農民經濟仍舊是小商品生產的經濟。這裏有非常廣闊，而且根深蒂固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當然是不免要同共產主義進行極殘酷的鬭爭。這個鬭爭底形式就是經過投機小販和奸商來反對國家採辦糧食（以及其他農產品），一般就是反對由國家分配農產品。

三

爲了說明這些抽象的理論原則，且來引出一些具體的統計材料。

根據糧食人民委員部的材料，在俄國境內由國家採辦的糧食，從一九一七年八月一日起至一九一八年八月一日止共約三千萬普特，下一年約計一萬一千萬普特。再下一年（一九一九至一九二〇年）頭三個月的採辦結果大約可達到四千五百萬普特，而在一九一八年同月份裏（八月至十月），則僅有三千七百萬普特。

從這些數目字中間就可看出，在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意義上說，我們的情形雖改善得很

慢，但總是一往直前地改善着。這種改善，是在俄國和外國資本家用盡世界列強所有一切力量來組織國內戰爭，因而造成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難條件下達到的。

所以不管各國資產者及其公開和暗藏的幫手們（第二國際中的「社會主義者」）怎樣造謠，怎樣誣蔑，但有一點總是不容懷疑的：即從解決基本經濟問題的觀點來看，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已獲得了共產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保證。全世界資產階級之所以瘋狂地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組織軍事進攻和陰謀等等來反對布爾塞維克，正是因為它明白知道，若不用武力把我們壓倒下去，則我們在改造社會經濟方面就必然會獲得勝利。但資產階級要想這樣把我們壓倒，是決不會成功的。我們在所得到的這個短期間內，並在行動時所處的那種舉世未有的困難條件下，究竟在什麼程度內戰勝了資本主義，這從下述總結數字中就可以看出。中央統計局剛剛製定了預備發表的關於蘇俄二十六省（不是全國）的糧食生產與消費情形的統計表。

其總結如下：

產量省區	蘇俄二十省	產糧數目（不計種子和飼料）	運到的糧食數	居民所擁有的糧食總量	每人消費的糧食
	（單位百萬口）	（單位百萬普特）	（單位百萬普特）	（單位百萬普特）	（單位普特）
城市	四·四	六二五·四	二〇·九	四一·五	九·五
鄉村	二八·六	六二五·四	二〇·六	四八·八	九·五

總計	消費省區		城市		鄉村	
	城市	鄉村	城市	鄉村	城市	鄉村
五二六.七	五.九	一三.八	一四.〇	二〇.〇	二〇.〇	四〇.〇
七三九.四	一四.〇	二二.八	二七.八	二七.八	二七.八	五五.四
五三.〇	六.八	四.四	七.四	七.四	七.四	一三.六

由此可見，供給城市的糧食大約有一半是由糧食人民委員會運到的，另一部是由投機小販運到的。據一九一八年城市工人食糧情形確切調查結果來看，其比例正是如此。但由國家運到的糧食，工人所付的價格要比由投機小販運到的少九倍。糧食的投機價格比國家定價高到十倍。這就是確切研究工人收支情形所得的結果。

四

如果把上述的統計數字仔細思考一下，就可得出表明俄國現時經濟一切基本特點的確切材料。

勞動羣衆已擺脫了歷來的壓迫者和剝削者，地主和資本家。這個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上的前進步驟，按其程度、其規模及其速度說來，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但資產階級底擁護者（包括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內)沒有估計到這一點，他們所說的自由平等，是指資產階級國會的民主制而言，竟把這種民主制冒稱爲一般「民主制」或「純粹民主制」(考茨基)。

但是勞動羣衆所注重的，正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免除地主和資本家壓迫的自由)，所以他們才這樣屹立不搖地擁護蘇維埃政權。

在農民國家裏，從無產階級專政方面首先獲得利益，馬上獲得利益和獲得利益最多的就是一般農民。俄國農民在地主資本家統治時期是經常挨餓的。農民在我國千百年來的長期歷史中，從來沒有可能來爲自己工作：他們忍飢受餓，却把幾萬萬普特的糧食交給資本家，交給城市和國外。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農民破天荒第一次爲自己工作，並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農民破天荒第一次享受了真正的自由，免於飢餓的自由，吃自己糧食的自由。誰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時，規定了最高度的平等：農民在絕大多數情形下，都是「按人口」分配了土地。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

爲了消滅階級，第一就要推翻地主和資本家。這一部份任務，我們已經完成了，但這祇是一部份的任務，而且不是最困難的一部份任務。爲了消滅階級，第二就要消滅工農間的區別，把全體的人都變成工作者。這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這是更困難得無比的任務。而且由於客觀必然

性，這還是很長期的任務。這個任務是不能用推翻某階級的辦法來解決的，必須把全部社會經濟加以組織上的改造，從個體的，單獨的小商品經濟過渡到公共的大經濟，才能解決這個任務。這樣的過渡，必然是非常長久的。採用急躁輕率的行政立法手段，只會阻滯這種過渡並增加其困難。祇有採取各種使農民都能大大改善全部農業技術，並把這技術加以根本改造的辦法來幫助農民，才能促進這種過渡。

爲了解決這個最困難的第二部份任務，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便應當在自己對農民的政策方面，一貫地執行以下基本路線：無產階級應當把農民勞動者和農民私有者，即是把農民中的工作者和農民中的商人，農民中的勞動者和農民中的投機者分別開來。

這種分別就是社會主義底全部實質所在。

無怪乎那些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馬爾托夫輩、切爾諾夫輩、考茨基之流）完全不懂得社會主義底這種實質。

這裏所說的分別是很難實行的，因為在實際生活中，「農民」所有的一切特性，不管彼此間如何差異，如何互相矛盾，總是溶合爲一個整體。但是把他們分別開來，還是可能的，不僅可能，而且是農民經濟和農民生活條件中所必然產生的現象。勞動農民歷來都受地主、資本家、投

機小販、奸商及其國家（包括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在內）所壓迫。勞動農民在幾百年中養成敵視和仇恨這些壓迫者和剝削者的心理，而實際生活的「敦養」，就迫使農民去設法和工人結成聯盟來反對資本公司，反對奸商、反對投機小販。同時經濟環境，商品經濟環境又必然使農民變爲（並非經常如此，但在大多數情形下是如此）投機小販和奸商。

根據我們上面所引的統計材料，就可顯然看出農民勞動者與農民投機者的區別。有一種農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爲了供給城市裏受餓工人，而按照國家固定價格，把四千萬普特糧食交給了國家機關，雖然當時這些機關還有許多缺點，而這種缺點是工人國家所明白認識，但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第一個時期中，是無法免除的，——這種農民就是勞動農民，他們完全不愧爲社會主義工人底同志，是社會主義工人最可靠的同盟者，是社會主義工人在反資本壓迫鬪爭中的骨肉兄弟。還有一種農民，利用城市工人底困乏飢餓，暗地裏用超過國家定價十倍的價錢，出賣了四千萬普特糧食，這樣來欺騙國家，到處引起並加強欺騙、搶劫和欺詐的現象，——這種農民就是投機者，就是資本公司底同盟者，就是工人底階級敵人，就是剝削者。因爲農民所有的剩餘糧食，都是從全國公有土地上收割來的，而其所用的農具不管怎樣都不僅是由農民，而且是由工人的勞動力創造出來的等等；用餘糧去投機，這就是剝削忍飢受餓的工人。

人們從四方八面大喊大叫，指責我們憲法上工農不平等，指責我們解散立憲會議，用強力奪取餘糧等事實說道：你們是破壞自由平等和民主制的人。我們却回答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作過這樣多的事情，來消滅勞動農民千百年來所備受苦痛的那種實際上的不平等，那種實際上的不自由。可是對於農民中的投機者，我們在任何時候都不承認他們可以享受平等，正如我們不承認剝削者可以與被剝削者，飽食者可以與飢餓者『平等』，不承認前者有劫掠後者的『自由』一樣。而對於那些不願意瞭解這種區別的有學識的人，我們就要用對待白黨的態度來對待他們，那怕這種人自稱為民主派、社會主義者、國際主義者、考茨基派、切爾諾夫派、馬爾托夫派等等。

五

社會主義就是消滅階級。無產階級專政在這一點上已做了它所能做到的一切。但是消滅階級是不能一下子辦到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始終是存在的。階級一消失，專政也就不需要了。沒有無產階級

專政，階級是不會消失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階級雖然還是存在，但每個階級都改變了，它們相互間的關係也改變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階級鬭爭並不消失，而祇是採取別的形式。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產階級是被壓迫階級，是被根本剝奪了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階級，是唯一直接而完全與資產階級對立，因而也就是唯一能够澈底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在推翻資產階級，奪得政權以後，已經成爲統治階級；它掌握着國家政權，它擁有已經社會化的生產資料，它領導着那些動搖的中間的份子和階級，它鎮壓着剝削者愈益增長的反抗力量。所有這一切都是階級鬭爭底特殊任務，這種任務，是無產階級以前沒有提出過，而且不能提出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剝削者階級，即地主資本家階級還沒有消失，而且也不能一下子就消失的。剝削者已被擊潰，可是還沒有被消滅。他們還保持着國際的基礎，即國際資本，因爲他們是國際資本底一個支部。他們還保留有某些生產資料中的一部份，還保留有金錢，還保留有極大的社會聯繫。他們的反抗力量，正由於失敗而更加增加千百倍。他們擁有管理國家、軍事、經濟的「藝術」，這使他們獲得極大極大優勢，所以他們的作用比他們在居民總數裏所佔的比重要大得不可計量。被推翻了的剝削者之反對已獲勝利的被剝削羣衆先鋒隊，即反對無產階級而進行的階

級鬭爭，更加殘酷得無可比擬了。既然說的是革命，既然不用改良幻想去代替這革命概念（如像第二國際中的一切英雄們所幹的那樣），那麼情形也就祇能這樣。

末了，農民亦如一般小資產階級一樣，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也是佔着中等的中間的社會地位：一方面，他們是人數很多（在落後的俄國是人數極多）的勞動大眾而由全體勞動者要求擺脫地主資本家壓迫的共同利益聯合起來；另一方面，他們又是彼此分立的小業主、小私有者和小商人。這樣的經濟地位必然使他們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動搖不定。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鬭爭尖銳化的時候，在一切社會關係遭到非常急劇破壞的時候，以及在農民和一般小資產者最慣於拘守陳規和因循苟且的情形下，他們從此方轉到彼方，反覆無常，猶豫不決等等，當然是必不可免的。

無產階級對於這個階級，或者說，對於這種社會成份的任務，就是要領導他們，爭取對他們的影響。領導動搖份子和不穩定份子，這便是無產階級所應作的事情。

我們把所有一切基本力量或階級及其由無產階級專政所改變了的相互關係比較一下，就可知道第二國際一切代表們中所流行的，說什麼「經過一般民主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那種小資產階級觀念，在理論上是絕頂荒謬，愚鈍至極了。這種錯誤觀念底基礎，就是從資產階級那裏繼承下

來的偏見，以為「民主制」包含有絕對的、超階級的內容。其實，在無產階級專政下，連民主制也過渡到嶄新的階段，階級鬭爭也提升到更高的階段，而使所有一切形式都服從於階級鬭爭。

關於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籠統詞句，實際上是等於盲目背誦那些反映着商品生產關係的概念。用這些籠統詞句來解決無產階級專政底具體任務，就無異是完完全全轉到資產階級底理論和原則立場上去。從無產階級方面看來，問題祇能這樣提出：是擺脫哪一個階級壓迫而獲得的自由？是哪一個階級與哪一個階級的平等？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民主制，還是以力爭廢除私有制為基礎的民主制？等等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二六）一書中早已解釋過，平等概念是商品生產底反映，所以假若不把平等瞭解為消滅階級，那末，平等概念便會變成一種偏見。關於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平等概念與社會主義平等概念不同的這種淺近真理，是常常被人遺忘的。如果不忘記這個真理，那就顯而易見，無產階級把資產階級推翻，就算是在消滅階級的方向上實現了最重大的前進步驟，無產階級為要把消滅階級這事業貫徹到底，就應當利用國家政權機關來繼續進行自己的階級鬭爭，同時要對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和動搖不定的小資產階級，採取不相同的鬭爭、影響和逼迫手段。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七日刊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六期

選目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五〇七至五二五頁

列寧：與燃料恐慌作鬥爭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給各地黨組織的通告——

同志們！我黨是無產階級有組織的先鋒隊，負有統一工人階級鬥爭並領導它爭取工農蘇維埃政權勝利的任務。我們兩年來勝利地進行了這種鬥爭，現在便明白知道，我們究竟用什麼方法才克服了由於四年帝國主義戰爭弄得國家破產以及由於俄國和國際一切剝削者羣起抵抗之在我們面前所造成的莫大困難。

同志們！我們力量的主要泉源就是我國工人的自覺性和英勇精神，以及勞動農民對工人所不能不始終表示的同情和擁護。我們各次獲得勝利的理由，是由於我們黨和蘇維埃政權把一切當前困難和當前任務公開宣告於勞動羣衆；善於向羣衆解釋，爲什麼在某個關頭應當致全力於蘇維埃

工作的某一方面；善於鼓舞羣衆底毅力、熱情和英勇精神，而把革命的高度努力集中於當前最主要的任務之上。

同志們！當前這一最主要的任務，就是與燃料恐慌作鬭爭。我們正在肅清高爾察克底殘餘，我們戰勝了尤登尼奇，我們開始了對鄧尼金的順利進攻。我們大大改善了採辦糧食和儲藏糧食的工作。但燃料恐慌有破壞全部蘇維埃工作的危險：工人和職員因飢寒交迫開始棄職離散，運輸糧食的車輛中途停止着，正因為缺乏燃料而使真正的災禍日益逼近起來。

燃料問題成了其他一切問題的中心。無論如何都要把燃料恐慌克服下去，否則糧食任務、軍事任務、全國經濟任務，都無從解決。

燃料恐慌也是有法克服的。因為我們雖然失去了頓巴斯的煤炭，又沒有可能在烏拉爾和西伯利亞迅速增加煤炭開採量，但我們還有許多森林，我們可以砍伐和運來足夠的木柴。

燃料恐慌是有法克服的。現在要善於集中主要力量來對付我們目前主要的敵人，即對付燃料恐慌，要善於引起勞動羣衆的熱情，要善於按革命精神緊張一切毅力來極迅速地大批地開採和運到各種各樣的燃料：煤炭、岩炭和泥煤等等，而首先是木柴、木柴、木柴。

我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相信，所有各地黨組織和全體黨員既在兩年來表現有能力有智慧用革

命手段解決比這一並不輕易而是更加困難得多的任務，現在也定能解決這個任務的。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各地黨組織特別提出下列辦法：〕

(一) 所有黨組織今後應當經常在黨的會議，首先是在黨委會議的議事日程上提出燃料問題以及與燃料恐慌作鬪爭的問題。爲了挽救燃料恐慌，我們還可以做些什麼，應當做些什麼？怎樣加強這種工作？怎樣使這種工作更有成效？——所有一切黨組織現在都要來注視這些問題。

(二) 各省執行委員會、各市執行委員會、各縣執行委員會、各區執行委員會，總而言之，一切蘇維埃領導機關，也都應當這樣做去。黨員應當負起首倡責任，來在全國範圍內加強統一這種工作，並使這一工作緊張起來。

(三) 要到處進行極廣泛的鼓動工作，主要是在鄉村中進行鼓動工作，來解釋燃料問題對於蘇維埃政權的意義。特別要進行鬪爭反對在燃料事宜上專注意地方利益、鄉土利益、狹隘利己傾向。要向大家解釋，不來爲全國需要而進行自我犧牲的工作，便不能挽救蘇維埃共和國，便不能捍衛住工農政權。

(四) 要萬分仔細地檢查黨底指示和蘇維埃政權底委託、要求、指令之實際執行的情形。在最近一次徵收黨員週入黨的新黨員，都應當被吸收來檢查全體人員怎樣執行了自己的義務。

(五) 全體居民義務勞動制，或動員一定年齡的人去採掘和運輸煤炭，砍伐和運輸木柴到各鐵路車站去，這一工作應當以最大的速度和最嚴格的紀律進行起來。必須規訂勞動標準額，並無論如何都要設法完成。對於那些違背再三告誡、要求和命令而逃避工作的人，必須嚴格無情的加以處分。任何寬容態度、任何軟弱態度，都是對革命的犯罪行為。

我們提高了軍隊紀律。我們現在應當提高勞動紀律。

(六) 義務星期六應當多多進行，要更加積極、更有系統、更有組織，並且首先是在燃料工作中去進行。黨員在遵守勞動紀律和努力工作方面應當成爲一切人的模範。人民委員會、國防委員會和其他中央機關以及各地蘇維埃機關關於燃料問題的決議，都應當真心誠意地加以實現。

(七) 應派黨內優秀工作人員去加強各地方燃料機關。幹部的分配，應按照這種目的來加以審查和相當改變。

(八) 從中央派出的同志，應給以一切幫助，達到在組織、佈置和進行燃料工作方面，能培養出——並且要在實踐中培養出——盡量多的青年人材。在地方刊物上要對這種工作予以更大的注意，把真正優良的模範工作很關心地表彰出來，使大眾知道，同時要無情地反對個別區域、個別機關、個別部門的落後懈怠現象或不善於工作的情形。我們的刊物應當成爲推進落後者，教育

人們去執行工作、遵守勞動紀律、從事組織等等的工具。

(九) 保證採掘及運輸燃料人馬的糧食和飼料，應成爲糧務機關最重要的任務，要從各方面來幫助這些機關，加強它們的工作，監督工作的執行。

(一〇) 在一切燃料機關中（以及在一切蘇維埃機關中）要孜孜不倦地力求做到在實際上保證各人親自擔負一定的工作，即嚴格而確切指定了的工作或一部份工作。集體討論的辦法，應當減少到最低限度，無論何時也不要阻礙迅速和果斷決定問題，無論何時也不要停息每個工作人員的責任性。

(一一) 關於一切燃料問題的公文手續，必須特別確切而迅速，稍有遲誤，就應受到無情的懲罰。向中央的報告應當是模範式的報告。

(一二) 一般說來，全部燃料工作應按軍事方式來進行：用戰爭所要求的同樣毅力、速度和最嚴格的紀律來進行。不這樣作，燃料的恐慌便無法克服。不這樣作，燃料的恐慌便無法挽救。

俄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相信全體同志都會緊張全力最積極最確切地來執行這些指示。

爲戰勝燃料危機而鬪爭。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刊載於眞理報第百五十四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五三二至五三三頁

列寧：在農業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第一次 代表大會上的演說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四日——

同志們！我非常高興地代表政府向你們農業公社和農業勞動組合第一次代表大會致敬。你們大家從蘇維埃政權底全部工作中當然都知道，我們非常重視農業公社、勞動組合以及一切力求把細小個體農業轉變為公共協作農業或勞動組合農業，並逐漸促進這個轉變過程的組織。你們知道，蘇維埃政權早已撥出了十萬萬盧布基金來幫助創辦這種事業。在關於社會主義土地整理的條例上特別指出了公社、勞動組合以及一切共耕企業的意義；蘇維埃政權也就用全力來使這個法令不致成爲一紙空文，而能真正收到它所能收到的成效。所有這種企業的意義是非常巨大的，因

爲原來貧困不堪的農民經濟如果仍舊不變，那末任何堅固地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事情也就無從談起。掌握國家政權的工人階級，祇有當它在事實上向農民表明了公共的、集體的、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耕種方法底優越時，祇有當它用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經濟來幫助了農民時，它才能真正向農民證明自己正確有理，才能把數千百萬農民羣衆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堅實可靠地真正吸收到自己方面來。因此，無論哪一種促進共耕制、勞動組合制農業辦法底意義，都不可過分誇大。我國有千百萬分散於各窮鄉僻壤的個體農戶。要想用某種急速辦法，某種命令來從外面、從旁邊去強迫加以改造，那就是完全荒謬的思想。我們明白懂得，要想影響千百萬小農經濟，祇能採取逐漸的謹慎的辦法，祇能用實際模範例子來表明，因爲農民非常講求實際，與舊式農業聯結得非常鞏固，要使他們作某種嚴重的改變，單靠忠告和書本知識是不行的。要是這樣辦，那就既不可能，而且荒謬。祇有在實踐上根據農民切身經驗來證明了必須而且可以過渡到共耕制的、勞動組合制的農業時，我們才可以說，在俄羅斯這樣幅員廣大的農民國家裏，我們在社會主義農業道路上已經有了嚴重的進步。所以這個賦予你們大家以巨大國家義務和社會主義義務的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底巨大意義，自然使得蘇維埃政權及其代表們對這個問題要特別注意和特別謹慎。

在我們關於社會主義土地整理的法令中說過，我們認為所有一切共耕的合作的農業企業絕對不應與附近農民隔離起來，表示特殊化，而是必須幫助他們。在法令中這樣寫着，在公社章程中又這樣重複着，在我們農業人民委員部各指令中也經常發揮這點，而這乃是最主要的事情。但全部問題就在於要找到真正實際辦法，怎樣來實現這點。在這裏我還不能肯定說，我們已經克服了這個主要困難。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你們既是從全俄各地來到的公共農莊實際工作人員，就有可能互相交換經驗，所以我想，代表大會定要掃除一切懷疑，而證明我們是已經通曉着或已開始通曉着這鞏固勞動組合、共耕社、公社以及各種集體、公共農業企業的實際事業。但是要證明這點，就需有真正實際上的成果。

當我們讀到農業公社章程或論述本問題的書籍時，總覺得我們過多注意於宣傳和在理論上論證公社組織底必要。當然，這是必須要做的；若沒有詳細的宣傳，若沒解釋共耕制農業的優越性，若不把這個意思千番百次加以說明，我們便不能指望廣大農民羣衆會對本問題發生興趣，而開始來具體試驗實現它的種種辦法。宣傳當然是必要的，再三重複是用不着害怕的，因為對於我們似乎是重複，而對於成千成萬的農民也許會不是重複，而是他們第一次發現的真理。若認為我們過於注重宣傳，那就應當說，我們還必須加一百倍的這樣做去。但我說這話，祇是想表明這樣

的意思，即如果我們向農民一般解釋農業公社制度的好處，同時卻不會在實際上把共耕社和勞動組合所給予他們的實際益處表明出來，那末農民就不會信任我們的宣傳。

這法令上說，公社、勞動組合、共耕社應當幫助附近的農民。但是國家，工人政權撥出了十萬萬盧布的基金來幫助農業公社和勞動組合。當然，如果某個公社從這基金中拿出一點來幫助農民，那末，恐怕這就祇會引起農民方面的譏笑。而且這種譏笑是完全有根據的。任何一個農民都會說：「既然撥了十萬萬的基金給你們，那你們自然不難從這基金中掏出一點，讓我們也來沾沾光哩」。恐怕農民只會譏笑這種行爲，因為農民對於這個問題非常注意，而且抱着極不肯輕信的態度。農民千百年來從國家政權方面所遇到的祇是壓迫，這點已司空見慣了，所以農民對於凡是官家做出的事情總是不肯輕信。因此，農業公社對農民實行的幫助，如果祇是爲了奉行法令，那末這種幫助不僅無益，而且祇會有害。因爲農業公社是個很響亮的名稱，是與共產主義這個概念有聯繫的。如果公社在實踐上表明自己是真正在進行認真改良農民經濟的工作，那才名符其實，那時就無疑地會提高共產黨員和共產黨底威信。但往往也有這樣的情形，公社祇是激起農民對自己的反感，而「公社」這個名詞有時甚至變成反對共產主義的鬪爭口號。並且這種情形不僅當人們荒謬偷地企圖用強迫手段迫使農民加入公社時，發生出來。這種荒謬舉動如此刺目，

使得蘇維埃政權早已就在反對這種行動。我希望，假如現在還能遇到有採用強力手段的個別例子，那末這種例子是很少的，而你們也就利用本屆代表大會來把這種豈有此理的舉動殘跡從蘇維埃共和國中根本剷除乾淨，使附近農民不能找到半點口實來擁護舊的成見：似乎加入公社，都是與某種強力手段有關。

但即令我們消除了這種舊缺點和完全克服了這種豈有此理的舉動，我們還不過是做了我們所應作的極小的一部份工作。因為由國家幫助公社仍然是必要的，而且假使我們若不極力由國家來幫助各種集體農業，那我們便不是共產主義者，便不是擁護建樹社會主義經濟的人。我們之所以不得不這樣做，也因為這是適合我們全部任務的設施，因為我們知道這些共耕社、勞動組合和集體組織都是新的創舉，如果執政的工人階級不給這些創舉以幫助，那它就不會發育起來。爲了使它真的發育起來，正因為國家根據實情給它以金錢上的及其他各種幫助，我們就要做到使農民不致於來譏笑這種創舉。我們應當經常顧慮到，使農民不會說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的社員是靠官家養活的，說他們與普通農民的區別，祇在於他們受到有官家的優待。如果除了土地外還從十萬萬盧布基金中撥出建築補助費，那末任何一個饑瓜都會比普通農民過着較為優裕的生活了。農公會說：這裏應該得上什麼共產主義，這裏有什麼改良，他們有什麼值得我們敬仰的地方呢？當

然，如果選出幾十個或幾百個人來，給他們幾十萬萬盧布，那他們都是會工作的。

最使我們憂慮的正是農民的這種態度，我很希望參加此次代表大會的同志們，對這個問題特別注意。必須在實踐上適當解決這個問題，使我們能够自信地說，我們不僅免除了這種危險，而且找到了方法來使農民不僅不會這樣着想，反而使他們在每個公社中，在每個勞動組合中，都看到由國家政權幫助的某種事情，並在其中找到，不是從書本上和言論中找到，——這是很容易的，——而是從實際生活中找到表明自己是優於舊式的那種新的農作方法。這便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困難所在，所以如果我們手邊祇有一些枯燥的數目字也就很難判斷，是否我們已實際證明了每個公社、每個勞動組合，都是真正高於所有一切舊時企業的組織，是否證明了工人政權在這裏幫助農民。

我想，爲要實際解決這個問題，最好是由你們這些實際認識當地許多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情形的人，製訂出真正實際的監督辦法，來監督那實成農業公社幫助附近農民的法令之實施；監督怎樣實際過渡到社會主義農業去的辦法，以及這些辦法在每個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中的具體表現何在；究竟這個法令是怎樣實行的，有多少共耕社和公社已在實地執行這個法令，又有多少是僅僅在準備執行這個法令；公社對農民的幫助有過多少次，這種幫助的性質如何，是慈善

性質還是社會主義性質。

如果公社和勞動組合從國家對它們的補助金中分出一部份給農民，那末這祇會使每個農民想到，這不過是一些善人在幫助他，但完全不是證明過渡到社會主義制度的事實。農民對於這樣的「善人」，自古以來就是懷着不肯輕信的心理。要善於檢查這個新社會制度真正表現何在，究竟用什麼方法向農民證明了，採用共耕和勞動組合辦法經營土地，比個體農民獨自耕種的辦法要好些，其所以好些，並不是由於官家幫助；要設法善於向農民證明，沒有官家幫助，這種新制度實際上也是能夠實現的。

可惜我不能在你們的代表大會上出席到底，所以我不能來參加規定這些檢查辦法。但我相信，你們和我們農業人民委員部的領導同志一塊，定能找出這樣辦法來的。我很滿意的讀過了農業人民委員謝略得同志寫的一篇論文，他在這篇論文中，着重指出說公社和共耕社不應當與附近農民隔離，而是要努力改善農民經濟。要把公社經營成爲模範農莊，使附近農民自願效法公社；要善於作出實際例子給它們看：應當怎樣來幫助那些在貨物缺乏和全般經濟破壞的困難條件下經營農務的人們。爲要決定實現這點的實際辦法，就必須製定一個非常詳細的指令，在這個指令中，應當列舉幫助附近農民的各種方式，應當詢問每個公社，究竟它在幫助農民方面做了一些什

變事情，應當指出具體辦法，如何達到使現有的兩千公社和大約四千勞動組合中每一個都能在實際上成爲鞏固農民信念的核心，使農民相信集體農業這種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辦法是有益處的東西，而不是空想，而不是夢囈。

我已經說過，法令責成公社幫助附近農民。要在法令中用另一種方式來表明這種意思，寫出某些實際的指示來，是不可能的。我們本來是要規定出一般的原則，而指望各地有覺悟的同志們會誠意執行這種法令，並善於找到許多辦法，按照各地具體經濟條件來實施這個法令。但是對任何一個法令當然都有法迴避，甚至能夠在外表上假裝實行而來加以迴避。所以關於幫助農民的法令，如果不誠意實行的時候，它可能變成一種真正玩具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結果。

公社所應當發展的方向，就是要使農民在與公社接觸時，能得到物質的幫助，而開始來改變自己的經營條件；要使每個公社、勞動組合或共耕社都善於奠定改良這些條件的基礎，並在實際上加以改良，這樣來實際證明給農民看，這種改變祇會對他們有益處。

你們自然可以想到，人們會說，要改良經濟就要有比現在好一些的條件，而現在的條件，乃是由於四年帝國主義大戰以及帝國主義者強迫我們進行的兩年國內戰爭所造成的經濟破壞。在現時我國這樣的條件下，怎麼還可以想到廣泛推行改良農業的事情，要是能勉勉強強逼下去不致於

餓死，也就算是托天之福。

當然，這樣的懷疑是可以發生的。但如果我遇到了這種反駁意見，那我就要用以下的話來回答。就假令由於經濟解體、經濟破壞、貨物空虛、運輸力薄弱、工具和牲畜已被毀滅，以致真正無法廣泛進行改良農業經濟吧。可是，在許多個別情形下，相當改良農業經濟，還無疑義是可能實現的。就假令連這點也不能辦到，那末，這是否就可以說，公社無法使附近農民生活改變，無法向農民證明出，集體農莊不是人工培植的暖室植物，而是工人政權對勞動農民的新幫助，是協助農民去反對富農的辦法呢？我相信，就假令這樣提出問題，就假令我們在現時經濟破壞條件下無法實行改良，但是如果在公社和勞動組合中有誠意工作的共產黨員，那還是可以做出很多很多成績來的。

爲了不遭空口無憑之譏，我就來舉出我們在城市裏叫做義務星期六的事情來做例子。城市工人在每人工作時間之外再爲社會需要做幾點鐘的某種義務工作，這種辦法就叫做義務星期六。這種義務星期六最初是在莫斯科，由莫斯科、嘉桑鐵路工人倡首實行的。蘇維埃政權有次在號召中指出說，紅軍戰士在前綫上忍受着空前的犧牲，他們雖然經受各種困苦，還能獲得對敵人的空前勝利；同時又說，我們要把這勝利貫徹到底，就必須使這種英勇氣概，這種自我犧牲精神，不祇

表現在前綫上，而且也表現在後方。莫斯科工人就以實行義務星期六來回答了這一號召。毫無疑義，莫斯科工人所經受的艱難困苦要比農民厲害得多，如果你們考查了他們的生活條件，並想一想他們在這樣困苦條件下竟能開始實行義務星期六，那末你們就會同意，決不能藉任何困難條件來拒絕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實現的事情，祇要能運用莫斯科工人所運用過的這種辦法。當義務星期六已經不是單個的現象時，而非黨工人又在實際上看見執政的共產黨黨員担負起這種義務，看見共產黨徵收新黨員並不是使他們利用政府黨的地位來獲得利益，而是使他們做出真正共產主義勞動的模範，即做出無報酬工作的模範，——正是這樣的義務星期六最能幫助提高共產黨在城市中的威信，最能幫助增強非黨工人對共產黨員的敬仰。共產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底最高階段，那時人們從事勞動，都是由於覺悟到必須為共同利益而工作。我們知道，現在我們還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勞動制，——希望我們的先輩，也許孫輩能够把這種制度建成起來也就算好了。但是我們說，執政的共產黨黨員也挺身担負着在與資本主義鬭爭中的大多數困難，既動員優秀的共產黨員上前綫，而對於那些不能上前綫的黨員，就要求他們執行義務星期六的工作。

這種義務星期六現時已在每個大工業城市中推行起來，現在黨要求每個黨員都參加這種工作，對於不執行這種要求的黨員，甚至予以開除黨籍的處分；如果你們把這種義務星期六的辦法

也在公社中、勞動組合中和共耕社中實行起來，那就甚至在最壞的條件下，你們都能够而且應當達到如下的成果，即使農民認識每個公社、每個勞動組合、每個共耕社的特點不在於它領得官家的補助金，而在於這些組織中都有工人階級的優秀份子參加，他們不僅向別人宣傳社會主義原則，而且善於親身實行這種原則，表明甚至在惡劣條件下，他們都能够用共產主義方法來經營農業，並盡量幫助附近農民。對於這一點是不能用任何遁詞來推卸的，這裏決不能藉口說貨物空虛、種子缺乏或牲畜病死等等。在這裏我們得以實際檢查，這種檢查至少使我們能於精確判斷，究竟我們把擺在自己面前的困難任務實際執行到了何種程度。

我相信，這次公社、共耕社和勞動組合全體代表會議上會把這個問題加以討論，並將懂得採用這種辦法便會真正成爲鞏固公社和共耕社的極好手段，而且能達到實際成果，使俄國每個地方都不會發生任何農民對公社、勞動組合和共耕社表示敵意的事情。但不僅如此，還要做到使農民對它們表示同感。我們，蘇維埃政權的代表自己要盡力來幫助這一點，使我們國家從十萬萬盧布基金中或其他來源中撥出的補助金，僅僅在勞動公社和勞動組合能與附近農民生活實際接近起來的時候，才來動用。沒有這種條件，則任何對公社和共耕社的幫助，我們都認爲不僅沒有益處，而且是絕對有害的。不能把公社對附近農民的幫助當作祇是由於富裕有餘，而是要使這種幫助成

爲社會主義性的幫助，即是造成使農民能從單獨、個體經濟過渡到共耕農莊的條件。而要做到這點，也就祇有用我在這裏說過的義務星期六辦法才行。

如果你們估計到那些比農民生活壞得無可計量，而却首先開始了義務星期六運動的城市工人底經驗，那末我深信，在你們全體一致贊助之下，我們定會達到使現存的幾千個公社和勞動組合中，每一個都能成爲在農民中傳播共產主義思想和概念的真正苗圃，成爲實際上的先例來向農民表明出，雖然它們還是嫩弱的幼芽，但畢竟不是用人工造成，不是暖室中培植出來，而是社會主義新制度的真正幼芽。祇有那時，我們才能鞏固地戰勝舊的黑暗勢力，才能戰勝破產和貧困現象，祇有那時，我們才不會害怕橫梗在我們前途上的任何困難。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五日和六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二百七十三和二百七十四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四卷，第五七七九至五八六頁

列寧：論義務星期六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俄共

莫斯科全市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同志們，如同代表會議底召集人所通知我的，你們指定了一個關於星期六勞動問題的報告，而且把它分爲兩個部份，以便有可能詳細地討論這個問題中最主要的東西：第一，莫斯科星期六勞動底組織及其成績；第二，對於進一步組織星期六勞動的實際結論。我想僅僅限於一般命題，僅僅限於把星期六勞動的組織看作我們黨的建設和蘇維埃建設中的新現象而引起的那些思想。因此，關於實際的方面，我祇是極簡要地講一下。

當共產主義星期六勞動最初組織起來的時候，還難以判斷這種現象有多少值得注意之處和能否從中生長出某種重大的東西。記得關於星期六勞動的頭一個消息發表在黨報上的時候，接

近職工建設工作和勞動人民委員部的同志們，他們底反響開始都是非常謹慎，以免說出悲觀的話。他們以爲，給與這些星期六勞動以巨大的意義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自此以後，星期六勞動竟開展得如此廣泛，以致它們在我們建設中的重要性爲任何人所不能爭辯了。

在實際上，我們常常使用『共產主義』一詞，竟到了這種程度，甚至把它包含在我們黨底名稱中。然而仔細思考一下這一問題，就會想到，它會產生好處，同時對我們也會造成若干危險。盡可能嚴格地把我們同第二國際底佔統治的社會主義分清界限的願望，乃是迫使我們改變黨底名稱的主要原因。自絕大多數的官方的社會黨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以其領袖爲代表，投到本國資產階級或『自己的』政府方面以後，舊社會主義底最大的危機、破產，對於我們就成爲最明顯不過的事了。爲了最激烈地着重說明，那些在帝國主義戰爭時期跟着『自己的』政府走的人，我們不能認爲他們是社會主義者；爲了表明舊的社會主義已經腐朽了、死亡了，主要地爲了這，就提出了改變我們黨底名稱的意見。況且，從純粹理論的觀點看來，『社會民主』這個名稱早已不是正確的了。還在十九世紀四十年代，當它在法國最初成爲廣泛的政治上的用語時，它是專歸小資產階級社會改良主義底黨用的，而不是歸革命的無產階級底黨用的。這樣，同舊的社會主義堅決分清界限的願望，就成了改變黨底名稱而叫做新的國際的主要的鼓舞者、推動者。

——如果我們反問自己：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別何在？那末我們應當說：社會主義乃是一種由資本主義直接成長起來的社會，是新社會底頭一個形態，共產主義則是社會底更高形態，而且祇有在社會主義完全鞏固了的時候，它才能發展起來。社會主義是以沒有資本家幫助的工作為前提，社會的勞動是處在有組織的先鋒隊、勞動者底先進部份之最嚴格的計算、監督、管理之下；而且，還必須規定勞動底度和勞動報酬。這個規定之所以必要，乃是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些遺跡和習慣，如分散的勞動、對於公共經營的不信任、小業主底陳舊習慣，而這些在一切農業國度裏是佔統治地位的。凡此都是和真正共產主義的經濟背道而馳的。我們稱為共產主義的則是這樣一種制度，在這個時候，人們習慣於執行社會的義務，而無需乎特別的強制機關了，在這個時候，對於公共福利的沒有報酬的勞動就成為普遍的現象了。不言而喻，從那些爲了完全戰勝資本主義而才走了開頭幾步的人們之觀點看來，「共產主義」底概念是很遙遠的。因此，不論我們黨底名稱之改變是如何正確，不論它帶來的利益是如何巨大，不論所作過的規模巨大的工作是如何重大，——因爲共產黨現在已經在全世界上存在着，雖然從共產國際底成立①起

① 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於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六月，舉行於莫斯科。

還不到一年，然而從工人運動底觀點看來，共產國際却比垂死的舊的第二國際要無比地強大些，——但是如果把『共產黨』底名稱解釋成這樣，好像目前正在實行着共產主義制度，那末，這就是莫大的曲解和實際的危害，而這種危害就是最空洞的吹牛主義。

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共產主義的』一詞要求對它要有很審慎的態度，也就是因為這個原故，所以開始見之於實際中的共產主義星期六勞動，獲得了特別的價值，因為祇有在這一非常細小的現象中才開始表現了一種共產主義的東西。從對地主和資本家底剝奪中，我們祇是獲得了建設最原始形式的社會主義之可能性，其中還沒有絲毫共產主義的東西。如果我們以我們現時的經濟爲例，那末我們從中僅能看到社會主義底還很微弱的萌芽和舊的經濟形式之巨大統治，這種統治或者表現於小生產底佔優勢，或者表現於最粗野的、不易制止的投機生意。當我們的敵人：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反駁我們說：你們粉碎了大資本主義，而代替它的在你們那裏却從一切漏洞中湧出來了最壞的從事投機事業的、高利貸的資本主義時，那末我們關於這一點回答他們道：如果你們想像：我們能够從大資本主義直接轉到共產主義，那末你們就不是革命家，而是改良主義者或空想家。

大資本主義到處根本被搖動了，甚至在那些還絲毫沒有向社會主義開步走的國度裏，從這個

觀點看來，我們的敵人對我們提出的這一切批評，這一切反駁，都是完全不值一駁的。當然，在粉碎大資本主義之後，就開始出現了新的、小的、投機性的資本主義嫩芽來代替它。我們正在同大資本主義底殘餘作激烈的鬭爭，這種大資本主義投入每一種小的投機事業中，在這裏更難以抓住它，在這裏它獲得了最惡劣的、最無組織的貿易形式。

鬭爭在戰爭環境中更加激烈了，這一鬭爭，起了投機之最狂暴的表現，特別是在資本主義更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地方，設想另外一種革命的轉變，那是完全錯誤的。從目前經濟底觀點看來，情形就是如此。如果我們提出蘇維埃俄國底現代經濟制度是什麼的問題，那我們應當說：它是社會主義在大生產中的基礎之奠立，是對舊資本主義經濟底改造，雖然有資本主義之表現於千百萬形式的極端頑強的抵抗。有些西歐的國家，擺脫戰爭所遭受損害的程度，是同我國一樣的，例如奧國，它們不同於我們的，祇是在那裏，資本主義底這種解體、這種投機性，以更大的力量顯現出來，社會主義建設底萌芽，那抵抗資本主義的東西在那裏則是沒有的。然而共產主義的東西現在在我們的經濟制度中也還是沒有的。『共產主義的』東西，祇有在星期六勞動，即：個別人爲着社會的利益而在廣大的範圍內所進行的沒有報酬的、不是經任何政權、任何國家所規定的勞動出現的時候，才開始的。這不是農村裏常常存在的對於鄰人的幫助，而是一種爲着全國的需要

而進行的、大規模組織起來的和沒有報酬的勞動。因此，如果把「共產主義的」一詞不僅應用於黨底名稱，而且獨特地應用於我們生活中真正實行「共產主義的」那些經濟現象，那是更加正確的。如果俄國目前制度中有什麼共產主義的東西的話，那末這祇是星期六勞動而已，其餘的則祇是爲鞏固社會主義而反對資本主義的鬭爭，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之後，從它當中就一定會長出共產主義，就一定會長出那我們不是從書本上、而是從活生生的現實上、從星期六勞動上所看到的共產主義。

這就是星期六勞動原則上的意義。星期六勞動表明，在這裏正在創造着並開始產生着一種以爲整個國家底需要而廣泛組織起來的無酬勞動爲形式的嶄新的東西，這種新東西是同舊資本主義的一切規則相背而行的，它是一種比戰勝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社會更高級的東西。因此，當今年黨中央號召幫助全國之後，莫斯科、嘉桑鐵路底鐵路工人——他們生活在極端飢餓和極端匱乏的條件下——首先起來響應時，當共產主義星期六勞動不復是個別現象而開始普及起來並博得羣衆同情的這種標誌出現的時候——就可以說，這裏已是一種有着巨大重要性的、原則性的現象了；我們確實應當給與它以各方面的援助，如果我們不僅在原則的意義上、不僅從反對資本主義的觀點上願意做一個共產主義者的話。從社會主義社會底實際建設之觀點看來，這還是不夠的。

必須說：這一運動實際上可以羣衆性的規模實行的。我們是否證明了這一點，我且不來回答，因為我們對於稱之爲共產主義星期六勞動的這一運動之規模，還沒有作一般的總結。我祇有些片斷的報告，並在黨報上讀到：這些星期六勞動在許多城市裏獲得了日益巨大的發展。彼得格拉的同志們說：彼得格拉的星期六勞動比莫斯科的要廣泛得不可比擬。至於各省，許多實際上熟悉這些運動的同志告訴我：他們正在收集關於這一新的社會勞動形式的大量材料。祇有在報紙刊物上和各個城市黨的代表會議上多次討論了這一問題之後，我們才能獲得總結性的材料，根據這些材料，我們才能够說，星期六勞動是否真正成了羣衆性的現象，我們在這個領域內是否真正達到了重大的成功。

我們是否很快地或者還不會很快地得到這種完全而可靠的材料，但無論如何，對於我們毫無疑義的。從原則的觀點看來，那可以指出我們不僅稱做共產主義者和不僅願意做一個共產主義者，而且在實際上正在實行着共產主義的——不獨是社會主義的——東西之現象，除了星期六勞動以外，再沒有別的了。因此，每一個共產主義者，每一個願意忠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人，都應當把自己的一切力量，把自己的一切注意朝向於幫助這一現象之說明及其實際的應用。星期六勞動底原則上的意義，就是如此。因此，在每一個黨的代表會議上，應不倦地提出這個問題，並從理

論方面和實際方面討論它。我們不應當把這一現象僅限於理論的、原則的方面。共產主義星期六勞動，不僅因為它們在實際上實行着共產主義，對於我們有巨大的價值。此外，星期六勞動對於我們還有兩重的意義：從國家的觀點看來，它們是對於國家的純粹實際的幫助；而從黨的觀點看來，對於我們黨員不應忽略的，這就是它們對於清除混入黨內的份子，對於消除黨在解體着的資本主義之環境中所經歷的影響所具有的意義。

列寧·論勞動紀律

——一九二〇年初——

爲什麼我們竟戰勝了獲得有全世界資本家幫助的尤登尼奇、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呢？

爲什麼我們堅信我們現在定能戰勝經濟破壞，定能恢復工業和農業呢？

我們之所以戰勝了地主資本家，是因爲紅軍兵士和工農都知道，他們是爲自己的切身事業而奮鬥。

我們之所以戰勝了，是因爲整個工人階級和全體農民中的優秀人物都在這次反剝削者的戰爭中表現了空前的英勇精神，建樹了神勇奇蹟，忍受了空前的困苦，甘願自我犧牲，無情地排除了一切自私自利和貪生怕死的份子。

現在我們之所以相信我們定能戰勝經濟破壞，是因爲整個工人階級和全體農民中的優秀人物

都用同樣堅定的意志，同樣英勇的精神，並同樣自覺地起來奮鬥。

當千百萬勞動者團結得像一個人一樣，跟隨本階級的優秀人物前進，那時勝利也就會有了保證。

從軍隊中驅逐了自私自利之輩。我們大家現在都要高呼：

「打倒自私自利份子，打倒那些專圖私利和投機，專想逃避工作的份子，打倒那些害怕爲了勝利而忍受必要犧牲的份子！」

勞動紀律萬歲，熱心工作，盡忠於工農事業吧！

走在紅軍前列而犧牲的戰士永遠光榮！

現在引導千百萬勞動者以最大熱情在勞動軍前列中行進的人們永遠光榮！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刊載於真理報第十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三十卷，第四〇二頁

列寧：從破壞歷來的舊制度到創造新制度

——一九二〇年四月八日——

我們這個報紙是專論共產主義勞動問題的報紙。

這是社會主義建設中最重要問題。首先就要好好懂清楚，祇有在無產階級奪得政權之後，祇有在剝奪了地主和資本家之後，祇有在爭得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對那些組織拚命反抗、組織反革命暴動和國內戰爭的剝削者獲得了決定勝利之後，才能實際上提出這個問題來。

這個時光，一九一八年初，好像業已來到——而在德帝國主義二月（一九一八年）向俄國開始武裝進攻之後，果然來到了。當時，這一時光竟出現得這麼短促；新的、更強有力的反革命暴動與侵略的浪潮竟襲來得這麼急速，使我們蘇維埃政權方面簡直沒有可能來多少聚神地、頑強地從事從事和平建設。

現在我們業已經歷過兩年飢餓、窮困、貧乏這空前未聞與不可思議的困難，同時這兩年又是紅軍對國際資本主義反動寇羣獲得了空前未有的勝利。

現在已經有了真正的機會來指望到（如果法國資本家不把皮蘭誘入戰爭），我們將取得比較穩固，比較長期的和平。

兩年來我們已經有了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實行建設的某些經驗。所以關於共產主義勞動問題，可以而且應當嚴重提出，——更正確些，就得這樣說：不是共產主義勞動，而是社會主義勞動，因為這裏不是指從資本主義中成長出來的新社會制度發展底高級階段而言，而是指它的低級階段，即初級階段而言。

共產主義勞動一語，若是比較狹義地、嚴格地說來，乃是有利於社會的無償勞動，這種勞動，不是爲了履行一定的義務，不是爲了獲得領取某種物品的權利，不是按照事先規定的法定標準額，而是自願的勞動，超過定額的勞動，不打算領到報償的勞動，沒有報償條件的勞動，而是爲了公共利益按習慣來操作的勞動，而是按必須爲公共利益操作的這種自覺態度（已成爲習慣）來勞動的勞動，——是爲了健全身體所自然需要的勞動。

大家都明白，我們，即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社會結構隔那廣泛地、真正普遍地運用這種勞動

的距離，還非常遙遠。

但是，這個問題已經提出來了，已由全體先進無產階級（共產黨和職工會）及國家政權提起出來，這已經是按這條道路走去的一個前進步驟。

要向大的目標走去，就得從小的目標開始。

然而另一方面，既有了『大的』變革，有了這會推翻資本家所有制而將政權轉交到無產階級的國家變革之後，而在新基礎上來建設經濟生活，就祇能從小的開始。

義務星期六、勞動軍、勞動義務制——這就是社會主義勞動與共產主義勞動在不同形式上的具體實現。

在實現這種勞動中，還有許許多多的缺點。用譏笑（或忿怒）態度來對待這些缺點，祇有完全不善於思索的人才做得出來，更不待說那些資本主義的捍衛者了。

在這樣嶄新、這樣困難、這樣偉大的事業中，缺點、謬誤和失錯的地方是決不可避免的。誰若是害怕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誰若是對這些困難表示畏縮、灰心絕望或倉皇失措，那他就不是社會主義者。

創立新的勞動紀律，創立人與人之間新的社會聯繫形式，創立吸引羣衆從事勞動的新形式和

新方法，——這需要有多年的，幾十年的工作。

這是最能收效和最高尚不過的工作。

幸而，我們在推翻了資產階級，壓倒了資產階級底反抗之後，我們已能爭得了使這種工作成爲可能的這一基地。

所以我們也就用全副精力來担負起這一工作。堅韌、堅定、決心、果斷，善於千百次來嘗試和千百次來加以改正，無論如何非達到目的不可，——這種品質，是無產階級在十月革命之前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內就鍛鍊起來的，而它在十月革命之後這兩年期間，雖忍受空前未有的窮困、飢餓、破產、貧乏的苦痛，又繼續鍛鍊過了。無產階級底這些品質也就是無產階級一定勝利的保證。

一九二〇年四月十一日刊載於共產主義雜誌星期六報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一四八至一五二頁

列寧：土地問題提綱初稿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日爲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

(一) 祇有由共產黨領導的城市的和工業的無產階級，才能使農村勞動羣衆解脫資本和大地主土地佔有制底壓迫，免除破壞的災亂，免除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必然一再發生的帝國主義戰爭底浩劫。除非與共產主義無產階級結成聯盟，並奮不顧身地來援助它爲推翻地主（大土地佔有者）與資產階級所進行的革命鬭爭，農村勞動羣衆則別無自救的辦法。

另一方面，如果工業工人將以狹隘行會利益和狹隘職業利益固步自封，並自滿自足地祇關心到改善自己有時是小康的生活狀況，那他們也就不能執行其使人類解脫資本壓迫和免除戰爭災禍這一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使命。

在許多有『工人貴族』的先進國家內，情形正是如此，這班工人貴族乃是第二國際中所謂社

會主義政黨底基礎，而其實他們是社會主義底死敵，是社會主義底叛徒，是市儈沙文主義者，是工人運動內部資產階級底代辦。無產階級要成爲真正革命的階級，成爲真正按社會主義精神來行動的階級，就祇有在自己的一舉一動上都以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底先鋒隊資格，以其在推翻剝削者所進行的鬭爭中的領袖資格來出現；但如果不把階級鬭爭引進到鄉村中去，不把農村勞動羣衆聯合到城市無產階級底共產黨周圍，不由城市無產階級來教育農村勞動羣衆，那末這個任務是不能完成的。

(二) 城市無產階級所應當引導來參加鬭爭或至少也要吸收到自己方面的農村被剝削勞動羣衆，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可以分爲以下幾個階級：

第一是農業無產階級或僱傭工人（年工、季工、短工），這是靠在資本主義農場中出賣勞動力爲生的人。把他們與農村居民的其他集團分開，成立這個階級的單獨組織（政治的、軍事的、工會的、合作社的、文化教育等等的組織），加緊在他們中間進行宣傳鼓動工作，吸引他們到蘇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方面來，這是各國共產黨的基本任務。

第二是半無產者或最小農，這是一部份靠在資本主義農業和工業內出賣勞動力，一部份靠在僅能少許自給的小塊私有土地或租來土地上勞作爲生的農民。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農村勞動

居民中這一集團的人數是很多的，但資產階級底代表們以及屬於第二國際的黃色「社會主義者」，往往蒙蔽這一農民集團的存在以及他們的特別狀況，部份的是爲了自覺地欺騙工人，部份的是由於盲目地爲種種庸俗因循觀念所蠱惑，竟把這個集團與一般普通「農民」混爲一談。資產階級愚弄工人的這種方法，在德國和法國表現得最明顯，其次就是在美國及其他國家，如果共產黨的工作路線正確，則這一農民集團乃是共產黨的極可靠的擁護者，因爲這種半無產者的生活艱難，他們從蘇維埃政權與無產階級專政方面能够立刻獲得極大的利益。

第三是小農，他們擁有私有的或租來的小塊土地，足以養活家口及供農莊的需用，並不要僱他人的勞動力。這一階層無條件地能從無產階級勝利方面得到好處，因爲無產階級勝利後能立刻地、完全地給他們以下列利益：（甲）免向大地主繳納租金或現糧（例如法國的 *metayers* 租糧，意大利和其他國家也是如此）；（乙）免付典押金；（丙）解脫大地主方面多種形式的壓迫及其對大地主的依賴（在使用森林方面等等）；（丁）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立刻幫助他們的經濟（可以使用無產階級所剝奪來的資本主義大農莊的農具和部份建築物，由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立刻把原先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主要是替富農與中農服務的這類組織，如農村合作社和共耕社，變成爲首先幫助貧民，即幫助無產者、半無產者和小農等的組織），以及其他許多利益等等。

同時共產黨應當明白瞭解，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即無產階級專政時期，在這個階層中，不免或至少有一部份人會動搖到求得絕對自由貿易和自由使用私有制權利那方面去，因為這一階層，既在出賣消費品（雖則範圍不大），也就是被投機業和私有制積習所腐化了的。但在堅強的無產階級政策下，在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充分堅決懲治大地主與大農的條件下，這一階層的動搖不會是很大的，並且這種動搖性不能改變一般和整個說來這階層將站在無產階級革命方面來的事實。

(三) 以上所述農村居民底三個集團總計起來，就組成爲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農村人口的大多數。所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成功不僅在都市內，而且在鄉村中都有了充分的保障。與這相反的意見却流行得很廣，但第一，這種意見祇是由於資產階級科學與統計材料之有系統地進行欺騙，極力蒙蔽上述農村各階級與地主資本家剝削者之間，即一方面是半無產者和小農，另一方面是大農之間的深刻分裂現象；第二，這種意見是由於黃色第二國際英雄以及各先進國內被帝國主義特權所腐化了的「工人貴族」，不善於與不願意在貧農中進行真正無產階級的革命宣傳、鼓動和組織工作；機會主義者底全部注意力無論過去或現在都集中在怎樣去同資產階級，其中也有大農與中農（關於他們的情形可參閱下文）作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妥協，而毫不注意到由無產階級舉行革命來

推翻資產階級政府與資產階級；第三，這種意見是由於根深蒂固的成見（與一切資產階級民主制偏見及國會制偏見結連着的），以致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所充分證明及俄國無產階級革命經驗所完全證實了的真理表示一竅不通，這個真理是說：以上所述這空前備遭抑壓，零散凋弊，而在一切最先進國家中是必然要度着半野蠻生活的三種農民，雖在經濟上、社會上和文化上對於社會主義勝利都繞有興趣，但祇有在無產階級爭得政權之後，祇有在無產階級堅決懲治大地主與資本家之後，祇有在這些備受壓迫的人從實踐上看出他們具備了這種有組織的，充分雄強堅實的領袖和保護者能來幫助和領導他們，向他們指出正確道路的事實之後，他們才能堅決不移地贊助革命的無產階級。

（四）所謂「中農」，這在經濟意義上應瞭解為小的農作者，他們第一，按私有權或租佃權也擁有多餘的土地，但這塊土地上的收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畢竟照例不僅供養活家口與農莊上的粗樸用度，並且可能有某種剩餘，這種剩餘至少在好年份內可以變為資本，第二，往往（例如兩三家農戶中便有一家農戶）可以僱傭他人的勞動力。在德國，各擁有五至十海克脫土地的農戶集團，可作為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內中農的具體例子，據一九〇七年的統計，這集團中僱有農業工人的農戶數約佔該集團全農戶數的三分之一^①。在法國，因為例如葡萄這類需要有更多更多勞

動花費到土地上去的特別農作物更加發達，大概這個集團內使用僱傭勞動力的範圍，還要廣泛。

革命的無產階級，至少在最近將來以及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初期，不能把吸引這個階層到自己方面這點作為自己的任務，而應當祇限於中立中農，即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鬭爭中，使中農中立起來。這個階層之動搖於兩個勢力之間是必不可免的，而且在新時代底初期，在各個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這個階層的主要趨向，將是贊成資產階級的，因為這裏是私有者底世界觀和情緒佔優勢；直接的趣旨是樂於投機買賣，樂於貿易與私有制底『自由』；與僱傭工人的對抗是公開發展的。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消滅地租與典押金，將直接改善這個階層的生活狀況，在多數資本主

① 確切數字如下：各種有五至十海克脫土地的農戶數為六十五萬二千七百九十八（總農戶數為五百七十三萬六千零八十二）；內中各種僱傭工人數為四十八萬七千七百零四，家庭的工作者（*Familienangehörige*）為二萬零三千六百三十三人。在奧地利，據一九一〇年的統計，這一集團的農戶數為三十八萬三千三百三十一，內中有十二萬六千一百三十六戶是使用僱傭勞動的；僱傭工人數為十四萬六千零四十四，家庭的工作者為一百二十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九人。奧地利的總農戶數為二百八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九。

義國家內，無產階級政權決不應該立刻完全取消私有制，並且無論如何都要保證小農與中農；不僅保留他們的土地，而且要把這土地面積擴大到他們平素租來的全土地面積（廢除地租）。

把這種辦法與無情地去反對資產階級的鬭爭結合起來，就可以完全保證中立政策的成功。無產階級國家政權祇有在極端謹慎，按步就班，藉實例之助，不對中農施用任何強力的條件下，才能施行過渡到集體農業的步驟。

（五）大農（“Grossbauern”）是農業中的資本主義企業主，照例在經營業務中都僱有幾個僱傭工人，他們之所以與『農民』有關，祇是因為文化水準不高，生活常規相同，在自己農莊內親身參加勞動。這是資產階級內，即革命無產階級底直接和堅決敵人內為數最多的一個階層。共產黨在全部農村工作中，應該注意到同這一階層作鬭爭，要把農村居民中佔大多數的勞動者和被剝削者從這些剝削者底思想和政治影響下解脫出來等等。

當城市無產階級勝利之後，這個階層方面的一切反抗形式，怠工和直接反革命的武裝發動，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所以革命無產階級應當立刻開始從思想上和組織上來準備必需的力量，以便徹底解除這個階層的武裝，除了推翻工業中的資本家以外，同時還要乘這階層底反抗初一變頭的時候，便給它以最堅決最無情的殲滅打擊，爲了這點，就得武裝農村無產階級，並在鄉村中組織

蘇維埃，其中決不能有一個剝削者，而且必須保證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在裏面佔着優勢地位。

但是，甚至剝奪大農都無論如何不能成爲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底直接任務，因爲還沒有相當的物質條件和技術條件，也沒有社會條件來把這樣的農莊公有化，在個別的，大概是例外的情況下，要將他們土地中零散出租的部份或爲附近小農所特別需要的那部份加以沒收；此外還要保證小農在某種條件下，無代價地來使用大農底一部份農業機器等等。一般說來，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應當保全大農自己的土地，祇有在他們反抗勞動者和被剝削者政權的情形下，才實行沒收這些土地。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其中反大農的鬭爭由於許多特殊條件會顯現得複雜而又遷延）底經驗終究表明出，這一階層因極小的抵抗企圖而受到了很好的教訓之後，也能於恭順地執行無產階級國家所給予的任務，並甚至開始來尊重——雖則非常緩慢，——這捍衛一切勞動者和無情對待寄生蟲富人的政權。

在俄國，當戰勝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進行反大農的鬭爭時，使這一鬭爭陷於複雜遲緩的那些特殊條件，主要是俄國革命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曆十一月七日）變革之後，經歷過全體農民反對地主的這「一般民主」的，即其基礎是資產階級民主的鬭爭階段；其次是城市無產階級文化上和數量上的薄弱；末了便是區域遼闊以及交通極爲不便。既然在各先進國家中沒有這

些阻滯條件，所以歐美無產階級應當更積極地準備着並更迅速、更堅決、更順利地貫徹鎮壓大農反抗的完全勝利，奪去他們可以進行反抗的任何可能，這是萬分必要的，因為在尚未達到這種十二分完備的勝利之前，鄉村中的無產者、半無產者和小農不能相信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已是充分穩固了的。

(六) 革命無產階級應當立刻和無條件地沒收地主與大農業主底土地，這在資本主義國家內就是那些直接或經過自己的業戶來有系統地剝削僱傭勞動力和四周小農（一部份也往往剝削中農）的人，他們不參加任何體力勞動，他們大半是屬於封建主（如俄國、德國、匈牙利的貴族，法國復辟了的領主，英國的貴族，美國先前的奴隸主）底後裔，或屬於特別豪富的財閥，或屬於這兩類剝削者和寄生蟲底混合種。

在共產黨隊伍中，決不容許宣傳或實行報償那些被剝奪了的大地主的土地，因為在現代歐美各國條件下，這樣就是背叛社會主義，就是對被剝削勞動羣衆施行新的貢稅，因為戰爭大大增加了百萬富翁的數量，使他們發了大財，而勞動羣衆所受的戰禍則最爲深切。

至於說到在勝利了的無產階級所沒收來的大地主土地上之經營方式問題，那末在俄國，因為它經濟落後，主要是由農民來分受這些土地，祇有在相當稀罕的例外，才保留過所謂「蘇維埃農

莊」，這些農莊由無產階級國家自力經營，並把那裏以前的僱傭工人變為執行國家委託的工作員和管理國家的蘇維埃委員，對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說來，共產國際承認在大多數情況下保留大農業企業，並做俄國「蘇維埃農莊」的型式來經營這種企業，乃是正確的新辦法。

但如果誇大或死板執行這一例規，而絕對不容許把從剝削者那裏剝奪來的一部份土地無代價地分給附近的小農，有時也分給中農，那就大錯特錯了。

第一，人們常常藉口大農業在技術上佔優勢這一無可爭辯的真理來反對分配大田產，實際上不過是最惡劣的機會主義和背叛革命的主張。無產階級爲了這一革命底勝利，決不要害怕生產暫時降低的現象，猶之北美奴隸制底敵人資產階級未曾因一八六三至一八六五年內戰結果所引起的棉花生產一時低落而裹足不前一樣。對資產者說來，重要的是爲生產而生產，對無產者和被剝削民衆說來，最重要的是推翻剝削者，是保證勞動者確有爲自己工作而非爲資本家工作的條件。無產階級底首要與基本任務，便是保證無產階級之勝利及其穩固性。而如果不中立中農，如果沒有若非全體小農，至少也是極大部份小農底贊助，則無產階級政權便不能穩固。

第二，不僅提高農業中的大生產，甚至是保留農業中的大生產，都必須首先有充分開通的，富有革命覺悟，並在職業上、政治上真正受過有組織鍛鍊的農業無產者。凡是在還沒有具備這種

條件或者還沒有可能把這一事業適當地委託給覺悟而又純達的工人的地方，如果企圖把大農莊急速轉交國家經營，這種辦法祇能破壞無產階級政權底威信，那裏在建立「蘇維埃農莊」時，必須萬分小心，必須有最縝密的準備工作。

第三，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內，甚至在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還保留有大土地佔有者對附近小農所施行的中世紀式、半勞役式的剝削制殘餘，例如德國的 Intencts，法國的 metayers，美國的半成農（在美國南部，黑奴多半是受着這樣的剝削，但有時白種人也受這種剝削）。際此情況下，無產階級國家必須把小農所承租的土地，無代價地交給原來這些佃戶使用，因為此外沒有別的經濟技術基礎，並且也不能一下子建立起這種基礎。

大農莊的農具，應實行沒收，轉為國家的公有物，但必須使國營大農莊有了這些農具的保證，而附近小農在遵守無產階級國家所製訂的條件下可以無代價地來使用這種農具。

在無產階級革命後初期，不僅絕對必須立刻沒收大土地主底田產，而且絕對必須把他們這些反革命頭目和殘酷壓迫農民的人一律驅逐或加以拘禁；依無產階級政權不僅在城市而且在鄉村鞏固的程度，就必須有系統地努力做到，使這階級中擁有寶貴經驗、知識和組織才能的現有一切人力，都能利用來（由最可靠的工人共產黨員特別監督）建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農業。

(七) 祇有當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最終壓倒了剝削者底一切反抗，保證了自己地位完全鞏固及政令能充分施行，而在大集體生產與最新（基於全部經濟電氣化）技術基礎上改組着全部工業的時候，則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勝利以及社會主義底鞏固才可以說是有保證。祇有這樣才會使城市能給落後的鄉村以急進的技術幫助和社會幫助，藉此建立大大提高耕作中和一般農業中勞動生產率的物質基礎，根據實際例子，並且是爲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而來喚醒小農過渡到大規模的、集體的、使用機器耕種的農業上去。這一爲全體社會主義者在口頭上所公認而無可爭辯的理論真理，却在實際上被那統治着黃色第二國際的以及德國和英國「獨立黨人」、法國龍格派等等領袖們的機會主義所曲解。這種曲解就在於他們把注意力移轉到比較遙遠的、美妙的將來，而忽視了這種困難的具體過渡階段和進到這一將來去的最近任務。在實踐中這無非是鼓吹與資產階級妥協，鼓吹「社會和平」，即完全背叛無產階級，而這無產階級現時正在因戰爭所造成的到處空前破產貧困的條件下，正在因戰爭所引起的一小羣富豪空前發財與卑鄙無恥的條件下奮鬥着。

爲使農村中爭取實現社會主義的鬭爭真正能收到成效，第一，就要各國共產黨都能這樣教育工業無產階級，使他們自覺瞭解到推翻資產階級與鞏固無產階級政權便必須忍受犧牲，並具有承

担此種犧牲的決心，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也就是無產階級善於組織並引導全體勞動者和被剝削羣衆，同時它這個先鋒隊有着爲了達到這一目的而去表現最大犧牲精神與英勇氣概的本領；第二，就要農村中的勞動者和最受剝削的羣衆能從工人勝利方面，在損害剝削者利益的條件下，得以立刻並大大改善本身生活地位，因爲不如此，就不能保障農村來贊助工業無產階級，特別是工業無產階級就無從找到糧食來供給各城市。

(八) 因爲在資本主義把農業中勞動羣衆陷入異常凄苦，零星散漫，往往是受着半世紀制束縛等條件下，組織與教育這些勞動羣衆去參加革命鬪爭一事具有極大的困難，所以各國共產黨必須特別注意農村中的罷工鬪爭，並加緊援助和從各方面去開展農業無產者及半無產者底羣衆罷工運動。由現在德國和其他先進國經驗所證實與擴大了的俄國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底經驗，表明祇有日益開展着的羣衆罷工鬪爭（在某種條件下，農村中的小農也能夠而且應當被吸引到這鬪爭中來）才能打破鄉村內的沉眠狀態，才能喚醒鄉村被剝削羣衆底階級覺悟以及必須有階級組織的覺悟，才能在他們面前明顯地實際地暴露出他們與城市工人聯盟的意義。

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斥責這班可惜不僅出現於黃色第二國際，而且出現於退出這國際的歐洲三個特別重要政黨中的社會主義者是叛徒，是變節者，他們不獨巧於對農村罷工鬪爭取冷淡態度，

並藉口有減低消費品生產的危險而公開反對這種罷工鬭爭（例如考茨基）。假若在實踐上沒有實際證明共產黨人和工人領袖善於把發展無產階級革命與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看得高於一切，善於爲着這一革命去担负最艱鉅的犧牲，那末任何綱領，任何冠冕堂皇的聲明，都是一錢不值的，因爲要避免飢餓、破產和新的帝國主義大戰，此外則別無出路。

尤其要指出，那班現時爲了保存自己在迅速革命化的工人羣衆中的威信常常在口頭上向共產主義讓步，或甚至在名義上轉到共產主義這方面來的舊社會主義底領袖與『工人貴族』代表們，正要在革命意識與革命鬭爭發展得最厲害，地主與資產階級（大農、富農）反抗得最殘酷，社會黨妥協派與共產主義革命家之間區分得最清楚的地方，正要在這裏的工作中受到考驗，證明他們是否忠實於無產階級底事業以及能否担任負責的職務。

（九）共產黨應當用一切力量儘快地在鄉村中去首先建立僱傭工人和半無產者的代表蘇維埃。祇有與羣衆罷工鬭爭及與最受壓迫的階級聯繫着，蘇維埃才能執行自己的使命，才能鞏固，而使小農受着自己的影響（然後把他們吸收進來）。但如果因爲地主與大農方面的繁重剝削，又因爲沒有工業工人及其工會方面的援助，以致罷工鬭爭還不發展，農業無產階級的組織能力還嫌薄弱，那末，成立鄉村代表蘇維埃就需要有長期的準備，其方法是建立甚至是不大的共產黨支

部，加緊鼓動工作，最通俗地來說明共產主義底要求，根據最顯著的剝削與壓迫實例來解釋這些要求，有系統地派工業工人到鄉村中去等等。

一九二〇年七月二十日刊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十二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五卷，第二六六至二七八頁

三 過渡到恢復國民經濟的和平

工作時期

列寧·論物品稅

——一九二一年三月十五日在俄國共產黨（布）

第十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關於以賦稅代替餘糧徵集制的問題，首先而且主要地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本質，乃是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關係的問題。這個問題之提出，其意是說，我們必須把這兩個主要階級之間的關係——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鬭爭或協調，將決定我們整個革命的命運——加以新的，或者應當說，加以更慎重的與更正確的補充的考察與某種範圍內的修正。我已無須乎關於這種修正之諸原因的問題詳加論述了。自然，你們大家都很清楚地曉得，有多少事件——特別是由於被戰爭、破壞、軍隊復員、以及嚴重的歉收所引起的極端尖銳的需要而產生的事件——有多少因素，曾使農民底處境特別困難，特別尖銳，並不可避免地增強了農民離開無產階級而朝向資

產階級方面的動搖。

現在，關於這個問題底理論的意義，或者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的處理說一兩句話。無可懷疑地，在一個小農生產者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度裏，實現社會主義革命，那祇有經過一系列的特殊的過渡的辦法才有可能，這些辦法，在工業與農業中的僱傭工人佔大多數的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度裏，是完全不需要的。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度裏，有着在幾十年過程當中形成的農業僱傭工人階級。祇有這樣一個階級，才能够在社會上、經濟上、以及政治上成爲直接轉到社會主義的一個支柱。祇有在這個階級充分發展的國度裏，才可以不需要全國範圍內的特殊的過渡辦法，而能够從資本主義直接轉到社會主義。我們在許許多多的著作當中，在我們所有的演講當中，在我們所有的報紙上面，都強調說，俄國不是這樣的國度，在俄國，產業中的工人僅佔少數，而小農則佔着絕大多數。在這樣的國度裏面，社會主義革命，祇有在兩個條件之下，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第一個條件是一個或幾個先進國度裏的及時的社會主義革命對它的幫助。正如你們所知道的，爲了爭取這個條件，我們比起以前曾做了更多的工作，然而還遠不足以使這個條件成爲現實。

另一個條件，乃是實現自己專政或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與大多數農民間之協商與一致。這種協商與一致，乃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它包含着一系列的辦法和階段。在這裏，我們必須指

明，在我們全部的宣傳與鼓動工作當中，我們必須清清楚楚地闡明這個問題。有些人把政治理解爲小手法，理解成爲有時簡直是和欺騙沒有何等差異的手法，在我們當中，對於這種人，必須予以最堅決的斥責。他們的錯誤，必須加以糾正。階級是欺騙不了的。我們在三年以來，曾進行了很多工作，爲的提高羣衆的政治覺悟程度，從尖銳的鬭爭當中學習到最多的，乃是羣衆。根據我們的世界觀，根據我們幾十年來的革命經驗，以及我們革命的教訓，我們必須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這兩個階級底利益是各不相同的；工人所需要的東西，小農並不需要。

我們知道，在其它各國的革命未到來之前，祇有與農民妥協和協同一致，才能挽救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一切會議上，在我們所有的報紙上，我們都需要如此直截了當地提出這個問題的。我們知道，工人階級與農民之間的這種妥協與協同一致，說得緩和一點，是不鞏固的，——請不要把『緩和』這個字眼寫在記錄上——如果直說的話，那還要壞得多。無論如何，我們不應當力求去掩飾任何事物，而必須坦白地說，農民對於我們跟他們所建立的那種關係底形式，是不滿意的，農民是不喜歡這種關係之形式，這種形式再不能這樣存在下去了。這是無庸爭辯的事情。農民底這種意志已經確定地表現出來了。這是廣大勞動羣衆的意志。我們必須顧及這一點；我們是有足夠思考力的政治家，我們應當能够這樣坦白地說：讓我們來重新審查我們對於農民的事

政策吧。直到此刻所存在的這種情勢，是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我們必須對農民說：『你們願意向後轉嗎？你們願意全部地恢復私有財產與自由貿易嗎？如果你們願意這樣做，這就是說要必然地與不可避免地滑到地主與資本家底政權之下了。許許多多歷史的實例與革命之實例，都證明了這一點。共產主義ABC，以及政治經濟學ABC中的小小摘引，都可以證實這是不可避免的。讓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吧。農民要和無產階級分離而倒退——並允許國家倒退到——地主與資本家的政權方面去，這對於農民是否值得呢？計算一下吧，並且讓我們共同來計算一下吧。』

我們以為，如果這種事情能以適當的權衡，那末雖則在無產階級底經濟利益與小農底經濟利益之間，有着我們所共認的深刻的差異，但結果還是有利於我們的。

從資源方面上來說，不論我們的處境是如何困難，然而滿足中農的任務，是必須予以解決的。農民成爲中農的人比以前更多得多了；矛盾已經緩和了。土地更平均的分配使用了；富農已經遭受到基本的打擊，並且一大部份的財產是被剝奪了，——在俄羅斯比在烏克蘭要多些，在西伯利亞則比較少些。可是，整個地說來，統計材料完全無爭論餘地地指出，農村已經是平衡了，相齊了，這就是說，富農與無地的農民之間的鴻溝已被除去了，人人都變得更平等些了；整個說

來，農民都已經達到中農底地位了。

對於這種中農，對於這種有着他的經濟特徵，有着他的經濟根源的中農，我們能否滿足他們呢？如果任何共產黨人，曾夢想在三年之內可以改造小農的經濟基礎與經濟根源，那他自然是一個幻想家而已。其實——用不着隱瞞——這樣的幻想家在我們隊伍裏是不在少數的。但這一點並沒有什麼特別壞的地方。如果沒有幻想家，那怎麼能够在像我們這樣的一個國度裏開始社會主義革命呢？自然，實踐已表明了，農業集體經營領域當中的各種各樣的試驗與革新，可以起演如何巨大的作用。但是實踐也表明了，當人們滿懷着最善良的意圖與願望，到鄉村去組織公社與集體農莊，但由於缺乏集體經驗而不善於經營時，這些試驗會扮演了如何有害的作用。

這些集體農莊底經驗，祇是表明了如何不需要去創辦的例子；周圍的農民對它們加以訕笑或惡意的鄙視。你們很知道，像這樣的例子不知有多少了。我重複一句，這是不奇怪的，因為改造小農的事業，改造他們整個心理與習慣的事業，乃是好幾代的事業。祇有物資的基礎，祇有技術，祇有在農業中大規模地運用拖拉機與機器，祇有大規模地實行電氣化，才能够解決這個對小農關係的問題，才能够使他們的全部心理趨於健全。這便是根本上與最迅速地改造小農的辦法。我說是需要好幾代，這倒不是說，需要幾個世紀。你們都很清楚地知道，供給拖拉機、機器、以

及使一個巨大的國度電氣化——這樣的事業，無論如何是不能少過於幾十年時間的。我們的客觀環境，便是如此。

我們應當盡力滿足農民的要求，他們感到不滿意，他們不滿意，並且他們的不滿意是合理的，也是不可能滿意的。我們應當對他們說：「是的，這樣的形勢是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如何去滿足農民呢？滿足農民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從何能取得怎樣滿足農民這個問題的答案呢？自然，這要從農民底那些要求中去尋找。這些要求，我們是知道的。但是我們必須審查這些要求；我們必須從經濟科學的觀點上去審查那我們關於小農的經濟要求所知道的一切。把這個問題，深刻的鑽一下，我們會立刻對自己說：在本質上，滿足小農，可用兩件事情：第一，需要有一定的流通之自由，需要有小私有者經營之自由；第二，需要供給他們以商品與生產物。然而如果沒有什麼可流通的，那末流通自由又有什麼用處呢？如果沒有什麼可供交易的，那末商業自由又有什麼用處呢？沒有這些東西，那將祇是一張廢紙而已；階級是不能用廢紙滿足的，而祇有用物質的東西才能滿足。這兩個條件，必須好好地加以理解。關於第二個條件，這就是說，我們如何供給商品，我們是否能夠供給商品的問題，我們往後還會說到的。至於第一個條件，即關於流通自由的問題，我們在這裏需要詳細地論述一下。

什麼是流通自由呢？流通自由，就是商業自由，而商業自由，就是說倒退到資本主義去。流通自由與商業自由，那就是指各個小生產者之間的商品交換。我們所有的人，祇要學過馬克思主義ABC的，都知道，這種流通自由與商業自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商品生產者之劃分為資本所有者與勞動力所有者，劃分為資本家與僱傭工人，這就是說，會重新造成資本主義的僱傭奴隸制，這種制度不是憑空從天上落下來的，而在全世界上都是從小農商品經濟中生長起來的。我們在理論上很瞭解這一點，在俄國，凡留心觀察小農經濟生活與條件的人們，不能不看到這一點的。

於是有人就問：共產黨是否可以承認並採用商業自由呢？這裏有沒有不可調和的矛盾呢？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答覆說，自然，這個問題在實際的解決上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我事先就預見到，並且在與同志們的談話中我得知，用賦稅代替餘糧徵集制的初步草案——這個草案已分發給你們了——中，發生問題最多的——這些問題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就是關於在地方經濟流通範圍內允許交換這個問題。這一點是在第八段的結尾中說到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它的限度或範圍是怎樣的呢？如何才能實現它呢？如果誰想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就可以得到對這個問題的答案，那就錯了。我們祇有從我們的立法上得到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的任務，祇是在於規定原則上的路線，提出口號。我們的黨乃是一個當權的黨，黨的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決議案，

是整個共和國所必須遵守的；在這裏，我們必須在原則上決定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在原則上決定這個問題，讓農民知道這一點，因為播種的季節已經到來了。然後我們又必須推動我們整個的機關，運用我們全部的理論力量，我們全部的實踐經驗，以便研究這一工作究竟應該如何進行，從理論上說來，可否這樣作呢，可否在一定的程度內對於小農恢復商業自由與資本主義之自由，而不至於在同時破壞無產階級政權的根基呢？是否能夠如此做呢？是可以的，因為問題祇是程度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夠獲得縱然是很少數量的商品，並把他們掌握在國家手中，掌握在有政權的無產階級手中，並將這些商品投於流通之中，那末，作為國家的我們，就能够在政治權力之上增加經濟的權力。將這些商品投入流通，便可以活躍小農經濟，而這種小農經濟，目前在戰爭與破產底嚴重條件底壓迫之下，在小農經濟無法擴展底壓迫之下，已經可怕的凋敝了。祇要小農一天為小農，他就必須有與他的經濟基礎即與小規模的個體經營相適應的一種鼓勵、一種刺激和某種鼓舞。在這種場合，我們便離不開地方的流通自由。如果這種流通，可使國家用工業生產品換得某種最低數量的穀物，足夠應付城市、工廠與工業底需要，則在那時，經濟的流通將會這樣的恢復起來，就是：這時國家政權，仍舊會留在無產階級手中，而且會愈益鞏固起來。農民要求在實踐上向他表明，掌握工廠、作坊、工業於自己手中的工人，能有與農民相交換的能力。在另一方

面，一個交通不便、幅員遼闊、氣候懸殊、以及農業條件不同等等的巨大農業國度裏，不可避免地要以在地方範圍內地方農業與地方工業之一定的流通自由爲前提。我們在這一方面曾經犯了很多錯誤，走得太遠了；我們在商業與工業的國有化，在停止地方流通的道路上面走得太遠了。這一點是否錯誤呢？這自然是無庸置疑的。

在這一方面，我們曾犯了很多錯誤；我們沒有遵守一定的適當的辦法，不知道如何去遵守這種辦法，如果看不到並且不理解這一點，那真是一種莫大的罪惡。然而有些事情，却出於必要而被逼着去做的：直到今天，我們一直是生活在如此狂暴、如此空前嚴重的戰爭條件之下，以致使我們在經濟領域內，除了依照軍事方式行動外，再沒有其它的辦法了。一個這樣破產的國度，竟然支持了這樣的戰爭，這實在是一個奇蹟。這個奇蹟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是從工人階級與農民經濟利益中產生出來的，這些工人與農民用他們的羣衆的熱情創造了這個奇蹟；而這個奇蹟又造成了對地主與資本家之抵抗。同時，我們曾走得比理論上與政治上所需要的更遠一些，這是一個不庸置疑的事實，我們在宣傳與鼓動當中，是不需要把它掩蓋起來的。我們在相當範圍內可以准許地方上的自由流通，這不僅不會破壞，而且相反地會更加鞏固無階級底政權。至於如何來進行這件事情，這是一個實踐之問題。我的任務，是在於向你們證明，這在理論上是可以的。

掌握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如果他手邊有任何資源的話，它儘可以將這些資源投於流通之中，藉以做到在相當程度內滿足中農，在地方經濟流通的基礎上，滿足他們。

現在，關於地方上的經濟流通問題講幾句，但預先我願講一下關於合作社的問題。自然，如果地方的經濟流通存在時，我們是需要合作社的，而我們目前的合作社，是太受限制了。我們的黨綱，強調這個事實，即最好的分配機關，就是資本主義所遺留下來的合作社，這個機關是需要保存下來的。在黨綱上是這樣說的。這一點，我們是否執行了呢？還非常不夠，而且某些部份完全沒有執行，這一部份人是由於錯誤，而一部份是由於軍事上的需要。合作社在經濟上分化出了更高級的份子，在經濟關係上更高級的因素，因之在政治上却分化出了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這是一種化學上的規律，——這是無可奈何的；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乃是這樣的人們，他們在有意或無意中恢復資本主義，幫助尤登尼奇之流。這也同樣是一種規律。我們必須同他們進行戰爭。要是作戰，那就要按照軍事的方式這樣向來做；我們應當保護自己，而且我們已經這樣做了。但是我們能否仍舊不變地留在目前的狀況下面呢？不能。如此把自己的手脚束縛着，將絕對是一種錯誤。這就是爲什麼關於合作社的問題我建議要通過一個決議的原因，這個決議案是很短的，我現在把它讀出來：

「鑒於俄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關於合作社問題的決議完全是以承認餘糧徵集制原則為基礎的，而餘糧徵集制現在已代以物品稅，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茲特決定：

取消上述這個決議。

代表大會責成中央委員會應依據俄國共產黨黨綱，並適應於以物品稅代替餘糧徵集制的這種情形，製定改善並發展合作社機構與活動的法令，並由黨的及蘇維埃的程序執行之。

你們會說，這有點不大明確。是的，這在某種程度上不大明確是必要的。爲什麼說這是必要的呢？因爲如果要十分明確的話，那就必須徹底知道我們在全年當中所要進行的事情。但是誰知道我們要進行什麼事情呢？沒有人知道這種事情，而且任何人也不可能知道的。

第九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束縛了我們的兩手。該決議說：「隸屬於糧食人民委員會」。糧食人民委員會是一個很好的機關；但是當你重新審查對小農的關係時，使合作社一定要隸屬糧食人民委員會，而束縛着自己的兩手，這在政治上確是犯了顯明的錯誤。我們應責成新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會，去擬就並建立某些辦法與補充條例，詳細檢查我們正在做的前進的與後退的步驟，這就是說，這應當在何種程度上完成，如何照顧到政治利益，應該退却多麼遠，以便使環境能夠變得輕鬆些，以及如何檢查實踐經驗底結果。從理論上說來，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正是處於一系列的過渡

步驟與過渡辦法之前。但對於我們，有一件事是很顯然的，這就是：第九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是以我們依着一個直綫往前邁進爲前提的。但結果，正如全部革命史所經常表現出的一樣，我們却是依着彎曲的道路前進的。用這個決議把自己的手束縛住，這將是一個政治上的錯誤。在取消這個決議時，我們說，我們應當以黨綱爲指針，黨綱是強調合作社機構底意義的。

在取消這個決議時，我們說：你們須適應於以物品稅來代替餘糧徵集制這種情勢。然則，我們在什麼時候進行這種事情呢？不要在收割以前，也就是說，還要經過幾個月的工夫。然則，這在各地將都是一樣嗎？絕不是的，把俄羅斯中部、烏克蘭、以及西伯利亞，千篇一律化，將它們刻在同一個模子裏去，那將是絕大的愚蠢。我建議把這個關於地方流通自由的基本思想，應以代表大會決議之方式提出。我相信，此後在幾天之內，中央委員會將會頒佈一個信，在信中會指出——自然，這要比我現在所說的更好些（我們會尋覓到最好的寫作家，把它寫得更好些）：不要損毀任何東西，不要性急，不要弄巧成拙，要這樣地進行，即：可以最高限度地滿足中農，而不致損傷到無產階級底利益。把這試驗一下，把那也試驗一下，在實踐上，根據經驗，加以研究，然後告訴我們，你們做到了什麼，而我們便可以設立一個專門委員會，或甚至幾個委員會，來研究所搜集到的經驗，我想，我們可以專請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紙幣流通一書底作者潑里奧柏

拉任斯基同志，來從事這個工作。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因為貨幣流通，是這樣一種東西，它可以做爲國內貿易週轉是否適當之絕好的考驗；如果這個週轉或流通失常時，則貨幣就變成廢紙了。我們必須十次的檢查所曾經採取的辦法，以便以後在這個經驗底基礎之上繼續前進。……

人們會向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並且願意知道：究竟貨物要從什麼地方取得呢？

貿易自由既需要商品，而農民則是很聰明的人，他們是很善於嘲笑人的。我們現在能否得到商品呢？我們現在是可以得到的，因爲我們的國際經濟地位已經大大地改善了。我們正在與國際資本作戰，這國際資本瞪着眼睛看到我們的共和國，說：『這些傢伙們都是強盜，是鱷魚。』（這幾個字是由一位英國女彫刻家爽直地告訴我的，而她則是從一個最有威望的政治家那裏聽來的）既然是鱷魚，那就祇消加以鄙視罷了。這就是國際資本家的呼聲。這就是階級敵人的呼聲。從他們的觀點上說來，這是對的。但是這種結論的正確性，還需要在事實上加以考驗。你既是全世界強有力力量，你既是全世界的資本家，你既說：『鱷魚』，而你手中又掌握着一切技術，那末，就試開槍吧！然而當它這樣試做時，它就發覺它自己所受的傷害，竟甚於我們。這樣一來，資本被迫不得不計及現實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生活，說：『還是做生意吧』。在這裏我們便獲得了偉大的勝利。我現在願告訴你們，我們已有兩宗借款的建議，其數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盧布。我

們是有金子的，但是金子是不能出賣的，因為金子是不能吃的東西。大家都破產了，在一切國度當中，資本主義各國之間的通貨關係，已被戰爭弄得混亂到不可想像的程度。此外，要同歐洲有所來往，就需要用船舶；然而我們却是沒有船舶的。我們的船隻是在敵人手裏。我們同法國未簽訂任何協定，它認為我們乃是它的債務者，那就是說，祇要它一旦觸到我們的船隻時，它就說：『這是我的』。它們有海軍，而我們却沒有。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所以，我們的金子的使用，祇及於極小的，小到可笑的限度。現在金融資本家方面，有兩宗願意借款的提議，數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盧布。自然，這筆資本是須付以極高的掠奪性的利息的。但在今天以前，一般說來，它們是沒有提到這一點的；在今天以前，它們祇是說：『我要槍殺死你，毫無代價的獲得你的一切的』。現在槍殺死既成爲不可能，於是它們就準備同我們做生意了。現在，同美國和英國的商約，可以說正在進展中；關於租讓，也是如此。昨天我還接到樊得立先生底一封信，他現在在這裏，他在信裏除了一堆怨言之外，還提了一大堆關於租讓與借款底計劃。這位先生乃是最投機營利的金融資本底一個代表人物，他是同比較敵視日本的美國西部諸州有着聯繫的。這樣，我們就有了取得商品的經濟上的機會。在這方面，我們能够獲得多少東西，這是另一個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總算有了這樣做的相當的機會了。

我重複地說，這種經濟關係底類型，即在上面表現爲同外國資本主義聯盟的這種類型，使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得在下面與農民進行自由的流通了。我知道，——而且我已經這樣說過了——這會引起若干嘲笑的。在莫斯科，有一個整個的知識份子官僚主義的階層，他們企圖造成『輿論』。他們開始嘲笑說：『共產主義原來是這樣的！它儼如一個撑着拐杖而行的人之類，滿臉裹着繃帶，我們所看到的共產主義，還是一幅謎一樣的小小圖畫。』這類的譏笑，我已經聽够了，這些譏笑，可以說或者是官僚主義的，或者是極其輕浮的。俄國是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而擺脫戰爭的，就是其形象正如同一個被打得半死的人一樣；在七年之中把它打得遍體鱗傷。感謝上帝，我們居然還能够藉着拐杖走動！這正是我們目前的處境啊！誰如果以爲我們不要拐杖便可以走動，那是說他狗屁不懂！當今在其他各國還沒有發生革命之時，我們將要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够脫出這種處境，因此，祇要能獲得強大的先進的資本主義方面底幫助，我們便不惜從我們的無限富源當中，從我們豐富的原料資源當中，耗費幾萬萬以至幾十萬萬。以後我們可以以多倍的利得收回來。在一個空前破產了而且是同樣破產的農民佔着人口絕大多數的國度內，如無資本底幫助，則保持無產階級政權是不可能的；自然，爲了這種幫助，資本是會吸吮我們百分之百的利息的。我們必須理解這一點。所以，或者是這種類型的經濟關係，或者是什麼也沒有。誰對這問題做另一

種提法，那誰就絕對絲毫不懂得實際的經濟，他也就是在玩弄辭令而已。我們必須承認這樣的事實，即羣衆已經是精疲力盡與困憊不堪了。七年的戰爭，如果先進各國迄今仍在痛感着四年戰爭的餘痛，那末試問對於我們，七年的戰爭將會發生什麼樣的影響呢？！

並且在我們這個落後的國度裏，經過七年戰爭之後，這直接了當地就是工人——他們遭受了空前的犧牲——以及農民羣衆之極端疲憊的狀態，這種疲憊，已近於完全不能工作的狀態。這裏，需要有一種經濟上的稍憩時間。我們打算利用我們的金準備，以謀取得生產手段。最好的辦法當然是製造機器，但是即令我們是購買了機器，我們也可以建成我們自己的工業。但是爲達到這個目的起見，須使工人與農民能够工作，然而在大多數的場合，工人們却是不能工作的：他們已精疲力竭，他們已困憊不堪了。需要幫助他們，需要動用我們的金準備去購買消費品，而不論我們以前的綱領如何如何。我們以前的綱領，在理論上是正確的，但是在實踐上却是破產的。我引證黎扎哈瓦同志的便條來告訴你們一件事情，從這個便條上，我們知道，已經購買了幾十萬普特的各種各色的食物，正以迅速的方式從拉特維亞、芬蘭與立陶宛運來。今天接到一個消息，說在倫敦已經簽訂了一張購買一八、五〇〇、〇〇〇普特煤的合同，我們定購這宗煤，爲的復活彼得格拉的工業，以及恢復紡織工業之用。即使我們用這種方式爲農民取得商品，這自然是違背綱

領的事情，這是不正確的；但是我們必須讓他們取得稍憩的時間，因為人民已疲憊不堪了，如果我們不給予他們以稍憩，則他們將不能工作了。

關於個體的貨物交換，我必須講兩句話。我們說流通自由，其意義是說個體的商品交換，這就是說，鼓勵富農。怎麼是這樣呢？不要閉目看不到這個事實，即：以賦稅代替剩餘糧徵集制，是意味着在現存制度之下，富農將會比以前更生長得多些。他們將要在以前不能生長的地方生長起來。但是這一點是可以加以補救的，這裏無需採用禁止的辦法，而應當從上面採用國家的聯合與國家的辦法去同他做鬭爭。如果你能給予農民以機器，把他們提高；而且你給他們以機器或實現電氣化，那幾千百萬的小的富農將被肅清了。在你不可能給予這些東西時，你應給予他們一定數量的商品。如果商品在你的手中，那末你總會掌握着政權的，而停止、斬斷、和取消這一種可能，那就不管是阻止流通底一切可能，這也就是意味着不能去滿足中農，不可能同他們和平共居。俄國的農民已更多地成爲中農，無需乎畏懼交換之成爲個體的交換。在交換中，任何人將都能給予國家一些東西。有的會提供它多餘的糧食，有的會提供它園藝生產物，第三個人會貢獻出勞動服務。在大體上，情況是像下面這樣的，即：我們在經濟上必須滿足中農，同意實行流通自由，否則，由於世界革命之延緩，在俄國要保持無產階級政權，是不可能的，從經濟上說是不可能的。

我們必須明白的認清這一點，並且對於這一點，不應畏而不言。在以物品稅代替餘糧徵集制的決議草案上（原稿已經分發給你們了），你們可以看到其中好多不協調的地方，好多矛盾的地方；因此，我們在該文末尾寫道：「代表大會在基本上（含義是十分廣泛的）批准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關於以物品稅代替餘糧徵集制的條例，並責成黨中央委員會迅速地調整該條例。」我們知道，這些條例尚未被調整；我們還來不及作這一點，我們還沒有担任起這個詳細的工作。正在仔細地研究實行徵收賦稅底形式，並在起草相當的法律，這個法律將提交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通過。日程預定爲這樣：如果你們今天能通過這個草案，則這個草案將提交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屆全體會議，這個會議將僅僅頒佈一個補充命令，而不頒佈法律，然後，再由人民委員會與勞動國防委員會將它轉化爲法律，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它製成爲實際的指示。重要的事情，是在於要使各地了解這個法律的意義，並進而迎接我們。

爲什麼我們需要以賦稅代替餘糧徵集制呢？餘糧徵集制是徵集所有的餘糧，建立義務的國家獨佔制。我們不可能有其它的辦法，因爲我們是處在極端需要的情況之下的。在理論上，不一定要把國家獨佔制視作從社會主義觀點上看來是最好的東西。在一個擁有工業——如果這個工業是在發生機能的話——並且具備着一定數量的商品的農業國度裏，採用賦稅制度與自由流通制度作

爲過渡辦法，是完全可能的。

這種流通本身，對於農民可以起鼓勵、喚醒與推動的作用，小私有者可以而且應當爲着自身的利益而努力，因爲從他那裏將不是徵集他所有的餘糧，而僅僅是徵稅而已，這個賦稅的數額將儘可能地早日予以規定。主要的一點是在於要從經濟方面去鼓勵、喚醒、並推動小農，使他進行其生產。我們必須建立適應於中農經濟的國家經濟，在過去三年當中，我們曾不能改造中農經濟，而且甚至在以後十年內，我們也不可能改造這種經濟。我要告訴你們，這是依什麼而定的。

在國家面前，放着一定的徵收糧食的責任。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在去年增加餘糧徵收額的原因。賦稅則必須少一些。確實的數目字，尙未加以決定，而且，也是不可能加以決定的，在波波夫的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之穀物生產這本小冊子內，曾引證了我們中央統計局底材料，這些材料提供了確實的數字，並指出農業生產額是由於什麼原因而減低了。

如果是歉收的話，則我們就不能徵集餘糧了，因爲沒有什麼餘糧可言了。這時就不得不從農民的口中取得穀物。如果有收成的話，那末，那時大家稍稍飢餓些，則國家便可因此而得救了，！或者，如果我們不能從那飽食的人們那裏徵集到糧食，則國家就要滅亡了。我們在農民中間宣傳之任務，就是這樣的。如果我們能得到還過得去的收成的話，則我們應徵集到五萬萬普

特的餘糧。這數額就够消費，並且還可以有某些積存了。全盤事情，就在於從經濟觀點上看來，應給予農民一種刺激，給予他們一種鼓勵。我們必須對小農說：『小業主，生產糧食吧，國家將祇徵收最低限度的賦稅。』

我說話的時間完了，我應當結束。我重複的說一遍：我們不能立刻頒佈一個法律。我們決議的缺點，是在於它並不是十分合乎立法精神的，——在黨的代表大會上不是製訂法律的。因此我們提議，通過中央委員會底決議做爲基礎，並責成中央委員會對它的條例加以調整，我們要印發該決議案原文，各地方的工作人員則應盡力加以調整與改正。澈底調整是不可能的，這是一椿不可解決的任務，因爲生活是在瞬息萬變着，要尋覓過渡辦法——這個任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不能迅速地與直綫地做到這一點，但是我們並不灰心，我們一定要把它完成的。稍微有點覺悟的農民，都不會不理解這一點，即：處於政府地位的我們，是代表工人階級和那些勞動農民能够與之妥協一致的勞動大衆的（這些人便佔全人口的十分之九），而每一種倒退行爲，則都不外是回復到舊的沙皇政府的統治上去。喀琅施塔得底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在那裏，他們說不要白黨，也不要我們的政權，——然而又沒有第三種政權——因而就陷於這樣一種情況之中，這種情況便是擁護我們，反對其它任何新政府之最好的鼓動。

我們現在有着同農民妥協的機會了，我們必須能够很實際地、技巧地、敏捷地、靈活地來利用這種機會。我們知道糧食人民委員會這個機關是怎樣的，我們曉得，這是我們最好的機關當中的一個。把它同其它機關做一比較，我們就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最好的機關，把它應當保存下來；然而這個機關必須服從於政治。如果我們不能調整同農民的關係，那末就是這最好的糧食人民委員會也就形同廢物了。那時這個最好的機關，不是為我們的階級服務，而是為鄧尼金與高爾察克服務了。如果政治要求堅決的轉變、靈活性、與技巧的行動，那末領導者就應當理解到這一點。一個堅定的機關，應當通用於一切轉變的，但如果機關之硬性硬化了，轉變成化石了，如果它阻礙着靈活的變化，那末這時，鬭爭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應當用盡一切力量去達到這樣一個目的，即：使得這個機關完全服從於政治。政治乃是各階級間的相互關係——這種關係是足以決定共和國底命運的。機關是一種輔助工具，它愈堅實愈好，則它也就愈好和能適應於各種轉變。如果它沒有能力執行這一點，那它也就沒有什麼用處了。

我請求你們要注意到一個基本的事情，就是細節與解釋的起草工作，是需要幾個月的時間的。在目前，我們必須注意到這件主要的事情，即：我們必須把今晚通過的，用無錢電向全世界各個角落作一廣播，說我們政府黨底代表大會，基本上已用賦稅代替餘糧徵集制，藉以給予小農

以擴展經濟、增加播種的許多鼓勵和刺激；代表大會因採取這種政策，而正在改正着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的關係，代表大會相信用這種辦法，在無產階級與農民之間一定可以做到建立親密的鞏固的關係的。

列寧：論糧食稅

——新政策底意義及其條件，一九二一年四月十一日——

代引言

糧食稅問題現時引起特別多的注意、討論與爭論。這是十分顯然的，因為它真正是當前情勢下我們政策底主要問題之一。

討論多少帶有一些亂雜性。由於過份明顯的原因，這種錯誤我們大家都犯得有。所以不企圖從本問題的『日常』意義，而從它的一般原則意義來加以觀察，才更有益處。換句話說：就是要注視着我們現時正在動手描繪目前政策中一定實際設施的這幅圖畫底基本輪廓。

爲了實現這一企圖，我想從我那本當前主要任務——論『左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的

小冊子中，摘引出一長段話來。這本小冊子已由彼得格拉蘇維埃於一九一八年出版了，其內容：第一，是一九一八年三月十一日報上發表的論布列斯特和約一文，第二，是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登出的與當時左派共產黨人的論戰。論戰部份現在已經用不着了，所以我也就把它刪掉。祇留下有關『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及我國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現時經濟基本成份問題的地方。當時我這樣寫道：

關於俄國現時經濟（摘自一九一八年出版的小冊子）

『：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現時情況說來，會是一個進步。如果，譬如說，經過半年，在我國奠定了國家資本主義，那就會是極大的成功，並且能够最有效地保證經過一年以後我國社會主義將徹底鞏固，而成爲不可戰勝的。』

我揣測道，一定有人會義憤填膺地起來指斥這段話：『怎麼嗎？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內，過渡到國家資本主義去，能會是一個進步？……這豈不是背叛社會主義麼？』

『：正是要把這點來詳細講講。』

第一，應該分析使我們有權有據能稱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這一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究竟是怎樣的。

第二，應該暴露那些看不見小資產階級經濟條件和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乃是我國社會主義主要敵人的人們底錯誤。

第三，應該真正瞭解在經濟實質上是與資產階級國家迥然不同的蘇維埃國家底意義。

現在我們就來觀察所有這三種情況。

大概，還沒有一個人在研究俄國經濟問題時，竟否認到這種經濟底過渡性。大概任何共產主義者也不否認，「社會主義蘇維埃共和國」這一名詞是表明蘇維埃政權要實現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決心，但總還不是承認現時經濟制度已經是社會主義的。

那末，「過渡」這字眼又是什麼意思呢？它在經濟上是否說，在該制度中既有資本主義的，也有社會主義的成份、部份或因素呢？誰都承認，是這樣。但並非所有承認這點的人都思考到了：俄國現存的各種不同社會經濟結構底成份，究竟是怎樣的。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裏。

我列舉出這幾種成份如下：

(一) 宗法式的，即領大程度上是原始式的農民經濟；

(二) 小商品經濟（其中包括有大多數出賣糧食的農民）；

(三) 私人資本主義；

(四) 國家資本主義；

(五) 社會主義。

俄國如此遼闊廣大，如此形形色色，以致社會經濟結構底這各種類型，都錯綜在它內面。特點也就在這裏。

試問，究竟是哪些成份佔優勢呢？在一個小農國家中，顯然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佔優勢，而且它也不能不佔優勢；土地佔有者底大多數，甚至是極大多數，係小商品生產者。在我國，投機商人到處在破裂國家資本主義（糧食壟斷，受國家監督的企業主和商人，資產階級的合作社）底外殼，而投機買賣的主要物品，便是糧食。

主要鬭爭正是在這一方面開展着。如果按國家資本主義這名詞說來，究竟是誰同誰在進行這一鬭爭呢？是上述序列中的第四種成份與第五種成份作鬭爭麼？當然不是的。這裏，並不是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作鬭爭，而是小資產階級和私人資本主義共同攜手，既反對國家資本主義，又反對社會主義。小資產階級抗拒任何的國家干涉，統計和監督，無論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也好，無論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也

好。這乃是絲毫不容爭辯的事實，許多經濟問題上的錯誤都是由於不瞭解這一事實才發生的。投機者，奸商，壟斷破壞者——這便是我國「內部」主要的敵人，即蘇維埃政權在經濟設施方面的敵人。在一百二十五年前，法國小資產者這班最顯著最真誠的革命家，祇想用較殺個別不多的「要犯」和頒佈大批通告法令來戰勝投機商人的這種願望尙可以原諒，但現在例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對這個問題所採取的純屬空談的態度，祇能引起每個有覺悟的革命家的厭惡和嫉視而已。我們很清楚地知道，投機業成經濟基礎，是在俄國蔓延得非常廣泛的小私有者階層；以及在每一個小資產者那裏都有自己代辦的私人資本主義。我們知道，這小資產階級多頭蛇的千百萬觸角，此時彼地都纏繞着工人中的個別成份；投機商業鑽進了我國社會經濟生活底全部機體內，抹擠國家壟斷制。

誰要看不見這點，那他就恰恰因爲自己盲目無能，暴露出自己是做了小資產階級成見的俘虜：

「……小資產者擁有用「正當」辦法，特別是用戰時不正當辦法所積累起來的幾千幾千的小存款。這種標本經濟形式，也就是投機業和私人資本主義底基礎。金錢，這是獲得社會財富底證券；千百萬小私有者緊緊地握着這種證券，對「國家」壓殺起來，不相信任何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祇一期待「擊過無產階級的大風暴」；或者是我們使這些小資產者來服從我們的監督與統計（我們若把居民中佔多數的貧民，或半無產者組織在無產階級先鋒隊周圍，那我們便能够做到這點），或者是小資產階級必然地和不免地推翻我們

的工人政權，如同正是在這小私有制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拿破崙和卡芬雅克輩之曾經推翻革命一樣。問題就是如此。問題也祇是如此。

三：保存有幾千小款的小資產者，係國家資本主義底敵人，他們並不是想把這款子用在自己身上，反對貧民，反對任何全國性的監督，而這幾千幾千小款却替破壞我們社會主義建設的投機業造成着千億萬金錢的基礎。譬如說，一定數目的工人在幾天內創造出爲數一千的價值。又譬如說，在我國，因爲小投機業，各種盜竊公物行爲以及小私有者破壞蘇維埃法令和蘇維埃章程的現象，以致這一千的價值中有二百落了空。每個覺悟工人就會說：如果我能從這一千中拿出三百來建立更好的秩序和組織，那我就不要不止拿出二百，却甘願拿出三百，因爲在蘇維埃政權下，既然秩序與組織都會整飭就緒，小私有者破壞國家壟斷的行動，都會澈底打破，那末以後這種「貢款」就會減輕，譬如說減到一百或五十，已經會是很容易的任務了。

這個普通的數字實例，——爲了要作極通俗的解釋，我故意把它弄得再簡單化沒有，——也就說明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現時情況底相互關係。工人掌握有國家政權，他們在法權上有最充分的可能，把這整整的一千都拿上手來，不讓一個哥比花在非社會主義的用途上面。基於政權已實際轉到工人手中這一法權上的可能性，也就是社會主義的成份。可是，小私有者與私人資本主義的自發勢力却經過許多途徑搗毀法權上的規定，扶植投機業，破壞蘇維埃法令底實施。國家資本主義會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就即令

（所以我故意舉出上述這種數字，來簡截表明這點）那時我們比現在所付的代價會更大一些，因為「領受教益」值得較費，因為這對工人是有好處。因為戰勝毫無秩序、戰勝經濟破壞與騷擾現象。比一切更重要些，因為讓小私有制時無政府狀態繼續下去，這乃是最大的、最可怕的絕對的社會使我們趨於滅亡（如果我們不戰勝它的話）的危險，但是我們支付大款給國家資本主義，這不僅不會滅亡我們，反而可以經過最可靠的道路，把我們引向於社會主義。祇有工人階級學會怎樣捍衛國家秩序來反對小私有制無政府狀態，學會怎樣在國家資本主義基礎上來安排全國性的大生產組織，祇有那時，——恕我用這樣的話來形容，——它才能在各方面都佔上風，社會主義底鞏固才有保證。

國家資本主義在經濟上比我國現有經濟要高得不可比擬，這是第一。

第二，國家資本主義內面，並沒有包含任何奇難雜瑣或極可怕的東西，因為蘇維埃國家是其中工人和貧民政權有了保障的國家。

★

★

★

三：爲了把問題說得更清楚，我們首先舉出國家資本主義的一個最具體的例子。大家知道，這個例子就是德國。那裏存在有現代最新的大資本主義技術，以及從內容上資產階級帝國主義的有計劃的組織。若把上面這加上着重點的字樣，同樣用國家字樣，但已是另一種社會形式和另一種階級內容的蘇

雜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這軍閥的、容克的、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的國家，那你們便可得到社會主義所給予的各種條件底總和。

沒有建築在最新科學上的大資本主義技術，沒有在產品之生產與分配的事業中使千百萬人都應最嚴格地遵守統一一定額的這種有計劃的國家組織，則社會主義便無從談起。我們馬克思主義者關於這點隨時都講到過，至於對那些甚至不瞭解這點的人（無政府主義者，大半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便不懶得絲毫費詞了。

同時，若沒有無產階級在國家中佔統治地位，社會主義亦無從談起，這也是最初步的道理。歷史（除了孟塞維克這班頭等蠢材之外，任何人也沒期待它會平穩、安靜、輕易、簡單地生出「完備的」社會主義來）演進得這麼奇特，到一九一八年時，却誕生了社會主義底兩半，彼此鄰近着，好像國際帝國主義這同一蛋殼內兩個未來的雞雛一樣。德國和俄國在一九一八年，是再明顯不過地體現了爲實行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一方面是經濟、生產、社會經濟諸條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條件。

若是德國無產階級革命獲得了勝利，那它也就會輕而易舉地一下子摧破帝國主義底任何蛋殼（可惜，這個蛋殼是由最好的鋼鐵所構成，而不是任何雞雛底力量所能衝破的），也就定會實現世界社會主義底勝利，而不經過困難，或者祇經過極小的困難，——當然，這裏所謂「困難」是指全世界歷史意義範圍內的，而不是指平常小組式範圍的困難而言。

但如果德國革命仍遲延「爆發」，那我們的任務，就在於學習德國人底國家資本主義，用一切力量來採用這種資本主義，爲了加速野蠻羅斯入底歐化過程，便應該不惜使用獨裁方式，在反對野蠻勢力時，決不拒絕使用野蠻的鬭爭手段。無政府主義者或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中，若有人（我隨便記起了卡列林和路在中央執委會內所說的話）竟能自矜自傲地議論道，唔，向德國帝國主義「學習」，對我們這班革命家說來，簡直是格格不入的；那就祇應這樣回答說：要是認真來理會這班人的意見，革命便會無可挽救地（並且是完全應分地）遭到滅亡。

在俄國，此刻正是小資產者資本主義佔優勢，從這樣的資本主義，無論走向國家大資本主義或走向社會主義，都是走的同一條道路，都是經過同一個中間站口——即所謂「對物品生產與分配上實行全國統計與監督」。誰若不懂得這點，那他就犯了不可饒恕的經濟錯誤，或者他不知道實際情形，看不見現成事物，不會辨別真理，或者祇局限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間抽象的對立，而不去洞悉此刻我國這種過渡底具體形式和階段。

附帶說說：這也是使新生活派與前進派營壘中的優等份子喪失頭腦的同一理論錯誤：其中劣等與中等之輩，因爲愚鈍和毫無氣節，已被資產階級所駭倒，追隨着資產階級底尼巴；而其優等人物則不瞭解，社會主義底導師們並不是徒勞無益地說到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他們也不是白白強調地

指出，新社會之「長時間的臨產苦痛」，並且這個新社會也還是抽象事物，祇有經過多種多樣尚未完善的，以求建立某種社會主義國家的具體企圖，然後這一抽象事物，才能實現到實際生活中去。

正因為若不經過爲國家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所共有的東西（全國的統計和監督），就不能從俄國現時經濟情況中前進一步，所以用「演進到國家資本主義一方法」的話來自欺欺人，這乃是理論上的荒謬絕倫之談。其實這也就是恰恰在思想上離開「演進」底真實道路，奔到「一方」去，不懂得這條道路；而在實踐上這便是等於向小私有制資本主義開倒車。

爲了使讀者相信，我還不祇在現時，而是在布爾什維克取得政權以前，就對國家資本主義給了一高「度」的估計，我來摘引我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寫的與禍臨頭和防止之法這小冊子中的話吧：

「：你試試用革命民主的國家，即用那採取革命手段來破壞一切特權，不害怕以革命手段實現最完備民主制度的國家去代替密克資本家的國家，代替地主資本家的國家，那又會怎樣呢？那你就會看見，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真正革命民主國家中，就會必然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以至一些步驟！」

「：因爲社會主義不過是由國家資本主義逐漸前進的最近一步而已。」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最完滿的物質準備，是達到社會主義的階梯，是條更繩子上一樣的一級，即從這一級到極爲社會主義的那一級之間，是沒有任何中間數目的。」（見第二七頁和二八頁）

「：請看，這是在克倫斯基執政時期寫的，這裏所說的，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社會主義國

家，而是一革命民主」國家。我們從這一政治榜級變遷得愈高，我們在蘇維埃中把這社會主義國家與無產階級專政體現得愈完備，則我們對「國家資本主義」，就應當害怕得愈少，難道這不明顯嗎？在物質的、經濟的、生產的意思上說來，我們還沒有進到社會主義的「四階」，如果不經過我們還未達到的這一「階」，就不能走進社會主義，難道這不明顯嗎？

★

『：還有以下這種情況，也是極有效益的。

★

★

當我們在中央執委會內與布林林同志爭論時，他順便指出說：在關於給專家以高度薪俸的問題上，「我們」比「列寧要右些」，因為馬克思說過，在某種條件下，對工人階級說來，最適當的是「從這匪幫手裏實行贖買」（即從資本家那幫，也就是從資產階級手裏，贖買土地、工廠及其他生產資料），這裏我們並看不出有任何違背原則的地方。

這是一番非常有趣的議論。』

『：請思考馬克思這話裏意思吧。

他所指的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英國，是壟斷前期資本主義頂點時期，是當時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最少而國家，是當時就工人贖買資產階級所有物而言，社會主義底「和平」勝利最有可能的國家。所以馬

克思說：在某種條件下，工人並不拒絕向資產階級進行贖買。至於對變革底形式、方法和手段，馬克思既沒有束縛自己，也沒有束縛社會主義革命將來的活動家，他極卓越地瞭解到將來會有某些大批新的問題發生，在變革進程中整個環境會怎樣發生變化，這種環境在變革進程中會如何頻繁而急劇地變動着。

但在蘇維埃俄國，自從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自從剝削者底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被鎮壓下去之後，某些條件業已按半世紀前在英國——如果英國當時已開始和平地轉到社會主義——本可形成的那些條件底樣式形成起來了。這難道不明顯麼？那時在英國本有下列種種情況能够保證使資本家屈服於工人：（一）由於沒有農民（在七十年代的英國，已有這樣的徵候，可以指望社會主義在農村工人中能有很迅速的成就），以致工人、無產者在全人口中佔着絕對優勢；（二）職工會內無產階級底高度組織性（當時英國在這方面，佔世界上第一位）；（三）無產階級受過歷來政治自由發展的訓練，而具有相當高的文化程度；（四）組織得極好的英國資產階級——當時他們是世界各國組織得最好的（現在這個首位已經轉到德國去了）——長期地慣於用妥協來解決政治和經濟問題。也就是因為這些情況，當時才能發生此種思想：可能使英國資本家和平地屈服於英國工人。

在我國，現時因有某些基本前提（十月革命的勝利，從十月到次年二月鎮壓了資本家底軍事反抗和怠工反抗），而使這種屈服已經有了保障。在我國，有生活貧苦和急速破產的農民援助無產者這種情形，來

代替工人。無產者之佔人口絕大多數以及他們高度組織性的事實，而成爲勝利的因素。末了，在我國，雖沒有高度文化水準，即也沒有妥協的積習。如果將這些具體條件加以熟思，那末很顯然的，我們現在能够而且應當做到把這兩種辦法結合起來——一方面要無情地懲治那些不文明的資本家，即不肯接受任何「國家資本主義」，也不去設想作任何妥協，祇是用投機業、收買貧民等手段來繼續破壞蘇維埃設施的資本家；另一方面要與那些文明的資本家，即肯接受「國家資本主義」，能於實行這種資本主義，能以真正用生產品供給千百萬人之大企業底聰明練達的組織者資格出現而成爲對無產階級有益的資本家謀妥協或向他們實行贖買。

布哈林是一個學識卓越的馬克思主義者兼經濟學家。所以他才提到並完全贊同馬克思這樣教導工人的一番話，說正因為要使於過渡到社會主義，就得保存大生產組織，說如果（這是一種例外：當時英國就是如此）環境會迫使資本家和平屈服，並在贖買條件下、文明地、有組織地轉到社會主義，那就好好地來贖買資本家，向他們贖買，這種思想是充分可以容許的。

但是布哈林錯誤了，因為他沒有考慮到俄國目前具體特殊情形，這種情形之所以特殊，是由於現時，按我國政治制度及按工人政權力量說來，我們俄國無產階級比任何英國和任何德國的還要先進，而同時按相當完善的國家資本主義組織，按文化水準，按「施行」社會主義的物質生產準備程度說來，我們

俄國無產階級比西歐最落後國家的都還要落後。正因為這種特殊情形，遂使現時工人們應當向那些決心爲蘇維埃政權服務，相當認真幫助組織大規模「國家」生產之最文明、最有天才、最有組織能力的資本家提出必要的特殊的一體貫一。這難道不明顯麼？在這種特殊情形下，我們應當極力避免以下兩種按其實質說來都是小資產階級性的錯誤，這難道不明顯麼？一方面，這會是不可救藥的錯誤：即如果聲明說，既然承認我們的經濟「力量」與政治力量不相適應，「所以」本來就不應取得政權。所謂「養中人」便是這樣議論着的，他們忘記了，「適應」是在何時也不會有的，無論在社會發展中或自然界發展中，都不能有這樣的適應，祇有經過許多嘗試，——其中每一種嘗試都會是片面的，都會有某種不相適應的毛病，——胜利的社會主義才能從全世界無產者底革命合作中，創立起來。

另一方面，縱容那班吶喊者和空談家，也會是彰明較著的錯誤，這些人表面上顯露得「在外」革命，但對於堅定的、深思熟慮過的、並估計到最困難過渡的革命工作，却無能爲力。

幸而各革命政黨底發展以及布爾塞維主義同這班人鬭爭的歷史，給我們遺留下了種種鮮明的圖像，其中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充分表現出一種不大好的革命家。他們現在幾乎瘋狂地吶喊着，急得喉嚨啞暗，高呼反對「右派布爾塞維克」底「妥協」，可是他們却不善於思想，「妥協」究竟有什麼壞處，它又因爲什麼應份遭到歷史與革命進程底裁判。

克倫斯基時代的妥協，會把政權交給了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政權問題乃是一切革命底根本問題。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一月間，「部份布爾塞維克底妥協，或者是害怕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或者是願意不僅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這類「不可靠的同路人」，並且與切爾諾夫輩和孟塞維克這些敵人來分享政權，而這些敵人必然會在基本問題上，即在解散立憲會議，在無情地撲滅博加也夫斯基輩，在充分實施蘇維埃制度，在進行每次沒收中，來妨害我們。」

現在政權已經由一個政黨，即無產階級政黨奪得了，保住了，鞏固了，甚至沒有一個不可靠的同路人」參加。現在已經談不到並且也不能談到什麼分享政權，什麼無產者拋棄反資產階級的專政。而在這個時候來談妥協，就無異於像鸚鵡一樣，祇是簡單重複那些聽得爛熟，但毫不可解的字句罷了。當我們已進到能夠而且應當管理國家之際，我們不惜金錢，極力吸收那些由資本主義所培養出的文化程度極高的份子到己方面，任用他們來反對小私有者以分離析現象，而把這種舉動竟稱之為「妥協」，這就是根本不善於思索社會主義建設底經濟任務。」

論糧食稅，自由貿易，租讓制

在以上所援引的一九一八年這篇論文中，關於期限一層，有許多錯誤。實際上的期限比當時

所想要的要長久一些。這是不足奇怪的。可是我國經濟底基本成份，依然與從前一樣。農民中的『貧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在極多的場合下，變成了中農。小私有者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因之加強了。而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的國內戰爭，異常加深了國內經濟破壞現象，阻滯了國內生產力的恢復，受害最大的正是無產階級。加之一九二〇年的歉收，飼料缺乏，牲畜病死，這便更厲害地阻滯運輸業與工業的恢復，於是也就反映到例如由農民馬匹裝運我國主要燃料即木柴的事宜上。

結果一九二一年春形成了的政治形勢，要求立刻採取最堅決最緊急的辦法來改善農民生活狀況和提高他們的生產力，這已成爲必須與刻不容緩的了。

爲什麼不是改善工人生活狀況，而是改善農民底生活狀況呢？

因爲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就需要有糧食和燃料。從整個國家經濟說來，此刻最大的『阻塞』正是從這裏發生的。而提高糧食底生產和收集，增加燃料底採辦和運輸，祇有改善農民生活狀況，提高他們的生產力。應該從農民方面開始。誰要不明白這點，誰要認爲把農民提到第一位就等於『放棄』或類似放棄無產階級專政，那他簡直是不實地思索，而陷入空談。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對政策的領導，無產階級這領導階級，即統治階級，應當善於這樣來規劃政策，首先解

決最刻不容緩最「迫在眉睫」的任務。現在最刻不容緩的，就是能夠立刻提高農民經濟生產力的辦法。祇有經過這種辦法，才可達到既改善工人生活，又能鞏固農工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那些想不經過這種辦法來改善工人生活的無產者或無產階級代表，實際上祇會是白黨和資本家的走僕。因為不經過這種辦法，就無異是把工人的行會利益看成高於階級利益，就無異是爲了工人直接的、一時的、局部的利益，來犧牲整個工人階級底利益，犧牲工人階級專政底利益，犧牲工人階級聯合農民反對地主資本家這一聯盟底利益，犧牲工人階級在爲解放勞動擺脫資本桎梏的鬥爭中之領導作用底利益。

所以，首先要採取緊急和嚴重辦法來提高農民底生產力。

但若不嚴重改變糧食政策，就不能做到這點。這樣的改變便是用糧食稅來代替餘糧收集制，此種更替是與至少在地方經濟周轉中繳納稅務之後的自由貿易相聯繫的。

用糧食稅來代替餘糧收集制這政策的實質何在呢？

關於這點，有一種不正確的觀念流行着，而且流行得很廣。其不正確的地方，大部份是由於人們不洞悉過渡底實質，沒有反躬自問，究竟這一過渡是從什麼過渡到什麼上去，他們竟異想天開，彷彿過渡是由一般共產主義過渡到一般資產階級性上去。要來反對這種錯誤觀念，不免要指

出一九一八年五月我所說過的話。

糧食稅是從國幣端貧困、經濟破壞和戰爭而被迫採取的特殊「戰時共產主義」，過渡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物品交換制的一種過渡形式。而物品交換制，也就是從帶有居民內小農佔優勢所發生諸特點的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去的一種過渡形式。

特殊「戰時共產主義」原來是這樣的：我們從農民手裏實際上拿來了全部的餘糧，甚至有時還不僅是餘糧，而是農民底一部份必需食糧，我們拿來這些糧食，爲的是供給軍隊、供養工人。其中大部份，我們是當作債務拿來，因爲付給農民的都是紙幣。那時不如此，我們便不能在這樣經濟破壞的小農國家內，戰勝地主和資本家。而我們勝利了（那怕有過全世界最雄強的國家支持我國的剝削者），這一事實不僅表明，工人和農民在謀自身解放的鬥爭中，該能於建樹怎樣的英勇奇蹟，這一事實並且表明，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考茨基之流既拿「戰時共產主義」來歸咎於我們，他們所起的祇是資產階級走狗底作用。應該拿這「戰時共產主義」來歸功於我們。

但同樣還必須知道這一功績底真正範圍。「戰時共產主義」曾是戰爭和經濟破壞所逼迫實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適應無產階級經濟任務的政策。它乃是一種臨時的辦法，在小農國家實現自己專政的無產階級，其正確政策是用農民所必需的工業品來交換糧食，祇有這樣的糧食政策

才能適合無產階級底任務，祇有這樣的糧食政策才能鞏固社會主義底基礎，才能使社會主義進到完全勝利。

糧食稅是走向這種糧食政策的過渡。我國經濟至今還破壞得如此不堪，戰爭（這是昨天的戰爭，但因為資本家的貪暴，它明天還可以爆發的）把我們仍壓得這樣厲害，以致我們尚不能拿出工業品從農民那裏換得我們所必需的全部糧食。我們懂得這點，所以實行糧食稅，就是把必需（對軍家和工人）的糧食量，作為稅務徵收得來，而其餘的糧食，我們將用工業品去交換。

這裏，還不應忘記以下的情形，貧困與經濟破壞到了這種程度，竟使我們不能一下子來恢復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大工廠的生產。爲了這點，在各大工業中必需要儲存大量的糧食和燃料，需要有新機器來替代舊機器等等。我們根據經驗，深信一下子作到這點，是不可能的，並且我們知道，經過這重大破壞的帝國主義戰爭之後，甚至最富庶和最先進的國家，也祇有在一定的、相當長的、多年的時期內，才能解決這個任務。由此可見，必須在某種限度內幫助恢復小工業，它既不需要機器，也不需要國家大量的原料、燃料、糧食的儲存，——而又能立刻給予農民經濟以相當幫助，並提高它們的生產力。

這樣一來，結果又會怎樣呢？

結果就會在相當的（那怕祇是地方性的）自由貿易基礎上，復興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這是毫無疑義的，漠視這樣的事實便太可笑了。

試問，這是必要的麼？這是對的麼？這沒有危險麼？

同類的問題，發出得很多，但這些問題多半祇能暴露發出這些問題的人底幼稚氣（說得輕一點）。

請看我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怎樣規定我國經濟上現存各種社會經濟結構底成份（組成部份）。我國存在有自宗法的，即半野蠻的直到社會主義的所有這五種結構底全部五層梯級（或組成部份），誰要來爭辯這點，都會是徒勞無益的。在一個小農國家，不言而喻，是小農「結構」，即一部份是宗法的，一部份是小資產階級的結構佔着優勢。既有交換，則小經濟底發展，就是小資產者的發展，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乃是不庸爭辯的真理，是政治經濟學上最初步的真理，並且是甚至由世俗日常經驗和觀察所證實的真理。

社會主義無產階級處在這樣的實際經濟情況下，究竟能進行哪種政策呢？是把小農所必要的一切社會主義大工業生產品拿出給小農，去換得糧食和原料麼？這會是一個最如願的，最「正確的」政策，——這種政策我們也已經開始實行了。但是我們不能拿出全部工業品來，還遠不能拿

出，也不會很快便可能拿出——最低限度，當全國電氣化計劃的初批工作還未完竣之前，我們是不能拿出——這全部工業品來的。然則怎樣辦呢？或者是企圖把非國營的私人交換、即商業，亦即在有千百萬小生產者存在的條件下，這必然發生的資本主義底一切發展，完全加以禁止，完全封閉起來。一個政黨要是試行這樣的政策，就不僅是愚蠢，而且是自殺。其所以是愚蠢，因為這種政策在經濟上是行不通的；其所以是自殺，因為試行這類政策的黨，就必然會遭到破產。應當承認，共產黨員中，有人正墮入這樣的政策，而在『思想、言論、行動』上，犯了錯誤。我們力求糾正這些錯誤。一定要糾正這種錯誤，不然後事就不堪設想。

或者（最後一個可能的與唯一合理的政策）不去企圖禁止或封閉資本主義底發展，而力圖把這一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水道中去。這在經濟上是可能的，因為凡是有一般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成份的地方，那裏——在某種形式和某種程度上——就有國家資本主義。

是否能夠把蘇維埃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與國家資本主義配合、結合、滲合起來呢？

當然能夠。我在一九一八年五月所要證明的，正是這點。我相信，我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也證明過了這點。並且，當時我就證明說，國家資本主義較之小私有者的（小宗法制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說來，乃是一個進步。在現時政治經濟情勢下，必須把國家資本主義來與小資產

階級生產比較，而人們却把國家資本主義祇與社會主義相對照或比擬，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

全部問題——無論理論上或實踐上的問題——就是要找到正當的方法，應該怎樣把資本主義之不可避免的（在某種程度內和某種期限內是不可避免的）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水道中去，這必須賴有一些什麼條件，怎樣保證在不遠將來變國家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

爲了來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儘量明確地料想到，在我們蘇維埃制度內，在我們蘇維埃國家範圍內，國家資本主義實際上會是怎樣的，可能是怎樣的。

蘇維埃政權怎樣能把資本主義底發展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水道中去，以及它怎樣「培植」國家資本主義，此種情形之最簡明的例證，就是租讓制。現在我們這裏，大家都同意租讓制是必要的，但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思索到租讓制有何意義，就所有現存社會經濟結構及其相互關係說來，蘇維埃制度下的租讓制是什麼？它是蘇維埃，即無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在反對小私有者的（宗法的、小資產階級的）自發勢力時，與國家資本主義結成的一種合同、同盟或聯盟。承租人，這就是資本家。他們按資本主義方式經營業務，是爲了獲得利潤，他們與無產階級政權訂立合同，是爲了獲得高於普通利潤的額外利潤，或者說，是爲了獲得用別的方法所不能得到或極難得到的原料。蘇維埃政權所獲得的利益，便是發展生產力，便是立刻或在極短期內，增加生產品量，譬如

說，我們有一百個某種產地、礦山、林區，我們開採不了這全部產業——我們的機器、糧食、運輸工具不夠，因為這同樣原因，其餘各產區，我們也開採得不好。正由於大企業經營得不好，開採得不充分，以致小私有者自發勢力在各方面都加強起來；削弱附近的（以後便是整個的）農民經濟，破壞它的生產力，降低它對蘇維埃政權的信仰，盜竊公物行為與大量的雖小而最危險的投機業等等。蘇維埃政權『培植』像租讓制這樣的國家資本主義，也就加強大生產來反對小生產，加強先進生產來反對落後生產，加強機器生產來反對手工生產，增加由自己支配的（自己份內的）大工業生產品量，加強有國家調度的經濟關係來敵對小資產階級無政府狀態的經濟關係。恰當而審慎地進行租讓制政策，這無疑是能夠幫助我們迅速（在某種不大的程度內）改良生產情況，改善工農生活，——當然是有某些犧牲作代價，即要把千百萬普特極寶貴的物品交給資本家。使租讓制對我們有益而沒有危害，這種範圍與條件的確定，是取決於力量底對比，取決於鬭爭，因為租讓制也是一種鬭爭，是階級鬭爭另一形式底繼續，而決不是用階級和平來代替階級鬭爭。實踐會指明出鬭爭底方式。

租讓制的國家資本主義，較之蘇維埃制度下國家資本主義底其他式樣說來，差不多是最簡單、最顯著、最明豁、最確定的形式。這裏我們與最文明的、先進的西歐資本主義直接訂立正式

的書面合同。我們確知自己的利益與損失，自己的權利與義務；我們確知租讓的期限，如果合同上規定有先期贖回的權利時，我們也確知先期贖回的條件。我們給全世界資本主義支付一定的『貢款』，在某種關係上從他們那裏實行『贖買』，同時我們却能夠立刻獲得鞏固蘇維埃政權地位和改善我國經濟事宜的一定條件。關於租讓制這任務底全部困難歸結起來，就是在訂立租讓合同時，一切都要經過深思熟慮，以後就要善於監視該合同的執行。這裏，困難無疑義是有的，這裏，錯誤在初期定是不可避免的，但這些困難，較之社會革命底其他各種任務，特別是較之發展、容許、培植國家資本主義的其他各種形式說來，還是最小的困難。

由於施行糧食稅，所以黨與蘇維埃一切工作人員底最重要任務，是要善於把『租讓』（也如『租讓』制國家資本主義一樣）政策底原則、原理、基礎，運用到自由貿易，地方周轉等等資本主義底其他形式上去。

就拿合作制來說吧。無怪乎糧食稅法令引起對合作制原則要立刻重新審查，要相當擴大合作社的『自由』及其權利。因為合作制也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不過這種形式比較不很簡單，不很明確，情形比較亂雜，遂使我們政權在實踐上遇到更大的困難。小商品生產者合作社（這裏不是指工人合作社，而是指小農國家內佔優勢的、標本式的小商品生產者合作社而言）必然產生出小

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關係，促成這種關係的發展，把小資本家提到首位，給他們以最大的利益。既然是小業主佔優勢，既然交換是可能而且必要，那麼情形也祇能是這樣。在現時俄國條件下，合作社自由與權利，也就是資本主義有自由、有權利。不看見這一顯明的真理，便是愚蠢或罪惡。

但在蘇維埃政權之下，『合作社』資本主義與私人資本主義不同，它乃是變形的國家資本主義，正因為如此，所以此刻，它在某種程度上，顯然對我們有利益。糧食稅既能自由出賣其餘（在納稅之外）的剩餘品，那末我們就必須極力把資本主義底這種發展（須知自由出賣，即自由貿易便是資本主義底發展）方向引導到合作社資本主義水道中去。從便於統計、監督、監察以及國家（這裏是指蘇維埃國家）與資本家之間的關係上說來，合作社資本主義近似於國家資本主義。合作社這一商業形式，比私人商業要有益些，這不僅因為上述原因，並且因為它使於聯合與組織千百萬居民，進而聯合與組織全體居民，而這種情勢，在進一步由國家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觀點上來說，也就是巨大的優點。

我們來把國家資本主義底這兩種形式，即租讓制與合作社，加以比較吧。租讓制是依據於大機器工業，合作社是依據於零小手工業的，一部份甚至還是宗法式的工業。租讓制在每一單獨租

讓合同上祇關係於一個資本家或新迪加、卡特爾、托拉斯底一個公司。合作制則包括成千累萬以至幾百萬的小業主。租讓制容許，甚至預先要訂立確切合同和規定確切期限。合作制却不能有完全確定的合同或完全確定的期限。取消關於合作制的法律，比解除租讓合同要容易得多，可是租讓合同中斷，就是一下子、簡單、立刻中斷與資本家所作經濟聯盟或經濟「同居」底實際關係，至於取消關於合作制的法律以及一般任何的法律，都不僅不會一下子破壞蘇維埃政權與小資本家的實際「同居」關係，而且一般地也不能破壞實際的經濟關係。「監視」承租者容易，「監視」合作社手困難。由租讓制過渡到社會主義，是由一種大生產形式過渡到另一種大生產形式。由小業主合作制過渡到社會主義，是由小生產過渡到大生產，這種過渡是比較複雜的，但它在成功時就能包括更廣大的民衆，就能把舊的關係，社會主義前期的，甚至資本主義前期的，即最頑強反抗一切「革新」辦法的那些關係底深固根蒂拔除掉。租讓制政策奏效時，能使我們獲得爲數不多，但却合乎現代先進資本主義水準的模範（比較我國的說來）大企業；經過幾十年後，這些企業會完全轉歸我們所有。合作制政策奏效時，能使我們振興小經濟，能使小經濟在不定期間，按自願聯合原則，易於過渡到大生產去。

再舉第三種國家資本主義來說。國家把資本家當作商人吸引前來，由他來出賣國家貨物與購

買小生產者底產品，付給他一定的代買代賣的利息。第四種國家資本主義：國家把國有的某種場所或產區、林地、土地等租予企業資本公司，而且租借合同最與租讓合同相似。關於最後這兩種國家資本主義，在我們這裏，完全沒有人說到，完全沒有人想到，完全沒有人指出它們來。但所以這樣，並不是因為我們強大聰敏，而是因為我們軟弱蠢笨。我們害怕正視這種『粗淺真理』，過於往往為『欺騙性的抬舉』所支配。我們慣於認為『我們』正是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却忘記去明確想到究竟這『我們』是誰。我在一九一八年五月論文內所列舉的我國經濟中社會經濟底一切——定是一切，毫無例外——組成部份，一切不同結構，必須加以嚴重注意，使這一明確概念不致於忘記。『我們』，無產階級底先鋒隊，無產階級底前進部隊，正在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但這前進部隊是全體無產階級中不大的一部份，而無產階級也祇是全民衆中不大的一部份。所以要使『我們』能順利地解決我國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這一任務，就應當瞭解爲了使資本主義前期關係過渡到社會主義，究竟需要哪些間接的道路、方法、手段和補助辦法，全部關鍵就在這裏。

試看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底地圖吧。在沃洛果達以北，頓河岸羅斯托夫及薩拉托夫東南，奧倫堡和阿姆斯克以南，托姆斯克以北，這些茫無邊際的空曠地帶上，可以分佈幾十

個巨大的文明國家。可是在這些空曠地方，還是宗法制、半野蠻性以至真正野蠻性籠罩着。而在俄國所有其餘那些偏僻農村，又怎樣呢？那裏到處一成幾十俄里都是小路——正確些說：一成幾十俄里都是無路地區，把鄉村與鐵路隔離，即與文化、與資本主義、與大工業、與大城市的物質脈絡隔離。難道在這些地方不到處都同樣是宗法制、奧布洛莫夫精神……半野蠻性佔優勢麼？

俄國既是這種情況佔優勢，試問由這種情況能否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呢？是的，在某種程度上是可能的，但必須有一個條件，現在我們因作過一種大功告成的科學工作，對這一條件知道得很確切。這個條件就是電氣化。如果我們能建成幾十個區域的電站（現在我們曉得，在什麼地方用什麼辦法，能夠而且必須建成這些電站），如果我們能從這些電站中把電力傳導到每個村莊裏去，如果我們弄得到充分數量的電氣摩托及其他機器，那時就不需要，或者幾乎不需要由宗法制進到社會主義去的中間環節與過渡梯級。但我們深知，實現這『一個』條件，祇是做到頭批工作，就至少要花費十年的功夫，至於縮短這個期限，也祇有無產階級革命在英德美這些國家獲得勝利的情況下，才有可能。

在最近將來這幾年中，要善於想想那些便利由宗法制，由小生產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中間環節。『我們』往往總還這樣議論：『資本主義是禍害，社會主義是福利』。但這種議論是不正確

的，因為忘記了現存社會經濟結構底全部總和，而所涉及的祇是其中的兩種成份。

資本主義，若與社會主義比較，確是禍害。但與中世紀制度、與小生產、與聯繫着小生產者散漫性的官僚主義比較，資本主義便是福利。既然我們還無力實現由小生產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所以資本主義——它是小生產與交換底自發產物，——在某種範圍內便不可避免，所以我們也就應當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要把它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底水道內去），把它作為小生產與社會主義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

試舉官僚主義這個問題，請從經濟方面來加以觀察吧。在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時，官僚主義還不足令我們注意。十月革命半年之後，當我們自上至下已打破了這套舊官僚機關的時候，我們還感覺不到這一惡事。

過了一年。在一九一九年三月十八至二十三日舉行的俄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我們通過了新黨綱，在這黨綱中，我們公開地說，不要害怕承認惡事，要甘願把它暴露出來，加以揭破，使其遭人鄙棄，喚起同惡事作鬭爭的思想、意志、毅力和行動；並且說到『蘇維埃制度內官僚主義部份地復活』這點。

又過了兩年。一九二一年春，當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討論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官僚

主義問題，當俄國共產黨第十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二一年三月）總結了那與分析官僚主義有密切關係的爭論之後，我們便見到這一惡事是更加顯著，更加明確，更加猙獰可畏了。官僚主義底經濟根源是怎樣的呢？這種根源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已臻發展的資產階級，正爲了反對工人（局部地反對農民）底革命運動，需要官僚機關，首先是軍事的，然後是法庭等等的官僚機關。這種機關，我們這裏沒有。我國法院是反資產階級的階級法院。我國軍隊是反資產階級的階級軍隊。官僚主義並不在軍隊中，而是在爲軍隊服務的機關裏。我國的官僚主義具有另一種經濟根源：小生產者底散漫零星狀態，他們的貧困、不開化、交通閉塞、文盲現象，農業與工業間缺乏周轉，兩者間缺乏聯繫和協助作用。這大部份是國內戰爭的結果。當我們被敵人四面封鎖，各方包圍，失去同全世界的連絡，以後又與南方糧區，與西伯利亞，與煤區斷絕關係的時候，我們是無法恢復工業的。那時我們本應當敢於實行『戰時共產主義』，不怕採取過激辦法；我們忍受得住半飢餓的，甚至比半飢餓更壞的生活狀況，但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堅持工農政權，縱然有空前未聞的最大經濟破壞現象和缺乏周轉的情形，我們也定要堅持住工農政權。我們並不會被那些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他們實際上大都是因爲恐懼，因爲驚嚇，才去擁護資產階級）嚇倒了的

事物所嚇倒。然而那種在一個被封鎖國家中，在一個被包圍要塞內本來成爲致勝條件的東西，在

一九二一年春，當最後一批白匪澈底被驅出蘇俄領土之後，却表現出了自己的反面。在一個被圍的要塞內，可能而且應當『停閉』一切周轉；因為羣衆底特別英勇精神，使這種情形可以忍受到三年之久。自此以後，小生產者底破產，更加厲害了。恢復大工業一舉，更加拖延，更加緩慢了。於是『被包圍』結果所產生的官僚主義，即小生產者之散漫與萎靡狀態的上層建築物，便充分顯露出來。

應該大胆承認惡事，爲的是要更堅決地同惡事作鬭爭，爲的是要再次再次地從頭開始——在將來我國建設底一切部門中，我們還不得不多番重複地從頭做起，改正沒有作成的事情，選擇各種達到完成任務的道路。既然恢復大工業要延期了，既然工農業間的周轉『被停閉』得不可忍受，那就應該從較易做到的事開始，即從恢復小工業開始。從這方面來幫助事業，把被戰爭與封鎖弄得一半倒塌的建築物底這一邊支撐起來。要用盡一切辦法，無論如何都要發展工農業的周轉，不要害怕資本主義，因爲在我國（經濟上由於剝奪地主與資本家，政治上由於存在有工農政權）給予資本主義活動底範圍是充分狹隘，充分『不大』的。這就是糧食稅底基本意思，這就是糧食稅的經濟意義。

黨與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人員，應當用全副力量和百般注意去造成和喚起各地方在經濟建設事

業中的大量主動精神，——省裏的要大，縣裏的更大，區裏的和鄉裏的更要大，——其目的是要刻不容緩地，那怕就是用『小』資料，在小範圍內去振興農民經濟，藉發展附近的小工業來幫助農民經濟。全國統一的經濟計劃，正要使這點成爲注意和關懷底中心，成爲『突擊』工作底中心。這裏所已經達到的，最接近於那極廣泛深沉『基礎』的某種改善，都能使我們在最短期間去更熱烈更順利地恢復大工業。

糧食工作人員至今祇知道一個基本指令：收集百分之百的餘糧。現在是另一個指令了：在最短期間，徵來百分之百的糧稅，然後又用大工業和小工業生產品，再換來百分之百的糧食。一個徵來百分之七十五的糧稅和另用大小工業生產品換來百分之七十五（從第二個百分數中）糧食的人，他所做的有利於國家的事，比另一個徵來百分之百的糧稅和用工業品換來百分之五十五（從第二個百分數中）糧食的人，要多得多。糧食工作人員底任務複雜起來。一方面，這是國家財政上的任務。要儘量快和儘量合理地徵收糧稅。另一方面，這又是一般經濟的任務。要極力這樣去引導合作社，這樣去補助小工業，這樣去發展地方的主動性和首創精神，使農業和工業間的周轉得以增大與鞏固。我們還沒有學會做這件事，做得很壞很壞；拿官僚主義來說，也就可以證明這點。應該大胆承認，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多東西可以而且應當向資本家學習。我們按省、縣、區、鄉

來把實際經驗總結加以比較吧：有的地方，私人資本家和小資本家達到了某種成就。他們獲得的利潤，大約是多少。這也就是我們爲了『領教』所付出的酬金。爲了領教，是不惜破費的，祇要能够獲益就行。在隣近地方，辦合作社也有了某種成就，合作社底利潤如此如此。至於在第三個地方，用純粹國家的，純粹共產主義的方式，也達到了什麼成績（這第三種情形在目前是罕有的例外）。

任務應當是這樣，要使每個省的經濟中心，每個省蘇維埃執委會下的經濟會議，立刻把農民繳納糧稅後餘糧『周轉』底各種經驗或制度加以組織好的問題，提在首位。幾月之後，就應當有實際結果，好來從事研究與比較。本地鹽或外來鹽；從中心運來的煤油；手工木業；靠本地原料，生產某些雖不很重要，但於農民有利的必需品的手工業；『綠煤』（利用當地小規模的水力來發電）等等等等——這一切都應當動用起來，無論如何都要活躍工農業間的周轉。誰能在這方面，那怕是用私人資本主義的辦法，甚至是沒有合作社，沒有直接變這資本主義爲國家資本主義，而能達到最大的成績，則他對於全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貢獻，比較那些祇會『着想』共產主義底純潔，祇會對國家資本主義和合作社頒寫規章、條文、訓令，但實踐上却不能推動這種周轉的人，要多得多。

可以把這視若奇談：私人資本主義會成爲社會主義底輔助物麼？

但這絲毫也不是奇談，而是經濟上完全不庸爭辯的事實。既然一個小農經濟的國家，經過了戰爭與封鎖，運輸業遭到重大破壞，而在政治上是由掌握有運輸業和工業的無產階級所領導，那末，根據這種情形，第一，就必然產生現時地方周轉底頭等意義，第二，就能够經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

儘可少來爭論名詞。直到現在，我們在這方面，還犯着多得無窮的錯誤。在實際經驗中，儘可多具有各種不同的樣式，儘可多來研究這些樣式。往往甚至是範圍最小的模範地方工作，較之中央國家工作底許多部門，具有更重要的國家意義。目前我國恰在一般農民經濟，特別是用工業品交換農業剩餘品方面，其條件正是如此。在上述關係中，雖則是一個區的模範工作佈置，較之『模範』地改善某人民委員部中央機關這工作，有着更巨大的全國意義。因爲我們的中央機關在這三年半來，已經弄到這種程度，居然擁有某些有害的因循慣習；我們不能把這種機關大大地和迅速地加以改善，這點，我們還不知道怎樣做是好。要幫助中央機關來比較急遽地從事改善，使之增加大批新生力量，使之順利地同官僚主義作鬥爭，使之克服有害的因循慣習，這種幫助就應當從地方得來，從下層得來，從一個不大的『整體』模範佈置中得來，不過，所需要的，正是這

樣的「整體」，即不是一種經濟，不是一個經濟部門，不是一個企業，而是一切經濟關係底總和。那怕是在不大的地方範圍內的一切經濟關係底總和。

我們中間，凡屬必須留在中央機關工作的人，即令是在相當狹小和直接能做到的範圍內，也得繼續進行這改善機關的工作，清洗其中的官僚主義。但在這方面，主要幫助是來自地方，並且一定可能從那裏來到。據我看來，我們各地方的情形比在中央這裏一般地要好一些，這是很明顯的，因為官僚主義底惡事，自然是集中在中央這裏；在這方面，莫斯科不能不是一個壞城市，並且一般是共和國內最壞的「地方」。在地方上，有兩種傾向；壞傾向要比好傾向少些。所謂壞傾向，就是那些混入到共產黨裏來的舊官僚、地主、資產者及其他敗類之從中舞弊，他們有時對農民作出種種暴戾欺凌的有害行為。這裏要用恐怖手段來實行清洗；就地審判，無條件地槍決。讓馬爾托夫輩切爾諾夫輩以及類似他們的非黨市侩，去拍胸叫呼：「謝謝上帝，好在我與「他們」不同，好在從來我都不贊成恐怖手段」。這些傻瓜「不贊成恐怖手段」，因為他們所起的作用，是專在愚弄工農這點上替白匪當鷹犬當奴僕。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不贊成恐怖手段」，因為他們所起的作用，是藉「社會主義」旗幟的掩護，把群眾引進到白匪的恐怖手段下去。俄國的克倫斯基時代與科爾尼洛夫叛亂，西伯利亞的高爾察克匪行，格魯吉亞的孟塞維主義，都證實了

這點；芬蘭、匈牙利、奧地利、德國、意大利、英國等的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英雄們的行為，也證明了這點，讓白黨恐怖主義底鷹犬奴僕們去誇耀他們否認一切恐怖手段吧。而我們還是要說出這一嚴重而不庸置疑的真理：在那些經歷着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大戰後空前危機，舊的社會關係中斷和階級鬭爭尖銳化的國家裏，——世界一切國家都是這樣，——不管種種偽善與空談，沒有恐怖手段是絕對不行的。或者是美國的、英國（對愛爾蘭）的、意大利（對法西斯蒂）的、德國的、匈牙利的以及其他樣式的白匪和資產階級的恐怖手段，或者是赤色的，無產階級的恐怖手段。決沒有中間手段，沒有，而且也不會有『第三種』手段。

好傾向就是：有成效地同官僚主義作鬭爭，極力注意工人和農民底需要，最關心振興經濟事宜，提高勞動生產率，發展各地工業與農業間的周轉。這種好傾向，雖則比壞傾向頻繁一些，但畢竟還嫌太少。可是這好傾向總算是有了。被國內戰爭和貧乏現象所鍛鍊出來的新穎的、年輕的、生動的共產主義力量，各地到處都在成長着。對於自下而上，不屈不撓，有系統地來推進這種力量，我們總還做得遠遠不夠。這點可以而且必須更廣泛和更堅定地做去。能够並且必須把某些工作人員從中央工作中調到地方工作中去：使他們以縣和區領導人資格，在那裏從各方面把整個經濟工作模範地佈置起來，這樣，他們會有極大的貢獻，並能比某個中央機構作出更重要的全

國性的事業。因為模範工作，將成爲工作人員的養成所和被人效法的榜樣，有了這種榜樣再來加以效法，就相當不困難了，而我們又能從中央這裏來加以幫助，使這種模範例子務必在到處廣泛『採用』。

靠繳納糧稅後的剩餘農產品和小工業，主要是手工工業，來發展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這一事業的本身就需要有地方之獨立的、明達的、聰穎的主動精神，所以從全國家的觀點來說，樹立縣區的模範工作，在目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軍事上，例如，在最後一次抗波戰爭期間，我們未曾害怕違背官僚主義的等級制，沒有害怕『降低位置』，竟把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仍保留他們那高級的，中央機關的職務）調遣到較下級的地方去工作。爲什麼現在又不能將全俄中央執委會或其他委員會的某些委員，或其他身任要職的同志們，甚至派遣到縣裏甚至派遣到區裏去工作呢？真的，我們並沒有『官僚化』到這種程度，竟會因此『窘恨』起來。何況我們這裏，能够找得出幾十個甘願去担负這種工作的中央工作人員。全共和國經濟建設事業會由此收到非常巨大的成效，而若干模範區或模範縣，就會起着不僅是巨大的，而簡直是有歷史意義的決定作用。

順便說說，在同投機業作鬭爭這問題的原則提法上，應該加以必要的變更，雖則這是小節，

但總還是有意義的。凡是不逃避國家監督的「正當」貿易，我們應當加以支持，發展這樣的商業對我們是有利的。但如果從政治經濟意義上來瞭解投機業，那麼投機業與「正當」貿易也就不能區分開來。自由貿易便是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便是投機業，——不看到這點是很可笑的。

又怎樣辦呢？難道要宣佈投機業不受懲罰麼？

不是的。要重新審查與重新製定關於投機業的一切法令，宣佈一切盜竊公物行為和一切直接或間接，公開或隱秘地逃避國家監督、監察和統計的不法行為，都應受到懲罰（實際上應比以前加倍查究）。正要這樣來提出問題（人民委員會已經開始這種工作，也就是說，人民委員會已經下令重新審查關於投機業的法令），我們才能達到把資本主義底必然發展，而在某種範圍內對我們還是必要的發展方向，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的水道中去。

政治總結和結論

我還要簡略地講講，因上述經濟情況，究竟目前的政治形勢起了什麼變化。

我已經說過，一九二一年我國經濟底基本特徵，是與一九一八年時相同，一九二一年春，主

要由於歉收和牲畜死亡，遂使原來因戰爭和封鎖就已非常嚴重的農民生活狀況，極端惡化下去。生活惡化底結果，便是一般爲小生產者所「特具」的政治動搖，這種動搖最顯明的表現，就是喀琅施塔得的叛亂。

喀琅施塔得事變中最顯著的特徵，正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底動搖。而充分形成了的、明顯的、確定的東西却很少。大都是「自由」、「自由貿易」、「解放」、「沒有布爾塞維克參加的蘇維埃」、或改選蘇維埃、或擺脫「一黨專政」等等等底模糊口號。無論孟塞維克或社會革命黨人，都宣稱喀琅施塔得運動是他們「自己」的運動。切爾諾夫派了一個專使到喀琅施塔得去：依據這位專使的提議，喀琅施塔得叛亂領袖之一，即孟塞維克法爾克也贊成「立憲會議」。所有一切白黨份子，快得像迅雷疾電一樣，立刻動員起來「擁護喀琅施塔得」。喀琅施塔得的白黨軍事專家，不止是科茲洛夫斯基一人，還有其他許多專門家，製定了在奧蘭林坂登陸的計劃，這個計劃把擁護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那班動搖不定的非黨羣衆都嚇倒了。有五十種以上在國外出版的白黨俄文報紙，展開了瘋狂的運動，來「擁護喀琅施塔得」。許多大銀行以及財政資本底全部力量舉行援助喀琅施塔得的募捐運動。資產階級與地主底一位聰明首領，立憲民主黨人米留可夫耐心地向切爾諾夫這傻瓜直接解釋（而向那些因與喀琅施塔得事件有關，被禁在彼得堡監獄裏

的孟塞維克唐恩和羅什科夫則間接解釋）說，用不着忙於召集立憲會議，可以而且應當贊成，祇要是沒有布爾塞維克參加的蘇維埃政權。

當然，要比像切爾諾夫這樣的小資產階級空談英雄，或馬爾托夫這樣的冒充『馬克思主義』的市儈改良主義武士，即此類妄自尊大的傻瓜們聰明一些，並不困難。老實說，這並不是因為馬爾托夫為人要聰明一些，而是因為大資產階級黨的領袖，由於自己的階級地位，而對問題底階級實質和政治上的相互關係，較之小資產階級底領袖切爾諾夫輩和馬爾托夫輩看得清楚些，懂得好一些。因為資產階級真正是階級力量，它享有全世界資產階級的必然贊助，它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是君主政體內或甚至最民主的共和國內，必然居於統治地位。至於小資產階級，亦即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底全體英雄，按其經濟地位實質說來，唯一祇能是階級軟弱無力的表現——由此也就產生出動搖、空談和軟弱無力。在一七八九年，小資產者還能成為偉大的革命家；在一八四八年，他們已是可笑而又可憐；而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時，按其實際作用來說，不管他們是被稱為切爾諾夫輩或馬爾托夫輩，考茨基之流或麥克唐納之流等等等，總之，他們都是反動勢力底可惡鷹犬及反動勢力的直接奴僕罷了。

當馬爾托夫在柏林自辦的雜誌上聲明說：彷彿喀琅施塔得不僅實行了孟塞維克的口號，並且

還證明了可能有個並非完全向白黨、資本家和地主服務的反布爾塞維克運動發生，這正是標本市儉式的自尊自傲精神：喂，我們就簡單閉着眼睛，不去管那所有一切真正白黨都歡迎喀琅施塔得叛亂者，並經過銀行募款幫助喀琅施塔得叛亂的事實吧！米留可夫與切爾諾夫輩和馬爾托夫輩比較起來，他的話是對的，因為他揭舉出真正白黨力量，即資本家地主力量最底真正策略：喂，我們來援助任何人那怕是無政府主義者都行，援助任何蘇維埃政權都行，唯一是要能推翻布爾塞維克，唯一是要使政權轉移！不管它向右移去或向左移去，不管移到孟塞維克上去或移到無政府主義者手裏去，橫豎一樣，唯一是要把政權從布爾塞維克手裏移走；至於其餘的事，——由『我們』米留可夫派，由『我們』資本家地主，『親自』來作好了，我們將把無政府主義者小卒們，切爾諾夫輩、馬爾托夫輩一喝趕掉，也像在西伯利亞趕走切爾諾夫和馬依斯基，在匈牙利趕走匈牙利的切爾諾夫輩和馬爾托夫輩，在德國趕走考茨基，在維也納趕走阿得列爾之流一樣。這類自尊自傲的市儉——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非黨份子，曾被真做實幹的資產階級成千累百的愚弄過，被他們在一切革命中，在一切國家中百十次地趕走過。這是歷史所已經證明了的，這是事實所已經檢驗過的。自尊自傲之輩將繼續侈口空談。米留可夫輩和白黨份子却將真做實幹哩。

稍微向右移去或稍微向左移去，橫豎一樣，唯一是要把政權從布爾塞維克手裏移走，至於其餘的事，也就自然迎刃而解，在這點上，米留可夫完全對的。這乃是一切國家和自中世紀以來新時代底一切革命史所證實了的階級真理。零星散漫的小生產者，即農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或者是由資產階級來聯合他們（這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在一切國家，在新時代一切革命中，從來往往就是如此，祇要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還永遠會是如此），或者是由無產階級來聯合他們（這在新時代某些最偉大革命高潮中最短促期間的萌芽形式上曾經有過；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俄國之比較發達的形式上也有過）。祇有妄自尊大的倨傲之輩，才能空談與夢想什麼『第三條』道路，什麼『第三種』勢力。

布爾塞維克費過極大的氣力，在決死的鬭爭中，培養出了能於實現管理的無產階級先鋒隊，創立並堅持了無產階級專政，經過四年來的經驗與實踐檢驗之後，俄國階級力量的相互關係，已經成爲再顯然不過的了。唯一革命階級之受過鍛鍊的銅鐵般的先鋒隊，小資產階級之動搖不定的自發勢力，再就是隱匿在國外並擁有全世界資產階級援助的米留可夫輩，資本家和地主們。問題是再明顯不過的了。祇有他們才利用和能夠利用各種所謂『轉移政權』的勾當。

在上述一九一八年那本小冊子中，關於這點直接說道：『主要敵人，是『小資產階級自發勢

力」。『或者是我們使這種勢力來服從我們的監督與統計，或者急這種勢力必然地和不免地推翻工人政權，如同正是在這小私有制基地上成長起來的拿破崙和卡芬雅克輩之曾經推翻革命一樣。問題就是如此。問題也祇是如此』（摘自一九一八年五月五日的小冊子，見以上本文）。

我們的力量，就是對俄國及國際現存一切階級力量有充分明顯和清醒的估計，再就是由此產生之鬪爭中的鋼鐵毅力、堅韌不拔、堅決性和奮不顧身的精神。我們的敵人很多，但他們是分裂的，或者不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如一切小資產者，一切馬爾托夫輩和切爾諾夫輩，一切非黨份子，一切無政府主義者）。而我們是聯合的——本身的直接聯合，與全世界無產者的間接聯合；我們知道自己所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們在國際範圍內，是不可戰勝的，但這絲毫也不排除在某一時期中個別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有遭受失敗的可能。

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無怪乎被稱為自發的勢力，因為這實在是一種無定形的、不固定的、不自覺的東西。小資產階級底自尊自傲之輩，以為用『全民投票』就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下小生產者底天性，但其實這祇是幫助資產階級，是藉助於教堂、刊物、教師、警察、軍閥機關、無數的經濟壓迫形式，幫助資產階級去壓服零散的小生產者。破產、貧困、艱難生活引起動搖；今天贊助資產階級，明天贊成無產階級。祇有經過鍛鍊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才能於巍然屹立來對抗這種

動搖。

一九二一年春的事變，再次表明了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底作用：他們幫助動搖的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從布爾塞維克方面動搖開去，幫助把『政權轉移』到資本家和地主方面。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現在學會了用『非黨人』來加以粉飾。這是已經充分證明了的。現在也祇有傻瓜才能不看見這點，才不懂得，我們是不應受人愚弄的。非黨代表會議並不是可以盲目崇拜的東西。如果我們能接近尚未沾染政治的羣衆，接近不問政治的千百萬勞動者，則這種會議是有益的，但如果它們變爲以『非黨人』自飾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講壇，那這種會議便有害了。因爲這班人幫助叛賊，幫助白黨。無論是公開的或粉飾爲非黨人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他們的位置却應該是在監獄裏（或在國外雜誌上與白黨併列；我們甘願放走了馬爾托夫到外國去），而不是在非黨代表會議上。可以而且應當另找檢查羣衆情緒和接近羣衆的方式。讓那些甘願玩賞議會制，立憲會議和非黨代表會議的人到外國去吧，請你們到那裏去，到馬爾托夫那裏去，請嘗嘗『民主制』的滋味，請問開弗爾格爾的兵士，究竟這滋味是怎樣的吧。可是我們決不得在這些『代表會議』上來幹『反對派』的勾當。我們處在全世界資產階級包圍之中，這班資產階級時時刻刻都在窺伺各種動搖，以便把『自家人』送回，以便恢復地主與資產階級。不管是公

開的或粉飾爲「非黨人」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總之我們是要把他們開在監獄裏的。

祇是把那些便於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利於米留可夫的動搖的方式除外，我們將用一切方式來更緊密地與尚未沾染政治的勞動羣衆發生聯繫。我們將特別熱心地提拔成千累百的非黨人員，即羣衆中，下層工農中的真正非黨人員來担負孟塞維埃工作，首先是担負經濟工作，決不是提拔「粉飾」爲非黨人好來暗中奉行有利於米留可夫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訓令的份子。我們這裏，有成百成千的非黨人員在工作着，其中有幾十個是担負極重要極負責的職務。要多多檢查他們的工作。要多多提拔成千百的下層勞動者來作新的檢查，要考驗他們，根據經驗所檢查的結果，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成百地提拔他們到高級職位上去。

我們的共產黨員至今還很少善於瞭解自己在管理上的真正任務：不是要力求「親手」担當「一切」，反而弄得顧此失彼，一事無成，而是要去檢查幾十幾百個助手的工作，組織自下而上的檢查，即由真正羣衆來檢查他們的工作；一面來指導工作，同時要向那些有專門知識的人（專門家）和有調整大經濟經驗的人（資本家）學習。聰明的共產黨員決不怕向軍事專家學習，那怕十分之九的軍事專家隨時都有叛變的可能。聰明的共產黨員決不怕向資本家學習（姑無論這資本家是承租企業的大資本家，或者承買承賣的商人，還是小的合作社資本家），雖然這資本家並不

比軍事專家可靠一些。我們學會了在紅軍中挑選改變的軍事專家，獎勵正直忠誠的軍事專家，總共運用了成千成萬的軍事專家。對於工程師、教師，我們也在學習這樣做（採取特有的形式）——但在這方面，我們所做的，比紅軍裏要壞得多（那裏，鄧尼金和高爾察克向我們催趕的很好，曾迫使我們儘量迅速、儘量勤奮、儘量有效地學習）。至於對承買承賣的商人，對替國家工作的買辦，對小的合作社資本家，對企業承租主等等，我們也要學會這樣做的（也是採取特有的形式）。

工農羣衆需要立刻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要把新的力量，其中也有非黨人員，安置在有益的工作上面，我們也就定可做到這點。糧食稅及其他與之有關的種種設施，定會幫助這點。我們可以藉此斬斷小生產者之必然動搖的經濟根源。至於對那般祇有利於米留可夫的政治動搖，我們將毫不留情地與之鬭爭。動搖份子多，我們的人少。動搖份子是分裂的，我們是統一的。動搖份子在經濟上是依賴的，無產階級在經濟上是獨立的。動搖份子不知道他們自己所想做的事；又愛，又怕，米留可夫又不允許他們這樣做。可是我們却知道我們所想做的事。

所以我們一定會勝利。

結 論

我們的結論：

糧食稅是由戰時共產主義進到正常的社會主義物品交換制的過渡。

由於一九二〇年歉收而更加厲害的經濟極端破壞現象，沒有可能迅速恢復大工業，使這種過渡成爲刻不容緩的必需辦法。

從此：要首先改善農民生活狀況。辦法：是糧食稅，發展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發展小工業。

周轉就是自由貿易，就是資本主義。它能幫助我們與小生產者底散漫性作鬭爭，並在某種程度上也與官僚主義作鬭爭。在這一範圍內，資本主義對我們是有益處的。實踐和經驗會來規定這範圍的大小。當無產階級堅牢地掌握着政權，牢固地把握着運輸業和大工業的時候，這裏對無產階級政權說來，並沒有絲毫可怕的地方。

應當將反對投機業的鬭爭轉爲反對盜竊公物行爲，反對迴避國家監察、統計和監督的鬭爭。

我們用這種監督把在相當範圍內是不可避免以及對我們說來還是必需的資本主義，引導到國家資本主義底水道中去。

在振興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中，無論如何要在各方面極力發展地方底主動性、首創性和獨立精神。研究這方面的實際經驗。這種經驗儘可能要是各式各樣的。

幫助供應農民經濟並促成其發達的小工業；在某種程度內，並給以國家原料，這樣來幫助它。讓原料留着不用，這是罪大惡極的行爲。

不要害怕共產黨員去向資產階級專門家「學習」，其中也向商人，也向小的合作社資本家，也向資本家「學習」。向他們學習應按另一種形式，但實質上是與我們曾向軍事專家學習並學會了一樣。「學習」底結果，祇有靠實際經驗來檢查：要做得比旁邊資產階級專門家所做的好一些，要能夠用各種辦法振興農業，振興工業，使農業與工業間的周轉發達起來。爲了「領教」要「不惜破費：多花點錢去學習，決不可惜，祇要能受到教益。」

竭力幫助勞動羣衆，接近他們，從他們中間提拔出成百成千的非黨工作人員來擔負經濟職務。至於對那些正是改穿着很時髦的喀琅施塔得式的非黨服裝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班「非黨」人物，——就要極小心地把他們禁閉在監獄裏，或者遣送他們到柏林馬爾托夫那裏，去

自由地享受純粹民主制底一切滋味，去自由地同切爾諾夫，同米留可夫，同格魯吉亞的孟塞維克交換意見吧。

一九二一年五月印成單行本出版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六卷，第三一七至三五二頁

列寧·現時和社會主義完全

勝利後金子底作用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五日——

把注意力集中到還沒有解決的革命任務上，——這是慶祝偉大革命紀念日的最好辦法。現在當還存在有革命尚未解決的一些根本問題，並需要去通曉某種新的東西（從迄今以前這革命中已做到的一切看來）以便解決這些任務的時候，這樣來慶祝革命，乃是特別適當和特別必要的。

對於我國革命說來，現時的新東西，就是在經濟建設底根本問題上，必須去採用「改良」的、逐次的、審慎迂迴的行動辦法。這件「新奇事情」，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引起許多問題和許多誤解。

理論上的問題是：在整個革命全盤勝利進程的條件下，在實行了許多最革命行動的同一境地，却轉而採取非常「改良」的行動，這種轉變又怎樣來解釋呢？這裏是否有「放棄陣地」、

『承認破產』等類的情事呢？我們的敵人，自半封建式的反革命派起直至孟塞維克或第二半國際底其他英雄們止，當然，都說是有理的。正因為他們是敵人，所以就不管有沒有理由，總在大聲疾呼地這樣聲明。從封建派直到孟塞維克止的一切政黨在這個問題上津津動人的統一，祇又一次證明所有這些政黨真是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一羣反動派』（順便說說，正如一八七五年和一八八四年恩格斯致伯伯爾的信中所預見到的一樣）。

但在友人中，也有某種：『誤解』之處。

我們要恢復大工業，並調整大工業與小農業間的產品交換，幫助小農業走向社會化。爲了恢復大工業，我們用餘糧收集制的辦法，從農民那裏借來某種定量的糧食與原料。這就是我們在一九二一年春以前那三年多內所實行過的計劃（方法或系統）。這在直接與充分摧毀舊社會經濟制度而代之以新社會經濟制度的意義上說來，曾經是解決任務的一個革命辦法。

自一九二一年春以來，我們却實行着完全是另一種的，改良式的辦法（固不是『已實行了』，而祇還是『正在實行着』，並且對這點我們還沒有充分悟解到）以代替原先行動中的辦法、計劃、方法或系統。所謂改良式的，就是說：並非摧毀舊社會經濟結構，即商業、小經濟、小營業、資本主義，而是振興商業、小營業和資本主義，寧願而逐漸地來把握它們，或者說，祇是按它們振

與的程度，使之有可能由國家來加以調劑。

這完全是解決任務的另一種辦法。

比較原先革命的辦法說來，這乃是改良的辦法（革命就是最基本地、最根本本地摧毀舊事物的改造手段，而不是力求把它摧毀得儘量少，不是審慎地、緩慢地、逐漸地來改作它）。

於是有人問道：既然你們試行過革命方法，認為這種方法無效，轉而採用改良方法，這豈不是證明你們一般地宣佈，革命是錯誤麼？這豈不是證明本來一般地就不應該先從事革命，而應該先從事改良，並只限於改良麼？

孟塞維克及其同流們所作出的結論，便是如此。但這種結論，或者是那班經過政治「火焰」鍛鍊的人底詭辯和簡單的騙詐行爲，或者是『未經』真正考驗的人底幼稚言論。對於一個真正革命家說來，最大的危險，——也許，甚至是唯一無二的危險，——就是革命誇大狂，忘却革命方法之適當運用與順利運用的界限和條件。真正的革命家，假使一開始就大書特書『革命』，而把『革命』抬高到幾乎是神妙而不可攀的東西，但却毫無頭腦，毫無能力去最冷靜地、最清醒地來想像、估量和檢查：究竟在什麼時機、什麼環境、什麼活動領域內，應該善於按革命方式來行動，而在什麼時機、什麼環境、什麼活動領域內，應該善於轉為改良的行動，那麼，他們在這個

問題上最易於一敗塗地。真正的革命家，假使失去清醒頭腦，一心設想彷彿「偉大的、勝利的、世界的」革命，在一切行動領域的各種環境下，其一切任務都可以而且必須按革命方式來解決，祇有在這種情況下，他們才會遭到滅亡（並非指他們外表上的失敗，而是指他們事業內部的破產）——且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必定遭到滅亡。

誰要是這樣「設想」，誰就必遭滅亡，因為他在根本問題上所設想的純係蠢事，而在殘酷戰爭（革命是最殘酷的戰爭）期間，對蠢事的懲罰，往往就是失敗。

根據什麼能得出結論，說「偉大的、勝利的、世界的」革命所可以採用和必須採用的方法，祇能是革命方法呢？這種結論是毫無根據的。並且這一結論簡直無條件地是錯誤的。如果不離開馬克思主義立場，從純粹理論原則上說來，這種結論顯然是不正確。我國革命的經驗也證實了這種結論是錯誤的。在理論上：恩格斯說，革命期間，亦如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能作出蠢事來的，他的這句話乃是真理。應該極力少作蠢事，對已經做過的蠢事，要儘快加以糾正，要儘量清醒地估計到，在什麼時候，哪些任務可以用革命方法去解決，哪些任務却不能用革命方法去解決。我們有過親身的經驗：布列斯特和約，完全不是革命行動底標本例子，而是改良行動，甚至比改良行動更壞的一種行動底標本例子，因為這是開倒車；至於改良的行動，照例乃是緩慢地、

審慎地、逐漸地前進，但不是開倒車。在締結布列斯特和約時，我們策略的正確性，現在已全被證實，已爲人所公認共曉，因而對於這個問題，完全沒有再提的必要。

我們所充分做到了的，僅僅是我國革命中關於資產階級民主方面的工作。而我們充分有權來以此自豪。這個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或社會主義的工作，歸結起來有以下主要三種：（一）用革命手段擺脫了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揭破並拆垮了資本主義世界兩大強盜集團底撕殺；這點從我們這方面，是充分做到了的；但要在各方面把這點澈底做到，那祇有靠幾個先進國家內的革命。（二）建立了蘇維埃制度，亦即建立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世界的轉變業已告成。資產階級民主議會制時代業已終結。全世界歷史底新篇章，即無產階級專政時代開始了。祇是要由其他許多國家來完善和完成蘇維埃制度和無產階級專政底一切形式。在這方面，我們所尚未作成的事，還非常之多。如果不看清這點，那便是不能饒恕的。我們還要多次地來完成、改造和從頭做起。今後在發展生產力與文化的事業上，我們所能前進與上升的每一梯級，都應當與完成和改造我們蘇維埃制度這點，併駕齊驅；而我們在經濟和文化方面，却遷落後得很。尙待改造的事情還非常之多，如果以此『根顏自慚』，那就妄誕至極（甚至比妄誕更壞）。（三）社會主義制度基礎底經濟建設。在這方面，最主要和最根本的事還沒有做到。而這也就是我們最可靠的事業，無論從原

則觀點或實踐觀點看來，亦無論從現在蘇俄的觀點或國際的觀點看來，都是最可靠的事業。

既然，最主要的事在其本身基礎上還沒有完成，那麼全部注意力就應當放在這方面。這裏，困難的地方也就在過渡形式上。

我在一九一八年四月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一文上，曾這樣寫道：

『僅僅一般地做個革命家和社会主義擁護者或共產主義者，還是不夠的。必須善於在每個時機裏找出鏈條上的一個特別環節。這個環節是爲了把握住整個鏈條並穩穩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所必須用全力抓住的；同時，在事變發展的歷史鏈條裏，各個環節的次序，它們的形式，它們的習連，它們彼此間的區別，都不像鐵匠所製成的普通鏈條那樣簡單，那樣笨拙。』

目前在我們所說的活動上，這樣的環節就是要由國家對國內商業實行正確的調節（指導），來振興國內商業。商業便是在歷史事件鏈條中，即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各個過渡形式中，我們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我們居領導地位的共產黨，『必須用全力抓住的環節』。如果我們現在把這一環節『抓住』得充分牢固，那麼在最近將來，所有整個鏈條，我們就定能把握住。否則我們既抓不住整個鏈條，而社會主義的社會經濟關係基礎，也無從建立了。

表面上，這好像是很奇怪的。共產主義和商業？！彷彿這兩者乃是什麼極不連貫、格格不入、

相距遙遠的事物。但如果從經濟上深思一下，則這兩者間的距離，並不比共產主義之隔小農經濟和宗法農業的距離更遠。

當我們將來在世界範圍內勝利了的時候，我想，我們會在世界幾個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金子築成些公共廁所。這樣使用金子。對於這些後代人說來，乃是最『公平』而最有教益的辦法，因為他們還沒有忘記，正是爲了金子的緣故，曾於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偉大解放』戰爭中，亦即在爲了解決這個大問題——是布列斯特和約壞些，還是凡爾賽和約壞些的戰爭中，竟使一千萬人犧牲，三千萬人殘廢；也正是爲了這金子的緣故，或則於一九二五年前後，或則於一九二八年前後，不是在日美戰爭，就是在英美戰爭，或總之是在此類戰爭中，定會再使二千萬人犧牲，再使六千萬人殘廢的。

姑無論上述這種使用金子的辦法，是如何『公平』，如何有益，如何合乎人道，但我們總歸要說：爲要做到這點，還應當像我們在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工作中那樣緊張，那樣有成效地，再操作一二十年吧，不過規模還要更加宏大。可是現在在蘇俄共和國內，總還是應當愛惜金子；賣出金子時，金子要賣貴些，用金子買進商品時，商品要廉價些。既是同狼處在一塊，就應當做照狼的辦法，至於說到要滅絕所有的狼，如像在合理的人類社會裏所必需的那樣，那我們就得記

住俄國這樣的一句聰明俗話：『不要在上戰場以前來吹，要下了戰場之後來吹吧』：

假如：假如千百萬小農旁邊，沒有電綫密佈的雄大機器工業，即無論按其技術強力和有組織的『上層物』以及與之伴隨着的現象說來，都是能於用大量優良產品，並較前更加便宜更加迅速來供給小農的這種工業，那末，在此種情形下，商業就是千百萬小農與大工業間之唯一可能的經濟聯繫。在世界範圍內，這『假如』二字業已實現，這個條件已經存在，可是一個國家，並且是資本主義國家中最落後的國家之一，曾在實踐上試圖把工業與農業的這種新聯繫立刻而直接地實現、執行與安排就緒，但它既是未能用『衝擊』動作，一舉解決這個任務，所以現在，它就應當用多次緩慢的、逐漸的、審慎的『包圍』動作來解決這個任務。

把握商業，指導商業，把商業放在一定的範圍內，這是無產階級國家政權所能做到的事。試舉一個極小的例子來說：在頓巴斯，一部份由於提高各國營大礦井的勞動生產率，一部份也由於把小的農民礦井出租，便已開始了不大的，很不大的，但無疑是實在的經濟復興。因此，無產階級國家政權得着數量不多的（從先進國家底觀點看來，乃是微末不堪的，然而在我國貧困現象之下却終歸是彰明較著的）補充煤炭，如把煤的成本作為百分之百，國家就根據這成本比例，按百分之一百二十賣給國家機關，而按百分之一百四十賣給私人使用（我要附帶聲明一句，這些數

目字，完全是我隨意想出的，一則因為我不知道確切數字，二則因為我就即知道的話，那我此刻也不會來公佈這些數字）。這好像說，雖然規模很小，但我們已開始把握工業與農業間的周轉，把握批發商業，把握這樣的任務：抓緊着現有小的、落後的工業，或者是大的、被削弱了、被破壞了的工業，在當前經濟基礎上把商業復活起來，使中等的、普通的農民（這是農民大眾，是農民羣衆底代表者，是自發勢力底體現人）能感覺到經濟上的復興，然後利用這樣的機會，更有系統地、更個強地、更廣泛與更順利地來恢復大工業。

我們決不致於受『情感底社會主義』或舊俄國式、半老爺式、半農民式、宗法式等情緒所支配，它們的特性是任意漠視商業。既然要鞏固農民與無產階級的聯繫，要在一個破產遭難的國家來刻不容緩地活躍國民經濟，要振興工業，要便於今後實施更深廣的辦法如電氣化等，那末所有一切經濟上的過渡形式，都可以而且應該善於利用。

祇有馬克思主義，才確切地正確地決定了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但馬克思當時祇能從一方面，即是祇能在無產階級甚至在一個國家中都還沒有遊得多少穩固、多少長久的初次勝利的環境裏看見這種關係。在這樣的環境裏，正確關係底基礎，就是把改良看成無產階級所作革命階級鬥爭底副產品。對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說來，這一關係乃是無產階級革命策略底基石，是無產階級革

命策略的ABC，而第二國際底變節領袖以及第二半國際半迂腐、半狡猾的英雄們却總在曲解與蒙蔽這ABC。當無產階級即令祇是在一個國家內獲得勝利時，於是在改良對於革命的關係上便有一種新東西出現了。在原則上，事情仍如以前一樣，但在形式上却已有一個爲馬克思本人所不能預察到的變化；可是這個變化祇有根據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政治觀點，才能瞭解的。爲什麼我們會能正確運用布列斯特的退守呢？因爲我們前進得如此之遠，我們也就有退却的地方。我們以這樣驚人的速度，從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到布列斯特和約時止，在若干個星期之內，就建成了蘇維埃國家，用革命辦法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澈底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甚至就是這一大規模的背進運動（布列斯特和約），也總歸使我們保持了充分廣闊的陣地，以便能利用『暫息』時機，然後勝利地前進，去反對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皮爾蘇茨基、弗蘭格爾。

當無產階級尙未勝利以前，改良是革命階級鬭爭底副產品。而在無產階級獲得勝利之後，對於獲得了勝利的國家說來，當實力已極度緊張地運用過而弄得顯然不够去用革命手段實行這種或那種過渡時，改良（雖在國際範圍內仍舊是『副產品』），還是爲取得暫息時間所必要的和理所當然的手段。勝利給予了很多的『後備力量』，使我們甚至在被迫退却時，也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無論在物質方面或精神方面，都有所憑藉而支持下去。所謂在物質方面支持下去，——

這就是說，保持住力量上的充分優勢，而使敵人不能把我們澈底打垮。所謂在精神方面支持下，——這就是說，不使自己精神渙散和組織瓦解，却保持住對情況的明確估計，保持住勇敢與堅毅精神，即令就退却得很遠，但祇是退却到一定限度，以便能及時停止退却，並重新轉為進攻。

我們已向國家資本主義退却了。但我們的退却是有限度的。現時我們正在向由國家來調劑商業這方面退却。但我們也會是退却得有限度的。現在業已有了這樣的徵候，可以望見這一退却的終點，可以望見，就在並非遙遠的將來，我們能於停止這一退却。我們進行這次必要的退却愈是自覺，愈是步調一致，愈是少帶成見，則能愈迅速地停止這一退却，爾後我們勝利前進，就會愈加穩固、愈加快便、愈加遠大。

刊載於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六、七兩日真理報第三百五十一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七九至八五頁

列寧：新經濟政策下職工會 底作用與任務

——俄國共產黨（布）中央委員會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決議案——

一 新經濟政策與職工會

新經濟政策引起無產階級內部情況，因而也引起職工會內部情況有許多根本的變動。在工業與運輸業中，極大多數的生產資料仍屬無產階級國家掌握。加之土地國有，這種情勢表明着，新經濟政策並沒有改變工人國家底實質，但它所根本改變着的是社會主義建設底方法和形式，因為新經濟政策，容許正在建設中的社會主義與正在力圖復活的資本主義之間在經過市場來滿足千百

萬農民需要這方面，實行經濟崩潰。

社會主義建設底形式之所以改變，是由於現時共產黨與蘇維埃政權在從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中的全部政策上，正實行着這一過渡底特別辦法，許多方面是在採取與以前不同的方式來行動，用所謂『新的迂迴動作』來奪取若干陣地，結束退却，以便更有準備地轉為重新向資本主義進攻。例如，現在不但容許，而且發展着由國家調劑的自由貿易與資本主義，而另一方面，已經社會化的國家企業則轉到所謂經濟核算制，即轉為商業性質，這樣在我國一般文化落後和疲憊不堪的情形下，必然在羣衆意識中，會多少形成各該企業內管理人員與工人間互相對立的現象。

二 無產階級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與職工會

無產階級國家，並不改變自己的本質，祇是在一定的程度內，祇是在由國家來調劑（監察、監督、確定形式、秩序等等）私人商業與私人資本主義的條件下，才可以容許自由貿易和發展資本主義。此種調劑的功効，不僅有賴於國家政權，而且更加有賴於無產階級和一般勞動羣衆政治

上的成熟程度，再則有賴於文化水準等等。但是，即令這一調劑充分奏效，而勞動與資本間之階級利益的對立性，無條件地還是會存在的。因此，今後職工會底最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在無產階級與資本作鬭爭中，要從各方面並採取一切辦法來捍衛無產階級底階級利益。這一任務應當公開地提在一個首要的地位上，職工會機關應當與此適應而加以改造、改變或補充（應當成立，或正確些說，及時成立各調解衝突委員會、罷工基金、互助基金等等）。

三 轉到所謂經濟核算制的國家企業與職工會

把國家企業轉到所謂經濟核算制上，這一轉化必然與新經濟政策發生不可分離的聯繫，而在最近將來，這種形式定會成爲若非唯一的，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在業經容許而日益發展的自由貿易情勢下，這實際就等於把國家企業在頗大程度內轉到商業性質基礎上。加之最迫切地需要提高勞動生產率，使每個國家企業非但不虧本並能獲利，又加之不免會發生廠方利益以及廠方謀利熱情過大，此種情勢就必然使在企業內勞動條件問題上，產生一方是工人羣衆，另一方是國家企業經理、管理人及其所屬機關這兩者間利益上的某種對立現象。因此，在已經社會化的企業中，職

工會無條件地必須負責保護勞動者底利益，儘可能促成他們物質生活的提高，經常改正經濟機關底錯誤及其過份謀利的傾向（如果這些現象乃是由於官僚主義歪曲國家機關的行爲中發生出來的）。

四 承認土地工廠等私有制而由資本家階級掌握政權之國家中
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與不承認土地和多數大企業私有制
而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之國家中無產階級的經濟鬥爭這兩
者間的根本區別

當階級還存在時，階級鬥爭是不可避免的。在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這一過渡時期中，階級必然存在，俄國共產黨綱上非常確定地說：在由資本主義進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期間，我們所進行的還祇是些初步設施。因此，無論是共產黨或蘇維埃政府和職工會都應當公開承認：當工業與農業中的電氣化尙未實現，或基本上尙未實現，還不能藉此來根除小經濟與市場統治地位之前，經濟鬥爭不但存在，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另一方面，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罷工鬭爭的最終目的，顯然是摧毀國家機關，推翻資產階級底國家政權。而在像我國這樣過渡式的無產階級國家中，工人階級一切發動底最終目的，祇能是鞏固無產階級國家與無產階級的階級國家政權，其方法是要與對這國家的官僚主義歪曲行為作鬭爭，是要與這國家中的錯誤和弱點作鬭爭，是要與資本家們力圖逃脫這國家監督的階級貪慾及其他類似現象作鬭爭。因此，無論共產黨蘇維埃政權或職工會，都不但決不能忘記，而且應當對工人和勞動羣衆指明，在無產階級執政的國家中採用罷工鬭爭手段，唯一祇是一方面由於對無產階級國家之官僚主義歪曲行為以及這國家機關內存在有資本主義舊時各種殘餘，他方面是由於勞動羣衆中政治上不發展以及文化落後的緣故。

所以當工人階級底個別集團與工人國家底個別機關間發生磨擦與衝突時，職工會底任務，就是要促成最迅速和最健全地調整這種衝突，力求盡量有利於職工會所代表的工人集團，祇要無損於無產階級其他部份並一般無害於工人國家及其經濟的發展，因為祇有這種發展，才能造成工人階級之物質福利和精神福利的基礎。調整工人階級單個部份與工人國家機關間之磨擦與衝突的唯一正確、健全與適當方法，就是職工會參加仲裁，職工會可以用自己機關的名義，或者根據雙方確切擬定的要求與提議，去向相當有關的經濟機關協商，或則逕直向最高國家機關起訴。

當由於經濟機關底不軌行動，由於某工人集團的落後現象，由於反革命份子的挑撥離間，未了，或由於職工會組織本身缺乏先見之明，以致在國家企業發生罷工等等情事時，職工會底任務就是要採取工會工作性質的步驟，如設法消除真正不確的行為與混亂現象，滿足羣衆之合理的可以實現的要求，從政治上影響羣衆等等，這樣來使衝突能够最迅速地得到解決。

職工會究竟在什麼程度上，能於採取真正在各方面保障工人羣衆利益並及時消除可以造成衝突之根源的這種預見政策，去順利地預防國家企業中帶羣衆性的發動，這是測量職工會工作的正確性及其成效的一種最重要和最確切的尺度。

五 職工會中恢復自願會員制

職工會把所有僱傭勞動者一無例外地登記爲會員，這種形式上的辦法，已經造成職工會中某種程度的官僚主義曲解，並使職工會本身脫離了自己的廣大會員羣衆；因此無論是個別加入職工會或集體加入職工會，都必須最堅決地實行自願會員制；決不能要求職工會會員有一定的政治觀點；在這點上，亦如在宗教問題上一樣，職工會應當是非黨的組織。在無產階級國家中，祇能要

求職工會會員瞭解公共的紀律並懂得爲了捍衛勞動者底利益和幫助勞動者底政權，即蘇維埃政權，必須團結工人的力量。無產階級國家應當在法權關係或物質關係上，鼓勵工人們聯合在職工會內。但職工會內，沒有義務決不應當有任何權利。

六 職工會與企業管理方面

在無產階級爭得國家政權之後，其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生產品量，大大提高社會生產力。這個任務，在俄國共產黨黨綱上已經明顯提出，現時由於我國在軍事時期後所遇到的經濟破壞、飢餓與破產現象，而特別尖銳化了。因此，必須在恢復大工業方面有最快而儘量鞏固的成效，若沒有這個條件，便不能造成勞動擺脫資本桎梏這全部事業的勝利，社會主義底勝利就無從說起，而此種成效也無條件地要求在俄國現時環境下，把全部權力集中在工廠管理處。這些按一長制通例組成的管理處，應當根據並限於同職工會締結的集體合同，以最大的機動自由，最嚴格地來檢查提高生產、保證沒有虧損和獲得生產利潤方面的實際效果，最嚴格地選拔極能幹極有威望的管理人員等等，獨立地來規定工資與分配紙幣、口糧、工作服及其他各種供給品。

在這種條件下，職工會對管理方面之任何直接的干預，都應當認為是絕對有害和決不容許的。

但如果把這一勿庸爭辯的真理，瞭解成爲否認職工會參加社會主義工業組織和參加管理國家工業，那就完全不正確了。在下列的確定形式上，職工會參加這種工作是必須的。

七 職工會參加無產階級國家經濟機關與管理機關的作用

無產階級是由資本主義正轉向於社會主義的國家底階級基礎。在一個小農佔極大優勢的國家內，無產階級祇有在非常巧妙、審慎和逐漸地實行與極大多數農民聯盟的條件下，才能順利地完成這個任務。職工會應當是蘇維埃政權之最親近和最必需的同事，而蘇維埃政權，在其全部政治和經濟工作上，都是由工人階級底覺悟的先鋒隊——共產黨所領導的。職工會一般地是共產主義底學校，它對於全體工人羣衆以及全體勞動者說來，又應當是學習管理社會主義工業（爾後並逐漸是農業）底學校。

根據這樣一種原理出發，即可規定出最近期間職工會參加無產階級國家經濟機關和管理機關

的下列基本形式。

(一) 職工會參加選拔一切經濟機關與有關經濟的國家機關底人員，向那裏提出自己的候補人，指明他們的工作年齡、工作經驗等等。這一問題的決定權，則唯一屬於負該機關工作全責的經濟機關。同時，經濟機關應注意到相當職工會對各候補人所提出的鑑定。

(二) 從工人中與一般勞動羣衆中提拔和培養管理人員，這是職工會的首要任務之一。如果說，我們現在已有幾十個充分稱職和幾百個相當稱職的工業管理人員，那麼，最近我們就需要有幾百個充分稱職和幾千個相當稱職的工業管理人員了。有系統地考察一切適於這種工作的工人和農民，切實地、周到地、細密地檢查他們學習管理的成效，這點今後職工會應當比現在更加百般仔細、百般堅毅地加以實現。

(三) 職工會必須加緊參加無產階級國家中一切計劃機關的工作，參加經濟計劃和生產綱領之製定以及關於工人物質供給定額底分配，參加選擇留作國家經辦的企業與擬定出租或租讓的企業及其他等。職工會並沒有任何職能來直接監督私人企業或出租企業的生產事宜，唯一祇能經過參加相當國家機關，來實行參加調劑私人資本主義的生產。此外，職工會還要參加一切文化教育工作與生產宣傳工作，它的這種種活動都應更加深刻和更加廣泛地吸引工人階級與勞動羣衆到國

家一切經濟建設中來，使他們認識整個經濟生活，認識全部生產工作，從採辦原料起直到售出產品止，使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經濟之統一的國家計劃以及實現這一計劃對工農有實際利益這點，都有一個愈益具體的概念。

(四) 規定工資與供給定額等，是職工會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及參加工業管理事宜中，其本身工作上一個必要的組成部份。特別是社會法庭應當不屈不撓地提高勞動紀律，提高為紀律、為增大生產率而鬪爭的文化方式，但絕對不能去干預一般人民法院的機能以及管理機關的職權。

以上所述職工會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事業中的幾種首要機能，當然，應由相當的職工會機關和蘇維埃政權機關來詳細具體規定。為了提高國民經濟與鞏固蘇維埃政權，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要估計到職工會在組織經濟及組織經濟管理方面已做過的巨大工作底經驗，同時也要估計到因為無準備、不明真象、不負責任地直接干預管理事宜造成不少危害的那些錯誤，以便自覺地、堅決地轉到實地教育工人與全體勞動者來管理全國國民經濟這一倔強的實際的並且是替多年多年打算的工作上去。

八 與羣衆的聯繫是職工會一切工作底基本條件

與羣衆的聯繫，亦即與極大多數工人（爾後並與全體勞動者）的聯繫，是職工會任何活動成績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條件。在職工會組織及其機關中，自下級以至最上級，都必須建立與根據多年經驗加以實際檢查過的負責同志底整個系統，這些負責同志並不一定祇是共產黨員，但應當處身於工人生活之內，知道這生活的各方面，善於在任何時機，對任何問題都能正確無訛地判定羣衆底情緒及其實際意圖、需要和思想，善於不帶半點虛偽觀念，明白確定羣衆的覺悟程度以及某種舊成見或舊思想殘餘在他們中間的作用，善於用同志關係對待羣衆，關心地滿足羣衆要求，這樣來爭取羣衆的無限信仰。對於一個黨員人數不多，而以工人階級先鋒隊資格領導着正在走向（至今還沒有較先進國家底贊助）社會主義的這巨大國家的共產黨說來，最巨大最嚴重的危險之一，就是脫離羣衆，就是先鋒隊向前跑得太遠，沒有「與隊伍看齊」，沒有與全體勞動軍，即與工人和農民羣衆中的極大多數，保持堅固聯繫這樣的一種危險。猶之一個裝備有極優良發動機與超等工作機的工廠內，如果安設在發動機與工作機之間的傳遞機業已損壞，那末這個工廠也就不

能開工了，同樣，如果位置在共產黨與羣衆之間的這一傳遞機——職工會，建立得不正確，或者工作得不對，那末，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就必不可免地會遭到破產。這個真理，祇是加以解釋、提到、證實，是不夠的，這個真理應當在職工會全部機構及其日常工作中，從組織上鞏固起來。

九 無產階級專政下職工會內部情況的矛盾

從上述問題中，便發生出職工會各任務間的種種矛盾。一方面，職工會的主要行動方法是說服、教育；另一方面，它們既是國家政權的參加者，又不能拒絕參加實行強迫制。一方面，職工會的主要任務，是最直接、最親切地捍衛勞動羣衆底利益；另一方面，它們既是國家政權的參加者與整個國民經濟的建設人，又不能拒絕採用強制手段。一方面，職工會應當按戰時方式來工作，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乃是最殘酷、最頑強、最拚命的階級戰爭；另一方面，對職工會說來，又是最少能採用特殊的戰時工作方法。一方面，職工會應善於適應羣衆的生活習慣及其當時政治水準；另一方面，它們無論如何也不應當助長羣衆底成見與落後性，而應當堅持不移地把羣衆日益提昇到愈

高的政治水準上去，如此等等。這些矛盾都不是偶然現象，就在今後幾十年內，也不會消除的。因為，當資本主義與小生產底殘餘依然存在時，整個社會制度中，這些殘餘與社會主義新芽之間的矛盾，是無可避免的。

由此可以得出兩個實際結論：第一，爲了順利進行職工會工作，祇是正確瞭解職工會的任務是不夠的，祇有正確的職工會機構是不夠的；還必須有一種特別的機智，善於在每個具體情況下，用特別辦法去接近羣衆，以最小的磨擦，而能在文化、經濟和政治方面把這些羣衆提昇到更高的程度上去。

第二個結論：上述各種矛盾必然會產生衝突、失調、磨擦等現象。必須有威信充分的最高機關來立刻解決這些糾紛。這樣的機關就是共產黨及世界各國共產黨的國際聯合——共產國際。

十 職工會與專門家

俄國共產黨黨綱上已經敘述出這個問題的基本原理。如果不再三注意到表明這些原理執行程度的事實，則這些原理不過是紙上空文。近來這樣的事實就是：第一，不僅在烏拉爾的，而且在

頓巴斯的社會化的礦井中，發生了工人打死工程師的事件；第二，由於共產黨支部黨員以及蘇維埃政權機關之不識事故和絕不容許的行爲所造成的那種惡劣工作條件，竟使莫斯科自來水廠總工程師奧爾登波爾格爾自殺，以致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不得不把這案件轉交法庭審判。

關於這種現象的最大部份罪過，與其說要由職工會來担負，不如說要由整個的共產黨與蘇維埃政權來担負。但此刻的問題，並不是來規定這種政治罪過誰負的輕，誰負的重，而是關於一定的政治結論。如果我們全體領導機關，也就是說，共產黨、蘇維埃政權以及職工會，不做到真正愛護一切誠實工作、通曉本業並酷愛本業，縱令在思想上還完全是歧視共產主義的專門家們，如同愛護自己的眼珠一樣，那末，也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任何真實成績了。專門家在尚未進到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之前，終歸還是社會上的一個特別階層，要使他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無論在物質或權利方面，無論在與工農間的同志合作方面，亦無論在思想方面，即滿意於自己的工作，並悟覺到自己這種工作不依賴於資本家階級底自私自利而對社會有益方面，都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活得要好些，這點，我們雖不是很快就能實現，但無論如何都要實現。如果一個機關，不來有計劃地進行這種已經收到成效的工作，即在各方面保障專門家，鼓勵其中優秀份子，捍衛與保護他們的利益等等，那末，任何人也不會承認這樣的機關是多少佈置得

不壞的。

職工會進行所有這樣的全部工作（或有系統地參加一切機關中的相當工作）時，應當不從該機關的利益出發，而應當從勞動與國民經濟的整個利益出發。關於專門家這層，職工會應負責進行極艱鉅困難的工作，即經常來促進最廣大的勞動羣衆，使他們能與專門家建立一種正確關係，祇有這樣的工作，才能收到真正重大的實際效果。

十一 職工會和對工人階級的小資產階級影響

祇有當職工會把極廣大的非黨工人羣衆聯合起來的時候，那它們才是真實的職工會。因此，就不免發生出——特別是在農民佔極大多數的國家內——各種政治影響在職工會中的相當穩固性，這些政治影響係資本主義殘餘及小生產的上層建築物。這乃是小資產階級的影響，也就是說，一方面是社會革命黨、孟塞維克（即第二國際與第二半國際各政黨之在俄國的另一形態）的影響，他方面是無政府主義的影響；祇在這些流派中，還保留有相當多的人數，他們並非從自私的階級動機，而是在觀念上來擁護資本主義，繼續崇信它們所鼓吹的一般「民主」、「平等」、

『自由』等等超階級的意義。

正要用上述唯一的經濟原因，而決不是用個別集團，更不是用個別人物所起的作用，才可以解釋我們職工會中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底殘餘（間或還是復生）現象。因此，共產黨，主持文化教育工作的蘇維埃機關以及職工會中的全體共產黨員，都應當更大加注意於同職工會內小資產階級的影響、流派和傾向進行思想鬭爭，——尤其是這新經濟政策不能不使資本主義相當加強起來的時候。加緊與小資產階級對工人階級的影響作鬭爭，藉此來對抗這種現象，乃是真正必要的。

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七日刊載於《真理報》第十二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一四七至一五六頁

列寧·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 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

——一九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

同志們！關於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請讓我不從年初開始，而從年終來開始吧。目前熱納亞問題是一個最迫切的政治問題。但因為我國刊物上關於這點已寫的很多，加之我在三月六日亞的演講中（這個演辭已經發表），也說到了這個問題的主要之點，所以，如果你們不特別要我敘述某些詳情細節，那就讓我不來詳細講到這個問題吧。

關於熱納亞會議的一般情形，你們大家是知道的，因為刊物上對這個問題已經登載得很多，據我看來甚至是太多太多，簡直多得有損於我國一般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的真正、實際和

迫切的需要。在歐洲所有資產階級國家內，人們關於熱納亞會議極愛異想天開，喧囂一時，這是不言而喻的，可是我們這次（也不祇這次）竟做法他們，而且做法得太多了。

應當指出，我們在中央委員會採取了最仔細的辦法，以便由我們最好的外交官來組織一個代表團（現在我們已有相當數量的蘇維埃外交官，已不像蘇維埃共和國存在的初期那樣了），我們在中央委員會給我國到熱納亞去的外交官擬定了充分詳細的指令，並擬製了很久，幾次重新地討論過。顯然，這裏的問題，我雖不能說是軍事的，因為軍事這個字眼很能引起誤解，但無論如何這也是競賽的問題。在資產階級營壘裏，有個非常強大，比其他派別強大得多的派別，極力想破壞熱納亞會議。但也有另一些派別，它們無論如何都想堅持這個會議，並使之召集成功。後面這些派別目前佔了上風。末了，在所有資產階級國家這營壘裏，有個可稱為和平主義的，即整個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都應列入的一個派別。這是資產階級中企圖堅持許多和平主義提議，並策劃出某種類似和平主義政策的那個營壘。我們共產黨人對於這種和平主義，抱有一定的觀點，不過這裏完全沒有說明它的必要。顯然，我們不是以共產黨人的資格，而是以商人的資格到熱納亞去。因為我們要作買賣，他們也要作買賣。我們想使這買賣對我們有利，而他們則想使這買賣對他們有利。鬭爭怎樣展開起來，將有賴於（雖然在不大的程度上）我們外交官底藝術。

我們既以商人資格到熱納亞去，那我們究竟是要與資產階級營壘中那些趨向於用武力解決問題的代表們周旋，抑或是與那些趨向於和平主義（即令這種和平主義是最壞的，而從共產主義觀點看來簡直是不值一評）的代表們周旋，這點對於我們說來，顯然不是沒有區別的。如果一個商人不善於領會這種區別，不能把自己的策略去適應這種情況，以求達到實際目的，那他畢竟是個不好的商人。

我們到熱納亞去的實際目的是要擴大商業，並造成一種使商業能最廣泛和最順利發展起來的條件。但我們決不來担保熱納亞會議定會成功。要來担保這點，那就會是可笑而妄誕無稽的了。我應當說，在最清醒和最細心估計此刻熱納亞的可能前途時，我總還是認為，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我們是能於達到自己這個目的的。

如果那裏我們的對方有足够的理解力，並不過份固執，那就在熱納亞會議上做到這點，如果他們硬想固執下去，那就會在熱納亞會議以外做到這點。但我們總之能夠達到自己的目的！

須知，資本主義列強近幾年來最迫切、最必要、最實際和最顯明暴露出來的利益，是要求發展、調整和擴大對俄國的通商關係。既然有了這樣的利益，那末就是辯論，就是爭執，就是在各種提議上發生分歧——甚至很可能走到決裂，——但歸根到底，這個基本的經濟上的必要性終究

會給自己開拓進路。所以我想，我們對於這點，可以放心。我雖不能担保期限，也不能担保一定成功，但正是在這裏大會上可以相當自信地說，蘇維埃共和國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正常商業關係，是必然會向前發展的。這裏能有多久的中斷——這點我將在本報告中相當的地方提到，但我想，關於熱納亞問題可以說到這裏爲止。

不言而喻，那些願意更詳細知道這個問題和不滿意報上已公佈的代表團名單的同志們，能够選出一個委員會來考察中央委員會的一切材料、信件和指令。當然，我們所規定的細節是帶假設性的，因爲直到現在還不能確切知道，究竟是誰去出席熱納亞會議，他們在這次會議上將提出些什麼條件，或先決條件，或附帶條件。我想，在這裏來把這一切都分判清楚是極不適當的，甚至實際上也辦不到。我再重複說，代表大會經過這個委員會，完全有可能來收集關於這個問題已公佈的和中央委員會現有的一切文件。

我祇限於說到這裏，因爲我相信，我們最大的困難並不在這個問題上。全黨應當注意的主要問題並不在這裏。歐洲資產階級刊物把這次會議的意義巧於吹噓，故意誇大，以此欺騙勞動羣衆（在所有這些自由民主國家和共和國裏，全資產階級刊物中十分之九總是這樣作的）。我們也多少受了這類刊物的蠱惑。我們的報紙總還是迷惑於舊的資產階級慣例，不願轉上新的社會主義正

軌，於是我們對這問題興起了不應有的喧嘩。其實，對於共產黨人，尤其是我們這些熬過自一九一七年起即已開始的艱苦年代，見過從那時起即已發生的各種嚴重政治錯綜的共產黨員說來，熱納亞會議並不是什麼大的困難問題。我並不記得，關於這個問題，不僅在中央委員會內，而且在我們黨內有過某種分歧或爭論。這是極自然的，因為從共產黨員（那怕其中有各種不同的色彩）的觀點來看，此地並沒有任何可以爭論的地方。我再重說一遍，我們是以商人資格到熱納亞去，以圖達到發展商業的最有利形式，這種商業已經開始，並正在進行，即令人得以強制地把它中斷一些時日，但經過這種中斷後，它終究是不免要發展起來的。

因此關於熱納亞問題就簡短說到這裏為止，現在我便來講講那些據我看來是過去一年內以及下年度政策上的主要問題。我以為（或至少我是慣於這樣作），在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中，我們不簡單是要說到在過去這一年內作了些什麼，而且要說到在過去這一年內得到了些什麼主要的和根本的政治教訓，以便正確地來決定自己下年度的政策，以便在這一年內也能學得一點什麼。主要的問題，當然是新經濟政策。過去這一年，乃是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年份。如果我們在這一年內獲得了某種巨大的、嚴重的和不可剝奪的勝利品（這點我還不能怎樣確信），那麼，這就祇是從這個新經濟政策的始基上學得一些什麼。這一年來，我們在新經濟政策方面，的確學到了

非常多的東西。至於我們是否真正學會和學會了多少，要檢查這點，大概是要靠今後的事件，即很少依我們意志為轉移而發生的，例如行將來臨的財政危機這樣的事件。我以為，關於我們新經濟政策這個作為估計上年度經驗和獲得下年度實際教訓之一切議論基礎的問題中，主要的應該是以下三點。

第一，新經濟政策對我們之所以重要，首先是它檢查我們真正能否達到與農民經濟的聯合。在我國革命發展的過去這一時期，當全部注意力和全部力量都主要用在或差不多都主要消耗在抵抗侵略的任務上時，我們不能認真地思索這個聯合，我們會無暇顧及這點。當時，既有刻不容緩和萬分迫切的任務存在，既是要打破有立刻被世界帝國主義英雄強勢力所窒死的危險，這一聯合在某種限度內是可以而且應當加以輕視的。

轉向新經濟政策，這是上屆代表大會上異常一致地通過了的，這種一致，甚至比我們黨內通過其他問題時都要更大（須得承認，大大一致這是我們黨的一般特點）。這種一致，表明已絕對要有新的門徑來接近社會主義經濟。那些從各種觀點來估計情況而在許多問題上抱着不同意見的人們，都一致堅決地很快得出結論說，我們沒有接近社會主義經濟及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適當門徑，而能於找到這種門徑的唯一方法，就是新經濟政策。當時，由於軍事事變的發展，由於

政治事變的發展，由於老的文明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殖民地內社會條件和政治條件的發展，——我們必得乘我國尙屬經濟上若非最落後國家，至少也是最落後國家之一的關頭，在舊的資本主義世界裏首先打穿一個破口。我國極大多數農民是進行着小的個體經濟。當我們建設我們所規劃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綱領中能一舉實現的東西時，這種建設，在相當程度上會離開了極廣大農民羣衆的日常生活，我們叫他們負擔了很艱鉅的義務，理由是說戰爭不容許在這方面有任何的動搖。雖然我們不免作出許多錯誤，但這種理由，大體上農民是接受了。全體農民羣衆看見並瞭解到，爲了捍衛住工農政權，使其免受地主的侵犯，使其不致於被那有奪去革命全部勝利品危險的資本主義侵犯所窒死，這些加在農民肩上的重大負擔，是必要的。可是在已經國有化和社會化的工廠和蘇維埃農莊中建設着的經濟與農民經濟之間，那時並沒有聯合。

我們在上屆黨代表大會上已明顯地看到這點。並且我們看得這樣清楚，以致黨內關於必然要實行新經濟政策的問題，竟沒有表現過任何動搖。

試來觀察觀察俄國各黨派在國外出版的異常豐富的刊物上對我們這個決議的估計，真是可笑極了。這些估計間幾乎沒有區別：他們都落在實際生活後面，此刻還硬說左派共產黨人直到現在仍然反對新經濟政策。人們在一九二一年記起了一九一八年有過的事，記起了連我們這裏的左派

共產黨人都忘記了的事，這班人總在反復咀嚼着，硬說這些布爾塞維克，大家都知道是狡猾虛偽的人；說他們把自己人中有意見分歧的事向歐洲人隱藏起來。當你讀到這點，那你就會想道：讓他們去迷誤吧。既然他們關於我們中間所發生的事竟抱着這樣的概念，那就可以按此種概念來判斷這些現已逃往國外似乎是最有學問的老舊人物底覺悟程度了。我們知道，我們並沒有任何意見分歧，其所以沒有，是因為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採用旁的辦法這一實際上的必要性，對大家已是完全瞭然的了。

我們這裏，過去沒有同農民經濟的聯合，沒有我們曾企圖建立的那種新經濟。此種聯合現在是否有了呢？還沒有。我們祇才接近到這種聯合。新經濟政策底全部意義（我國刊物上，人們往往還在到處繼續尋找這個意義，但却找錯了地方）就在於而且祇在於要找到我們正用大力來創立的那種新經濟底聯合。我們的功勞就在這裏，不如此，我們就不會是共產黨員革命家。

我們不顧一切舊的東西，已開始完全按照新方式來建設新的經濟。如果我們不曾開始建設這種新經濟，那我們在頭幾月或頭幾年就會已被人粉碎。但這並不是說，我們硬要堅持：既然我們這樣絕頂勇敢地開始了新經濟建設，那我們就一定要繼續這樣幹下去。這種主張有什麼根據呢？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我從最開始時就說過，我們必須去進行無上新奇的事業，如果資本主義較發達國家的工人同志不迅速地來幫助我們，那我們的事業就會是絕頂困難的，其中無疑地會作出許多錯誤。主要是應善於清醒地來觀察，什麼地方犯了這樣的錯誤，並把一切都從頭加以改造。不是一兩次，甚至是很多次地把一切都從頭加以改造，這也就會表明出，我們是不帶絲毫成見，真正用明豁眼光來對待我們那在世界上最偉大的任務。

在新經濟政策問題上，現時主要的是正確領會過去這一年來的經驗。這點必須做到，這點我們也願意作到。既然我們無論如何都要作到這點（我們願作到這點，並且定會作到這點！），那就應該知道，新經濟政策之基本的和有決定意義的（其餘一切都是從屬的）任務，就是奠定我們已開始建設的新經濟（雖然建設得很不好，很不嫻熟，但畢竟在完全是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新的生產和新的分配法基礎上開始建築起來了）與千百萬農民所經營的農民經濟間的聯合。

這種聯合以前還沒有過，現在我們首先要建立這個聯合。要使一切都服從於這一事業。我們還應該查明，在建立這種聯合時又不破壞我們那雖然笨拙但已開始建設的東西方面，新經濟政策究竟有了何種成就。

我們建設自己的經濟是同農民聯繫在一起的。我們應當再三改造這種經濟，並要把它安排妥

當，使得我們大工業和農業中的社會主義工作能與每個農民祇圖逃出貧困，並不異想天開（既是祇爲了逃脫最痛苦的直接餓死危險時，又怎樣能異想天開呢？）而儘力從事的工作聯合起來。

要把這種聯合顯示出來，使我們能明白地看見它，使全體人民能看見它，使全體農民羣衆都能見到：現時在農民羣衆那空前破產、空前貧乏的困苦生活與人們爲遙遠的社會主義理想所進行的工作之間，有了聯繫。要使每個普通平常的勞動者都瞭解到，他自己的生活的真得到了某些改善，而且這種改善並不像地主政權和資本主義時代少數農民所獲得的那樣，那時任何改善（改善無疑義是有的，而且很大）都是與對農夫的譏笑、侮辱、嘲弄以及施於羣衆的暴行緊相聯繫着，這種暴行任何一個農民也沒有忘記過，而且今後幾十年內在俄國都是不會忘記的。我們的目的是，是要恢復聯合，用事實來證明給農民看，我們是從農民所瞭解、所熟識，而此刻在其貧困境況下所易於接近的辦法來開始，而不是從農民看來乃是什麼遙遠的、空想的事物來開始，證明出我們善於幫助農民，證明現時共產黨員是在小農處於破產、貧困、遭受飢餓痛苦的極端困難時日，實際地幫助他們。或者我們來證明這點，或者農民把我們拋到九霄雲外去。這是完全免不了。

這就是新經濟政策底意義，這就是我們全部政策的基礎。這裏也就是施行新經濟政策過去這一年來我們的主要教訓，以及本年度中我們的所謂主要政治條規。農民借債給我們，當然，他

們在經歷過這種艱難時日之後，也不能不借給我們。廣大的農民羣衆都同意這樣：『好，如果你們不會做，那我們就等等吧，也許你們是要學會的』。但這種債務決不是取之無盡的。

應該知道這點。借了債以後，終歸要着着急。須知快到這樣的日子，那時這農民佔多數的國度不再借債給我們，那時，如果說句生意話，它就會向我們追索現款。『敬愛的當局們，雖說債務展期了幾個月和幾個年頭，但此刻你們終歸找到了最真實和最可靠的辦法來幫助我們逃出窮困、貧乏、飢餓和破產。你們會做，你們已經證明了這點』。這就是我們免不了快要經受的一種考試，而這種考試終究要決定一切，既決定新經濟政策底命運，也決定俄國共產主義政權底命運。

我們能否完成我們的直接事業呢？這個新經濟政策是否有點用處呢？如果退却會是正確的，那末，退却之後就同農民羣衆接合起來，並和他們一塊，雖然行動百倍地緩慢，但却是堅毅不拔地前進着，而使他們經常看見我們畢竟是在前進。那時我們的事業就會是絕對不可戰勝的了，世界上任何力量也戰勝不了我們。直到現在，即在這第一年中，我們還沒有達到這點。這是無可隱諱的。我深信（我們的新經濟政策也能使我們完全明確堅定地作出這個結論），如果我們領會到新經濟政策中所包含的全部巨大危險，而把我們的全部力量集中到各種弱點上去，那時我們就一

定能解決這個任務。

與農民羣衆，即與普通的勞動農民接合起來，並開始向前移動，其速度雖比我們所希望的慢得不可計量，慢到了極點，但這裏整個羣衆却真正會和我們一同前進。到了一定的時候，這個運動就會加快到是我們現在所夢想不到的速度。據我看來，這便是新經濟政策第一個基本的政治教訓。

第二個較爲局部的教訓，這就是藉國家企業和資本主義企業間的競賽來實行檢查。現在我們建立着合股公司——往下我要略徵來講講它們，——這些公司也像我們的全部國營商業和全部新經濟政策一樣，是我們共產黨人應用商業方法和資本主義方法的表現。這些公司也具有另一種意義，那裏有資本主義方法和我們方法之間的實際競賽。請具體地比較比較吧。我們直到現在祇是寫過綱領，給了諾言。當時這是完全必要的。沒有綱領和諾言就不能進行世界革命。如果白黨份子，包括孟塞維克在內，因這點來謾罵我們，那這祇是證明孟塞維克以及第二國際和第一半國際的社會主義者關於革命發展的一般情形，一竅不通。除了經過這條道路外，我們便不能開始前進。

但目前的情形是，我們對自己的工作應施行嚴格的檢查，而不往往又是由這些共產黨員組成

的監察機關所舉行的檢查，那怕這些監督機關是再好不過的，那怕它們在蘇維埃機關係統中以及黨機關係統中差不多是盡善盡美的監督機關。我們所需要的不是這樣的檢查，而是從民衆經濟觀點上看來名符其實的一種檢查。

以前資本家會辦理供給。雖然這件事情他們做得很不正當，用強盜打劫的方式欺負了我們，掠奪了我們。這是那些不議論共產主義的普通工人和農民也都知道的，他們不議論共產主義，因為他們不懂得這是什麼一回事。

「但資本家終歸會辦理供給，你們會麼？你們是不會的」。這就是去年春季所常聽到的話——雖然並非隨時都聽得清楚，——但這些話却成了去年春季整個危機底根源。「你們倒是些好人，但你們所擔當的經濟事務，你們卻不會辦理」。這就是農民以及受過農民影響的許多工人，在去年用來反對共產黨的那種最普通和最致命的批評。這也就說明，爲什麼新經濟政策問題中舊有的這一條，具有這樣重要的意義。

需要真正來檢查。旁邊既有資本家在動作，他們按強盜方式動作，他們獲得利潤，但他們會幹這一套。可是你們——試按照新方法去作吧：你們既無利潤可獲，原則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是再好不過的，——你們這些神聖人物，簡直可以活活地升入天堂裏去，——但事情究竟會不會作

呢？需要檢查，真正來檢查，並且不是先由中央監察委員會審查和提出責難，再由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處罰辦法這樣的檢查，——不是這樣，而是需要從人民經濟觀點看來是真正的檢查。借給共產黨員的債比借給任何其他政府的都要多些，但關於償還這層却允許他們百般展期。當然，共產黨員會幫助他們擺脫了資本家和地主的壓迫，這點農民都很重視，所以農民對債務才展期，但這總歸是有一定期限的：爾後他們就要來檢查：你們管理業務是否不比別人壞些呢？舊日的資本家會管理，你們却不會管理。

這就是第一個教訓，也就是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底第一個主要部份。我們不會管理業務。這是過去一年中所已經證明了的。我很想列舉幾個「國家托拉斯」（如果用屠格涅夫如此讚揚的美麗的俄文加以形容）的例子，來指明我們怎樣會管理業務的情形：

可惜，因為許多原因，一大部份是因爲病的關係，使我不能將報告的這部份充分發揮，祇能限於把自己觀察所得的信念表達出來。我們在這一年來極明顯地證明了，我們不會管理業務。這主要的教訓。或者我們在最近這一年內證明我們會管理業務，或者是蘇維埃政權不能繼續存在下去。最大的危險就是並非所有的人都意識到這點。如果全體共產黨員，負責工作人員，都明白瞭解到：自己既然不會，就得從頭學習，那時我們便會獲得勝利，——據我的意見，這才是主要

的、根本的結論。但是他們不瞭解這點，却又深信：如果誰這樣想，那他就是不開通的人，就是可惜沒有學習過共產主義，也許學習一下共產主義，那他們就會懂得的。不，請原諒，問題並不在農民和非黨工人沒有學習共產主義，而是在於那個本該宣揚綱領和號召人民來執行這個偉大綱領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既然這個時間業已過去，那末現在就要來證明，你們在目前困難情況下能否實際地幫助工人和農民底經濟，使他們都看得見，你們確實經受得住這一競賽。

我們已開始組織了合股公司，其中既有俄國和外國的私人資本家參加，也有共產黨員參加，這些公司乃是一種這樣的形式，那裏可以正確地佈置競賽，可以表明並學會，我們能與農民經濟建立聯合並不比資本家作的壞，我們能滿足農民底需求，能在農民現有的黑暗落後狀態下，幫助他們前進，因為要在短時期內改造農民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擺在我們面前的競賽這一刻不容緩的任務。這就是新經濟政策底關鍵以及我所認爲的黨政策底全部實質。我們這裏的純粹政治問題和困難，應有盡有。這都是你們所知道的：既有熱納亞會議，也有武裝干涉的危險。困難是大極了，但這些困難與競賽的困難比較起來，畢竟還是很微末的。因為我們已經看見那裏的情形，我們在那裏已經學會很多的東西，已體驗過資產階級的外交。這原來是十五年來孟塞維克所教過我們的玩藝，而且是多少使我們受到了教益的玩藝。

這並不是新的東西。

請看在經濟方面我們必須要作的事吧：現在就是要賽得過平常的店員、普通的資本家、商人，他們一到農民中去，並不來爭論共產主義——真的，他們也不致於來爭論共產主義，却祇來爭論：如果你們需要什麼東西，又要交易公平，又要建築得好，那末，由我來建築，價錢是很貴的，但共產黨員，也許建築得更貴，也許，要貴上十倍。這就是現時最能起作用的宣傳鼓動，這也就是經濟根源之所在。

我再重複一遍，由於我們正確的政策，我們已從人民方面取得了債務並展期償還，若按新經濟政策的語句說來，這就叫做期票，但這些期票上並沒有註明期限，什麼時候應交出它們來兌現，這點從期票的條文上是看不出來的。危險就在這裏，政治期票與普通商業期票不同的特點也就在這裏。我們要用全力注意到這點，不要以為在國家托拉斯和合股公司中，到處都是負責的優秀共產黨員而自安自慰——這沒有任何益處，因為他們不善於經營，比較那班經過大工廠大商號鍛鍊的普通資本主義店員要差一些。這點我們沒有悟覺到，這裏要用同樣美麗的俄文詞句說來，就是還存在有「共產主義誇大狂」。問題就在於負責的共產黨員，即優秀、純潔、忠實，受過苦役鍛鍊，並且是不怕犧牲的這共產黨員，却不會作買賣，因為他不是精於實務的人，沒有學過這

點，又不願意去學習，而且不瞭解應當從頭學起。他這共產黨員，是完成過世界上最偉大革命的革命家，雖不是四十個金字塔，也是四十個歐洲國家都在期望着他去幫助擺脫資本主義制度，他也應當向那些在糧食行跑了十年並熟悉這門的普通店員學習，可是他這負責的共產黨員和忠實的革命家，不僅不懂得這點，甚至還不知道他是不懂得這點。

同志們，如果我們祇把這個初次的無知現象改正過來，這也就會是極大的勝利。這次代表大會閉幕之後，我們應抱定這樣一種信念：我們既不知道這點，今後我們就要從頭來學習。我們總還不失為革命家（雖然很多人甚至不完全無根據地說，我們已經官僚化了），我們能夠瞭解這個簡單情理，即在新的、異常困難的事業中，要善於再三從頭開始：開始之後，陷入了困境，又重新來開始，——那怕十次改作，但總之要達到自己的目的，不要裝威作勢，自誇自大，說什麼你是共產黨員，而他却是個非黨的店員，也許還是個白黨份子，就即令他定是個白黨份子，但他善於作好經濟上定要作好的事情，然而你却不會作。如果你這個負責的共產黨員，又有成百的官頭銜，又是共產黨和蘇維埃的「功臣」，假若你瞭解這點，那你就應達到自己的目的，因為這點是能夠學會的。

這一年來我們雖有某些小小成績，但這成績畢竟是微乎其微。主要的是沒有悟解到和沒有普

逼地使全體共產黨員都相信到，此刻我們俄國負責的和最忠實的共產黨員在這方面的本領，比任何一個舊時的店員都要差些。我再重複一遍，要開始從頭學習。如果我們悟解到這點，那我們就能經住考試，而考試是很嚴格的，這是由日益臨近的財政危機所舉行的考試，這是由俄國和國際市場所舉行的考試，況且我們是服從於這種市場，是已與之結聯而不能同它脫離的：這是個嚴格的考試，因為這裏人們能够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擊敗我們。

問題就是這樣而且祇是這樣，因為這裏競賽是很嚴重的，是有決定意義的。我們有過打開我們政治和經濟難關的各種進路和出路。我們可以自豪地誇耀說，我們迄今以前都曾善於適應不同的情況，在各種配合下利用所有這些進路和出路，但現在我們再沒有任何的出路了。這裏請讓我毫無誇大地告訴你們說，真的是就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要進行這『最後的決戰』，不是同國際資本主義，——那裏將還有多次『最後的決戰』，——而是同俄國資本主義，同那從小農經濟中成長起來，並有小農經濟支持的俄國資本主義，進行此種決戰。這裏，在最近將來，就要進行戰鬪，戰鬪開始的日期不能確定。這裏要進行『最後的決戰』。這裏不能再有任何政治上以及任何其他的路可走，因為這是與私人資本實行競賽考試。或者我們經住這一與私人資本競賽的考試，或者在這考試中我們完全失敗，爲了經住這個考試，除技巧以外，我們是應有盡有，我們既

有政權，又有許多各種經濟資源及其他資源，所缺乏的祇是技巧。但如果我們能從過去這一年的經驗中得出這個簡單的教訓，並把這一經驗作為我們在整個一九二二年的行動指南，那時我們就連這個困難也能夠戰勝，那怕它比以前的困難更大得多，因為這個困難是在於我們本身。這並不是什麼外來的敵人。這個困難就在於我們自己既不願瞭解那強迫我們接受的不愉快的真理，又不願落到我們應該落到的不愉快的情況中，即從頭開始學習。在我看來，這就是從新經濟政策中產生出來的第二個教訓。

第三個教訓，補充的教訓，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可惜，這次代表大會上沒有布哈林同志參加，我本想同他來稍微爭論爭論，但最好是留到下次代表大會時再說吧。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我以為我們刊物以及我們的黨一般地都犯了這樣一種錯誤，就是我們墮入知識份子的成見，墮入自由主義，異想着如何來瞭解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總是在舊書本上來尋找答案。而那裏所寫的，却完全不是關於這個問題：那裏所寫的乃是資本主義制度下常有的那種國家資本主義，可是任何一本書上也未曾寫到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的國家資本主義。甚至馬克思關於這點連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他去世之後也沒留下一段確切的言論和無可反駁的指示讓我們來引證。因此現在我們就必須靠自己來打破困局。如果一般地觀察觀察我們刊物上關於國家資本主義所寫的東西，猶如

我在準備這個報告時所企圖作到的那樣，便可以確信地說，那裏完全沒有瞄準目標，簡直是無的放矢。

國家資本主義，據所有經濟學書上的解釋，乃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當國家政權直接控制某些資本主義企業時的一種資本主義。而我們的國家是無產階級的國家，它依據着無產階級，給無產階級以一切政治上的優勢，並經過無產階級把下層農民（大家記得，我們是從貧農委員會開始了這個工作）吸引到自己方面來。因而國家資本主義問題弄得很多人迷惑不清。爲的不致發生這種現象起見，就須記住這一主要的東西，即我們現有的這種國家資本主義，無論在什麼理論或什麼著作中都是沒有解釋的，原因很簡單，因爲與這個名詞有關的所有一切通常的概念，都是關係於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政權的。而我們的是已脫去了資本主義軌道，但還沒有走上新軌道的社會制度，可是指導這個國家的不是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我們的人不願來瞭解，當我們說到「國家」時，這國家就是我們，就是無產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底先鋒隊。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我們能夠加以限制，我們能夠規定它的界限的一種資本主義，這個國家資本主義是與國家關聯着的，而這國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底先進部份，就是先鋒隊，就是我們。

國家資本主義，這就是我們應當加以一定限制，但至今我們還不善於限制的一種資本主義。

全部問題就在這裏。這個國家資本主義將是怎樣的，已經要依我們爲轉移了。我們有充分的，而且是極充分的政權；在我們支配下的經濟資料也是充足的，但是被提昇出來，爲的是要去直接管轄，去確定範圍，去劃清界限，去使其他服從自己，而不是自己服從其他的這個工人階級先鋒隊，却缺乏技巧。這裏所需要的祇是技巧，而我們却缺乏這種技巧。

須知這完全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情況：無產階級即革命先鋒隊擁有極充分的政權，同時却有國家資本主義並存着。問題底關鍵就在於要使我們瞭解，這便是我們能够容許和應當容許的一種資本主義，是我們能够限制和應當限制的一種資本主義，因爲這種資本主義對於廣大農民和應該滿足農民需求來作買賣的私人資本是必需的。定要把事情這樣安排，使資本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周轉底通常進程成爲可能，因爲這是人民所需要，沒有它便不能生活。一切其餘的東西對於他們這個營壘的人，都不是絕對必需的，一切其餘的東西在他們看來都是可以通融下去的。你們這些共產黨員，你們這些工人，你們這些負責管理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底覺悟部份，你們要善於做到使你們所掌握的國家能按照你們的意志來行動。我們已經過了一年了，國家在我們的手中，——而這一年來，國家在新經濟政策方面，真正是按我們的意志行動了麼？不是的。我們不願意承認這點。它不是按我們的意志行動的。然則它是怎樣行動了呢？就像一輛不聽駕駛的汽車，彷彿

內面坐着開車的人，但汽車却不是往他所指出的方向駛去，而是往某個旁人所指出的地方駛去，也不知這個是什麼人，還是秘密的、非法的、憑空來的什麼東西，或是投機商人，或是私人經濟資本家，或者是兩者一塊，——但汽車却不是完全照着，而且常常完全不照着這汽車駕駛人所想像的那樣行進。這就是關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所要牢記着的基本點。要在這個基本方面，從頭來學習；祇有當這點已成爲我們絕對的心得和知覺時，我們才能担保說，我們學會了這點。

現在我就來講到關於停止退却的問題，也就是我在五金工人代表大會上的演說中業已提到的問題。從那時起，無論在黨報上，無論在同志們的私人來信中，亦無論在中央委員會裏，至今我都沒遇到過任何的反駁意見。中央委員會批准了我的計劃，按這個計劃也就是要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的報告中盡力着重指出這一停止退却的問題，並請求代表大會給予相當的指令，即用全黨名義提出而必須執行的指令。我們退却已一年了。現在我們應當代表全黨來說：已經够了！退却所要達到的目的已經達到了。這個時期正在終結，甚至可以說已經終結了。現在所提出的是另一個目的——就是要重新配置力量。我們已進到新的地方，一般和整個說來，我們總算是退却得比較有秩序。不錯，從各方面有過不少能使這個退却成爲驚惶退却的呼聲。有些人說，你們在某些部份上退却得不對，例如，所謂『工人反對派』（我以爲他們的這個名稱是不正確的）

某些代表責備的那樣。他們過份熱心想向一道門裏鑽去，結果却落在另一道門裏了，現在他們已明顯地暴露了自己的錯誤。當時他們却沒有看到他們的活動不是來改正我們的運動方向，而其實他們的活動，唯一是引起驚慌，妨害有紀律地實行退却。

退却本是件困難事情，尤其是對於那些已習慣於進攻的革命家，尤其是當他們已習慣於幾年來進攻中的巨大成功的時候，尤其是他們周圍如果有其他國家那些祇幻想開始進攻的革命家環繞着的時候。其中有些人看見我們在退却，竟像小孩般可恥地哭泣起來，如在最近一次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上所發生過的情形那樣。某些同志由於最優良的共產主義情感和共產主義志向，想道，看，這樣好的俄國共產黨員都在實行退却，於是他們也就哭泣起來。也許，那怕我在這些美妙的民主國家內僑居過很多年，現在我也難於瞭解這種西歐人的心理了。但也許在他們看來，這竟是這樣難於瞭解，居然可以哭泣起來。無論如何，我們亦無暇來論列這些感傷心理。對我們是很顯然的，正因爲我們在許多年內這樣勝利地進攻，並獲得了這樣多的迥非尋常的勝利（而所有這些，還是在一個遭受了絕頂破壞和缺乏了物質先決條件的國度裏哩！），既然我們獲得了這多勝利，爲了鞏固這個進攻，我們退却本來是完全必須的。那時我們不能保持住一舉奪來的全部陣地，另一方面，正因爲我們是一舉奪來，是在工農熱情的頂峯上奪得了無限多的東西，所

以我們才有這樣寬大的地方，使我們能够實行很遠的退却，甚至現在也還能够遠遠退却，絲毫不喪失主要的和重要的東西。雖然驚慌失措的呼聲，其中也有『工人反對派』在內（它最大的害處也在這裏！）。引起了我們中間的部份損失，造成違反紀律和脫離正確退却的現象，但一般和整個說來，退却是實行得很有秩序的。退却時最危險的事，就是驚慌。如果全軍（這裏我是比仿說）都在退却，這時便不能有全體前進時的那種情緒。這時寸步都可以遇到相當頹喪的情緒。我們人中甚至有過一些詩人，他們寫道，看吧，在莫斯科，是飢寒交迫，『先前，乾淨、漂亮；現在，買賣、投機』。我們有許多這樣的詩歌作品。

顯然，這是由於退却而產生的。這裏含有巨大的危險：經過偉大的勝利進攻後來實行退却，確是一件極困難的事；這裏完全是另一種關係；在進攻時，即令不維持紀律，大家也會自行奔向前去；而這裏紀律還應當更是自覺的，並且百倍地需要，因為當全軍都在退却時，它既不明白，也看不見應行停止的地方，而它所看見的祇是退却，——這裏有時祇要稍微發出一點驚慌失措的聲調，就足以使大家跑散的。這裏的危險確是很大，當真正的軍隊在實行這樣的退却時，就架上火機關槍，若是有秩序的退却轉為混亂逃跑時，那就下令：『開槍吧！』。這是作得對的。

如果當我們進行空前困難的退却，全部關鍵在於保持良好秩序之際，竟有人來散佈驚慌心

理，即令這是出於一番好意，也終究必須殘酷無情地嚴格懲治這些稍微破壞紀律的人，這不僅對某些屬於我們黨內的事情應該如此，而且對於孟塞維克之流或第二半國際的全體先生們更應該如此。

近幾天內我在共產國際雜誌第二十期上讀到了拉科施同志評鮑威爾所著新書的一篇文章，我們大家有個時候都會向鮑威爾學習過，但他在大戰後，也如考茨基一樣，已成了可憐的市儈之徒。他現在寫道：『看，他們在向資本主義退却；我們隨時都說：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

當我們說要槍斃作這種宣傳的人時，而那些專在進行此類宣傳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却表示驚奇。固然他們都很詫異，但須知問題是極明顯：當軍隊實行退却的時候，那裏的紀律比在實行進攻時更需要百倍，因為進攻時全體都是向前奔進。如果現在大家都開始向後逃竄，那這就是死亡，就是必然死亡和立即死亡。

正是在這種關頭要退却得很有秩序，確切地規定退却底限度而不陷於驚慌失措，這是最主要的。當孟塞維克說：『你們現在實行退却，而我隨時都是主張退却的，所以我同意你們的行動，我是你們的人，讓我們來一同退却吧』，那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他們說：『凡是公開表示孟塞維主義的人，我們革命法庭應一律處以槍斃，否則，這就不是我們的法庭，那也不知它是什麼

東西了」。

但他們怎的也不能瞭解，並說道：「這些人的獨裁辯該是多麼厲害呵！」他們至今還以為我們之所以懲辦孟塞維克，是因為他們在日內瓦和我們爭吵過。可是假如我們真的走上了這條道路，那大概我們的政權連兩個月也維持不住。其實，鮑威爾，第二國際和第二半國際領導者們以及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宣傳出的這些話，也就是他們的本性：「革命進得太遠。我們隨時都在說的，正是你現在所說的話。讓我們再把這點來重複一遍吧」。而我們却回答說：「正因為這點，讓我們來槍斃你們吧。或者請不必說出你們的觀點，或者，如果你們想在目前情況下，當我們的處境比白黨直接進犯時還更困難的時候，來宣傳自己的政治觀點，請原諒，那我們就會像對待最惡劣和最有害的白匪份子一樣來對待你們」。我們決不應當忘記這點。

當我說到停止退却時，我絕不想藉此來說，我們已學會作買賣了。我的意見恰恰與這相反，若是從我的發言中得出這樣的印象，那就是人們沒有正確瞭解我的話，那就證明我不善於把自己的思想正確敘述出來。

必須使我們這裏由於新經濟政策所造成的焦急和奔忙，以及想把一切都按照新方式來創立來適應的那種趨向，都能停止下去。我們現在有了一些合股公司。誠然，它們的數量是很少的。我

們創辦了有外國資本家參加的九個合股公司，這些公司業經對外貿易部批准，此外索科里尼可夫主持的委員會批准了六個，北方木料管理局也結合了兩個。這樣一來，現在就有十七個擁有若干百萬資本，且經相當機關批准了的合股公司。（當然，在我們機關方面也有充分的混亂現象，這裏也可能錯過一些時機）。但無論如何，現在我們已經有了與俄國資本家及外國資本家合辦的股份公司，它們的數量並不多。這一雖屬微小但是實際的開端表明着，人們業已重視共產黨員，不過是根據他們的實踐方面來重視，而不是像中央監察委員會和全俄中央執委會這類高級機關那樣來重視他們。當然，中央監察委員會是個很好的機關，我們現在將給它以更多的權力。但畢竟還是，如果這些機關檢查共產黨員時，那：真的，在國際市場上，人們並不承認它們的威信。可是當俄國的和國外的這班普通資本家與共產黨員來組織合股公司之際，我們就說：「我們總還會作一些事情，不管這些事情作得怎樣不好，範圍怎樣狹小，但講到開端這點，我們畢竟有了一點什麼成績」。當然，這成績並不怎樣多；試想想，我們宣稱要把全副精力（人們說，我們的精力是很大的）都放到這個事業上，這已經有一年了，可是在這一年之內，我們却祇創辦了十七個合股公司。

這證明我們是多麼不靈便，多麼呆笨，我們多少還帶有些奧布洛莫夫式精神，因為有這種精

神，我們仍是不免要挨打的。但我再來重複說一遍吧，我們畢竟是有了開端，偵察工作已經作過了。如果可供資本家活動的起碼條件都沒有，那資本家是不會到我們這裏來的。但既然有了那怕是極小部份的資本家來到，這也就指明，部份的勝利業已有了。

當然，他們還要在這些合股公司內部來打擊我們，竟會打擊得使我們以後需得好幾年才能整理就緒。但這也不要緊。我並不說這是勝利，——這是一種偵察動作，它指明我們已經有了活動場所，有了一塊地方，所以我們已能停止退却。

用偵察動作去同資本家規訂了的不過是極少數的條約，但這些條約畢竟是締結了。要在這方面來學習，並繼續行動。就這點說來，已是停止焦急、叫喊和奔忙的時候了。紛紛寄來的字條，接連打來的電話，總說：「既然實行的是新經濟政策，可否把我們這裏也來重新改組一下呢？」。大家都在奔忙，漫無秩序；誰都不實際作事，大家都在議論怎樣適應新經濟政策，却得不到任何結果。

可是商人們在恥笑共產黨員，大概，他們還這樣說：「先前你們是專來開導別人的，現在你們却專來空口議論」。資本家已在譏笑我們，說我們遲延了、錯過了時機，——這是沒有任何懷疑的，在這個意義上，所以我提議，要用代表大會的名義批准這個指令。

退却已經終結。怎樣與資本家在一塊工作的主要活動方式，已經規定了。雖然榜樣極少，但榜樣已經有了。

對新經濟政策問題玩弄聰明，憑空議論已經修了吧！詩就讓詩人去，這是他們份內的事。但經濟人員們，就請再不要議論新經濟政策，而去增加這些合股公司的數目，去檢查那些善於佈置與資本家比賽的共產黨員人數吧。

退却已經終結，現在的問題是重新配置力量。這就是代表大會應當提出的指令，這個指令應把混雜和忙亂現象完全消除。安靜點吧，不要異想天開，這是不唯無益而且有害的。要在實際上證明，你工作得並不比資本家壞。資本家建立着與農民的經濟聯合，爲的是要發財致富；你也應當同農民經濟建立聯合，爲的是要加強我們無產階級國家底經濟權力。與資本家比較起來你是佔着優勢，因爲國家政權在你的手中，許多經濟資料也在你的手裏，祇是你不善於運用它們，你要清醒些來觀察事物，拋去浮誇心理，脫掉華麗的共產主義外衣，簡樸地來學習普通事務，那時我們才會戰勝私人資本家。我們擁有國家政權，我們擁有大批經濟資料；若是我們戰勝了資本主義，並與農民經濟建立了聯合，那我們就會成爲絕對不可戰勝的力量。那時，社會主義建設就不會是汪洋大海中那所謂共產黨這少數人的事業，而定會成爲全體勞動羣衆的事業了；那時，每個

普通農民都會看到：我們是在幫助他；那時，他就會跟着我們走去，就即令這種步度會要慢一百倍，但它却穩固牢實一百萬倍。

就是要在這樣的意義上來講停止退却的問題，並用某種形式把這個口號變成代表大會的決議，才會是正確的。

我想來講講與這有關的一個問題，什麼是布爾塞維克底新經濟政策，是進化呢？抑是策略呢？改換路標派份子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你們知道，改換路標派是俄國僑民中滋長的一種思潮，一個社會政治派別，為首的就是立憲民主黨大活動家，以前高爾察克政府底某些總長，他們已確信蘇維埃政權是在建設俄羅斯國家，因而要跟着這個政權走去。『但這個蘇維埃政權是在建設什麼樣的國家呢？共產黨人說，是建設共產主義的國家，同時認定這是一種策略：布爾塞維克在困難關頭一關過私人資本家之後，就會為所欲為的。讓布爾塞維克去講自己所喜歡的東西，其實這不是策略，而是進化，是內部的變化，他們會走到通常的資產階級國家，所以我們應當幫助他們。歷史是異途同歸的』，——改換路標派這樣論道。

其中某些人假裝共產黨員，但也有比較直率的人，烏斯特亞洛夫就在其列。似乎他當過高爾察克政府的總長。他不同意自己同志們的意見，並說道：『你們關於共產主義隨便怎樣說都行，

但我却斷定，共產黨員所作的這一切並不是策略，而是進化」。我以為，烏斯特亞洛夫的這種爽直聲明對我們有莫大益處。我們還得多次聽到這樣甜蜜的共產主義說話，尤其是我因為職務關係，每天都簡直聽得有些苦悶，有時甚至苦悶得無法忍受。現在却有一期改換路標雜誌〔二〇〕上不是載的這種共產主義謊話，而直接說道：「你們那裏根本不是這麼一回事，這祇是你們的想像而已，其實，你們是在往通常資產階級泥塘裏滾去，標着各種巧妙辭句的共產主義小旗將在那裏飄蕩起來罷了。」這是很有益處的話，因為這裏我們所看到的，已不是簡單重複我們從周圍經常聽到的東西，而簡直是階級敵人底階級真理。瞧燕這樣的言論倒很有益處，因為寫出這樣的話來，並不是由於在共產主義國家中祇准這樣寫或禁止有旁的寫法，而是由於這真正是階級敵人粗魯而公開說出來的階級真理。「我贊助俄國的蘇維埃政權，——烏斯特亞洛夫說，雖然他是個立憲民主黨人，資產者，贊助過武裝干涉，——我贊助俄國的蘇維埃政權，因為它踏上了可以滾到通常資產階級政權去的道路」。

這是很有益的話，這樣的話，我以為是必須注意到的；改換路標派這樣寫着，對我們說來，是比其中某些有時裝成差不多是共產黨員的人要好得多，因為從遠處大概你是分辨不清的，——也許，他們相信上帝，也許他們相信共產主義革命。老實說，這樣公開的敵人倒是有益的。老實

說，烏斯特亞洛夫所說的事情，是可能的。歷史上有過各種變質的事發生；憑藉信念、忠誠和其優越品質，這在政治中是完全不嚴重的東西，優越品質祇是很少數人才有，而決定歷史命運的却是極廣大的羣衆，如果那少數人不適合於這些羣衆，那他們對待這少數人時也就不十分客氣了。

過去這樣的例子很多，所以要歡迎改換路標派底這一公開聲明。敵人說出階級的真理，就指明擺在我們面前的危險。敵人力圖使這成爲不可避免的事。改換路標派表現着成千成萬各種各樣的資產者或參加我們新經濟政策的蘇維埃職員底情緒。主要和真正的危險就在這裏。因此對這個問題要特別加以注意：真的，是誰佔上風？我所說的是競賽。對我們直接的逼攻已經是沒有了，現時他們並未扼住我們的喉嚨。明天怎樣，這我們還得看看，可是今天他們已經沒有拿着武器進攻我們，但同時，我們與資本主義社會的鬭爭是更加百倍殘酷、百倍危險，因爲我們不是隨時都顯然看到，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我所說的共產主義競賽問題，不是從同情共產主義的觀點上，而是從經濟形式和社會結構形式發展的觀點上出發。這不是競賽，這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之間一種瘋狂的、拚命的，如果不是最後一次，也是接近於最後一次的決死鬭爭。

這就要明顯地提出問題：我們的力量何在以及我們所缺乏的是什麼？政權是極充分的。這裏未必有人會來說，在某個實際問題上，在某個事務機關中，共產黨員或共產黨缺乏權力。主要的經濟力量操在我們手裏。一切有決定意義的大企業和鐵路等等，都是由我們掌握。不管租賃業有些地方獲得了多麼廣泛的發展，但它一般地還是起着極小的作用，大體上，還祇佔極微末的部份。在俄國無產階級國家手裏的經濟力量，完全足以保證過渡到共產主義。究竟缺乏的是什麼呢？所缺乏的東西，是顯而易見的：就是從事管理的那部份共產黨員缺乏文化才幹。但如果就莫斯科（這裏有四千七百個負責的共產黨員）以及這堆龐大官僚主義機器看來，——究竟是誰在領導誰呢？要說是共產黨員在領導這樣的一堆機器，那我却很懷疑。如果說句真話，那就不是他們在領導人家，而是人家在領導他們。這裏便發生了某種類似我們在孩童時代聽人講述的那番歷史情景。他們教我們說：常常有一個民族攻打另一個民族，於是那個征服了人家的民族，就是征服者，而那個被征服了的，就是被征服者。這是極為簡單，人所共知的事。但對這些民族的文化來說，情形又怎樣呢？這裏却不是那樣簡單了。如果那征服了人家的民族，文化上高於被征服的民族，那征服者就強迫被征服的民族來接受自己的文化，反之，那就會被征服者強迫征服者來接受自己的文化。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首都內是否有某種類似這樣的情形，是否

四千七百個共產黨員（差不多整整一師人，而且全是最優秀的份子）服從了別人的文化呢？誠然，這裏似乎可以得到一種印象，以為被征服者有高度的文化。完全不是這樣一回事。他們的文化是渺小的低微的，但終究比我們的要高。不管這文化是怎樣渺小得可憐，但它總比我們負責共產黨員的文化要多，因為這些共產黨員沒有充分的管理技巧。成爲機關領導人的共產黨員們——因怠工者有時故意這樣巧妙地迎合他們，以便弄到一些粉飾門面的招牌，——往往被人愚弄了的。這樣來承認是很不愉快的。或者，至少是不很愉快的，但我覺得，須得這樣承認，因爲現在問題底關鍵就在這裏。據我看來，過去一年來的政治教訓，就歸結在這點上，而一九二二年的鬭爭也將在這個標幟下來進行。

蘇俄共和國和俄國共產黨做負責工作的共產黨員能否瞭解他們不善於管理呢？能否瞭解他們自以爲是在領導人家，而其實却在被人領導呢？如果他們能於瞭解，那他們當然也能學會，因爲事情是可以學會的，但爲了這層就必須學習，可是他們又不學習。人們祇在到處發號施令，而其結果却完全不是他們所想的那樣。

我們宣佈新經濟政策時所提到日程上的競賽，——這乃是很嚴重的競賽。看來，這種競賽在一切國家機關內都有，其實這是兩個絕對互相敵對階級鬭爭底又一形式，這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

級鬭爭底又一形式，這種鬭爭還沒有終結，甚至在莫斯科中央機關內，從文化要求上說來，也還沒有得到完滿的解決。因為資產階級的活動家對於通曉事物一層，往往比我們那些擁有全部政權和一切資源，但絲毫不會利用自己權利和政權來操作的優秀共產黨員，要高明一些。

我想從亞歷山大·托多爾斯基所著的小冊子內引證一段話來。這本小冊子是在威斯廣斯克城（特維爾省的一個縣城）出版，並且是在俄國蘇維埃革命第一週年——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出版的，時間已過去的很久了。威斯廣斯克城的這位同志，大概是個黨員。我最早以前讀過這本書，現在不敢担保，我在這方面不會說錯。他敘述到他如何着手裝置兩個蘇維埃工廠，如何吸引兩個資產者參加，並且這都是按照當時的辦法：在剝奪他們自由權和沒收其全部財產的威脅之下強迫他們來作工的。這兩個資產者就這樣被吸收來參加恢復工廠的工作。我們知道一九一八年吸收資產階級的情形，所以也就用不着詳細地來講這點；現在我們是用另一些辦法來吸收他們。以下就是他的結論：「這還是事情的一半——戰勝和致死資產階級是不夠的，還要強迫它來為我們工作」。

請看這是多麼卓越的語句。這些卓越的語句指明，甚至在威斯廣斯克城，甚至在一九一八年，就正確地瞭解了已獲勝利的無產階級與被戰勝的資產階級間的關係。

如果我們打壞剝削者的雙手，使其不至爲害，並致之於死命，這還祇是事情的一半。而在我們莫斯科負責工作人員裏，一百個中大約有九十個人都以爲全部事情祇是致剝削者於死命，使其不至爲害，打壞他的雙手就完了。我關於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以及白黨份子所說的那些話，往往都歸結於要使他们不至爲害，要打壞他們的雙手（也許，不僅打壞他們的手，可能還打壞他旁的地方），並致他們於死命。但須知這祇是事情的一半。甚至在一九一八年，當威斯廣斯克城的同志說出這點時，這還是事情的一半，而現在這竟至是少於事情的四分之一。我們應當強迫資產階級用自己的手來爲我們做事，而不是使負責的共產黨員祇居領導地位，祇擁有官職，而却跟着資產階級隨波逐去。全部問題的實質就在這裏。

祇靠共產黨員的手來建成共產主義社會，這是幼稚的想法，完全是幼稚的思想。共產黨員不過是滄海之一粟，不過是人民大海中的一粟；他們祇有在不僅按全世界歷史意義求正確決定道路方向時，才能領導人民按照自己的道路前進。在全世界歷史意義上，我們絕對正確地決定了我們的道路；每個國家的事實都能來確切證明這條道路我們是決定得正確的，而在我們祖國，在自己國家內，我們也應當正確地來決定這條道路。這條道路不僅取決於這點，而且也取決於不會有武裝干涉，取決於我們能够用商品來換取農民的糧食。農民會這樣說：『你是個極好的人，你捍衛

了我們的祖國；因爲這點我們才聽從你的話，可是如果你不善於經營，那就請你滾開去罷」。是，農民定會這樣說的。

祇有當共產黨員能够用他人的手來建設經濟，自己向這資產階級學習，並使資產階級走上利於我們的道路時，那我們才能管理經濟。而如果共產黨員自以爲我既是負責的共產黨員，我什麼都懂，我所戰勝過的人要比店員高明得多，我們在戰綫上撕殺過，並且還不是同這樣的人撕殺哩，——正是這種佔優勢的情緒在戕害我們。

如果我們使剝削者不至爲害，打壞他們的手，並割掉他們的手，這還祇是事情中最不重要的一部份。這是須得作的。我們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和我們的法庭在這方面，不應當像至今所作的那樣柔軟，要記住，它們乃是處在全世界一切敵人包圍下的無產階級法庭。這點做起來並不難，我們基本上已學會了這點。這裏應該採取某些逼迫手段，但這是輕而易舉的事。

至於勝利底第二部份——即藉非共產主義者的手來建設共產主義，即善於實際地來作經濟上必須作的事情，——這就是謀得與農民經濟的聯合，滿足農民的需求，使農民能承認道：「不管挨餓是怎樣困難，怎樣艱苦，怎樣難受，我却看見，雖說這政權是我所沒有習慣的，但從它那裏能得着實際的，真正感覺得到的好處」。要做到使那些人數衆多，並超過我們不知多少倍而與我

們合作的份子這樣地來工作，以致我們能注視他們的工作，能瞭解這個工作，能用他們的手作出某種有益於共產主義的專業來。目前情況的關鍵就在這裏，因為就即令有個別共產黨員已瞭解並見到了這點，但在我們黨內廣大羣衆中，却還沒有瞭解到必須吸收非黨羣衆來參加工作。關於這點不知寫過多少訓令，說過多少話，但這一年來，又作了些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作到。我們黨內，找不出一百個委員會，甚至找不出五個委員會能表明自己有什麼實際結果。請看我們多麼落在目前迫切需求的後面，我們還多麼厲害地保持着「一九一八和一九一九年的傳統」。那時本是作出了世界上最偉大歷史事業的偉大年代。但如果祇回顧這些年代，却看不見現在面前擺着何種迫切任務，那就會自遭滅亡，無疑的，絕對會自遭滅亡，全部關鍵就在於我們不願意瞭解這點。

現在我想引證關於我們管理情形的兩個實際例子。我已經說過，最好是拿一個國家托拉斯的例子來證明這點。但恕我不能使用這種正確方法，因為這要極具體地來研究那怕是一個國家托拉斯的材料，可惜我沒有可能來作這樣的研究，所以我就祇舉出兩個不大的例子。一個例子是：莫斯科消費合作社對外貿易人民委員部的官僚主義；另一個是順巴斯方面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很少適當，但我又拿不出更好的例子來。就根據這個例子，我也可以來說明我的主要意思。你們從報紙上都知近幾個月來我沒有可能來直接過問事情，因為我既沒在人民委員

會任事，也沒在中央委員會工作。當我偶然暫時來到莫斯科時，總常常聽到有對對外貿易部的許多情激可驚的怨言。至於對外貿易部工作不好，辦事拖延，這點我從來一分鐘也沒有懷疑過。但既然這些怨言特別激烈，那我就企圖來加以分析，——祇拿一樁具體的事件，將其查究到底，弄明那裏的實際情形，爲什麼這架機器動作不起來。

莫斯科消費協社需要購買罐頭。於是就有一個法國人來作這筆買賣。究竟他作這件事情，是否爲着國際政策的利益，是否通報過協約國領導者，或者是否因爲得到了彭加萊和蘇維埃政權底其他敵人的同意，我却不得而知（我想，我們的歷史家在熱納亞會議後是會來分析這件事的），但法國資產階級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實際上也參加了，這是實事，因爲法國資產階級的代表竟出現於莫斯科，並出賣罐頭。莫斯科發生飢餓現象，夏季還會有更大的飢荒，肉類沒有運來，並且按衆所週知的我們交通人民委員部工作質量來看——大概是會運來的。

他們出賣肉類罐頭（罐頭是否完全壞的，當然，將來的檢查會證實這點）來換取蘇維埃的紙幣。還有比這更簡單的事麼？但如果按蘇維埃的方式認真加以考究，原來事情就不簡單了。我沒有可能來直接注意這件事情，祇是組織了人去檢查，現在我這裏一個小本上記得有這一著名事件的經過。事件是這樣開始的：據加米涅夫同志的報告，二月十一日，俄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通

過了一個決議，贊成在國外購買一批食品。當然，不經過俄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這些俄國公民哪能解決這樣的問題呵！試想想：不經過中央政治局，這四千七百個負責工人（這祇是按登記數目）怎能解決關於在國外購買食品的問題呢？這當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加米涅夫同志顯然深知我們的政策和實際情況，所以不過份倚靠大量負責工作人員，而用擒牛直擒角的果斷辦法來下手，如果擒不住牛，那無論如何也得擒住政治局，於是一下子就做出決議（我沒聽說關於這個問題有過討論）：『請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注意從國外購入食品的願望以及關稅』等等。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是注意到了。動作開始。這是二月十一日的事。我記得，我在二月最末的一兩天或稍前一點才來到莫斯科，我首先聽到的就是莫斯科同志的號泣，簡直是絕望的號泣。怎樣一回事呀？我們怎的也買不到糧食。爲什麼呢？對外貿易人民委員會遷延。因爲我許久沒參加工作，所以當時還不知道政治局對這個問題已有決議，於是我祇告訴總務處說：查究清楚，把材料拿給我看。這件事情，祇當克拉辛回來，加米涅夫和克拉辛談過話，一切辦妥，我們買到了罐頭之後，才告結束。好在這件事情是順利地結束了。

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善於協商妥當，並正確決定俄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所要求的政治路線，這點我是絲毫也不懷疑的。如果在商業問題方面的政治路線也由加米涅夫和克拉辛來決定，那我們

這裏就會是世界上最優秀的蘇維埃共和國，但決不能容許每個協定都硬要拉出政治局委員加米涅夫和克拉辛來，——此時克拉辛正忙於熱納里會議前這需要有絕頂緊張勞動的外交事務，——硬要拉出這兩個同志去向法國人購買罐頭。這樣工作是不行的。這既不是新，也不是經濟，也不是政策，而簡直是一場大笑話。現在我有關於這個問題的調查材料。我甚至有兩種調查材料：一種是人民委員會總務主任高爾布諾夫及其助手米羅施尼可夫調查來的，另一種是國家政治保衛局調查來的。究竟國家政治保衛局爲什麼來注意這件事，我不知道，而且不完全相信這是正當的，但我並不來講這點，因爲我害怕又要來番新的調查。重要的祇是材料已經收集好了，現在都在我的手裏。

爲什麼我在二月底來到斯莫科後，竟聽到了一種真正的號泣，說什麼「我們買不到罐頭」，同時輪船停在利巴雅，罐頭就堆在那裏，他們甚至同意用真正的罐頭來換蘇維埃的錢哩！如果這些罐頭不完全是壞的（我此刻之所以着重指出「如果」這字，是因爲我還不完全相信，那時我是否再要指定人作第二次調查，但其結果我們祇好留到下屆代表大會上來講了）——就是說，如果這些罐頭不是壞的，又已經買到了手，我試問：爲什麼沒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就不能作這樣的事呢？從我這裏有的調查材料中，我看到有某個負責的共產黨員大罵另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我

又從同一檢查材料中看到，某個負責的共產黨員向另一個負責的共產黨員說：「以後除非有公證人，我決不同你談話」。讀完這段故事後，我就記起二十五年前，當我流放在西伯利亞時我不得不當律師的情形。那時我是個秘密的律師，因為我是被放逐的囚事犯，是被禁止作這種事情的，但因爲沒有別的人，大家也就祇好到我那裏來，並訴述某些案件。這裏最難於瞭解，究竟是什麼一回事。有時來了一個鄉下女人，當然，她一開始就講到她的親屬，真難瞭解，究竟她講的是什麼一回事。那知是關於一條白母牛。你告訴她說：「拿憑據來吧」，她就走去，並說道：「沒有白母牛的憑據，他還不願意聽哩」。於是我們也就在自己流犯人中常來取笑這憑據的事。但我總還是把事情稍許改進了一些：當有人來找我的時候，總帶得有憑據，那時我才能弄個清楚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爲什麼他們訴苦，苦處在什麼地方。這已是二十五年前在西伯利亞的事情（那裏距火車站有幾百俄里）。

爲什麼在革命後三年的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爲了買點罐頭，還要經過兩次調查，還須有加米涅夫和克拉辛參加以及政治局底指令呢？究竟缺乏什麼呢？政權麼？不是的。錢也找到了，既有經濟權力，也有政治權力。一切機關全在工作。究竟缺乏什麼呢？就是莫斯科消費協社中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員（我絲毫也不反對他們，並認爲他們都是很好的共產黨員）以及對外貿易部

百分之九十九的工作人員缺乏文化才幹，——他們不能精確地來處理業務。

當我初次聽到這件事情，我就向中央寫了一個書面提議：據我的意見，除全俄中央執委會委員外（這些委員，你們知道，是不可侵犯的）除了這些人外，要把莫斯科各機關中的全體工作人員放到莫斯科最壞的監牢裏禁閉六個鐘頭，而對外貿易部的工作人員，則禁閉三十六個鐘頭。那知現在却沒找着一個有罪的人，其實從我所講述的這中間，很顯然是找不出罪犯來的。簡單是由於通常俄國知識份子式的不善於實際作事，雜亂無章罷了。起初急於動手，便想一下作成，爾後才加思索，當稍一走不通的時候，就馬上跑到加米涅夫那裏去訴苦，把問題搬到政治局去。當然，國家的一切困難問題要提交政治局——關於這點以後我還得講到，——但要首先加以思索，然後才動手來作。如果你發言，那就請有憑有據地來發言。起初你可發一個電報，在莫斯科還有電話，也可給相當的機關去個筆記電話，把底稿交瞿魯巴，並告訴說：我認為這買賣很緊急，如果遷延，那我就來查究的。要想這一起碼的文化作風，對待問題要有充分的思考；要是問題不能一下子在一兩分鐘內或經過電話來得到解決，那你就拿着文件，並有憑有據地說：『如果你要遷延，那我就把你關進監牢裏去』。但我們這裏沒有任何思考，毫無準備，徒事奔忙，好幾個委員會，弄得大家都疲倦了、困憊了、病倒了，而祇是當加米涅夫能與克拉辛接洽時，事情才得

到進展。這是極標本式的現象。這種現象決不祇發生在首都莫斯科，而且在別的都城，在一切獨立共和國的都城和個別省會內也可見到，而在非都會的城市裏則經常發現這樣的事，甚至是比這還壞一百倍的事。

在我們的鬭爭中應當記得，共產黨員不思考是不行的。他們能卓越地向你們談到革命鬭爭，論到全世界革命鬭爭情形。而爲了逃出極端的貧乏和窮困，就需要有思考、有文化，言行得當——但他們卻不會這樣作。如果我們來歸罪負責的共產黨員，說他們對待事情不誠實，這便是不正確的。其中絕大多數人——百分之九十九——不僅誠實，而且在最困難條件下業已證明其忠於革命，無論在沙皇制度崩潰前和在革命後都簡直是不願犧牲生命的人。如果在這方面來找原因，那就根本不正確了。需要有文化才幹來對待最尋常的國家事務，務必瞭解，這是國家的、商業的事，如果有障礙，那就要善於把它消滅掉，並將遷延這事的罪人提交法庭審判。我以爲無產階級法庭是知道怎樣治罪的，但爲要治罪，就得找到罪犯，我却可以向你們担保說，這裏是找不到罪犯的，你們每個人都來看看這件事情吧，——這裏並沒有罪犯，祇有奔忙、亂雜、瑣屑事情：誰都不會正確對待問題，誰都不瞭解，對待國家事務是不應該那樣，而應該這樣。一切白匪份子和怠工者也就利用這一弱點。有個時候我們會與怠工者進行過殘酷鬭爭，這個鬭爭現在也還擺在

日程上；當然，怠工者還有，還要同他們作鬭爭，這是對的。但在我所說的這樣一種情況下，難道能和他們作鬭爭麼？這比一切怠工行為更加有害，怠工者唯一是要看到：兩個共產黨員爲了在什麼時候去向政治局請求關於購買糧食的原則指令問題，彼此發生爭論，於是就乘隙而入。如果有個稍微聰明點的怠工者站到這兩個共產黨員的某一方，或依次站在雙方加以贊助，那就潛透了。那事情就會永遠地被葬送了。誰的罪過呢？誰也沒有罪過，因爲兩個負責的共產黨員，忠實的革命家，竟爭論這樣毫無意味的問題：要在什麼時候把問題提到政治局去，以便得到購買糧食的原則指令。

這就是問題的實情，這就是困難之所在。任何一個經過資本主義大企業鍛鍊的店員，都會作這樣的事，而百分之九十九的負責共產黨員却不曾作，並且不願意瞭解到，自己沒有這種技巧，應該從頭開始學習。如果我們不懂得這點，不進預備班去從新學習，那我們就絕對不能解決現時這全部政策基礎的經濟任務。

我想引證的另一個例子，就是頓巴斯，你們知道，這是我國全部經濟的中心和真正基礎。如果我們不恢復頓巴斯，不把它提到應有的高度，那就根本談不上任何恢復俄國大工業，任何真正的社會主義建設，因爲除非經過大工業，就不能建成社會主義。在中央委員會裏我們是注意到了

這點的。

這個區域並沒把瑣碎問題非法地、可笑地、荒謬地搬到政治局去，而所提出的乃是真正絕不容緩的事件。

中央委員會本應當監督到，使在我們全部經濟底這真正中心真正基礎的地方，真正有條理地來工作，而在石煤工業中央管理局担任領導工作的，不僅無疑是忠實的，而且還真正是有學問，本領極大，甚至可以說——我這話是不會錯的，——是富有天才的人，因此中央委員會把注意力集中到那裏去。烏克蘭是個獨立共和國，這是很好的，但它在黨的關係上有時總想——要是客氣點說——繞圈子，而我們就得設法使之就範，因為那裏的人很狡猾，而烏克蘭黨的中央——我並不說，它存心欺騙，但不知怎的却同我們有些疏遠了。爲了要看到這件事的全部底細，我們就在這裏的中央委員會內審察了這件事情，並發現了其中的磨擦和分歧。那裏有個小礦井管理委員會。是的，在小礦井管理委員會與石煤工業中央管理局間有着劇烈的磨擦。但我們中央委員會，終究有某些經驗，於是就一致決定，並不撤消領導人員，如果發生磨擦，那就連全部詳情細節也一齊報告我們，因為當我們在那區域有不僅忠實，而且很有本領的人，這時就需要盡力贊助他們，假如他們還沒有學好，那就得使他們真正學習成器。結果，在烏克蘭召集過黨代表大會，

——我不知道代表大會上的實情，祇知道發生過各種各樣的事。我問過烏克蘭的同志，並且專門請求過奧爾忠尼啓則同志，中央委員會也就委託他去看看那裏的情形。顯然，那裏有過陰謀傾軋，一場糊塗，如果黨史研究委員會要來研究這個問題，就費十年功夫也是弄不清楚的。但實際結果是這樣：違反中央委員會一致通過的指令，使這批人的位置竟被另一批人代替了。這是什麼一回事呢？這批人中的一部份，不管其一切高尚品質，基本上犯了相當的錯誤。他們過份醉心於行政手段。那裏環繞在我們周圍的都是工人。往往人們當一講到『工人』時，就以爲這是指工廠內的無產階級而言。事情全不是這樣。我國從戰爭開始時起，那些投進工廠裏去的並不是無產者，而是志在躲避戰爭的人，難道現在我國社會條件和經濟條件已能使進到工廠中去的都是真正的無產者麼？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按馬克思的話說來這是正確的，但馬克思寫的不是關於俄國，而是關於從十五世紀開始的整個資本主義。這在六百年過程中是正確的，而對於現在的俄國來說，却就不對了。進到工廠中去的人，往往不是無產者，而是各種各樣的偶然成份。

要善於這樣正確地來安排工作，使其既不落後，又能及時解決已有的磨擦，並使行政手段不脫離政治，——這就是任務所在。因爲我們政治和行政手段的基礎，是要使整個先鋒隊與全體無產階級羣衆和全體農民羣衆聯繫起來。如果誰忘記這些小輪子，如果他只醉心於行政手段，那就

糟透了。頓巴斯工作人員所犯的錯誤，較之我們其他的錯誤，是微乎其微的；然而這是個標本式的例子，中央委員會一致要求：『留下這部份人，連小的衝突也交到我們中央來解決，因為頓巴斯，這不是偶然的區域，而是沒有它，則社會主義建設祇會是空洞的善良願望』，——但結果我們的全部政權，中央委員會的整個威信原來都是不充分的。

當然，這次是在使用行政手段方面犯了錯誤；此外，還有一大堆旁的錯誤。

這個例子就說明，全部關鍵並不在於政權，而是在於要會管理，會正確地安排人員，會這樣來避免小衝突，使國家的經濟工作不至於中斷。我們卻不會這樣做，錯誤也就在這裏。

我以為，當我們說到我國革命和估量到革命底命運時，我們要把那些已完全解決，並已作為某種固定不移事物載入了擺脫資本主義的這一世界歷史轉變史冊中的那些革命任務，嚴格地區分開來。我國革命已成就了這樣的事業。就讓孟塞維克和第二半國際代表鮑威爾去叫喊：『他們那裏是資產階級革命』，但我們却說，我們的任務，是把資產階級革命進行到底。正如一個白黨刊物上所說的那樣，人們四百年來在我們國家機關中收集了陳義，而我們却在四年功夫內便把這些陳義清除淨盡了，——這是我們最偉大的功績。而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却作了些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作。無論在我國也好，甚至在先進文明的德國也好，人們連不能把堆積在那裏的中世紀

污垢運除出去，反而來挖苦我們的最偉大的功績。把革命進行到了底，這正是我們的不可剝奪的功績。

現在感覺到戰爭的氣氛了。各工人聯合會，例如改良工會，通過反戰決議，並威脅說要用罷工來反對戰爭。不久前，如果我沒弄錯的話，我看見報上的電訊說，在法國國會裏，一個很好的共產黨員發言反對戰爭，並指出說，工人寧願起義，不願戰爭。現在已經不能像我們在一九二二年公佈巴塞爾宣言時那樣來提問題了。祇有俄國革命指明，怎樣才能逃出戰爭，這該要費多大的困難，什麼是用革命手段來退出反動戰爭。反動的帝國主義戰爭在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避免的。人類在解決這類性質的一切問題時，是決不能忘記，也決不會忘記，那時已有幾千萬人被害，並且現在還會有幾千萬人遭到屠殺的。須知我們是處在二十世紀，俄國民族，是用並非有利於這國或那國政府而是破壞它們的這樣一種革命手段退出了反動戰爭的唯一民族，而俄國革命也就把俄國民族引救出來了。俄國革命所獲得的東西，是不可剝奪的。任何力量也不能奪去這一勝利品，猶之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奪去蘇維埃國家所創造了的東西一樣。這是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勝利。幾百年來，國家都是按照資產階級樣式建立起來的，現在却破天荒第一次地找到了非資產階級的國家形式。也許，我們的機關還不好，但據說，最先發明的那架蒸汽機，也是不好的，

甚至不知道，它是否能用。但問題並不在這裏，而是在於發明已經有了。縱令頭一架蒸汽機按其形式說來是不適用的吧，但現在我們畢竟有了火車頭。縱令我們的國家機關是壞到了極點吧，但它畢竟是創立起來，歷史上最偉大的發明業已成功了，無產階級形式的國家業已創立了，——因此讓全歐洲，讓成千的資產階級報紙去大肆風傳，說我們的情形多麼亂雜、多麼窮困，說勞動人民祇過着一種痛苦生活，——但世界上所有的工人畢竟還是傾向於蘇維埃國家。這也就是我們所達到的和不可剝奪的偉大勝利品。但對我們這些共產黨底代表說來，這表明祇是打開門徑。現在我們面前擺着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任務。這點作到了沒有呢？還沒有作到。我們還沒有社會主義底基礎。那些臆想有了這樣基礎的共產黨員，是大錯特錯了。全部關鍵就在於把我們俄國革命中具有全世界歷史功績的東西，與我們施行得最不好的，還沒有建立的以及還要多次改作的東西，堅決地、明確地、清醒地區別開來。

政治事變常常是很錯綜而複雜的。可以把它們和鏈條相比，為要抓住整個鏈條，決不能祇抓住一個環節。決不能人為地隨便挑選你所想要抓住的那個環節。一九一七年時的關鍵何在呢？就在於退出戰爭，這是全體人民所要求而且是籠罩着一切的。革命的俄國達到了退出戰爭的目的。雖曾費過很大的努力，但人民的基本要求是正確估計到了，這便使我們獲得了多年長久的勝利：

所以人民感覺到，農民看到，每個從前綫上回來的兵士也很好地知道，他們獲得了蘇維埃政權這個更民主、更接近勞動羣衆的政權。不管在其他方面我們作了多少糊塗難看的事體，而我們既然估計到了這個主要的任務，也就是說，一切都是正確的。

一九一九和一九二〇年的關鍵何在呢？——是軍事上回擊敵人、當時雄強一世的協約國來攻打我們、窒殺我們。這裏就無需宣傳，任何一個非黨的農民也瞭解到發生了什麼事。地主快回來了。共產黨員善於同地主作鬭爭。這也就是廣大農民羣衆之所以贊助共產黨員以及我們獲得了勝利的原因。

一九二一年的關鍵是要有秩序地來實行退却。所以那時需要加倍嚴格的紀律。『工人反對派』說：『你們對工人的重視不夠，工人應當表現更大的主動性』。但主動性應表現於有秩序地實行退却，並加倍嚴格地保持紀律。誰要是稍微陷入驚慌或破壞紀律，就會葬送革命，因為最困難的事，乃是帶着那些已慣於爭取勝利，浸透了革命思想觀念，內心裏認爲一切退却都類似卑劣行爲的人們，來實行退却。最大的危險是破壞秩序，最主要的任務是維持秩序。

至於現在的關鍵何在呢？這個關鍵——我的報告就是要歸結到這點，並以此來結束報告——並不在於政策改變方向；關於這點，因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緣故，人們已說得再多沒有了。所有這

些全都是空話。這是最有害的空談。我們人中因實行新經濟政策的緣故，已着手輪旋，改造機關，建立新機關。這是最有害的空談。我們却說，當前底關鍵——乃是人材問題，乃是選擇人材。這點對那班已習慣於反對細故小事，反對日常文化工作，提出個人作用來代替改造機關的革命家，是難於領會的。但我們現時所處的情況，是要在政治上清醒地加以估計，估計到我們已前進得如此遙遠，使我們竟不能保持住，而且不應當保持住全部陣地。

在國際方面，我們的情況近幾年來有了巨大的改善。我們爭得了蘇維埃式的國家，——這是全人類底大進步，而共產國際根據從任何國家所得的消息每天都向我們證實這點。這是誰也沒有絲毫懷疑的。但就實際工作方面上講來，問題就是共產黨員若不能給農民羣衆以實際的幫助，那農民羣衆就不會贊助他們。注意底中心點並不在於要製定法律，頒佈完善法令等等。我們有過一個時期，法令曾是一種宣傳底形式。當時人們譏笑我們，說布爾塞維克不瞭解別人並不執行他們的法令；所有的白黨刊物上全在譏笑這點，但當布爾塞維克奪取了政權，並向普通農民和普通工人說：我們就正想要這樣來管理國家，這就是法令，請試試吧，當時這樣一個時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用法令形式把自己政策上的概念立即讓普通工農知道。結果爭得了我們在人民羣衆中至今都有的這種巨大威信。這是在革命初必須有的一個時期，若沒有這個時期，我們就不會站在革

命浪潮的前頭，而會跟着它的尾巴跑。若沒有這個時期，則那些想在新基礎上來建設新生活的全體工農，就不會信任我們。但這個時期已經過去了，而我們却不願瞭解這點。現在當人們頒佈法令來建設和改造什麼機關時，那工農是會置之一笑的。現在普通的工農對這點不會發生興趣，他們是對的，因為重心並不在這裏。你們共產黨員，現在應向人民宣傳的並不是這點。雖然我們這些坐在國家機關裏的人，面前隨時都堆滿了這類瑣事，但要抓住的並不是鏈條的這一環節，關鍵並不在這裏，關鍵在於人們被安排得不正確，在於很卓越地參加過全部革命的負責共產黨員，却被委任來經營這種是他所一竅不通，並妨礙我們看見真理的工商業務，因為在他背後巧蔑有自私自利的人和騙子。問題是我們沒有實際檢查已執行了的事。這是枯燥無味的細小任務，這些瑣碎事情，但我們經過了偉大政治革命以後，係處在這樣一種條件下，此時我們應得伴着資本主義經濟結構生存一個時期，此時全部情況底關鍵並不在於政策，——就這字的狹義上說（報章所載的，這是政治的噪聲，這裏一點社會主義的氣味也沒有），全部情況底關鍵並不在於決議，並不在於機關，並不在於改組機關。既然我們需要這一切，那我們也就會來作這點，但不要帶這些東西鑽到民衆裏去，而要選擇必需的人材，並檢查實際工作的執行情形，這才會是人民所重視的。

在人民中，我們還祇是滄海一粟，祇有當我們正確代表人民意識時，我們才能管理國家。否

則共產黨就不能引導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就不能引導羣衆，於是整架機器就會倒塌。現在人民和全體勞動羣衆自己所視爲主要的祇是怎樣能實際減輕極端貧困和飢餓的現象，表明生活上真正有了改善，即農民所需要所瞭解的改善。農民懂得市場並懂得商業。我們曾不能直接按共產主義方式實行分配。爲了這點，還缺乏工廠和工廠裝備。那我們就應當經過商業來實行供給，但要並不比資本家所供給的壞些，否則人民便忍受不了這樣的管理。問題的全部關鍵就在這裏。如果不是發生任何意外事變的話，那這就應成爲一九二二年我們全部工作底樞紐，不過要有以下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沒有武裝干涉。雖然我們極力從外交上來避免武裝干涉，但同時它每天都可能發生。我們真正應當刻刻警惕着，爲了紅軍的利益，我們應當去作某些重大的犧牲，當然要嚴格地確定這種犧牲底範圍。整個資產階級世界就對峙在我們面前，他們祇在尋找勒死我們的形式。我們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不過是這資產階級底代辦，他們的政治地位也就是如此。

第二個條件是如果財政危機不過份厲害。這一危機正在逼近着。這點，你們在財政問題報告時是可以聽見的。若是危機太厲害、太嚴重，那我們就只得來改造很多東西，把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點上。如果危機不過份嚴重，那它甚至也許還會有益處：它將把一切國家托拉斯中的共產黨

員加以清洗。祇是不要忘記作到這點。財政危機震撼到機關和企業，其中無用的首先就要倒塌。祇是不要忘記，決不可把這一切都推到專門家身上，說這是他們的罪過，至於負責的共產黨員那裏是好到極點了，既在前綫上鬪爭過，工作又隨時都不錯。如果財政危機不過度嚴重，那還可以從中收到益處，它會不像中央監察委員會或中央檢查委員會那樣來從事清洗，而是認真地來把經濟機關中全體負責共產黨員一一加以清洗。

第三個條件是要在這個期間不作政治錯誤。當然，如果我們作出政治錯誤，那時全部經濟建設就會遭到挫折，那時就得來爭論關於改正錯誤和確定方針的問題。但若沒有這樣的悲慘錯誤，那最近將來的關鍵就不在於法令，不在於政策（就這字的狹義上說），不在於機關，不在於機關組織——因為負責的共產黨員和蘇維埃機關，會按必要程度來做這件事情的，——全部工作底關鍵是在於選擇人材和檢查工作的執行情形。如果我們在這方面實際學會了，並作出了具體成效，那時我們又能克服一切的困難。

末了，我應當來講講我們高級機關以及黨對它們的關係的實際方面。我們這裏在黨與蘇維埃機關間，形成了一種不正確的關係，在這點上我們的意見是完全一致的。我已舉過一個例子，說明怎樣竟把一件具體小事搬到政治局去的情形。形式上要來避免這種現象是很困難的，因為我國

是唯一的政府黨在實行管理，決不能禁止黨員來申訴。所以一切問題都從人民委員會搬到政治局來。這裏我的過錯也是很大的，因為人民委員會與政治局之間的聯繫很多都是由我親自來主持的。一旦我不得不離開工作的時候，弄得兩個輪子同時都不動作了，爲要維持這種聯繫，加米涅夫就得來担任三重的工作。因為我在最近期間未必能回到工作中來，那全部的希望就移到這點上：現在還有兩個代理人——一個是瞿魯巴同志，他被德國人清洗得乾乾淨淨，另一個是李可夫同志，他也被德國人完全清洗好了。原來，甚至德皇威廉，對我們也有用處，——這點我却沒有料到。因為威廉有過一個外科醫生，這位醫生就是醫治了李可夫同志的，他把他壞的部份割去留在德國，把李可夫同志好的部份留下，並把這清洗得很乾淨的部份給我們送來。如果這種方法今後還繼續採用，那這會是完全很好的事情。

現在且把笑話擱在一旁，來講講主要的指令。在這方面，中央委員會裏是完全一致的，我希望代表大會大大注意這個問題，並在這一意義上來批准指令，好解脫政治局和中央身上的細小事情，並提高負責人員底工作。要使各人民委員對自己的工作負責，而不是把問題起初提到人民委員會，爾後又提到政治局來。形式上我們不能取消向中央申訴的權利，因為我們的黨是唯一的政黨。這裏應該取締一切關於細小事情的請求，但要提高人民委員會底威信，使各人民委員，而

不是他們的代理人，來多多參加人民委員會的工作，要在我最近這一年來沒有做到的這方面，來改變人民委員會底工作性質；即對檢查執行一舉加以更大的注意。人民委員會將還有兩個代理主席——李可夫和瞿魯巴。當李可夫任國防委員會紅軍供給部非常全權代表時，他善於把工作整頓起來，事情也就進行得順利。瞿魯巴把自己領導的人民委員部（二）變成了最好的人民委員部之一。如果他們兩人能在執行和負責方面大加注意地督促各人民委員部的工作，那我們在這裏也就會有雖然很小但總歸是現存的進步。我們有十八個人民委員部，其中至少有十五個是全不中用的，——不會是個個人民委員都好，祇希望人們對這點多多注意，也就算不錯了。李可夫同志應當兼任中央局委員和全俄中央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因為這兩個機關之間應有一種聯繫，沒有這種聯繫，則主要的車輪有時是徒然空轉的。

因此要注意到，使人民委員會內和勞動國防委員會內的各種委員會加以裁減，使它們知道並解決自己份內的事情，而不是把事情分散到無數的委員會中去。近幾天來把各委員會都清洗過。總共有一百二十個各種各樣的委員會。有多少個是真正必要的呢？祇有十六個。而這還不是第一次清洗。不去對自己的事情負責，不去把決議提交人民委員會，不去知道自己對這負有責任，而他們却躲藏在各委員會後面。在這些委員會裏，像七八糟，誰都弄不清楚是誰負責；一塌糊塗，

結果，提出一個由大家共同負責的決議了事。

因此要指明出，必須擴大和發展省經濟委員會底自主性和活動。現在我們以科學作根據，並估計到經濟條件、氣候、生活、燃料供給、地方工業等等的條件，把俄國劃分為各個省區。根據這個劃分，建立了區的和省的經濟委員會。當然，部份的改正是會有的，但要提高這些經濟委員會底威信。

要使全俄中央執委會更加振奮地工作，並正常地來召集常會，舉行常會的時間應當是比較長的。常會應當討論法律草案，這些草案有時並沒有絕對必要，就匆忙提交到了人民委員會。最好是把這些草案擱留下來，先讓地方工作人員去仔細考慮考慮，並對法律起草人提出更嚴格的要求，而我們現在却沒有這樣作。

如果全俄中央執委會常會日期更長，它將分為各委員會和各副委員會，並善於更加嚴格地檢查工作，找出那些據我看來是目前政治時局底全部關鍵和全部實質的東西：將重心轉移到選擇人材，轉移到檢查實際工作的執行上去。

應該承認和不怕承認，這些負責的共產黨員在百分之九十九的場合下，都是沒有按各人現有的能力被安排得適適當當，他們不善於進行自己的工作，因之他們就應當立刻學習。如果能承認

這點，加之我們既有做到這點的充分可能，——而按一般的國際形勢看來，我們有時間來得及學成，——所以這無論如何都是要作到的。

一九三二年刊載於俄國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速記錄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二五至二五九頁

列寧：俄國革命五週年與世界革命底前途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

同志們！在講演人名單中，把我列爲主要的報告人，可是希望你們都瞭解，我經過久病之後，不能做很長的報告。我祇能對最重要的一些問題，作個引言。我的報告題目將是很有限的。

『俄國革命五週年與世界革命底前途』這個題目，確是過於廣泛，過於龐大，一般說來，一個人在一次報告中，是不能把它發揮盡致的。所以我祇來講講這個題目中不大的一部份，即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我故意祇來講這一小部份，爲的是要使大家認識現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這至少對我說來，是最重要的，因爲我此刻正在研究這個問題。

總之，我所要說到的是我們怎樣開始了實行新經濟政策，以及我們藉助於這一政策達到了一

些什麼結果。既然我僅限於這個問題，那我也許能夠對這個問題作出一般的評述，並使大家對這些問題有着一般的概念。

如果要從我們爲什麼來實行新經濟政策這點開始講起，那我就應當提到我在一九一八年寫的那篇文章。一九一八年初，在一個簡單的論戰中，我恰恰涉及到我們對國家資本主義應採取什麼立場的問題。當時我寫道：

『國家資本主義，較之我們蘇維埃共和國現時（亦即當時的）情況說來，會是一個進步。如果，譬如說，經過半年，在我國奠定了國家資本主義，那就會是極大的成功，並且能夠最有效地保證經過一年以後我國社會主義將徹底鞏固，而成爲不可戰勝的。』

在說這段話的時候，我們當然比現在要蠢些，但無論如何並沒有蠢到這種程度，連這樣的問題都不善於觀察到了。

可見我在一九一八年時，就認爲國家資本主義對於蘇維埃共和國當時的經濟情況說來，乃是一個進步。這話聽起來是很奇怪，甚至也許是妄誕無稽的，因爲那時我們的共和國已經就是社會主義共和國了；那時我們每天都在非常急忙地——大概是過於急忙地——採取各種新的經濟辦法，這些辦法祇能稱爲是社會主義的辦法。但在那時，我總還是認爲國家資本主義，較之蘇維埃

共和國當時的經濟狀況說來，乃是一個進步，爲了證實這個觀點，我並簡單列舉過俄國經濟制度底幾種基本成份。這些成份，在我看來，有以下幾種：『（一）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式的農民經濟；（二）小商品生產（這裏也包括有出賣糧食的農民多數）；（三）私人資本主義；（四）國家資本主義，以及（五）社會主義』。在當時俄國，所有這些經濟成份都是存在的。那時我所抱定的任務，是要說明這些成份彼此間的關係怎樣，是否應把其中非社會主義成份之一的國家資本主義，看得比社會主義還要高些。我重複地說：在一個宣佈自己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裏，竟把非社會主義的成份估計得比社會主義還高些，認爲它是駕乎社會主義之上，這在一切人看來，都覺得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你們記起，我們並沒有把俄國經濟制度，看成是什麼同一種類和高度發達的東西，而是充分覺察到在我們俄國，除了社會主義形式的農業之外，還有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式的農業，那麼，問題也就會清楚了。在這種情況下，究竟國家資本主義能起什麼作用呢？

我並反躬自問：這幾種成份中，哪一種是佔優勢的呢？顯然，在小資產階級隊伍中，是小資產者的成份佔統治地位的。當時，我就覺察到是小資產者的成份佔優勢；不能有另一種想法。當時我所想到的問題，——本係發生在與現在問題無關的一次特別爭論中，——就是：我們對國家

資本主義的態度怎樣？於是我會回答自己說：國家資本主義，雖然它不是社會主義的形式，但對我們和對俄國說來，會是比较有形式要適宜些的形式。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雖然我們業已完成了社會革命，但我們無論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底萌芽或基礎，都未曾估計過高；反之，我們當時就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覺察到：如果我們能先進到國家資本主義，然後才進到社會主義，那麼，就會是好一些。

我之所以應當特別強調這部份問題，因為我認定祇是從此，第一，可以說明現在的新經濟政策，究竟是什麼；第二，可以作出對於共產國際也是很重要的實際結論。我並不是說，我們事先就準備好了一個退却計劃。這樣的計劃，以前並沒有過。當時這些簡短的爭論詞句，決不是什麼退却計劃。例如，對國家資本主義具有基本意義的重要之點，即自由貿易，那裏一個字也沒有提到。但這總歸是已給了一般的，尚不明確的退却思想。我認為，不僅從這個按經濟制度說來至今還是很落後的國家底觀點出發，而且從共產國際及西歐各先進國家底觀點出發，我們都應當注意到這個問題。例如，現在我們正在製定綱領，我個人認為，頂好我們此刻祇在一般地，即所謂初步地把全部綱領加以討論之後就交去付印，但採取最終的決定，不必定要在此刻或在今年。爲什麼呢？我想，首先當然是因爲此刻我們未必能把這全部綱領都思考得很周到。而其次，還因爲我

們幾乎完全未曾想到可能退却與保證這一退却的問題。然而當全世界範圍內都起了根本變化，如推翻資本主義以及異常艱難來建設社會主義的情形下，對這個問題，我們也無條件地必須加以注意。我們不應當知道，我們直接轉為進攻並在這進攻中獲得勝利時，我們究竟該怎樣行動。在革命時期中，這點並不是很困難，但亦不很重要，至少也不是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在革命時期中，常常有這樣的時機，即乘敵人頭腦昏潰之際，我們來向它進攻，那我們就可輕易獲勝。但這還沒有根本解決問題，因為我們的敵人，如果具有充分的堅忍性，它還能事先聚集力量等等。那時它能很容易首先挑起我們去進攻，然後把我們打得退後很多年。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準備着有退却可能的這種思想，是具有極重大的意義，這並不僅從理論觀點出發是如此。就是從實際觀點看來，所有一切準備在最近將來轉為直接向資本主義進攻的政黨，此刻也應當想到，怎樣來保證自己退却的問題。我想，如果我們除了注意到我國革命經驗中其他一切教訓外，還注意到這個教訓，那末，這對我們不僅不會有任何害處，而且在很多場合下，定會對我們有益處。

我既着重說過，我們在一九一八年，就已把國家資本主義視為可能的退却路線，現在我就來講到我國新經濟政策執行底結果。我重說一句：那時這還不過是一個很模糊的思想，但在一九二一年時，即當我們渡過了國內戰爭中最重要的階段，並且是勝利地渡過這個階段之後，我們就

碰上了蘇維埃俄國內部很大的——我認爲是極大的——政治危機，這個危機不僅造成頗大一部份農民的不滿，而且造成頗大一部份工人的不滿。這是蘇維埃俄國歷史上第一次發生的情形，我相信這也是最後一次的情形，那時大量農民，雖然是不自覺地，但却是本能地在情緒上反對我們。這種特殊的，對我們自然也是很很不舒適的情況，究竟是什麼原因產生的呢？原因是我們在自己的經濟進攻中前進得太遠了，沒有替自己保證充分的根據地，羣衆已感覺到了我們在當時還不善於自覺地去認識，但不久祇經過幾星期後我們也就承認了的情勢：即向純社會主義形式與純社會主義分配的直接過渡，乃是我們力量所不能勝任的事，如果我們不能實行退却以便祇限於肩負較輕的任務，那我們就有遭到滅亡的危險。我覺得危險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開始的。到同年春，我們便一致決定——關於這點，我並沒有看見我們中間有過什麼大的意見分歧——轉到新經濟政策。現在，到一九二二年末這一年半以後，我們已經能夠作出某些比擬。究竟發生過一些什麼情形呢？這一年半以上的時日，我們是怎樣渡過了的呢？獲得了什麼樣的結果呢？這一退却是否使我們得到益處，它是否真正挽救了我們，抑或結果還在動搖莫定之中呢？這就是我所想說的主要問題，而且我認爲這個主要問題，對於各國共產黨說來，也有着頭等意義，因為假如這問題的答案是否定的，那我們大家都會陷於滅亡的了。我認爲，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地來肯定回答這個問

題，也就是說，過去這一年半的時期，確定地絕對地證明我們是經受住了這次考驗。

我現在就想來證明這點。爲此我應當略舉我國經濟中一切組成部份。

首先我要講到我們的財政制度以及著名的俄國盧布問題。俄國盧布數量，現已增至以億兆計，我想，祇就這點也够認爲它是很著名的了。這總有點什麼意義。這乃是天文學上的數字。我深信，此地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這數字的真實意義。但我們就從經濟觀點看來，並不認爲這種數字是非常重要的，因爲這數字上的零雖多，須知是可以勾去的。我們在這從經濟觀點看來是全不重要的藝術上，已經達到了某種成就，我相信在今後發展過程中，我們在這種藝術上還會達到更大的成就。而實際上真正重要的，却是穩定盧布的問題。我們正在着手解決這個問題，我們的優秀人才也集中在這方面，而且我們認爲這一任務具有決定的意義。如果我們能做到使盧布先穩定一個較長的時期，然後又繼續永遠穩定下去，那我們便獲得贏局了。那時這一切天文學上的數字，——所有這些億兆兆的數字都會毫無危險。那時我們能够把我國經濟安置在一個堅固的基礎上，並在堅固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關於這個問題，我想我能够向你們列舉些很重要而具有決定意義的事實。在一九二一年，紙盧布價格穩定時期，繼續了不到三個月之久，而在現時一九二二年，這個穩定時期雖還未結束，但也繼續了五個月以上。我認爲舉出這點已經就够了。如果大

家還想要我們拿出科學上的證據，證明我們將來能完全解決這一任務，那末這個例子當然還嫌不夠。可是據我的意見，要來完全充分地證明這點，一般是不可能的。我所舉的實際材料，證明從去年我國開始實行新經濟政策時起，直至今天，我們已經學會了前進。既然我們已學會這點，那我相信，祇要我們不作出什麼特別蠢事來，今後在這方面我們也能學會達到更大成就的。可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商業，是我們所需要的商品流轉。如果說，雖然我們會處在戰爭狀況下（因為大家都知道，祇在幾星期前，我們才把海參崴奪回）（二二），雖然我們祇是現在才能完全有系統地開始我國的經濟活動，而我們也能够在兩年來開展商業；如果說，我們總還是達到了使紙盧布的穩定時期從三個月延長到五個月，那末，我認爲，並敢於說這點也就能夠使我們滿意。須知我國是孤立無援的國家。無論過去或現在，我們都借不到任何外債。所謂如此「燦爛」地組織自己資本主義經濟，甚至至今還不知道走向何處去的強大資本主義國家中，任何一個也未會幫助過我們。他們藉凡爾賽和約建立了一種連他們自己都摸不清內中底細的財政制度。如果這些巨大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經營着，那我認爲，我們這些落後無知的人，居然通曉了這件最重要的事：即通曉了穩定盧布的條件，我們也就可以藉此得意了。這並不是用什麼理論分析來證明着，而是由實踐來證明的，我以爲實踐是比世上任何學理上的討論，都重要些，而實踐證明着，我們在這裏達到了

具有決定意義的結果，即我們在穩定盧布這方針上，已能把經濟推向前進，這對於商業，對於商品自由周轉，對於農民以及大量的小生產者羣衆說來，是具有最重大意義的。

現在我來講到我們的社會目標，最主要的，當然就是農民。一九二一年時，巨大部份的農民無條件地是不滿意的。後來我國又遭到了飢荒。而這對於農民，乃是一次最艱鉅的考驗。當時，國外都在叫喊：『看吧，這就是社會主義經濟底結果』。其實，飢荒乃是國內戰爭的可怕結果，對這點人們當然表示緘默。一九一八年開始向我們進攻的一切地主與資本家們，把事情說成這樣，彷彿飢荒是社會主義經濟底結果。當時，飢荒確是巨大而嚴重的災禍，甚至有毀滅我國全部組織工作與革命工作的危險。

那末，現在我就問道：經過這次空前有和突如其來的貧困之後，自從我們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准許了農民貿易自由之後，此刻的情況又是怎樣呢？這答覆是很顯然而且是人所共見的，即是說：農民在一年來，不僅克服了飢荒，並且繳納了這樣多的糧食稅，使我們現時就已收到了幾萬萬普特的糧食，同時並幾乎沒有採用過任何強迫辦法；在一九二一年以前可說是形同俄國一般情景的農民暴動，差不多已完全絕跡，農民滿意自己的現狀。我們能够安然認定這點。我們認為，這些證據比任何統計數字的證據，還重要些。農民是我國有決定意義的因素，這點是誰也不

懷疑的。現在，農民的情狀已使我們再無須害怕他們有什麼反對我們的舉動。我們是完全自覺地說到這點，絲毫也沒有過甚其辭。這是已經做到的了。農民可能不滿意我國政權工作的某一方面，他們也許會埋怨。當然，這種現象是可能而且是不可免的，因為我們的機關和我們國家經濟尚極不完善，還不能預防這種現象，但無論如何，要說是全體農民大不滿意我們，這種情形是絕然沒有的了。這是一年來的成就。我認爲這已經是很大的成就。

現在我來講到輕工業。我們正應當在工業問題上，把重工業與輕工業區分開來，因為它們的情況是彼此不同的。關於輕工業，我可以安然地說：這裏已可見到一般的高漲現象。這點我不來詳細地講。因爲我的任務，不是來列舉統計材料。可是這一般的印象，是有事實作根據的，所以我能担保地說，在這種印象的基礎上，並沒有任何不足信或不確切的東西。我們可以指出輕工業底一般高漲，及與此有關的彼得格拉和莫斯科工人生活之相當改善情形。在其他區域內，這種現象較少看到，因爲那裏是重工業佔優勢，所以這點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但我要重複一句，總之，輕工業無條件地是在高漲着，彼得格拉與莫斯科工人生活底改善——這已是無疑義的事實。一九二一年春，在這兩個城市內，工人中籠罩着不滿的氣氛。現在，這種現象已經沒有了——我們每天都在注視工人底生活與情緒，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是不會犯錯誤的。

第三個問題是關於重工業。我應當說，這裏的情形仍舊是很嚴重。到一九二一年，這方面的情況開始有了某種轉變。因之我們能够希望，在最近將來，情形就會好轉的。我們已部份地爲重工業搜集了必要的資金。在資本主義國家內，要振興重工業，就必須有若干萬萬的公債，沒有這批巨量的公債，重工業就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國家底經濟史指明出，在落後國家內，必須有幾萬萬美金或金盧布的長期公債，才能成爲發展重工業的適當資金。我們以前沒有過這樣的公債，至今也未得到任何的公債。人們現在關於租讓業及其他等等所寫到的一切，除了紙上空文以外，幾乎是一無所有。我們最近關於這點，特別是關於烏爾卡爾特的租讓，也寫得很多。然而我們的租讓政策，我覺得是很好的。雖則如此，但稍可滿意的租讓業，至今我們還沒有。請大家不要忘记這點。所以，對於我們這個落後國家說來，重工業情形實在是一個很艱難的問題，因爲我們曾不能指望富庶國家的外債。雖然這樣，我們已見到有顯著的改善，並且我們看見，我國的商業活動，也替我們弄來了一部份資本。不錯，這數目還很小，略略超過二千萬金盧布。但無論如何，始基是已經奠定了：我們從我國商業中已能弄到資財，我們能够利用這種資財來改善重工業。現時，我國重工業情況，至少還是極度困難的。但我認爲，我們已能多少節省一批資財。今後我們也還要這樣做去。雖然這種來源往往是出自人民身上，但此刻我們總還得百般節省。現在我們正

在研究怎樣縮減我們的國家預算，裁減我們的國家機關。後面我還要略略說到我們的國家機關問題。我們無論如何，應當縮減我們的國家機關，我們必須儘量節省。我們在各方面，甚至在學校經費方面，都實行節省。這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我們知道：不挽救重工業，不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成任何工業，而沒有工業，我們就根本不能維持我們之為獨立國家的地位。這點我們知道得很清楚。

要挽救俄國，單靠農民經濟收成豐盛還不夠，而且單靠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情況興旺也還不夠，——我們還要有重工業。而爲了要使重工業的情況興旺，就需要有多年的努力。

重工業是需要有國家補助金的。我們如果找不到這種補助金，便不能成爲文明的國家，更不必說成爲社會主義的國家了。總之，我們在這方面，採取了堅決的步驟。我們籌到了爲建立重工業基礎所必需的資金。固然，我們至今已籌到的數額，祇略略超過二千萬金盧布，但無論如何，這個數額總算是籌到手了，並且這筆款項，是預定唯一來發展我國重工業的。

我想，我已照我所允諾過的話，概括地向你們敘述了我國國民經濟中最主要的成份，我想，從這一切中可以作出結論說，新經濟政策現在已經有了成果。現在我們業已有了確實證據，證明我們這個國家能够經營商業，能够保持農村經濟中與工業中的堅固地位，而向前邁進。實際的活

動已證明了這點。我想，這對於我們，暫時也就够了。還有很多東西，我們應加以學習，而我們也瞭解到，我們還必須學習。我們掌握政權已有五年，並且這五年期間，我們都是處在戰爭狀態中。可見，我們已經有了成就。

這是很顯然的。因為農民贊成我們。農民已經是充分贊助我們了。農民懂得，贊助白黨的是他們所深惡痛絕的地主。所以農民才帶着最大的熱忱和全副忠誠心來贊助我們。要做到使農民捍衛我們，反對白黨，這本不困難。原先就痛恨戰爭的農民却儘一切可能，來幫助反白黨的戰爭，幫助反地主的國內戰爭。但事情還不止於此，因為實際上這裏的問題，祇是政權留歸地主還是留歸農民的問題。這對我們說來，是不夠的。農民瞭解到，我們爲工人奪取了政權，其目的是要藉這政權的幫助，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所以對我們說來，最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經濟之經濟上的準備。過去我們不能去走直路來準備這種經濟。我們迫不得已才走彎路來達到這點。我們在我國所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乃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它與普通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不同。我們掌握有一切經濟命脈，我們操縱着已歸國有的土地。這點極爲重要，雖然我們的敵人斷言說，彷彿這點毫無意義。這是不對的。土地已歸國有，這種情勢非常重要，在經濟方面，也有極端重大的實際意義。這點我們既已做到，所以我應當說，今後我們一切活動，也應當祇限於這種範圍之

內，我們已經做到了使我國農民滿意、工業復興、商業活躍起來。我業已說過，我國的國家資本主義與一般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區別就在於，我們無產階級國家不僅掌握有土地，而且掌握有工業中一切最重要的部門。我們出租了的首先祇是一部份的中小工業，而其餘的一切仍留在我們手中。至於商業方面，我還想着重地說，我們設法建立合股公司，並已在建立這樣的公司，其中一部份資本屬於私人資本家，而且是外國資本家，另一部份資本則是我們國家的。第一，我們用這種辦法來學習經商，這對於我們是必需的，第二，如果我們認為必要，我們隨時都有可能取消這種公司，所以說，我們這樣做，絲毫不冒險。我們從這班私人資本家方面，學習並注視着我們怎樣才能上進，我們犯有一些什麼錯誤。我覺得，我說到這裏，也就用不着再講下去了。

不過，我還想涉及幾個不甚重要的問題。無疑的，我們過去做過極多的蠢事，將來也還會做出大量蠢事來的。對於這點，誰也不比我判斷得更好，誰也不比我觀察得更清楚。

爲什麼我們做出蠢事來呢？這是很顯然的：第一，我國是個落後的國家，第二，我國的教育程度極低，第三，我們得不到外援。沒有一個文明國家會來幫助我們。反之，他們都在反對我們，第四，我們國家機關的過失。我們承受了舊的國家機關，這也就是我們的不幸。國家機關人員往往在工作中反對我們。實際情形是，一九一七年我們奪取了政權之後，國家機關人員曾對我

們怠工。當時我們很表示驚愕，於是向他們說：「請你們轉回到我們這裏來吧」。但他們都轉回來了，這也就是我們的不幸。現在我們擁有大量的公務員，但我們却缺乏有充分知識的人材，去真正管理他們。實際上往往發生這種情形：在上面這裏，即在我們執掌國家政權的地方，機關總還能盡些職能，但在下面那裏，即在他們所管理的地方，他們却在這管理中常常反對我們的設施。在上面我們自己的人，我雖不知確數，可是我想，無論如何總祇有幾千，最多也不過幾萬。但在下面，却有幾十萬從沙皇制度及資產階級社會遺留下來的舊官吏，他們一部份是自覺地，一部份是不自覺地在工作中反對我們。這裏，在短時期內顯然是無濟於事的。這裏，我們應當有多年的工作，才能把機關加以改善，才能改變這種機關，才能吸收新的力量進來。這點，我們做得相當迅速，也許過於迅速。我們創辦了許多蘇維埃學校和工人班，有幾十萬青年在學習，也許學習得過於迅速，可是，無論怎樣，工作已經是開始了，我想，這一工作是會收到成效的。如果我們工作得不過於倉忙，那末經過幾年之後，我們就可以培養出大批能於根本革新我們機關的青年。

我說過，我們做了大量的蠢事，但在這點上，我也應當說到我們的敵人方面。如果我們的敵人責難我們說：看，列寧自己也承認，布爾塞維克做了大量的蠢事；那我就想這樣來回答他們：

對的，但你們是否知道，我們的蠢處，較之你們的說來，終歸完全是另一種性質的。我們祇是剛開始學習，但我們已經學習得極有系統，竟使我們深信，我們一定能達到良好的成績。可是，如果我們的敵人，即資本家與第二國際英雄們，強調我們所作過的蠢事，那我爲了比喻比喻起見，就來引證俄國一位著名作家的話，這句話我略加變更後，就成了這樣：如果布爾塞維克做出蠢事，那末布爾塞維克也不過是說：「二乘二等於五」；至於我們的敵人，即資本家與第二國際英雄們做出蠢事來，那末，在這班人那裏就得出：「二乘二等於燭」。這是不難證明的。例如，拿美英法日諸國同高爾察克簽定的條約來說吧。我問問大家：世界上還有比它們更文明更強大的國家麼？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它們既不估量，又不思索，也不觀察觀察，居然許諾幫助高爾察克。我以爲，這從人類理性常識上看來，甚至是難於瞭解的大失敗。

或者，再舉一個更近而且更重要的例子：凡爾賽和約。我問問大家，這裏，「偉大」、「榮譽」列強們幹的是什麼一回事？它們現在從這一混亂糊塗中，怎能找到出路呢？如果我再重複地說，我們作出的蠢事，較之資本主義國家、資本主義世界和第二國際所共同作出的種種蠢事說來，還算不得一回事，我想，這並非過甚其詞。所以我認爲，世界革命底前途——這是我應當簡略涉及到的題目，——是順利的。並且我認爲，在一定的條件下，這種前途，還會是更好的。

關於這種條件，我想來說幾句話。

在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我們通過了一個關於各國共產黨組織結構及其工作方法與內容的決議案。決議寫得極好，但它幾乎完全是俄國式的，也就是說，完全根據俄國條件寫出的。這點是決議案的好處，同時也是它的壞處。壞處就因為（我深信）差不多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把它讀完。我在出席講話之前重新又把這決議讀了一遍。第一，這個決議案太長，其中有五十或五十段以上。這種文件，外國人通常是不能讀完的。第二，即令把這決議案讀完，也沒有一個外國人能懂得這決議案，正因為它太俄國化了。這並非由於它是用俄文寫成，況且各國文字的譯本都譯得很好，而是由於它內面充滿了俄國精神。加之，第三，縱然例外地有某個外國人能懂得這決議案，那他也不能把它實際執行。這是決議案的第三個缺點。我同某些來此出席的代表談過話，我希望，在本大會今後進程中，雖然我不能親自參加——可惜，我沒有可能參加——但我希望同各國很多代表來詳細談談。我覺得我們因為寫出這樣的決議案而犯了很大的錯誤，即我們自己截斷了今後勝利的道路。我已經說過，決議案寫得極好，其中總共五十或五十多段我都贊成。但我們却沒瞭解，怎樣使我們俄國的經驗適用於外國人。決議案中所說到的一切，結果都成了死的條文。可是，如果我們不懂得這點，那我們是不能前進的。我認為對於我們全體，無論是

俄國同志或外國同志，最重要的事，就是在俄國革命五週年之後，我們應當學習。祇是現在我們才有可能來學習。我不知道，這一可能究竟能繼續多久。我不知道，資本主義列強能讓我們安靜學習多久。但沒有戰爭行動，脫離了戰爭的每一時機，我們都應當利用來從事學習，並且是從頭學習起。

我們全黨和俄國各階層的人都在渴求知識，這也就可以用來證明這點。這種致力學習的趨向表明出，此刻我們最重要的任務是：學習再學習。但是外國同志們也應當學習，這並不是說，他們要像我們所還需要的這樣來學習——讀、寫、瞭解讀過的東西。人們爭論說，這是有關於無產階級的文化，還是有關於資產階級的文化呢？我不來答覆這個問題。無論如何，我們必須首先學習讀、寫與瞭解讀過的東西，這是毫無疑義的。外國同志們，已不需要這樣作。他們所需要的，是比較高深的東西：這裏首先是，要使他們也瞭解到，我們寫出了關於共產黨的組織結構，外國同志們既沒有讀，也不瞭解，却在上面署了名。這應當成爲他們的首要任務。必須使這個決議案見諸實行。這點，一個夜晚是做不到的，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決議案過於俄國化：上面所反映的是俄國經驗，所以外國人完全不瞭解，他們也就決不會滿意於把這個決議案當作神像掛起，向它祈禱。這樣是不會有任何成就的。他們應當把一大部份俄國經驗消化下去。至於能怎樣做到這

點，我却不知道。也許，例如，意大利的法西斯蒂會向我們大大効勞：他們會向意大利人表明出，意大利人所受的教育還不够，他們的國家還不能保證不發生黑幫派。也許，這會是很有益處的。我們俄國人也應當設法向外國人來解釋這個決議案底原理。不然，他們是絕對無能執行這個決議案的。我堅信，在這方面我們不僅應向俄國同志說，而且也應向外國同志們說，在當前這時期內，最重要的是學習。我們是在一般意義上學習着。他們却應當在特殊意義上來學習，爲的是真正能理解革命工作底組織、結構、方法和內容。如果做到了這點，那時，我深信世界革命底前途，不僅會是很好的，而且會是優越的。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刊載於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刊（俄文版）第八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三四二至三五五頁

列寧：論合作制

——一九三三年一月四日至六日——

一

我覺得我們這裏對合作制注意得不够。現在，自十月革命以來，而且不管是有新經濟政策（在這點上，反而應該說，正由於有新經濟政策的緣故），我國的合作制有着非常重要的意義，關於這層，未必所有的人都瞭解。在舊日的合作制提倡者的理想中，曾有過許多幻想。他們的這種幻想常常令人可笑。爲什麼說這是他們的幻想呢？因爲他們不瞭解工人階級爲推翻剝削者統治的這一政治鬥爭底重大基本意義。現在，我國已推翻了剝削者底統治，現在，凡舊日合作制提倡者理想中許多曾經是幻想，甚至是奇談，甚至是鄙陋的東西，都日益變成爲最明顯的現實事

物了。

在我國，既然由工人階級掌握國家政權，既然一切生產資料都屬於這個國家政權，實際上，我們這裏的任務，祇是要把居民合作化。在居民儘量合作化的條件下，以前曾引起那些公正深信必須進行階級鬭爭，必須爭取政權等等人士之合理嘲笑與譏視的社會主義，自然也就可以實現。可是並非所有一切同志都明瞭，把俄國合作化這點現在對於我們說來，該具有如何巨大無極的意義。新經濟政策中，我們會經向以商人資格出現的農民讓了步，即對私人貿易原則讓了步；合作制底巨大意義也正是從此產生出來（這與人們所想的恰恰相反）。老實說，在新經濟政策下，將俄國居民充分廣泛充分深刻地合作化，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因為我們現在找着了把私人利益、私人營業利益以及由國家來檢查與監督這一利益的辦法結合起來的梯級，即使私人利益服從全體利益的梯級，這種梯級在以前許多許多社會主義者看來，曾是不可逾越的障礙。的確，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為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來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必需

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

這種情況也就是我們許多實際工作人員所估計得不夠的。他們輕視我國的合作社，不瞭解這種合作社，第一，從原則方面說來（生產資料所有權操在國家手中），第二，從採用對農民盡量簡單、容易和便於接受的辦法來過渡到新制度方面說來，該具有如何重大的意義。

須知這點又是主要的。幻想出種種勞動聯合來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回事，而這樣學會實際建設社會主義，使一切小農都能參加此種建設，又是另一回事。這段階梯現在我們是已經達到了。無疑義的，我們雖達到了這段階梯，但絕少去加以利用。

我們轉到新經濟政策時做的有些過份，這並不是說我們過於重視自由工商業的原則。而是由於我們完全忘記了合作制，現在對合作制估計不足，開始忘記在上述這雙重意義上合作制已有的巨大意義。

我現在想向讀者們說到，根據這「合作制」原則看來，此刻在實踐上可以而且應當做到的，究竟是些什麼事情。爲了使一切都明瞭「合作制」原則底社會主義意義起見，此刻可以而且應當用來開始發展這一原則的，究竟是些什麼手段？

在政治上要這樣對待合作社，使它不僅一般地和經常地獲得某種優待，並且使這種優待，成爲純粹資財上的優待（減低銀行利息額等等）。要用國家資金貸予合作社，這種資金額應比我們借給私人企業的，甚至比借給重工業的還要多一些。

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需要有相當階級底財政幫助。不待說，「自由」資本主義之產生，是花費過許多萬萬盧布的代價的。現時我們所應當特別幫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對於這一點，我們現在應當認識和具體實行。可是，必須正確瞭解我們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就是說，要知道我們並不是幫助隨便一種合作社周轉，而祇是幫助有真正民衆切實參加的合作社周轉。獎賞參加合作社周轉的農民，——這種形式，無條件是對的，但同時應當檢查這農民參加的情形，檢查他的自覺性及其良好工作質量，——這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如果合作社手到達鄉村，就在那裏開設起合作店舖，這樣，嚴格說來，居民無論如何也不會來參加，但同時又因爲有利可圖，那居民也就會急於參加這合作店舖的。

這件事還有另一方面。從一個「文明」（首先是識字的）歐洲人底觀點上說來，爲了要促使所有的人個個都來參加，並且不是消極地，而是積極地參加合作事業，那我們還需做到一件小小事情。老實說，我們還沒有做的，「祇有」一件：就是要使我國居民具有這種「文明」程度，以

致懂得人人參加合作社的利益，並把這參加合作社的事情料理妥善。「祇有」這一件。現在爲要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並不需要其他特別高明的辦法。可是，爲要做到這「祇有」二字，却需要全盤的改革，需要全體民衆有在文化方面的整個發展階段。所以我們的條規應當是：高明辦法要儘量少些，巧妙花樣要儘可能稀罕。新經濟政策在這方面，乃是一種進步辦法，因爲它恰恰適合於最普通農民的水準，它對農民並不提出絲毫過高的要求。但是爲要經過新經濟政策，做到使全體農民個個都參加合作社——這就需要一個較長的歷史時代。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也要花二十年的功夫來通過這一歷史時代。但這終歸還是一段特殊的歷史時代，如果不經過這一歷史時代，不做到人人都識字，沒有足夠的知識程度，沒有充分教會居民去閱讀書報，沒有做到這一切物質基礎，沒有例如防荒防飢等等的相當保障，——如果沒有這些條件，我們就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現在，全部問題就在善於把革命胆略，把我們已經並很充分表現出來而且完全奏了效的革命熱忱（此地我幾乎是敢於說）與那能稱爲精幹而又有知識的商人本領結合起來，具有這種本領也就成爲一個優良的合作社手了。我所瞭解的要具有商人本領，是指要具有文明商人本領而言。讓俄國人或普通農民牢實地記着這點。他以爲他既是在做買賣，那他就有本領當個商人。這種想法是完全不對的。他雖然在做買賣，但做買賣與有本領當個文明商人，這中間的距離還遙遠

得很。此刻他是在按亞洲方式做買賣，但如果要有本領當個商人，那他就應當按歐洲方式來做買賣，但是他要能做到這層，還得經歷一個很長的時期。

現在來結束我的話：用經濟上、財政上及銀行方面的種種特權來支援合作社，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對組織居民的新原則所應當有的贊助辦法。但這還祇是一般提出了任務，因為在實踐上這一任務的全部內容，還沒有確定，還沒有詳細規定出來，也就是說，應該善於找出我們給合作事業的『獎賞』形式（以及給獎條件），找出我們得以充分幫助合作社的獎賞形式，找出我們得以培養出文明合作社手的獎賞形式等等。而在生產資料公有制下，在無產階級戰勝了資產階級的階級勝利條件下，文明合作社手的制度，這也就是社會主義底制度。

二

當我一寫到新經濟政策問題時，我總是引證一九一八年我那篇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論文。這點不止一次地引起某些年輕同志的懷疑。可是他們所懷疑的，主要是抽象政治方面的問題。

他們覺得，生產資料屬於工人階級，而國家政權也屬於這工人階級，這樣的制度不能稱為國

家資本主義。但是，他們沒有看出，我之所以用「國家資本主義」這個名稱，第一，是爲了要把我們現時的立場與我在反對所謂左派共產黨人論戰中的立場從歷史方面聯繫起來，並且那時我已屢次證明出，國家資本主義比我國現時經濟要高些；對我說來，重要的是規定普通國家資本主義與我在介紹讀者去認識新經濟政策時所說到的那種特別的，甚至是完全特別的國家資本主義之間的直接聯繫。第二，實際目的，對我隨時都是很重要的。而我國新經濟政策底實際目的，就是能實行租讓制；按我國條件說來，租讓制已無疑義會是純粹國家資本主義式的。所以關於國家資本主義的議論，在我看來，應該是這樣一種情形。

但還有另一方面的情形，其中我們需要有國家資本主義，或至少也需要有與國家資本主義相比擬的東西。這就是合作制問題。

無疑義的，在資本主義國家情況下，合作社是集體的資本主義組織。同樣無疑義的，在我國現時經濟現實環境內，當我們把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但唯一是在公有土地上，唯一是在屬於工人階級的國家政權監督下，——與澈底的社會主義企業（無論生產資料或建築企業的土地以及整個企業都屬於國家）結合起來時，這裏也就發生了第三種企業的問題，亦即合作企業，這種企業，從原則意義上說來，以前並未具有獨立性。在私人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資本主義企業不

同，前者是集體企業，後者是私人企業。在國家資本主義下，合作企業與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第一是私人企業，第二是集體企業。在我們的現存制度下，合作企業與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不同，因為合作企業是集體企業，但它與社會主義企業沒有區別，因為它是建築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土地上，是建築在屬於國家，即屬於工人階級的生產資料上。

當人們議論到合作社時，他們正是對於我國的這種情況，估計得不充分。他們忘記，由於我國國家制度的特點，我國合作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如果把租讓制區分開來（順便說說，我國租讓事業，並沒有得到多大的發展），那末在我們的條件下，合作制往往是與社會主義完全符合的。

現在我就來說明自己的意思。爲什麼說自歐文起所有舊時那些合作社提倡者底計劃都是空想的呢？就因為他們不估計到如階級鬭爭，由工人階級奪取政權，推翻剝削者階級底統治等基本問題，而夢想用社會主義來和平地改造現代社會。因此，我們很有理由把這種「合作制」社會主義，看成完全是幻想，是空想，而把期望用簡單的居民合作化就能將階級敵人轉爲階級朋友，將階級戰爭轉爲階級和平（所謂國內和平）的夢想當作甚至是鄙陋不堪的東西。

從現時基本任務看來，我們無疑義是正確的，因為沒有爭取國家政權的階級鬭爭，社會主義

是不能實現的。

可是，既然國家政權已由工人階級掌握，既然剝削者底政權已被推翻，加之全部生產資料（除了由工人國家臨時有條件地自願租給剝削者的那些生產資料外）都握在工人階級手中，請看，現在的情況已發生了怎樣根本的變更。

現在我們有理由說，在我國，單純的合作制發展，就等於（祇有上述一點「小小」的例外）社會主義發展，因此我們也就不得不承認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整個觀點都有了根本變更。這種根本變更，就在於以前我們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不能不放在政治鬭爭、革命和奪取政權等等上面。現在這一重心却改變了，亦即轉移到和平的，組織上的「文化」工作上面。我敢於說，假如不是國際關係，不是必須在國際範圍內要為我們的立場而鬭爭，那我們的重心就得移到文化建設上去。但若把這點置之不論，祇就國內經濟關係來說，那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確是歸結在文化建設上面。

在我們面前有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第一個任務，就是改造我們從舊時代接受過來，簡直是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在五年來的鬭爭中，我們對於這種機關來不及，並且也不能來得及認真加以改造。我們的第二個任務，就是農民中的文化工作。農民中的文化工作，如果將它當作經濟

目的看待，那就正是要實行合作化。在農民完全合作化的條件下，我們也就會已安穩穩地站在社會主義的基地上。但這完全合作化的條件，是包含有農民（但真正是廣大農民羣衆）底高度文化水準在內，即如果沒有整個的文化革命，那末，完全合作化便是不可能的。

我們的敵人屢次向我們說，說我們做些沒有頭腦的事，把社會主義培植在一個文化不足的國度內。可是他們錯誤的地方，就在於我們並不是從（迂儒）理論所墨守的那一端開始的，我國的政治變革和社會變革是發生在我們現時終於面臨着的文化變革或文化革命以前。

現在有了這文化革命，我國也就够稱爲完全的社會主義國家了。但是這文化革命，無論在純粹文化方面（因爲我國的文盲現象）或在物質方面（因爲要成爲文明國家，就必須有相當發達的生產物質資料，必須有相當的物質基礎），對於我們說來，都具有不可思議的困難。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刊載於《真理報》第一一五期與一二六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三九一至三九七頁

列寧：寧肯少些，但要好些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

在改善我們國家機關問題上，我認爲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會不應當貪求數量，不應當倉忙急躁。直到現在，我們對於國家機關的質量，還很少能加以思索與關心，殊不知特別認真準備這個機關，把真正現代品質的人材，即不亞於西歐優良榜樣的人材集中在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會裏，這乃是一種應份合理的辦法。當然，對社會主義共和國說來，這種條件還嫌過於簡樸。但第一個五年的情況，曾使我們相當充滿了不信任的和懷疑的心理。我們對於那些過於頻繁和過於輕易地修談什麼『無產階級』文化的人，不由地抱着這種態度；我們在開始的時候，若有真正的資產階級文化也就够了，我們在開始的時候，若沒有資產階級制度前期特別惡劣的文化，即官僚式或農奴制等等的文化，也就行了。在文化問題上，急躁與誇張都是最有害不過的。我們年輕的文藝作家

與共產黨員，對這點應該好好記着。

所以，關於國家機關問題，我們現在也應當根據過去的經驗做出這樣的結論：最好是慢一些。

我們國家機關的情形，如果不說是可惡，至少是可憐到了極點，致使我們必須首先切實加以考慮，怎樣來與這機關的缺點作鬭爭，同時要記着，此種缺點是根源於過去的東西，這些東西雖已被搗毀，但還未消滅，還未退到已屬悠遠的文化階段上去。我在這裏之所以正是提出文化問題，因為在這一事業中，祇有那些變成了文化、生活、習慣的東西，才能算是已達到的成績。而在我國，可以說，凡是社會制度中好的東西，都未經充分思索、瞭解和覺察到；祇圖急忙領會，既未檢查，也未考驗，既未被經驗證實，也未實際鞏固起來，如此等等。當然，在革命時代和使我們在五年內就從沙皇政體進到了蘇維埃制度這令人頭暈目眩的發展速度中，本來情形也就祇能是這樣。

應當及時猛省，應當對那種突飛猛進的運動，對一切虛張聲勢的誇耀等等懷着必要的不信任態度，應當考慮到怎樣檢查我們每小時所倡導，每分鐘所進行，而後來每秒鐘都證明其不鞏固、不堅牢和不可瞭解的前進步驟。這裏最有害的，就是急忙。最有害的，就是以爲我們總懂得一點

什麼，或以爲我們總具有頗大數量的成份來建成真正新的機關，即真正配稱爲社會主義、蘇維埃等等的機關。

其實不然，在我們這裏，這樣的機關，甚至這樣機關的成份，都簡直少得可笑，所以我們應當記住，爲要建立這種機關，不應吝惜時間，而是要花費多年多年的光陰。

我們這裏有些什麼成份可以用來建立這樣的機關呢？祇有兩種成份。第一，是傾心爲實現社會主義而鬪爭的工人。這種成份所受的教育是不夠的。他們本想造成優良的機關。但是他們不知怎樣做法。他們不能做到這點。他們本身上至今還沒有養成爲建立這種機關所必需的知識與文化程度。要做到這點正是需要文化。這裏用蠻幹猛衝手段，或用奮勇堅毅精神，或用一般任何個人的優良品質，都是毫無成就的。第二，是有知識的、受過教育和訓練的成份，但這種成份在我國，較之其他一切國家說來，都是少得可笑。

可是不要忘記，我們總還過於想用熱情和急性等等，來補償（或者希圖可以補償）這種知識。

我們無論如何都要定下這樣革新我們國家機關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並且要來檢查，使我們這裏的學科不致成爲死板文字或時髦空談（老實說，這在

我國是特別常見的現象），使學科切實滲透到機體內部，完全並真正變為生活底組成部份。總之，我們所應當提出的，不是西歐資產階級所提出的要求，而是目的在於發展成爲社會主義國家的國家所應份適當提出的要求。

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們應當把這作爲改善我國機關之工具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造成爲真正的模範機關。

要使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能進到必需的高度，就應當遵守這樣的規則：多番計量，一次剪裁。

要做到這點，就應當把我國社會制度中真正優秀的人事，極謹慎地、熟思地、格外明確地吸收來建立這個新的人民委員部。

要做到這點，就應使我國社會制度中現有的優秀成份：第一，是先進工人，第二，是真正開明的，能於保證絲毫不信空言，絲毫不昧良心說話的份子，——都絕不害怕承認任何困難，不怕爲達到嚴重目的而進行任何鬭爭。

我們爲改善我們的國家機關，已經空忙了五年，但正因爲是空忙，所以這種行動在這五年期間，僅僅證明了自己是無用，不唯無益，或甚至有害。正因爲是空忙，所以這種行動祇使我們具

有工作底外表，實際上却混亂了我們的機關和我們的頭腦、

這種現象，終非根本改變不可。

應該遵守這一規則：寧肯數量少，但要質量好。應該遵守這一規則：與其白白空忙，毫無獲得精幹人材的希望，不如再等兩年，甚至三年，倒還好些。

我知道，這一規則會是難於遵行，難於運用到我們實際生活中去的。我知道，相反的規則會在我國經過無數孔隙鑽進來的。我知道，將要給以莫大的反抗力，要表示頑強的堅定性；我知道，這裏的工作，至少在頭幾年內會是很少有顯明結果的；但同時我却深信，祇有經過這樣的工作，我們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祇有達到了這一目的，我們才能建立真正配稱為蘇維埃的、社會主義等等的共和國。

大概，許多讀者認為我在前一篇論文中引來作為例證的數字太少。我相信，可以舉出很多統計來證明這些數字是不充分的。但我以為我們應當把真正模範質量的利益這點，提在所有這一切計算之上。

我認為，正是現在這個時候，我們應當對於我們國家機關萬分認真地來進行這番工作，這時，急躁就幾乎是這工作中最有害的毛病。所以我很加注意隄防，不要人們來擴大這些數字。反

之，在我看來，這裏的數字，應該特別吝嗇。說句老實話，現在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是沒有任何威信的。大家知道，再沒有比我們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工作得更壞的機關，在現時條件下，這個人民委員部也祇能是這樣。我們應該牢記着這點，如果我們抱定目的，真要在最近幾年內，把它造成爲這樣的機關：第一，應當是模範的，第二，能引起大家的絕對信仰，第三，向所有每個人證明，真不愧爲像中央監察委員會這樣一個高級機關的工作。按一般定額招來的職員，據我的意見，應立刻地永久地驅逐出去。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底職員，我們應當來完全特別加以選拔，非根據極嚴格的考試不可。如果這個人民委員部裏，工作馬馬虎虎，仍得不到任何信仰，說話幾乎沒有半點威信，那末設立這樣的人民委員部又有什麼用處呢？我想，在我們現在所講到的這類改造工作中，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要避免這種現象。

我們吸收來担任中央監察委員的工人，應當是無可非難的共產黨員，我想，對這些人應當加以長期訓練，教他們學會工作方法，瞭解工作任務。其次，這工作中，應有定量的秘書人員來當助手，在任命這種人員之前，定要經過再三審查。末了，凡屬我們破例要立刻任命爲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職員的人，應當具備下列各條件：

第一，他們應有幾個共產黨員底介紹；

第二，他們應經過考試，證明他們具有通曉我們國家機關的知識；

第三，他們應經過考試，證明他們懂得我們國家機關問題的理論基礎，懂得管理法和辦事手續等等的基礎；

第四，他們應與中央監察委員及本部秘書處極協調地工作，使我們能够信託這整個機關的全部工作。

我知道，這些要求應具有莫大的先決條件，所以我很耽心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會中大多數「實踐家」會宣稱這些要求是執行不了的，或者以輕蔑態度來譏笑它們。但我要問問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會現有的任何一個領導人或與之有關的人，他能否真心向我說出，像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會這樣的人員委員會，實際上有什麼必需呢？我想，這個問題能够幫助他們去適當地判斷。或者，值不得來進行改組（這樣的改組我們曾進行過很多）工農檢查人民委員會這樣無希望的事情，或者，真正定下自己的任務，用緩慢、艱難、迥非尋常的辦法，經過多次檢查，來建立真正模範式的，能够引起所有每個人來尊敬（而不祇是因爲職銜要求這樣做）的機關。

如果不能忍耐，如果不準備花費幾年功夫來做這件事，最好是不要動手。

據我看來，要從我們在高級勞動研究院及其他方面業已潦草建成的機關中間，選出最少數的

機關，檢查它們充分認真的工作，而祇有這樣去繼續努力，使這工作真正合乎現代科學的要求，使這工作能給我們以一切的保證。那時在幾年之內，能確實指望會有一個機關，能名符其實地工作着，也就是說，能享受着工人階級，俄國共產黨以及我國全體民衆底信任，有系統地、不屈不撓地來爲改善我們國家機關而工作着。

這點，本來此刻就可以着手準備。如果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贊成上述的改造計劃，那末它現在就可以開始實行準備的步驟，以便有系統地進行工作，直到這些步驟全部完成爲止，既不用急躁，也不拒絕把已做過一次的事再重新改作一遍。

這裏，凡屬不澈底的決定，都是再有害不過的了。凡屬根據其他任何理由製定出來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職員底定額，其實都不過是依據舊官僚式的理由，依據舊日的成見，依據已經註定作廢了的，祇能引起一般譏笑的東西等等。

實際上，這裏的問題是如此：

或者證明現在我們在國家建設中，是真正學會了一些什麼（五年內也應該學會一點東西），或者證明我們還沒有成熟到這種程度；那時，也就值不得動手去做。

我想，依我們現有的人材看來，如果說，我們已經相當學會能於有系統地、從新地建成一個

人民委員會，這種假設，並不誇張。不錯，這樣一個人民委員會也就應當決定我們整個的國家機關。

此刻要懸賞徵求兩種或更多的關於組織一般勞動和特別是組織管理勞動底教科書。我們現有的萊爾曼斯著的那本書，可以作為基礎，雖然（要附帶說一句）他顯然同情孟塞維主義，是不能用來編製適合於蘇維埃政權的教科書的。不久前出版的克爾仁澤夫底書也可以作為基礎；末了，現有的一部份參考教材內，也有些可以適用的地方。

要派遣幾個有學問與忠實的人到德國或英國去蒐集書籍和研究這個問題。我之所以提到英國，是恐怕沒有可能派人到美國或加拿大去。

要指定一個委員會來起草農檢查人民委員會職員候選人的初步考試大綱；同樣也要定出中央監察委員候選人的初步考試大綱。

這種和諸如此類的工作，當然既不會使人民委員作難，也不會使農檢查人民委員會負責人或中央監察委員會主席團感覺困難的。

同時必須指定一個預備委員會來挑選中央監察委員的候選人。我相信現在我們無論從各機關有經驗的工作人員中，無論從我們蘇維埃大學生中，都能找出過額的候選人來充任這種職

位。如果事先排除某一種人，那就未必正確了。大概，必須寧可使這個機關具有各種各樣的成份，我們應當使這種成份成爲多種品質底結合和各種優點底錯綜，總之，是需要花費一番工夫來解決擬定候選人這個任務。舉例來說，如果這個新的人民委員部是由一色一樣的人所組成，譬如，都是一類帶官吏性的或者沒有一個帶鼓動性的人，或者沒有一個特長於交際或長於深入到爲這種工作人員所相當生疏的人羣中去等等的人——那就會是最壞不過的了。

★

★

★

我想，如果我把自己的計劃來同學院式的機關比擬，那便能最好地表達我的意思。中央監察委員，應當在自己主席團領導下，有系統地來考察政治局底一切文件。同時他們應當正確分配自己的工作時間來個別審查我們各機關的辦事情形，從最小的局部的機關起，直至高級的國家機關止。末了，他們的工作範圍內，還要包括研究理論，即研究組織他們所要致力的這一工作的理論，並且還要由老同志或由勞動組織高級研究院教授來領導他們作實踐學習。

可是我想，他們決不能祇限於這類學院式的工作。除了此項工作之外，他們還要準備自己去做另一種工作，這種工作，我可以不客氣地稱之爲捉拿拐騙，也不是拐騙，但總之是這類的人，並要想出特別巧妙辦法來掩護自己的偵察、襲擊等行動。

在西歐國家機關中，這樣的提議會引起空前的不滿與忿激情緒等等，但我相信，我們還沒有官僚化到這種程度，以致能於採取他們這種態度。我國新經濟政策還未能如此受人尊敬，以致當想到我們這裏必須捉拿人的時候，準會生起氣來。我們的蘇維埃共和國還成立得不久，各種陳腐廢物還堆積得如此之多，致使想到可以利用某種巧計，利用有時追尋深源及蜿蜒曲折的偵察辦法去實行搜掘時，恐怕誰也不會生氣，假如有人生氣，那便可以相信到，我們對這樣的人定會捧腹大笑的。

我相信，我們新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一定會拋棄這種壞的品質，這種品質，法國人叫它是 *pruderie*，我們稱之為可笑的禮貌或可笑的自尊，這種品質會完全助長我國蘇維埃機關或黨機關內的官僚份子。附帶說說，我們這裏，不僅在蘇維埃機關內，而且在黨的機關內也有官僚份子。

我在上面寫過，我們應當學習，應當到高級勞動組織研究院去學習等等，這絕對不是說，我所瞭解的『學習』是指什麼學校式的學習，或者僅限於學校式的學習。我相信，每一個真正的革命家都不會懷疑到，我在這裏所說的『學習』，內中也包含有某種半玩笑式的手法，某種巧計，某種花樣或諸如此類的東西。我知道，在西歐官氣十足莊嚴堂皇的國家裏，這種意見會引起真正的大驚小怪，決沒有一個正派的官吏甚至會同意把這意見提出來討論。可是我相信，我們還沒十

足地官僚化，在我們這裏，要是討論這種意見，祇會引起歡悅而已。

其實，又爲什麼不能把快意的東西和有益的東西結合起來呢？又爲什麼不利用某種開玩笑與半開玩笑的做作來揭露那般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的、半有害的等等東西呢？

我以爲，如果我們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把這些理由都拿來考察一下，那會是獲益不少的，並且我們中央監察委員會或它那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方面的同事所藉以獲得最光榮勝利的奇案紀事中，在那些是正式莊重的教科書上不常寫出的地方，又將添上我們將來的『工農檢查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所作的不少的功績。

★

★

★

怎樣可以把黨的機關與蘇維埃機關結合起來呢？這裏不會有什麼決不容許的事情麼？

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是以自己的名義，而是以我在上面暗示過的這些人的名義，我說，我這裏，不僅是蘇維埃機關內，並且在黨的機關內也有官僚份子，這就是指這些人說的。

其實，如果是爲了工作的需要，爲什麼不能把這兩種機關結合起來呢？大家未必不知道例如外交人民委員部自開始時起就已實行這類結合，並收到非常大的益處嗎？難道在政治局內沒有用黨的觀點常常來討論許多大大小小關於我們方面回答外國列強『進程』的『進程』問題，以預防

它們的（要說得客氣一點就是）奸謀詭計麼？難道蘇維埃機關與黨的機關這種靈敏的結合，不是我國政策中非常力量底泉源麼？我以為在我們對外政策上所已證實和鞏固了的東西，在這方面已成了慣例而不致引起任何懷疑的東西，對於我們一切國家機關至少也同樣合宜（我想，還更合宜得多）。而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也就是為我們一切國家機關而設的，它的活動應毫無例外地涉及一切國家機關，地方的、中央的、商務的、純粹官廳的、學術的、檔庫的、戲院的等等，——總之，各機關一無例外。

為什麼對於這樣規模宏大、此外還需要非常靈敏的活動形式的機關，——為什麼對於它，就不容許黨的監察機關和蘇維埃的監察機關有一種特殊式的合併呢？

我並不認為在這方面會有任何妨害。而且我想，這樣的合併是使工作順利進行的唯一保證。我以為關於這點的一切懷疑都是從我們國家機關內沾滿塵垢的份子方面發生出來的，對於這種懷疑祇能置之一笑。

★

★

★

還有另一種懷疑：把學習活動與職務活動結合起來是否適宜呢？我覺得不但適宜，而且應當這樣。一般說來，我們對於西歐的國家機構雖然取完全革命的態度，可是居然已中了這般國家

機構的遺毒，沾染了它許多最有害和最可笑的成見，而局部地便是我們的那些親愛的官僚們故意把這種毒物來傳染我們，故意投機，以為在這類成見的渾水內，他們往往撈得到魚；並且他們在這渾水內撈得這麼厲害，致使我們人中間，祇有盲人才看不見如此廣泛的撈魚勾當。

我們在所有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一切關係方面，真是『非常』革命了。但在尊敬上司，遵守辦事形式和禮節方面，我們的『革命性』往往由最腐敗的守舊積習所代替。這裏常常可以看到一種最有趣的現象：在社會生活上，一面是最偉大的向前躍進，但要實行極微小的變革時却胆怯得要命。

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最勇敢的前進步驟，是在早已構成爲理論範圍的這一方面，是在主要由理論、甚至完全由理論開發出的這一方面。俄國人因厭煩那種可惡的官僚生活，而在家裏構思非常勇敢的理論系統，所以這些非常勇敢的理論系統，在我們這裏就常常帶着非常的片面性。在我們這裏，一般思想系統中理論上的勇氣和對於某種最小的辦公手續改革上所表示的異常胆怯心理，這兩者共居在一塊。具有爲任何他國所未有的勇敢精神，規定出最偉大的帶全世界意義的土地革命，但同時對於某種極不重要的辦公手續的改革，則缺少勇氣；或者缺少勇氣，或者缺少耐性來把在一般問題上已收到『燦爛』效果的一般原理運用到這種改革上來。

因此，我們現在實際生活中，既包含有非常勇敢的驚人特徵，同時又有害怕最小變革的怯懦心理。

我想，在任何一個真正大革命中，情形也祇能是這樣，因為真正的大革命都是從舊東西，從整理舊東西的意向與力求新東西的極抽象意志這兩者間的矛盾中產生出來的，這種新東西應當新到這種程度，致使其中連一點舊東西都不能存在。

這種革命愈急進，則許多這樣矛盾存在的時間就會愈延長。

★

★

★

現在我們實際生活底一般特徵如下：我們已破壞了資本主義的工業，我們曾力求澈底摧毀中世紀式的機關，地主的土地佔有制，並在這個基礎上培植了小農和最小農，這些農民因為信仰無產階級的革命工作成績而跟隨着無產階級前進。然而我們要靠這種信仰心來支持到各較發達國家中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時日，這是不容易的，因為小農和最小農，特別是在新經濟政策下，按着經濟底必然性，還處在勞動生產率極低的水準上。加之國際環境也曾使現時俄國後退，使我國國民勞動生產率，一般地整個地比戰前低得多。西歐資本主義列強，一部份是有意地，一部份是自發地，竭力使我們後退，利用俄國內戰中的各種因素來儘量破壞我國。正是這樣退出帝國主義戰

爭，當然就有很大的好處。這些列強大都這樣推論，而從它們的觀點出發也祇能這樣推斷說：若是我們推翻不了俄國的革命制度，那我們至少也要使它難於發展到社會主義。結果，它們的任務祇一半得到解決。它們並沒有推翻我國革命所創立的新制度，可是它們也未嘗使這新制度立刻就能這樣大步前進，去證實社會主義者預言底正確，去使社會主義者能夠極迅速地發展生產力，發展足以形成爲社會主義的一切資源，昭然若揭地向一切人和每個人證明社會主義蘊蓄有莫大的力量，證明人類現在已轉進到了一個新的，具有非常光明前途的發展階段。

現在國際關係的體系已形成這樣，即在歐洲有一個國家被各戰勝國所奴役——這就是德國。再則，西歐有些國家，而且是最老的國家，因獲得勝利而處於一種便利地位，能夠利用這一勝利來向本國被壓迫階級作一些不關重要，但終能把這些國家裏的革命運動推延下去，而造成某種『社會和平』局面的讓步。

同時，東方許多國家，如印度和中國等等，正因為受到這次帝國主義戰爭的影響，而完全被拋出了自己的常軌。它們的發展已最終循着一般歐洲式資本主義軌道前進了。在它們那裏，已開始醞釀着一般歐洲式的事變。而現在全世界人都看得清楚：這些國家已被捲入到不能不引起全世界資本主義危機的發展漩渦中去了。

因此，我們面前發生了這樣一個問題：處在我國這種小農和最小農生產情況以及我國這種經濟被破壞情況之下，我們是否可以支持到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完成其發展到社會主義的那一天呢？但這些國家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過程，不會是像我們從前所期待的那樣完成的。它們這種發展的過程，不會是經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裏平衡『成熟』，而會是經過某些國家被別些國家所剝削，經過帝國主義大戰中的第一個戰敗國家被剝削，再加上整個東方被剝削的道路來完成的。另一方面，正由於這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底影響，東方已最終加入了革命運動，最終捲入了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總漩渦。

在這樣的形勢下，對我國說來，應規定出怎樣的策略呢？策略顯然是如此：我們應當極端慎重來保持我國的工人政權，來把我國小農和最小農維繫在這工人政權底威信和領導之下。在我們方面有這樣的長處，就是全世界現時正進到一定會產生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運動中。但我們方面也有這樣的短處，就是帝國主義者已經得以將全世界分裂為兩個營壘，並且因為德國這個真正先進、文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現時已極難振作起來，使這種分裂更加複雜化了。所謂西歐的一切資本主義列強都在啄食它，不使它抬起頭來。而另一方面，整個東方若干萬萬被剝削得幾乎過着非人生活的勞動人民，已被陷入到這樣的境地，就是他們所有的體力與物力都決不能去與

西歐任何一個要小得多的國家底體力、物力和武力作任何比擬。

我們是否能避免將來與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發生衝突呢？我們是否能希望西方強霸帝國主義國家和東方強霸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內在矛盾與衝突將給我們以第二次的遷延，如它們第一次所給過的那樣呢？那時西方反革命派會出兵幫助俄國的反革命勢力，但因為西方與東方反革命營壘中的矛盾，因為東方剝削者與西方剝削者營壘中的矛盾，因為日本和美國之間的矛盾，遂使這次進犯遭受了失敗。

我覺得，對上面的問題應當這樣來回答：問題底解決要依極多的情況為轉移，鬭爭底結局，一般地和整個地說來，祇有根據地球上人民底絕大多數終究是由資本主義本身在教育和訓練他們去作鬭爭的這一事實，才可以預先見到。

鬭爭底結局，歸根到底是取決於俄國、印度、中國等構成世界人口絕大多數的這種情形。正是這世界人口底大多數，最近幾年來非常迅速地捲入謀自身解放的鬭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來，關於世界鬭爭問題底最終解決，不能有絲毫的懷疑。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來，社會主義的最後勝利，是完全和絕對有保證的。

可是我們所要注意的，不是社會主義最後勝利底這種必然性。我們所要注意的，是我們俄國

共產黨，我們俄國蘇維埃政權，爲要阻止西歐反革命國家來撲滅我們起見所應當採取的策略。爲要保證我們能够生存到在反革命帝國主義的西方與革命民族主義的東方之間，在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與東方方式的雖則落後但是佔人口大多數的國家之間發生下一次武裝衝突的時候，——那末這大多數就必須趕快發展文明。我國的文明程度也還够不上直接進到社會主義，雖然我們有了達到這點的政治前提。我們應當抱定這樣的策略，或者爲自救起見，我們必須採取如下的政策。

我們所應當努力建成的國家，是要工人能够保持他們對於農民的領導，保持農民對於他們的信任，並以極大節省辦法把自己社會關係中任何浪費現象的任何遺跡剷除乾淨。

我們應當使我們國家機關儘量節省。我們必須把這種機關中所有一切浪費現象的遺跡剷除乾淨，而沙皇俄羅斯及其官僚資本主義機關所遺留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這種遺跡，尙是很多的。

這不會是農民的狹隘眼界麼？

決不是的。我們祇要能保持工人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就能在我們國家裏用極嚴格節省的辦法把任何一點貯蓄都保存起來，藉以發展我們的大機器工業，發展電氣化，加緊開採泥炭，完成瓦爾霍夫水電站建設工程等等。

我們的希望就在這裏，而且僅僅在這裏。祇有如此，我們才能够——用個比喻來說——從一

匹馬上跨到另一匹馬上，由農民的、莊稼漢的、窮苦的馬上，由依靠於破產農民國家的種種節省辦法的馬上，跨到無產階級所努力尋求，而且不能不尋求的馬上去，跨到巨大機器工業、電氣化、瓦爾霍夫水電站等等的馬上去。

我便是這樣把我們的工作、政治、策略、戰路底總計劃與改組後的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底諸任務聯繫起來。我們之所以應當對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這樣特別關心、特別注意，把它的地位提得特別之高，使它的領導人能與中央委員會有同等權利等等等，其理由就在這裏。

這種理由也就是說，祇有儘量清洗我們的國家機關，充分裁減其中一切非絕對必需的人事，祇有經過這種辦法，我們才能支持下去。並且我們還不是支持在小農國家底水準上，不是支持在這種普遍狹隘性底水準上，而是定能支持在不斷向前發展，邁進到大機器工業的水準上。

我對於我們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所理想的崇高任務，就是如此。我替我們工農檢查人民委員部計劃到把最有威信的黨的上層人員與『普通的』人民委員部合併起來的目的，就是如此。

一九三三年三月四日刊載於真理報，四十九期

選自列寧全集，第三版，第二十七卷，第四〇六至四〇八頁

斯大林論蘇維埃政權鞏固後的農民

——摘自「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五章

「農民問題」，一九二四年四月——

如果從前，在革命第一個時期，主要問題是推翻沙皇制度，而後來，在二月革命以後，首要問題是推翻資產階級來擺脫帝國主義戰爭；那末現時在國內戰爭結束以後，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經濟建設問題就成爲首要問題了。加強和發展已收歸國有的工業；爲此目的而利用國家所調節的商業把工業和農民經濟聯繫起來；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制，以便後來逐漸減少糧食稅定額，而辦到用工業製造品去交換農民生產品；振興商業並發展合作制，吸收千百萬農民來參加合作制，——這就是列寧爲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底基礎而擬定的經濟建設方面的當前任務。

有些人說：這個任務也許是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所不能勝任的。有些懷疑派甚至說：這個任

務簡直是空想的，是無法實行的，因為農民總是農民，——農民是由小生產者組成的，因此不可利用他們來組織社會主義生產底基礎。

但懷疑派是弄錯了，因為他們沒有注意到這裏有決定意義的一些情況。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其中主要的情況。

第一，決不可把蘇聯農民和西方農民混爲一談。蘇聯農民不能不與西方農民不同，因為蘇聯農民經歷了三次革命底教訓，他們同無產階級一起，並在無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反對沙皇和反對資產階級政權的鬭爭，從無產階級革命手中獲得了土地與和平，並因此而變成了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而西方農民却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代和在自由資產階級領導下進行了鬭爭，從這個自由資產階級手中獲得了土地，因而變成了資產階級底後備力量。顯然用不着證明：蘇聯農民既慣於重視他們與無產階級的政治親善和政治合作，並因有這種親善和這種合作而獲得了自由，於是他們便不能不是非常願與無產階級實行經濟合作的力量。

恩格斯曾說：『社會黨奪取政權，已成爲最近將來的事情』，『爲要奪得政權，黨就應當首先從城市裏跑到鄉村裏去，而成爲在鄉村裏有勢力的黨』（見恩格斯所著農民問題，一九二二年版）。他這一段話是在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寫的，而他所指的是西方農民。俄國共產黨人在三次

革命中是在這方面做過了巨大的工作，已經在鄉村裏爲自己造成了我們的西方同志所不敢夢想的影響和支柱，——這還須要證明麼？這個情況，不能不根本促進了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實行經濟合作的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懷疑派硬說小農是與社會主義建設不能相容的因素。可是請聽恩格斯關於西方小農所說的話吧：

『我們堅決站在小農方面；我們將極力設法改善小農生活，使他們易於過渡到共耕制，要是他們決意這樣辦的話；如果他們還不能決意這樣辦，那我們就要設法給予他們儘多的時間，讓他們在他們那一小塊土地上考慮考慮這個問題。其所以要這樣來作，不僅是因為我們認定有可能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而且也是爲着黨的直接利益。被我們救全而沒有降落爲無產者，還在農民地位時就被我們吸收到自己方面來的農民人數愈多，社會改造也就會愈加迅速和愈加容易實行。如果我們等待資本主義生產到處都發展到極限，讓最後一個小手工業者和最後一個小農都變成大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品時，才來進行這個改造，那是沒有益處的。我們在這方面爲着農民利益而必須犧牲一些社會公款，這從資本主義經濟底觀點上看來，好像是白費金錢，然而這正是善於利用資本，因爲這種物質犧牲，會使以後實行整個社會改造時能節省大批經費，也許能節省十倍。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對待農民。』（見恩格斯所

恩格斯說這些話時，是指西方農民而言。可是，他的這些話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內實行得這樣容易，這樣完全——這難道不很明白麼？祇有在蘇維埃俄羅斯，才能立刻實行並完全實行使「獨立工作的小農轉到我們這方面來」，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物質犧牲」，實行爲這點所必要的「慷慨對待農民」；在俄國，這些以及諸如此類的有利於農民的辦法已經在實行着，——這難道不很明白麼？這個情況也一定要便利並推進蘇維埃國家底經濟建設事業，——這怎麼可以否認呢？

第二，決不可把俄國農業和西方農業混爲一談。西方農業是按照通常的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是在農民深刻分化的環境中發展的，在一個極端上是大田產和私人資本主義大地產，而在另一個極端上却是窮苦、貧困和僱傭奴隸地位。因此，在西方發生瓦解和解體是完全自然的。在俄國却不是這樣。我國農業是不能按這樣的道路去發展的，因爲單是有蘇維埃政權存在和基本生產工具及生產資料國有化的事實，也就不容許農業按這條道路發展。俄國農業應按別一條道路，即是使千百萬小農和中農合作化的道路，在農村中發展羣衆合作制並由國家以優待借款來幫助這合作制的道路去發展。列寧在他論合作制的論文中正確指示說：我們俄國的農業應當按新道路去發

展，即經過合作社吸收多數農民來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將集體制原則逐漸灌輸於農業，起初灌輸於農產品銷售方面，然後灌輸於農產品生產方面的道路去發展。

因有農業合作社工作而在農村中所發生的一些新現象，在這方面是極值得注意的。大家知道，在農業總社內產生了以農業各部門（如麻、馬鈴薯、油類等等）為標準的新的巨大的組織，這些組織是有廣大前途的。其中例如麻業總社包括有許多種麻農民生產協作社。這個麻業總社供給農民以種子和生產工具，然後向這些農民購買所有的麻類產品，大批銷售於市場，保證農民得以分沾利潤，這樣就是經過農業總社而把農民經濟與國家工業聯繫起來。怎樣稱呼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呢？照我的意思，這是國家社會主義大生產制中的家庭農業體系。我在這裏說國家社會主義生產中的家庭農業體系，是與資本主義生產制中的家庭工業，例如紡織業部門的家庭工業體系相比擬而言；在資本主義的家庭生產體系下，家庭手工業者從資本家那裏領得原料和工具，並把所有一切生產品交給資本家，所以他們事實上是在家庭裏做工的半僱傭工人。這不過是指明我國農業究竟應當按那條道路發展的許多標誌之一。我在此地還不說其他農業部門方面的其他類似的標誌。

顯然用不着證明：絕大多數農民是會很願意走這條新的發展道路，而拋開私人資本主義大地

產和僱傭奴隸地位的道路，貧困破產道路的。

請看列寧關於我國農業發展道路所說的話吧：

『國家支配着一切大生產資料，無產階級執掌着國家政權，無產階級與千百萬小農及最小農結成聯盟，無產階級有對農民實行領導的保證等等，——難道這不是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難道這不是我們經過合作社，而且僅僅經過合作社，經過我們從前所鄙視爲買賣機關，並且現時在新經濟政策情形下，我們從某一方面也有理由這樣來鄙視的合作社，便把完備社會主義社會建設成功所必須的一切麼？這還不是說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但這是爲建成社會主義社會所必需而且足夠的一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三九二頁）

『列寧往下講到必須用財政及其他辦法來幫助合作制，認爲合作制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新的民衆組織原則」和新的「社會制度」時說道：

『每個社會制度之產生，都需要有相當階級底財政幫助。不待說，「自由」資本主義之產生，是花費過許多萬萬盧布的代價的。現時我們所應當特別幫助的社會制度，就是合作社制度，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應當認識和具體實行。可是，必須正確瞭解我們對於這種制度的幫助，就是說，要知道我們並不是幫助隨便一種合作社週轉，而祇是幫助有真正的民衆切實參加的合作社週轉。』（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

所有這些情況是說明什麼呢？

就是說明：懷疑派是不對的。

就是說明：列寧主義是對的，因為列寧主義把勞動農民羣衆看作是無產階級底後備力量。

就是說明：執政的無產階級能够運用而且應當運用這個後備力量，以便把工業和農業聯絡起來，提高社會主義建設，爲無產階級專政建立起保證過渡於社會主義經濟所絕對必需的那個基礎。

斯大林：「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

工作底總結」摘錄

——一九二五年五月九日在莫斯科黨組織

積極份子會議上的報告——

（前略）

四 論蘇聯社會主義底命運

現在來說第四種問題。

以前，我曾說過我們的代表會議對於直接涉及共產國際的一些問題的各種決議案。現在我們且來談談那些對於共產國際和俄國共產黨都有直接關係的問題。因此這些問題，便成爲內外問題的聯合的鏈環。

資本主義的暫時穩定應如何反映到我們的國家裏面社會主義之命運？這個穩定，是否我們國家裏面社會主義建設的末途，或末途開始？

當其他各國於較長的時期尚保存資本主義的條件之下，在我們的技術和經濟落後的國家裏面，一般的說能否以自己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

在資本主義包圍中而且在目前穩定的資本主義包圍中，我們能不能創造完全的保證，免於武裝干涉的危險以及免於國內舊制復辟的危險？

所有這些問題因為國際關係的新環境，必然要擺在我們面前，非予以確實固定的答覆不可。

我們的國家，具有兩部份的矛盾：一部份是內部的矛盾，即存在於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另一部份是外部的矛盾，即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與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

我們且把這兩部份矛盾，分開來看一看。

無產階級與農民間，存在着一些矛盾，這自然不能否認。祇要回憶在實行農產品價格的政策，規定價格的限度和實行減低工業品價格的運動時我國過去現在所發生的事情，就足以明瞭這些矛盾的全部實質。在我們的前面，有兩個基本的階級，這便是無產階級與私有者階級，即農民。因此在他們中間，便不能避免矛盾。整個的問題，就在我們能不能以自己的力量戰勝那些存

在於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人們說，能不能以自己的力量來建成社會主義呢？其實這般人就是想說，我們國內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是否能夠被克服呢？

列寧主義對於這個問題給了正面的回答：是的，我們能建成社會主義，我們在工人階級的指導下將與農民共同去建設社會主義。

這個回答的根據和理由在那裏？

這種回答的理由，就是除了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以外，對於發展的根本問題，還有共同利益存在，這些共同利益，超過並且至少能夠超過這些矛盾，而且這些共同利益是工農聯合的根基。

這些共同利益在什麼地方？

就是農業的發展，有兩條道路，即資本主義的道路與社會主義的道路。資本主義的道路就是爲着城市和鄉村資產階級上層份子發財而使多數農民窮困的發展，社會主義的道路則與之相反，就是不斷提高大多數農民幸福的發展。無產階級，尤其是農民，樂意按照第二條道路即社會主義的道路去發展，因爲這條道路，是農民擺脫貧困和半飢的生存之唯一救星。無產階級專政，手裏握有經濟的主要命脈，將採用所有的手段，使第二條道路即社會主義的道路勝利，這是不用不着說的。另一方面，農民切膚的願望按着第二條道路發展，這更是不言而喻的。

由此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共同利益，便超過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

所以列寧主義說，我們與農民在工農聯合的基礎上能夠而且應該建成完滿的社會主義社會。所以列寧主義根據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共同利益而說，我們能夠並且應該以自己的力量，克服那些存在於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

列寧主義對於這件事體，就是這樣觀察的。

可是同志們大概不是個個都是贊同列寧主義的，比方托洛茨基同志關於無產階級與農民間各種矛盾的問題說道：

『在農民佔大多數的落後國家裏面，工人政府地位的矛盾，祇有●在國際範圍內，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舞台上才能得着解決。』（參看托洛茨基著的「一九〇五年」書上的序言）

換句話說，就是我們沒有力量也沒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並且消滅吾國內部的矛盾——無產階級與農民間的矛盾，因為依他的意見，祇有世界革命的結果，並且祇有在世界革命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够消滅這些矛盾，才能够建成社會主義。

● 着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

這個論點，與列寧主義毫無相同之處，這是用不着說的。

托洛茨基又繼續說道：

『沒有西歐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幫助，俄國工人階級是不能保持政權的，並且不能轉讓其當時的統治爲長期的社會主義專政。在這方面，一秒鐘都不能懷疑的。』（參看托洛茨基著的我們的革命一書第二七八頁）

換句話說，就是當西方的無產階級還未握着政權並未給我們幫助時，我們是不能幻想保持政權於較長的時期的。

往下托洛茨基又說道：

『……以爲（舉例來說）革命的俄國，能屹立於保守的歐洲之前，這是無希望的。』（參看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上冊第八〇到九〇頁）

換句話說，依他的意見，我們不僅不能建成社會主義，並且連短期的屹立於「保守的歐洲之前」也不可能，雖然全世界都知道，我們不僅保持了並且還打退了保守的歐洲對於我國的一些瘋狂的進攻。

托洛茨基最後又說道：

『俄國社會主義經濟之真正的興旺，祇有在歐洲各主要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才有可能。』

（參看托洛茨基全集第三卷上冊第九二到九三頁）

我想大家已經明白了吧。

同志們，我引了這些引證，爲的是要把這些引證與列寧全集集中的引證對照，使你們就够領會關於在被資本主義國家包圍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裏面能建成完滿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之基本實質。

現在且看看由列寧全集引來的引證。

列寧選在一九一五年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就寫道：

『經濟的與政治的發展之不平衡，是資本主義無條件的定律。由此社會主義起初可以在幾個國家裏面，或者甚至於在一個單獨的資本主義的國家裏面獲得勝利。如果這個國家裏的無產階級取得了勝利，剝奪了資本家並且在本國組織了社會主義的生產，那末它就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其方法就是吸引其他各國被壓迫的各階級到自己這方面來，在這些國家中舉行反對資本家的暴動，在必要的時候，甚至要用軍事的力量來反對剝削階級及其國家』……『因爲不經過社會主義共和國與其他各國多多少少長期激烈的鬭爭，要想把各民族自由地聯合在社會主義裏是不可能的。』（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三卷，一三三頁）

換句話說，被資本家包圍着的無產階級專政國家，不僅能夠以自己的力量消滅無產階級與農民間內部的矛盾，而且能夠並應該建成社會主義，在本國組織社會主義經濟，準備武力來幫助周圍各國無產階級，作顛覆資本主義的鬭爭。

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個國家裏面勝利這個問題的基本論點就是如此。

列寧在一九二〇年第八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關於俄國電氣化的問題，也是這樣說的，不過說話的方式有點不同。他說道：

『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上全國電氣化。不然國家仍是小農國家，這是我們應該明白瞭解的。我們不僅在世界範圍內，而且在本國內也比較資本主義弱些，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們明瞭了這點，並且我們要把事情做到這個地步，即使小農的經濟基礎，轉變到大工業的經濟基礎。祇有到國家電氣化的時候，祇有當工業、農村經濟與運輸事業有現代大工業的技術基礎的時候，祇有那時候，我們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七卷，四二八頁）

換句話說：就是列寧完全瞭解我們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完成底技術上的各種困難，但是他決不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

因此作出那種荒謬的結論，如後說：『俄國社會主義經濟之真正與旺，祇有在歐戰各主要國家內的無產階級勝利之後，才有可能』。列寧則認為我們能以自己的力量，克服這些困難而達到『最後的勝利』，即建成完滿的社會主義。

經過一年之後，在一九二一年列寧又說：

『和農民發生二十年的相互關係，便能保證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甚至於當無產階級革命延遲的時候；而無產階級革命是延長着）。』（參看列寧：論糧食稅的提綱摘要，一九二一年。參看布爾塞

維克第七期，一九二五年）

換句話說，就是列寧完全瞭解到我們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完成底政治上的困難，但是列寧決不由此便作出那種不正確的結論，如後說：『沒有歐洲無產階級直接的國家的幫助，則俄國工人階級便不能保持政權』，列寧却認為祇要對於採取農民有正確的政策，在建成完滿的社會主義的意義上，我們完全能夠達到『在全世界範圍內的勝利』。

可是對於農民正確的政策是什麼？對於農民正確的政策，完完全全有賴於我們，僅僅有賴於我們，即有賴於指導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我們的黨。

在一九二二年，列寧在其論合作制的短文中也是這樣說的，不過說得更肯定些，他說道：

『實際上，國家政權握有一切大的生產工具，國家政權是在無產階級的手裏，無產階級與數千百萬小的和極小的農民聯合起來，在此聯合中無產階級握有對於農民的領導權等等，難道這還不够從協作制僅僅從協作制一方面來建成社會主義嗎（我們從前輕視協作制，視之爲營業主義的東西，在現今新經濟政策下面，我們也還有相當的權利輕視他們）？難道這還不是建成完滿的社會主義社會之必須的條件麼？這自然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之建設完成，但這是此種建設完成之一切必須的充足條件。』（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下冊，一四〇頁）

換句話說，就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我們有一切必要的條件來建成完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和戰勝一切和各種內部的困難，因為我們能够並且應該以自己的力量，戰勝這些內部的困難。

我想大家已經明白了吧。

反對的意見，以爲我們國家經濟上比較落後，沒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列寧取一種攻勢，駁斥這種意見，認爲這與社會主義是不相容的，他說道：

『他們的理由，真算陳舊到萬分，在西歐社會民主黨發展的時候，他們就把這種理由背熟了，這種理

① 着重點是我加的。

——斯大林

由，說我們還未長成到社會主義，說我們還沒有——好像他們中間各種「博學的」老爺們所說的那樣——社會主義底客觀的先決條件。」（參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下冊，一一八至一一九頁）

不然，在十月奪取政權和組織十月革命有什麼用處呢。因為完滿的社會主義社會建設完成之可能和必要若是因某種原因而失去，則十月革命便也失掉意義。誰否認在一個國家裏面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誰便定要否認十月革命的正當。反之，誰不相信十月革命，誰便不應承認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中，有勝利之可能。不相信十月革命與不承認在我們國內有建成社會主義之可能，這兩方面中間的聯繫，是完滿的和直接的。

列寧說：

「我知道有些明智的人們，認為自己很聰明，且自稱為社會主義者，他們諱勸在所有各國還未爆發革命的時候，便不應奪取政權。他們並不知道這樣一說，他們便離開了革命，跑到資產階級那方面去了。如果說要等到一切勞動階級在國際範圍內完成革命的時候，這便是叫大家停滯於期待中，這完全是無意思的。」

（參看列寧全集第十五卷，二六七頁）

關於第一種矛盾，關於內部的矛盾，關於在資本主義包圍條件中建成社會主義之可能的問題，就是如是。

現在來講到第二種矛盾，講到外部的矛盾，即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與其餘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

這些矛盾在什麼地方呢？

這些矛盾，就在既有資本主義的包圍，也就一定有資本主義國家武力干涉的危險，而既有這種危險，那末也就一定有復辟的危險和舊制度復興的危險。

這些矛盾，用一國的力量能不能完全加以克服？自然不能。因為一國的努力，即使這是個專政的國家，也不能充分的完全保證它免去武力干涉的危險。免於外力干涉的實足保障，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祇有在國際範圍內，祇有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共同努力的結果，或者更好些，祇有幾個國家無產階級勝利的結果，才有可能。

所謂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是指什麼？

社會主義最後的勝利，就是防止武力干涉企圖與復辟企圖的實足保障，因為多少嚴重的復辟企圖，祇有在外力嚴重的幫助下，祇有在國際資本的幫助之下，才能發生。因此全世界工人對於我們革命的幫助，特別是幾個國家內工人的勝利，是第一個已勝利的國家完全保證無武力干涉企圖與復辟企圖之必要條件，社會主義最後勝利的必要條件。

列寧說：

『當我們蘇維埃共和國還是整個的資本主義世界底孤立遼闊的時候，以爲這些和那些危險會消滅下去，這完全是一種可笑的幻想和烏托邦，這些根本的矛盾既然還保存着，這些危險自然也就保存着，而且也沒有方法逃避它們。』（列寧全集第十七卷，四〇八至四〇九頁）

列寧又說：

『我們不僅在一國內生活，而且在很多國家的系統裏面生活，蘇維埃共和國與帝國主義國家長久的共存是在是不可能的，結果不是這個就是那個國家勝利。』（列寧全集第十六卷，一〇二頁）

因此列寧又說：

『祇有在世界範圍內和各國的工人底共同努力，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列寧全集第十五卷，二八七頁）

第二種矛盾的問題就是這樣。

誰把一個國家的力量可以完全克服的第一種矛盾和必須用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的力量始能克服的第二種矛盾混爲一談——那末，他就犯了反列寧主義的最大錯誤，這種人或者是一個糊塗蟲，或者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機會主義者。

本年正月有一位同志給我一封信論及在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該信可爲此種頭腦不清的榜樣。他驚奇的寫道：

『你說，列寧主義的理論……就是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個國家內勝利。可惜，我在列寧的著作中，找不出關於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指示。』

這位同志，我認爲是我們青年學生中較優秀的同志之一，他在『列寧的著作中，找不出關於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指示』，這當然不是什麼不幸，將來他讀完列寧全集的時候，他終究可以找出此等指示。不幸之處，就是他把內部的矛盾和外部的矛盾混雜了，結果弄得一塌糊塗。我答覆這位同志的話，你們也不妨認識一下。我答覆如下：

『不是說完全的勝利，而是說一般的勝利，即是說驅逐地主和資本人家，奪取政權，打退帝國主義的進攻和着手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這是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所完全可以做到的，可是要完全保障不致復辟，這祇有在「幾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共同努力」以後，才有保證。有人以爲俄國勝利的無產階級，在其他國家無產者顯然表示同情的條件之下（當時幾個國家內的無產階級還沒有得到勝利）不能抵抗守舊的歐洲；要是在俄國開始革命的時候就有這種主張，那是愚蠢的。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極庸俗的機會主義。倘若這個理論是正確的，那列寧斷定「我們要把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變爲社會主義的那俄羅斯，我們有建成

完滿的社會主義社會之一切必要條件」等話（參看列寧論合作制一文）也就不對了……。在我們政治的實際行動上，若以為勝利的無產階級國家祇是消極的，以為在沒有其他國家勝利的無產階級援助以前，這一個國家祇能站在原地，這是最危險的。我們假定，在五年或十年以內，西歐的革命還不會成功；我們又假定，在這個時期內我們的共和國依然存在，依然是在新經濟政策的條件之下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共和國，那末你是不是以為在這五年或十年以內，我們的國家將清閒無事，而不組織社會主義經濟呢？祇要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便可以明瞭否認一個國家內社會主義勝利的理論，是十分危險的。但這是不是說，這個勝利，就是完全徹底的呢？不是的，因為資本主義包圍存在以前，時時都有武裝干涉的危險。（一九二五年正月）

根據我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議案的觀點來說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的命運問題，就是這樣。

五 黨在鄉村中的政策

現在來說第五種問題。

在沒有說到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黨在鄉村中的政策的決議以先，我想稍微談談資產階級的言論機關因我黨批評我們自己在鄉村中的缺點而起的喧嘩。資產階級的言論機關很得意地告

評人，說我黨公認的批評我黨自己的缺點就是蘇維埃政權崩潰的徵象，就是蘇維埃政權瓦解和崩潰的徵象。不用說，所有這些喧譁祇是欺詐和虛偽罷了。

自我批評，是我黨強固的象徵，而不是薄弱徵象。祇有生機健全和走向勝利之途的強固的黨，才能在大家面前無情地批評了而且將來永遠要批評自己的一切缺點。在人民面前掩蔽真理的黨，畏懼光明和畏懼批評的黨，不算是個政黨，而是死命已定的騙徒們的朋黨。資本家先生們以其自己的心腹來測度我們。他們畏懼光明並竭力對人民掩蔽真理，以盡善盡美這個炫耀耳目的招牌，去隱藏自己的缺點。所以他們以為，我們共產主義者也應當在人民面前掩蔽真理，他們畏懼光明，因為他們祇要容許比較嚴重的自己批評，對於自己一切缺點實行比較自由的批評，則資產階級的制度將不留片石了。所以他們以為，倘若我們共產主義者容許自我批評，那末這是我們受人包圍和懸於空中的徵象。這般體面的資本家和社會民主黨人，正是以自己的心腹來測度我們。祇有明日黃花和死命已定的政黨才能畏懼光明和批評。我們不畏光明，亦不畏批評，因為我們是向上發展和走向勝利的黨。所以我們幾月以來所舉行的自我批評正是我黨萬分強固的徵象，而不是薄弱的徵象，正是鞏固我黨的手段，而不是使我黨瓦解的手段。

現在來講黨在鄉村中的政策問題。

因國內和國際的新環境，在鄉村中究竟有些什麼新的事實可以指出呢？

我以爲有四件基本的事實：

(一) 國際環境的改變和革命速度的緩慢，要求選擇最安全的（雖然是長久的）道路，使農民參加社會主義的建設，和農民共同去建設社會主義；

(二) 鄉村在經濟上的增長和農民的分化過程，要求消滅鄉村中軍事共產主義的殘餘；

(三) 農民底政治積極性，要求改變鄉村中舊有的領導和行政的方法；

(四) 蘇維埃的改選中，發現了毫無疑義的事實，即我們國內有許多區域的中農曾站在富農方面反對貧農。

根據這些新的事實，黨在鄉村中的基本任務究竟何在呢？

有些同志根據鄉村分化的事實，得出一個結論以爲黨的基本任務——就是燃起鄉村中的階級鬭爭。同志們！這是不對的，這簡直是空話。現在我們主要的任務，不在這裏，這是復詠孟塞維克老百科全書中孟塞維克的舊歌。

現在主要的任務，完全不在燃起鄉村中的階級鬭爭。現在我們主要的任務，要使中農團結於無產階級的周圍，重新取得中農。現在主要的任務是與農民基本羣衆結合起來，提高農民基本羣

衆的物質和文化的程度，並與這個羣衆共同向社會主義的道路前進。主要的任務是在與農民共同去建設社會主義，並必須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去建設社會主義，因為工人階級的領導是我們的建設走到社會主義道路的基本保障。

現在黨的基本任務，就在這裏

當施行新經濟政策時，列寧關於這個問題所說的話至今還有充分的效力，所以現在不妨回憶一下。他說：

『問題底全部實質，即在欲與廣大無比和力量無限的羣衆共同前進，就非和農民共同前進不可。』
(列寧全集十八卷，下冊，七一頁)

列寧又說：

『與農民羣衆聯絡，與普通的勞動農民聯絡而開始前進，這種前進比我們所描想的是要緩慢萬分，可是這樣一來，一切羣衆才真正和我們共同前進。將來總有一個時候，這個運動的迅速是我們現在所不可幻想的。』(列寧全集十八卷，下冊，二九至三〇頁)

根據上述各點，我們目前在鄉村中的基本任務就有兩個。

(一) 第一個任務是要把農民經濟歸入蘇維埃經濟發展的一般系統中。以前我們的經濟有兩

個平行的過程；城市則走城市的道路，鄉村則走鄉村的道路。資本家盡力使農民經濟歸入資本主義發展的系統中，可是這個過程產生了農民羣衆的貧困和農民上層份子的豪富。這個步驟引起了偉大的革命。自無產階級勝利以後，爲使農民經濟歸入蘇維埃經濟發展的一般系統中，就須造成足以促進國民經濟發展的新條件，其基礎是逐漸地然而不是不斷地提高大多數農民的幸福，這就是說，現在所走的道路與革命前資本家引導和號召農民所走的道路，完全相反。

但是如何能把農民經濟歸入經濟建設的系統中呢？就是經過協作制。經過信用協作制，經過鄉村經濟協作制，經過消費協作制和經過手藝協作制。

經過這些大大小小的道路自然是緩慢的，可是一定會歸納農民經濟於社會主義建設的一般系統中。

(二) 第二個任務是一步一步地，但是不斷地實行消滅農村中舊有行政和領導方法的路綫，實行振作蘇維埃的路綫，實行把蘇維埃變爲真正的選舉機關的路綫，實行培植鄉村中蘇維埃民主制的路綫。列寧說道：無產階級專政是大多數勞動者的民主制的最高形式。列寧說道：這個民主制的最高形式，祇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和我們能够鞏固這個政權以後，才有實現的可能。所以，這個鞏固蘇維埃政權和培植蘇維埃民主制的時期已經開始了，我們應當循着這條道路謹慎前

進，不要急燥，在工作的過程中應使許多非黨的農民積極份子團結在黨的周圍。

倘若第一個任務——歸納農民經濟於經濟建設的一般系統中的任務——使我們有促進農民與無產階級並駕齊驅走入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之可能，那末第二個任務——培植蘇維埃民主制和振作鄉村蘇維埃的任務——定能使我們改造我們的國家機關，使國家機關與國民羣衆聯絡起來，使國家機關成爲健全的、忠實的、簡單的和節省的組織，以便造成許多條件使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易於過渡到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社會。

我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關於黨在鄉村中的政策問題的決議之基本路線就是這樣。

根據上述各點，也應當改變黨在鄉村中的領導方法。

我們黨內有人斷定說，新經濟政策既然存在，而資本主義又開始暫時穩定，那末我們的任務是在實行盡量壓制的政策，在黨內是如此，在國家機關內也是如此，使四方八面均感覺到這點。同志們，我應當說，這個政策是不正確的和致命的政策。現在我們所需要的不在盡量壓制，而在盡量靈活，在政策上是這樣，在組織上也是這樣，在政治的領導上應該盡量靈活，在組織的領導上也應當盡量靈活。在現在複雜的條件之下，沒有靈活的政策我們是不能操縱自如的。我們需要盡量靈活，以便保持黨的操縱自如，以便保證黨有充分的領導。

其次，必須使共產主義者在鄉村中放棄一切畸形的行政手段。對於農民不能祇限於一種命令的方法。應該耐煩的對農民解釋他們所不瞭解的問題，使農民心悅誠服，做這種事的時候不要怕犧牲時間和精力。我們中間有些作領導工作的人，時常是發號施令以了事，這當然是要容易得多簡單得多。然而不是一切簡單而容易的事都是好的。不久以前有一個鎮委書記答覆省委代表所提出的該鎮缺乏報紙的問題，他說：「我們何必要報紙呢？沒有報紙，倒還安靜和妥當些，不然農夫們一經閱報，他們又要質問一切，麼煩極了。」這個書記也稱為共產主義者哩！實在不待證明，這不是共產主義者，而是一個不幸的東西罷了。同志們，事實上現在要實行領導，非有「麻煩」不可，若沒有報紙，那就更是不行。倘若我們想保持黨和蘇維埃政權在鄉村中的領導，就必須瞭解和領會這個簡單的道理。

其次，現在要實行領導，必須善於管理經濟，必須知道和瞭解經濟。現在祇會高談「世界政治」，狂論張伯倫和麥克唐納，是做出大事來的。我們正逢經濟建設的時間。因此，祇有瞭解經濟的人，祇有善於在經濟發展方面向農夫作有益忠告的人，祇有善於扶助農夫經濟建設的人，他才能領導。研究經濟，與經濟相接觸，無微不至的參加經濟建設，便是現在共產主義者在鄉村中的任務。沒有上述的能力，領導一事簡直不要夢想好了。

現在不能照舊有方式領導了，因為農民的政治積極性已經提高了，連使這種積極性表現於蘇維埃的形式中，使牠經過蘇維埃，不要越過蘇維埃。誰能在鄉村中撮作蘇維埃和使鄉村的農民積極份子團聚在黨的四周，他就可以做領導工作。

現在不能照舊有方式領導了，因為鄉村經濟上的積極性已經提高了，應使這個積極性表現於協作制的形式中，使牠經過協作制，不要越過協作制。誰能在鄉村中培植協作制的社會系統，他就可以做領導工作。

一般講來，鄉村中黨底領導的具體任務，就是這樣。

六 論五金工業

現在來說一說我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所討論的最後一部份的問題。

在我們的經濟的發展中所謂新的和特別的現象，究竟在什麼地方呢？

所謂新的和特別的現象，就在我們的經濟實際上的發展超過了我們的經濟計劃，我們的經濟計劃原來是不充分的，且往往趕不上經濟的實際發展。

我們的國家預算案就是這個事實明顯表現之一。你們知道，在半年的時期中，我們曾不得不三次變更我們的國家預算案，因為我們預算案收入的部份迅速的增加了，這種增加在我們預定的收支數中是沒有估計到的。換言之，我們預定的收支數和我們預算案的計劃趕不上國家收入的增長，所以國家的金庫中有餘剩的數目。這就是說，我們國家的經濟生活的本身有無可抑制的上升力，把所有我們的財政專家的科學計劃完全推翻了。這就是說我們經濟的勞動的強有力的增長，不下於（要是不能勝過的話）美洲南北戰爭以後的美國經濟的增長。

我們經濟生活中這個新的現象最明顯的表現即為我們的五金工業的發展。去年金屬的生產等於戰前的盧布一萬萬九千一百萬盧布。去年十一月，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的年度計劃，其數目等於戰前盧布二萬萬七千三百萬盧布。本年正月，這個計劃因為與五金工業實際上增長的速度不相適應，有所變更，其數目竟達到三萬萬一千七百萬。到本年四月，這個擴充的計劃，又不切實際了，因此又把這個計劃定為三萬萬五千萬的數目。現在看來這個計劃又有缺點了，因此必須再行擴充，現在要定為三萬萬六千萬至三萬萬七千萬。

換言之，本年五金工業的生產，比之去年的生產，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至於我們的輕工業偉大的發展，運輸的發展，燃料工業的發展等等，我再不多說了。

所有這些表示什麼呢？即是說，在整頓工業（社會主義基本的基礎）的意義上，我們的發展已經走到廣闊道路上了。至於說構成一切工業基本關鍵的五金工業，則它的停滯時期已經過去了。我們的五金工業有完全向上發展的把握，有充分興榮的把握。謝爾仁斯基同志說得對，我們的國家可以和應當成爲五金工業的國家。

這個事實，對於我們國家內部的發展，以及對於國際革命，均有莫大的意義，這是用不着證明的。

從內部發展的觀點來說，我們五金工業的發展，我們五金工業的增長，其意義非常之大，這是毫無疑義的，因爲我們工業的增長即是表示我們一切經濟的增長，因爲我們的五金業是一切工業的基本基礎，因爲若無五金工業強有力的發展，無論輕工業、無論運輸、無論燃料、無論電氣化、無論農業，均不能有強固基礎。五金工業的發展，即是一切工業發展的基礎和一般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

請閱列寧關於『重工業』所說的話，所謂重工業，列寧主要的是指五金工業而言。

『我們知道，要拯救俄羅斯，不特在農民經濟中要有豐富的收穫，——這還是不夠的——不特在供給農民消費品的輕工業中要有優良的情況，——這也還是不夠的，——我們還要有重工業。要使重工業有優

良的情況，就必須經過數年工作。」

列寧又說：

『若不拯救重工業和恢復重工業，我們就不能建設任何工業。沒有重工業，我們終是要死亡而不能成為獨立的國家。』（列寧全集十八卷、下冊，九五頁）

說到我們五金工業的發展之國際意義，那末可以說是無量的。因為，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五金工業的發展，難道不是直接證明，無產階級不特能破壞舊的而且能建設新的嗎？難道不是直接證明，無產階級能用自己的力量，建設新的工業和自由的沒有人剝削人的制度的社會嗎？但在事實上證明這點，而不是從書本上去證明這點，——這就是說，一定地和徹底地促進世界革命事業向前發展。

西歐的工人們來參觀我們的國家，這不是偶然的。這個參觀對於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實有莫大的鼓動和實際的意義。凡來到我們國家的工人們，遍視我們工廠和作坊的一隅一角，不肯輕忽，這一個事實，證明他們不相信書本上的話，而願意根據切身的經驗來信服無產階級建設新工業創造新社會的本領。當他們相信這一點的時候，則世界革命事業的前進，將一躍千里了，這是我們可以深信的。

列寧說：

『現在我們影響世界革命主要的方法，就是我們自己的經濟政策，一切的人都注視蘇維埃俄羅斯共和國，世界各國一切勞動者（沒有一個例外，亦並沒有絲毫的誇大）無不注視這個過程，在這方面鬭爭已經轉移到全世界的範圍中了。我們一解決這個任務，——則我們在國際範圍內便一定地和完全地得了勝利。因此，經濟建設的問題，對於我們有十分特殊的意義。在這個戰線上，我們應該緩慢地和逐漸地，——迅速是不行的，——但是一直地上昇和前進，來保持我們的勝利。』（列寧全體第十八卷，上冊，第二八二頁）我們一般工業的進步，尤其是五金工業的進步，其國際意義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約有四百萬的產業無產階級。這當然是很少的。可是要建設社會主義和建立我們的國防以恐嚇無產階級的敵人，這也算是可以了。然而我們不能和不應當以此中止。我們要有一千五百萬至二千萬的產業無產者，我們國內主要的區域應當電氣化，農業要協作化和要有極發展的五金工業。到那時候，我們就不怕任何的危險了。到那時候，我們在國際範圍內就得着勝利了。

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歷史意義，就在牠清楚的指出了達到這個偉大目標的道路。
這條道路是正確的，因為這是列寧的道路，使我們完全勝利的道路。

我黨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工作的總結，大概如此。

俄國共產黨（布）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工作底總結
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三三年

斯大林論蘇聯底內部形勢

——摘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八日『聯共（布）中央

在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

現在我來講中央工作報告底第二部份。這一部份涉及到我國底內部形勢以及中央對於與內部形勢有關的諸問題的政策。我要引用若干數字。雖然數字最近在報上公佈的不少，但是沒有一些數字，可惜是不能說明的。

一 國民經濟全貌

在談到數字之前，讓我先來說明一下，決定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的若干一般論題（我

想從經濟開始)。

第一個論題。我們是在資本主義包圍底環境下進行工作與建設的。這就是說，我們的經濟與我們的建設，將要在我們經濟體系與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之間的矛盾中、衝突中發展的。這種矛盾，我們無論如何是不能避免的。這就是一種範圍，在這種範圍底境界裏面，應當進行兩種體系底鬭爭，社會主義體系與資本主義體系底鬭爭。此外，這就是說，我們的經濟不僅應當在對外與資本主義經濟底對立中來建設，並且還應當在我國內部各種不同成份底對立中，在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底對立中來建設。

由此得出結論：我們應當這樣的來建設我們的經濟，就是要使我們的國家不變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底附屬物，使它不包括在資本主義發展之總體系以內而成為它的補助企業，使我們的經濟不是作為世界資本主義底補助企業發展起來，而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單位發展起來，這個單位主要是依靠於國內市場，依靠於我們工業與我國農民經濟底聯合。

有兩條總路線：一條是從下面一點出發，就是我們的國家應當還很久地是一個農業國，應當輸出農業生產品，輸入裝備，應當堅持這條道路並應當循着這條道路向前發展。這條路線，在本質上是要求壓縮我們的工業。它不久以前在沙寧底提綱中得到了自己的表現（也許有人已在經濟

生活上讀過了它們)。這一條路綫將引導到這種地步，就是我們的國家從不能或幾乎從不能真正地工業化起來，我們的國家，從一個依靠國內市場的經濟上獨立的單位，應當客觀上變成資本主義總體系底附屬物。這一條路綫，是表示對我們建設任務之拋棄。

這不是我們的路綫。

還有另外一條總路綫，它是從下面一點出發，就是我們應用盡一切力量，使我們的國家成爲一個在經濟上自主的、獨立的、奠基於國內市場的國家，這個國家可作爲吸引其他一切漸漸脫離資本主義而流入社會主義經濟軌道的國家到自己方面來的中心。這一條路綫要求我們工業底最大限度的展開，但是要依我們所有的資源而轉移，和與之相適應。它堅決地反對把我國變爲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附屬物的政策。這是我們的建設路綫，它是黨在現在將來都要採取的路綫。祇要資本主義包圍一天，這一條路綫，是必須遵守的。

但是當革命在德國或法國或在兩國同時勝利的時候，當在那裏在更高的技術基礎上開始社會主義建設的時候，那便是另外一回事了。那時，我們就由把我們的國家變爲獨立經濟單位的政策，轉向把我們的國家包括在社會主義發展底總軌道的政策。但是祇要這種情況一天還沒有發生，那末對我們國民經濟之一種最低限度的獨立，對我們便是絕對必要的，如果沒有這種最低限

度的獨立，我們便不可能保持我們的國家免於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經濟的從屬。

第一個論題就是如此。

第二個論題。像第一個論題一樣，我們應作為我們建設指南的第二個論題，就在於我們每一次都要考慮到我們對於國民經濟之領導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領導之特點。在資本主義國家那裏，是私人資本統治着，在那裏，個別資本主義托拉斯、新迪加、這些或那些資本家集團所犯的錯誤，都是由市場底自發性來矯正的。生產的太多了——便發生危機，但在危機之後，經濟又走入常規。輸入太多而成了入超——就發生匯兌率波動、通貨膨脹、輸入縮減、輸出增高。這都是以危機方式進行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沒有一個稍微重大的錯誤與稍微重大的生產過剩，或生產與全部需要額之嚴重脫節，不是由於失策、錯誤與脫節因某次危機未被改正而發生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人們就是這樣生活的。但是我們却不能這樣生活。在那裏，我們看到經濟的危機、貿易的危機、金融的危機，這些危機都要撞動個別資本家集團。在我們這裏——却是另外一回事。我們貿易上、生產中的每一嚴重的停滯，我們經濟中的每一嚴重的失算，並不是以某種危機而結束，而是打擊着整個國民經濟。每一危機，不論是貿易的、金融的、工業的，在我們這裏都能變成打擊全部國家的總危機。因此要求我們在建設時要有特別的慎重與銳敏。因此，在我們這

裏，就應當以計劃的方式來領導經濟，要使失算少些，要使我們的對經濟的領導最銳敏，最有預見，最不犯錯誤。但是，同志們，可惜，我們既不長於特別的銳敏，既不長於特別的預見，也不長於特別的不犯錯誤的領導經濟的才能，我們大家祇是正在學習建設，所以我們就會常有錯誤，並且今後還會有的。因此我們應當有後備力量地去建設，我們必需有能够彌補我們錯誤的後備力量。最近二年來，我們全部工作表明，我們既不能保證沒有意外，也不能保證沒有錯誤。在鄉村經濟方面，我們的很多事情不僅依賴於我們的經營方法，並且還依賴於自然力量（歉收及其它等等）。在工業方面，有很多事情不僅依賴於我們的經營方法，並且還依賴於國內市場，而國內市場我們還是沒有掌握的。在對外貿易方面，很多事情不僅依賴於我們，並且還依賴於西方資本家底品行，並且我們的輸出與輸入愈是增長，則我們便愈是依賴於資本主義的西方，便愈是受到敵人方面打擊的傷害。爲了保證自己避免所有這些意外與不可避免的錯誤，我們就得領悟必需積累後備力量的思想。

我們不能保證避免農業方面的歉收。因此，需有後備力量。我們不能保證在發展我們工業方面避免國內市場的意外。我就不用再說，我們是靠自己向所積累的資金來生活的，所以我們在這些所積累下來的資金底開支上，應當特別節省與節約，盡力使每一戈比都用得合理，即投入在每

個特定時期所絕對必需發展的這種事業中。由此必需有用於工業的後備力量。我們不能保證在對外貿易方面沒有意外（暗中的抵制，暗中的封鎖及其它等等）。由此必需要有後備力量。

我們可以將農業信貸放款額增加一倍，但這樣一來，就沒有資助工業的必要的後備力量了，工業在其發展上便要遠遠落後於農業，製造品底產量便要縮減，並造成製造品價格之飛漲以及由此而來的一切後果。

對發展工業可以投下一倍多的支出，但是因為游資的很大缺乏，這是一種我們不能支持的這樣快的工業發展速度，在它的基礎上我們一定要失敗的，至於因此而沒有後備力量來進行農業信貸一點，那就不用說了。

爲了使工業底發展以迅速的速度向前推進，可以把我們的入口貿易，主要是裝備底輸入，比現有的向前發展一倍以上，但是這會引起輸入超過輸出，形成入超的貿易差額，我們的外匯就會被破壞的，就是說，那祇有在其工業之計劃辦法與發展才有可能的基礎，就會被破壞的。

不顧一切，不注意國內市場底狀況，可以儘量地推進出口貿易，但這必然會在城市裏引起大的紛亂，就是說，會使農業生產品底價格迅速上漲，因而使工資受到損害，並造成某種人爲的組織性的飢荒及由此產生的一切結果。

可以把工人底工資不僅儘量提高到戰前水平，並且還可以超過戰前水平，但是這種情況會引起我們工業發展速度之降低，因為在我們的條件下，在外無借款、在沒有信貸等等情況下，工業之發展，祇有在積累若干利潤底基礎上才有可能，這種利潤是資助工業與扶持工業所必要的，但是，如果我們將提高工資底速度弄得太快了，那末，相當重大的積累就沒有可能了。諸如此類很多。這就是應該作為我們建設工作的火把與燈塔的兩個基本的指導性的論題。

現在讓我們來舉一些數字。

不過，還要等一下。在我們的經濟體系中，我們還有點參差不齊，——整整五種結構。有一種經濟結構幾乎是自然的：這就是農民經濟，其產品底商品性是很小的。第二種經濟結構是商品生產底結構，在這裏農民經濟中的商品性起着決定性的作用。第三種經濟結構是私人資本主義，它並沒有被殺死，它復活了，並且將來在某種限度以內還要復活的，祇要我們的新經濟政策存在一天。第四種經濟結構是國家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是我們所允許的，並且我們有可能按照無產階級國家所願望的加以監督與限制。最後，第五種結構是社會主義的工業，也就是我們的國營工業，在這裏在生產中出現的不是兩個敵視的階級——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而是一個階級——無產階級。

關於這五種結構，我說了兩三句話，因為沒有這兩三句話，便難以瞭解我要舉的那一堆數字和我們工業發展中所顯示出來的那種趨勢。並且，關於我們制度體系中的這五種經濟結構，列寧生時，曾十分詳細地說過了^①，他教導我們要善於在我們建設工作中考慮這些結構之間的鬥爭。

我願關於國家資本主義與關於按其類型說是社會主義的國營工業說兩三句話，以便消除黨內圍繞這個問題所形成的誤會與混亂。

可否把我們的國營工業稱爲國家資本主義的？決不可以。爲什麼呢？因爲國家資本主義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是一種這樣的生產組織，這裏所出現的是兩個階級：佔有生產資料的剝削階級與不佔有生產資料的被剝削階級。不論國家資本主義具有何種特殊形式，它在其本質上依然應該是資本主義的。伊里奇，當他分析國家資本主義時，首先是指租讓企業而言的。以租讓企業爲例，來看一看，這裏出現的是不是兩個階級呢？是的，出現的是兩個階級：即進行剝削並且暫時

① 見列寧論「左傾」幼稚病和小資產階級性（列寧選集中文版十三卷），一九二二年四月九日在俄共（布）莫

斯科市和莫斯科省委部書記和負責代表會議上關於糧食稅的演說，論糧食稅，俄國革命五年與世界革命之前

途等文。

譯者

佔有生產資料的資本家階級，即租讓企業所有者階級和被租讓企業所有者剝削的無產階級。在這裏，我們看不到有社會主義成份，這從下面一點即可看出來，即無人敢攔進租讓企業中去搞提高勞動生產率運動。因為大家都知道，租讓企業是非社會主義的，是與社會主義毫不相干的企業。

拿另一類企業即國營企業來說，它們是否國家資本主義的？不，不是的。為什麼呢？因為在國營企業中出現的不是兩個階級，而是一個階級——工人階級，工人階級以自己的國家為代表，佔有生產工具與生產資料，它不受人剝削，因為在企業中除去工資外，所得到的最大部份，是用於進一步發展工業，即用於改善整個工人階級之狀況了。

有人會說，這依然不是完全的社會主義，如果考慮到那在我們企業管理機關中所保存的官僚主義殘餘的話。這是對的。但是這與國營工業就類型說是社會主義生產並不矛盾的。有兩種生產類型：資本主義類型，包括國家資本主義類型在內，這裏有兩個階級，這裏，生產是爲了資本家底利潤而進行的。還有另外一種類型——社會主義的生產類型，這裏沒有剝削，這裏生產資料屬於工人階級，並且這裏企業不是爲了異己階級底利潤而工作的，而是爲了全體工人爲擴大工業而工作的。列寧也同樣說過：我們的國營企業就類型說是徹底社會主義的企業。

這裏可以與我們的國家作一類比。我們的國家也是稱爲非資產階級的國家，因爲照列寧的話

說，它是新的國家類型，是無產階級的國家類型。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的國家機關不是爲了壓迫工人階級而工作的，如一切毫無例外的資產階級國家所作的那樣，而是爲了把工人階級從資產階級壓迫下解放出來而工作的。這就是爲什麼我們的國家按其類型說是無產階級的國家，雖然，在這個國家底機關中你可以找到好多無用東西與舊日的殘餘。列寧曾宣佈我們的蘇維埃制度是無產階級的國家類型，沒有人像列寧這樣嚴厲地因它的官僚主義殘餘而責罵它。然而，他時時說：我們的國家是一種新型的無產階級國家。要把國家的類型與那些還保存在國家體系與機關中的遺跡與殘餘加以區別。同樣，必須把國營企業中的官僚主義殘餘與工業構成之類型——我們所稱的社會主義類型，加以區別。決不能說，因爲經濟機關中或托拉斯中還有錯誤、官僚主義等等，就說我們的國營工業不是社會主義的。決不能這樣說的。如果這樣，那末就自己的類型說，我們的無產階級國家，就不成爲無產階級的了。我能够舉出許多資產階級機關，它們要比我們的無產階級國家機關工作得好些和經濟些。但是這還不是說，我們的國家機關就不是無產階級的，我們的國家機關按其類型就不高於資產階級的了。爲什麼呢？因爲這種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雖然工作得好些，但是它是爲資本家而工作的，而我們的無產階級國家機關，即令它有時工作得不好，但它總是爲無產階級而工作的，反對資產階級的。

這種原則的區別是決不能忘記的。

國營工業，也可以說是如此。決不能根據我們國營企業管理機關中現有的並且將來還會存在的官僚主義底齟齬與殘餘，決不能根據這些殘餘與這些缺點，就忘記我們的企業在其本質上是社會主義的企業。在一些工作得很好的企業中，例如福特工廠裏，也許盜竊的事情較少，但是他們依然是爲福特而工作的，爲資本家而工作的，而我們的企業，有時會有盜竊事情，並且不是永遠都是事事如意，但是他們依然是爲無產階級而工作的。

這種原則的區別是決不能忘記的。

現在我們來談談有關全部國民經濟的一些數字。

農業——其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的總生產額，如果把它與戰前水平——一九一三年水平相較，已達到百分之七十一，換句話說，按戰前價格計算，一九一三年曾生產了一百二十萬萬餘盧布，而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生產了九十萬萬餘盧布。根據我們計劃機關所有的材料，預計來年一九二五—二六年度，生產額之進一步提高將達到一百一十萬萬盧布，就是說要達到戰前水平之百分之九十一。農業日益增長着，——這一結論自可想見。

工業——如果拿全部工業——國營的、租讓的和私營的都包括在內來說，一九一三年全部工

業會提供了七十萬萬盧布的總生產額，一九二四—二五年度則爲五十萬萬盧布。這是戰前水平之百分之七十一。我們的計劃機關預計，下年度的生產將達到六十五萬萬盧布，即戰前水平之百分之九十三左右。工業是在上升着。本年度它上升得比農業快些。

特別需要講一下電氣化的問題。一九二二年全俄電化委員會計劃規定，在十年至十五年之內，要建設三十個發電站，其力量爲一百五十萬基羅瓦特，價值八萬萬金盧布。在十月革命以前，發電站之力量爲四十萬二千基羅瓦特。到現時爲止，由我們所建立的發電站，其力量爲十五萬二千三百五十基羅瓦特，預計在一九二六年達到三十二萬六千基羅瓦特。如果按這種速度發展下去，那末十年之內，即大約到一九三二年（最低限度預定的期限），蘇聯電氣化底計劃將被實現。與發電站建設事業之增長並行的，是電氣工業之增長，其一九二五—二六年度の計劃，預定爲戰前水平的百分之一六五—百分之一七〇。但是，必須指出：大規模的水力發電站之建築，其所用資金與預定計劃相較，會大大超過的。例如沃爾霍夫河發電站建築之最初計劃爲二四、三〇〇、〇〇〇『試行』盧布，而到一九二五年九月，它便增到九五、二〇〇、〇〇〇金盧布，這就佔了用於建設第一批發電站的資金之百分之五十九，而沃爾霍夫河發電站之力量祇佔這些發電站力量總量之百分之三十。基莫—阿夫恰里發電站之最初計劃爲二、六〇〇、〇〇〇金盧布，而最

近的要求則爲一六、〇〇〇、〇〇〇左右金盧布，其中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左右已經用去了。

如果把國營工業和合作社工業或是二者合營的工業之生產，與私營工業之生產作一比較，便得到這樣的結果：一九二三——二四年度國營工業與合作社工業佔一年工業生產總額百分之七十六，私營工業佔百分之二十三點七，而一九二四——二五年度國營工業與合作社工業之比例爲百分之七十九點三，私營工業之比例已不是百分之二十三點七，而是百分之二〇點七了。

私營工業比重在這一時期中跌落了。預計在下一年，國營工業與合作社工業之比例將佔百分之八十左右，而私營工業將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從絕對數字看，私營工業是在增長着，但因爲國營工業與合作社工業增長得更快，所以，私營工業比重是在逐漸下跌。

事實就是如此，對於這一事實決不能不加以重視，這個事實說明：社會主義工業之超過私營工業，是一件不容爭辯的事實。

如果就集中在國家手中的財產與私營手中所有的財產來比較，那末可以說，在這一方面——我是就國家計劃委員會底統制數字——優勢也是在無產階級國家一方，因爲國家所有的資金，其總額不少於一百一十七萬萬（金盧布），而屬於私人所有者，主要是農戶的資金，其總額不多於七十五萬萬。

這是一個事實，這個事實說明：社會化的資金所佔的比例是很高的，並且這一比例與非社會化部份的財產所佔的比例比較，是正在增長着。

而我們的整個制度，依然還不能稱為資本主義的，也不能稱為社會主義的。我們的整個制度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制度，在這裏就生產總額講，還是私有的農民生產佔着優勢，可是，這裏社會主義工業所佔的比例，是在不斷地增長着。社會主義工業的比例是在如此地增長着：即這一工業，利用自己的集中性，利用自己的組織性，利用我們是無產階級專政一點，利用運輸是在國家手中，利用信貸制度與銀行都是我們的，——利用所有這一切，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它在國民生產總額中的比例，正在逐步地增長着，它在向前發展着，開始使私營工業隸屬於自己，開始使所有一切其餘的經濟結構都適應於自己並跟着自己走。農村底命運就是如此，——它應當跟着城市走，跟着大工業走。

這就是所得出的基本結論，如果提出關於我們制度底性質、關於社會主義工業在這一制度中的比例、關於私人資本主義工業比例、最後，關於小商品生產——主要是農民生產在整個國民生產中所佔比例的問題來說的話。

關於國家預算說兩句話。你們應該知道：我們的國家預算已長到了四十萬萬盧布。如果折成

戰前的盧布，那末，我們的國家預算，較之戰前時期的國家預算，則不少於百分之七十一。其次，如果在總的國家預算上，把能够計算的地方預算數目加上去，那末，我們的國家預算，較之一九一三年，就不下於百分之七十四點六。有特別意義的，在我們的國家預算中，非稅收底比重大大地高於稅收底比重。所有這一切也同樣說明：我們的經濟是正在增長着與正在向前發展着。

我們去年從國營企業與合作社企業所得的利潤問題，具有最重要的意義，因為我們是個缺乏資本的國家，是個從外得不到大量借款的國家。我們應當銳敏地注視我們的工商企業，銀行與合作社，以便知道，我們可以支配什麼去進一步開展我們的工業。一九二三—二四年度，全聯盟性的國營工業與金屬工業總管理處，似乎提供了近一萬萬四千二百萬金盧布的利潤。其中，七千一百萬已扣入國庫。一九二四—二五年度，我們已有三萬萬一千五百萬了，其中，依照計劃，將有一萬萬七千三百萬扣入國庫。

全聯盟性的國營貿易，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其所得利潤，約三千七百萬，其中，一千四百萬，已作為國庫收入。在一九二五年，由於降低物價政策，所得較少——二千二百萬。從這一數額中，將有一千萬左右算作國庫收入。

在對外貿易方面，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我們所得利潤為二千六百餘萬盧布，其中約有一

千七百萬已歸國庫收入。在一九二五年，對外貿易將提供，或更確切地說，已提供了四千四百萬。其中，二千九百萬已歸國庫收入。

根據財政人民委員部底決算，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銀行所得利潤為四千六百萬，其中，一千八百萬已作為國庫收入；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得九千七百餘萬，其中，五千一百萬已作為國庫收入。

消費合作社所得利潤，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為五千七百萬，農業合作社為四百萬。

我剛剛所引的那些數目字，或多或少都是被縮小的了。你們知道——這是為了什麼。你們知道：我們的經濟機關，為了給自己多留一些，以擴充業務，是如何計算的。如果你們覺得這些數目字是小的話，而實際上它們確是小的，那末，你們就要考慮到，它們是稍稍被縮小的了。

現在，關於我們的對外貿易額說幾句話。

如果將我們一九一三年的全部貿易額作為一百，那末，似乎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我們在自己對外貿易中已達到戰前水平之百分之二十一，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已達到戰前水平之百分之二十六。一九二三—二四年度的出口，等於五萬萬二千二百萬盧布，入口——四萬萬三千九百萬；總額——九萬萬六千一百萬；出超為八千三百萬。一九二三—二四年度，我們是貿易出

超。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出口等於五萬萬六千四百萬；入口——七萬萬零八百萬；總額——十二萬萬七千二百萬，差額——虧一萬萬四千四百萬。這一年，我們在對外貿易方面，入超一萬萬四千四百萬。

讓我在這個問題上稍微講幾句。

上一經濟年度的這種虧差，當受這樣解釋：說我們在這一年，由於歉收，運進了許多糧食。可是，我們運進的糧食，價值是八千三百萬，而這裏却是虧一萬萬四千四百萬。這一虧損將引起什麼結果呢？它將引向我們買進比賣出多，輸入比輸出多，這就使我們的支付差額成爲問題，從而也使我們的外匯成爲問題了。第十二次黨代表大會的指示說，黨無論如何要努力做到貿易出超。我應當承認，我們大家，不論是各蘇維埃機關或中央委員會，都在這裏犯了最大的錯誤，沒有執行黨給我們的指示。執行這一指示固然是困難的，但是，至低限度，在某種強制下還是可以得到若干出超。我們犯了這個重大的錯誤，大會應當糾正它。中央委員會在本年十一月的特別會議上，曾力謀糾正它，檢查了我們的入口與出口的數字，通過了一項決定：來年——我們在那裏草擬了來年我們對外貿易額之基本成份——的對外貿易出超，至低限度要達到一萬萬。這是必要的。這對於像我們這樣的國家，是絕對必要的，在我們這裏，資本少，不從國外輸入資本，或者

祇有一點點，因而這裏的支付差額，它的平衡，應當靠貿易差額來維持，以便使金盧布的外匯不要波動，以便保持外匯，從而使我們能够保持進一步發展我國工業與農業之可能。你們大家都體驗過了，什麼是外匯波動。我們不應重返這種不幸的事了，須要採取一切辦法，根除那往後可以使我們陷於外匯波動的條件下的一切因素。

有關全部國民經濟、有關個別工業與農業部門、有關社會主義工業對於別種經濟之比重、以及有關我所講過的及中央委員會所堅持的那些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領導思想之數字與見解，就是如此。

二 工業與農業

如果再就直接有關工業與農業在其現在與最近將來相互關係中的一些問題來看，那末，這些問題可以歸結為下列幾點：

第一，我們還依然是一個農業國：農業生產額比工業生產額佔優勢。工業中的基本東西，是在於它已經接近於戰前標準之界限，工業中的進一步步驟表示它在新的技術基礎上的展開，利用新的裝備，發展新的工廠建設。這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跨過這一門限，從最大限度利用我們工

業中原有的一切的政策，轉到在新的技術基礎上、在新的工廠建設基礎上建設新的工業的政策，越過這一門限，要有大批的資本。但是我們既很缺乏資本，那末往後我們工業之發展，十之八九，將不是像現在這樣快的速度了。

而農業的情況，便不是這樣了。決不能說：農業在其今日技術基礎上所有的一切可能性都已經發揮完了。農業不同於工業，它可以在一定時期，並在現有技術基礎上快速向前發展。甚至農民文化程度寫讀能力之簡單的提高，甚至像選擇這樣簡單的事情，都能把農業底總生產額提高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大家計算一下吧：這對我們全國有什麼意義。這就是還潛伏在農業中的那些可能性。這就是為什麼農業中之進一步的發展，目前還不會遇到像我們工業所遇到的那些技術上的困難。因此，今後工業平衡與農業平衡之不一致，由於農業中藏有許多內在的、還遠未利用而在最近幾年應當利用的潛在的可能性，在最近許多年中還要增長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任務何在呢？

首先在於：無論如何要發展我們的大國營工業，克服當前的困難。其次在於：發展地方型的蘇維埃工業。同志們，我們不能祇是一心去發展聯盟性的工業，因為聯盟性的工業，我們的集中的托拉斯與新迪加，不能滿足一萬萬四千萬人口底各種各樣的嗜好與要求。爲了能夠滿足這些

要求，就必須達到使每一區、每一州、每一省、每一特區、每一民族共和國的生活，工業生活沸騰起來。如不在經濟建設方面發動地方上所蘊蓄的力量，如不從區與府開始對地方工業給以各方的支持，如不發動所有這些力量，我們便不能達到列寧所說的我國經濟建設之普遍高漲，沒有這一點，沒有中央利益與地方利益的結合，我們便不能解決發動建設主動性的問題，解決全國普遍經濟高漲的問題，解決全國迅速工業化的問題。

第二，從前在燃料方面是燃料生產過剩的問題。現在，我們正在碰到燃料危機的問題，因為我們的工業，增長得比燃料快些。我們正接近於我國在資產階級制度下所處的那種水平，當時燃料是不夠的，我們會不得不從外輸入，換句話說，燃料是跟工業、跟它的需要不相適應的。由此，任務是加強發展我們的燃料經濟，改善它的技術，以便燃料在其發展上追上、能夠追上工業之發展。

第三，金屬與全部國民經濟也有若干的不相適應。如果計算一下對金屬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再計算一下金屬產量之最大限度的可能，那末，我們金屬的缺乏，要以幾千萬計。這樣，我們的經濟，特別是我們的工業，便不能向前發展了。因此，對於這一情況應加以特別的注意。金屬是我們工業基礎之基礎，應使它與工業和運輸相適應。

第四，我們的熟練勞動力是與我們的工業不適應的。一系列數字在報上公佈了，我不必列舉它們了，我祇是說：一九二五——二六年度，全國工業所需要補充的熟練勞動力為四十三萬三千人，而我們祇能供給這一需要底四分之一。

第五，我想再指出一個缺點與不適應，這就是鐵路車輛的使用率超出了一切限度。車輛工作之需要竟是如此之大，以致於來年我們使用車頭與車箱不是要達到可能性之百分之百，而是不得不達到百分之一百二十一——百分之一百三十。這樣一來，交通人民委員部底固定資本，將被過份地耗損，而我們如果不採取堅決的辦法，在最近將來就會大糟其糕。

這就是一般我們國民經濟內部，特別是工業內部所有的那些缺點與不適應，這些缺點與不適應，是應該加以克服的。

三 貿易問題

現在，讓我來講貿易問題。數字說明：在這一方面，和在工業方面一樣，與私人資本主義部份比較，國營部份之比重也在增長着。如果認為，國內貿易之總額，在戰前等於二百萬萬商品

盧布，那末，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這個總額等於一百萬萬，即戰前的百分之五十，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等於一百四十萬萬，即戰前的百分之七十。對內貿易額的一般增長是毫無疑問的。如果談到這一貿易額中的國營部份，那末就得出：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國營比例等於對內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四十五，合作社之比例為百分之十九，私人資本之比例為百分之三十五。在下一年度，即一九二四—二五年度，國營部份等於百分之五十，合作社部份已不是百分之十九，而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七，而私人資本部份，也不再是百分之三十五，而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九了。私人資本在總貿易額中之比例是在下跌着，國家與合作社之比例是在上升着。如果把貿易額分為批發與零售兩部份，這裏有同樣趨勢。在批發方面，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國營貿易所佔之比例等於全部貿易額的百分之六十二強，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為百分之六十八點九。有顯然的增加。在合作社方面，是從百分之十五增大到百分之十九。私人貿易原為百分之二十一，現在為百分之十一。在零售方面，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國家所佔之比例等於百分之十六，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幾乎等於百分之二十三。合作社在零售中所佔之比例，在去年等於百分之二十五點九，而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則等於百分之三十二點九。增長是毫無疑問的。私人資本在零售中所佔之比例，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等於百分之五十七，現在為百分之四十四點三。我們在零

售方面顯然已跨過了門限。在去年，在零售方面，私人資本曾佔優勢，在今年，是國家與合作社佔優勢了。

在原料與穀物採購方面，國家與合作社意義之增長爲：在榨油種子方面，在一九二四—二五年爲百分之六十五，在亞麻方面爲百分之九十四，在棉花方面幾乎是百分之百，在穀物方面，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爲百分之七十五，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爲百分之七十。這裏我們有一些降低。大體上講，在對內貿易方面，國家與合作社部份之增長，不管從批發與零售方面講，都是毫無疑問的。

在穀物採購方面，國家所佔之百分比雖是佔着優勢，可是，它增長得仍較去年少些，這就指出了穀物採購方面所犯的那些錯誤。問題是：採購方面的過錯，不僅是各蘇維埃機關底過錯，並且也是黨中央底過錯，因爲後者應監督各蘇維埃機關，它對各蘇維埃機關中所作的一切都負有責任。這一過錯可歸結如下：在計劃時，我們沒有考慮到，市場之狀況，採購之條件，在本年與去年前年相較，是有了一些新的和特殊的東西。本年是第一年；我們在穀物市場上不用行政上的壓力的辦法了，我們把稅務負擔，稅的壓力減到了最低限度，農民與政府代辦機關是以平等地位在市場上出現的。這些情況，沒有被我們的計劃機關考慮到，我們的計劃機關曾想到一九二六年一月

一日止要採購一年全部穀物採購的百分之七十。我們沒有考慮到，農夫亦會要手段：他把自己的通貨商品——小麥——屯放起來，以待漲價，目下寧願以出售其它不大值錢的穀物。我們沒有考慮到這一點。與此相聯繫，正在修改採購計劃，縮小出口計劃，而入口計劃也相應地減縮。出入口計劃正在修改着，計劃應當最低限度獲得一萬萬出超，可是，這個計劃還沒有最後擬出來。

四 各階級，它們的積極性，它們的相互關係

全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首先引導到工人階級物質狀況的改善，工人階級之非階級化，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工人階級之恢復與增長，是以快速進行着。這是一些數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如果計算一下各種工業內所有的工人，把小工業的，把季節性工人，把農業工人都算進去，根據勞動人民委員部的材料，我們共有五百五十萬工人，其中有一百萬僱農與七十六萬失業工人。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工人已有七百萬多，其中有一百二十萬僱農與七十一萬五千失業工人。工人階級之增長是毫無疑問的。

全部工業中每個工人的平均一月工資，以金盧布計算，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為三十五盧布，或

戰前的百分之六十二。在一九二五年九月爲五十盧布，或戰前的百分之八十八點五。有個別部門，則超過了戰前水平。每個工人的平均每日實際工資，以商品盧布計算，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爲〇·八八盧布，在一九二五年九月爲一盧布二十一戈比。全部工業中每人一個工作日之平均產量，以戰前盧布計算，在一九二四年四月爲四盧布十八戈比，而在一九二五年爲六盧布十四戈比，即戰前的百分之八十五。如果把每月的工資與勞動生產率加以比較，即看出它們是平行前進的：工資是在增長着，勞動生產率也在增長着。可是，在六月與七月，工資提高了，而勞動生產率提高得較工資爲少。其所以如此，是由於以下的原因：一是休假，一是工廠中進來了新的工人階層——半農民。

現在，開聯到了工資基金。工資基金，根據勞動人民委員部的材料（我指的是工業，與其它部門無關），在一九二三—二四年度爲八萬萬零八百萬盧布，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爲十二萬萬餘，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度預計爲十七萬萬。

同志們，社會保險基金是供何種需要用的，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就不談了。現在，讓我舉出一個總的數字，以便弄清楚一個問題：究竟無產階級國家在工人之保險事業上開支了多少。被保險者的總數，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爲六百七十萬人，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度預計爲七百萬

入。工資的平均扣除率，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爲百分之十四點六，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度預計爲百分之十三點八四。如就總額來說，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用於這一事業的爲四萬萬二千二百萬盧布，而在一九二五—二六年度預計爲五萬萬八千八百萬。也許，報告一下不是多此一舉，就是，去年所確定的那一基金當中，相當於七千一百萬的一項款額，保存在社會保險金項下了。

在農民方面，農業生產額之提高，自然不能不反映在農民人口物質狀況之改善。根據我們計劃機關之材料：農村居民之個人消費，這一消費增長之百分比，較城市居民消費增長之百分比爲高。農夫已開始吃得好些，他從自己生產中留給自己用於私人消費的部份，也比去年多的多。

無產階級國家方面對於貧農，對於災戶的幫助表現在什麼地方呢？財政人民委員部確定：對貧農的財政上的幫助，根據不完全確切的大約數字，在一九二四—二五年度爲一萬萬至一萬萬零五百萬盧布，其中，稅金與保險金的豁免約佔六千萬盧布，其次，荒災救濟基金二千四百萬盧布，信貸一千二百萬盧布。對於災戶的幫助，在一九二四年，曾包括有人口七百餘萬的區域。這一方面的全部支出爲一萬萬零八百萬至一萬萬一千萬盧布，其中，屬於國家預算方面的爲七千一百萬，屬於社會團體與銀行機關資金者三千八百萬。除此以外，還組成了用於防旱的七千七百萬基金。這就是無產階級國家對於農民中力量薄弱階層的幫助，自然，幫助是很不夠的，可是，關

於這種幫助是應該講兩句的。

工人階級與農民物質狀況之改善，這是我們建設方面向前發展所不能缺少的一些基本前提。我們看到：這些前提在我們這裏已經具備了。

關於提高羣衆積極性談幾句。我們內部形勢中的基本東西，那種迫在眼前無論如何不能逃避的東西，就是與工農物質狀況之改善相聯繫，他們的政治積極性提高了，他們已開始更批判地對待我們的缺點，更大聲地談論我們實際工作中的缺點。我們進入了一切階級及一切社會集團活躍之時期。工人階級活躍起來了，農民及其一切集團活躍起來了，新的資產階級，它在鄉村中的代理人（富農），它在知識界中的代理人，也都活躍起來了。這一事實，曾是我們政策中下述一個轉變之基礎，這一轉變之表現，就是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之決定。活躍蘇維埃之政策，活躍合作社、職工會之政策，在確定出租與僱傭勞動問題上對於農民之讓步，對於貧農之物質幫助，與中農鞏固聯盟之政策，軍事共產主義殘餘之肅清，——這一切，就是黨在農村中新方針之主要表現。至於在去年年底與今年年初我們在農村中得到了什麼，這是你們都很熟悉的。農民中間的一般不滿增長了，甚至有些地方還有暴動之企圖。這就是確定黨在農村中新方針的情況。

在提高羣衆積極性與活躍他們組織的時期，黨對待農民政策底基礎就是如此，這一政策是為

了調整農村中的關係，提高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在農村的威信，並保證無產階級及貧農與中農之鞏固聯盟。

你們知道：這一政策已完全證明了自己的正確。

五 列寧關於農民問題的三個口號

對於中農採取的方針，我們作得是否正確？新方針底原則方面是怎樣的？我們有沒有列寧在這一方面的某種指示？

人們說：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曾通過了一項關於農民問題的決議案^①，其中說：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在為奪取政權而鬭爭的時代，祇能是貧農，而中農，僅僅可以使其中立。這是對的？這是對的。列寧寫了這一個決議案，因為他指的是正在去奪取政權的黨。而我們呢，——則是已經當了政的黨。區別就在於此。在農民的問題上，在工人與農民或與農民個別階層聯盟的問題上，列寧主義有三個基本口號，這三個基本口號，是跟革命底三個時期相適應的。整個問題

① 參看列寧土地問題提綱初稿（為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起草），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十八卷。

——譯者

是在於：要正確地掌握從一個口號轉到另一個口號，從另一個口號轉到第三個口號。

從前，我們是進行資產階級革命，我們布爾塞維克，首先擬定了自己對於農民的策略，當時列寧說：與整個農民聯盟反對沙皇與地主，使立憲民主黨資產階級（即自由資產階級——譯者）中立。當時我們採用這一口號進行着資產階級革命，並且我們得到了勝利。這是我們革命底第一個階段。

過後，我們到了第二個階段，到了十月革命，這時列寧提出了一個新的口號，這個新口號是與新的形勢相適應的：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反對一切資產者，使中農中立。這一口號，對於正在奪取政權的共產黨是必要的。甚至在他們已經奪取政權、但還沒有把政權鞏固的時候，他們也不能期望與中農聯盟。中農，是觀望者。他觀望、等待，祇有當你佔了上風，趕走地主與資產者的時候，他才會與你聯盟。所以他才是中農。因此，在我們革命底第二個階段，我們已不是工人與整個農民聯盟的口號，而是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的口號了。

往後呢？往後，當我們把政權充分地鞏固了，打退了帝國主義者底進攻，並進入了廣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時候，列寧提出了第三個口號，——無產階級及貧農與中農鞏固聯盟的口號。這一口號，是唯一正確的口號，它是與我們革命底新時期，廣大建設的時期相適應的。它之所以

是正確的，不僅是因為現在可以期望建立聯盟，並且還因為在建設社會主義時，我們不僅應當運用幾百萬，而且應當運用幾千萬農村的人們。否則，便不能建設社會主義。社會主義不僅包括城市而已。社會主義是這樣的一種經濟組織，它在生產資料與生產工具社會化底基礎上把工業與農業聯合起來。沒有這兩種經濟部門底聯合，社會主義是不可能的。

列寧主義關於與農民聯盟的口號，就是如此。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上所講的，是絕對正確的，因為，當你正在奪取政權或者是還未來得及鞏固既得的政權的時候，僅可以期望與貧農聯盟，中立中農。可是，當你鞏固了自己、奪得了政權、開始了建設以及當你應當運用幾千萬人的時候，無產階級及貧農與中農聯盟，便是唯一正確的口號。

這一個從舊的『無產階級與貧農聯盟』的口號，從舊的使中農中立的口號，到與中農鞏固聯盟口號的轉變，在我們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就開始了。讓我從伊里奇在這次代表大會開幕詞中引舉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如下：

『……舊時社會主義底優秀代表者——當他們還相信革命及在理論上和思想上為革命服務的時候——會說過使農民中立，就是說，使中農即使不能變成積極幫助無產階級革命的一個社會階層，那末，至少也

使他變成一個不妨礙這一革命的、中立的、不站在我們敵人方面的社會階層。這一個對任務的抽象的、理論的提法，對於我們是完全明白的。可是這種提法是不夠的。我們已經走進了社會主義建設底這樣一個階段，這時需要具體地、詳細地規定出一種用鄉村工作經驗所考驗過的基本規則和指示，我們應當以這些規則和指示為指導，以便對中農採取鞏固聯盟底立場……」（着重點是我加的。——斯大林）

這就是黨在特定歷史時代期望與中農鞏固聯盟底政策底理論基礎。

誰要是想用列寧所寫的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底決議案來駁斥列寧這些話，——就讓他直接了當地講吧。

在理論上，問題就是如此。我們不要斷章取義地，而要整體地瞭解列寧底學說。列寧對待農民有三個口號：一個——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另一個——是在十月革命時期；第三個——是在蘇維埃政權鞏固以後。誰想用一個什麼總的口號來代替這三個口號，誰就要犯重大錯誤的。

在理論上，問題就是如此。而在實際上，它是這樣的，即在我們完成十月革命以後，在趕跑地主與把土地分給農民以後，顯然，如列寧所說的，我們多多少少使俄羅斯中農化了，現在，中農佔農村中的大多數，雖然有着分化底過程。

自然，分化是在進行着。在新經濟政策下，在特定階段上，也不能不如此。但是分化是慢慢

地進行的。不久以前我讀了一本教科書，它似乎是中央宣傳部出版的；又讀了另外一本教科書，如果我沒弄錯了的話，它是列寧格拉克黨底宣傳部出版的。如果相信這兩本教科書的話，那末就是說：在沙皇時代，貧農約百分之六十，而現在，是百分之七十五；在沙皇時代，富農約為百分之五，而現在約為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二；在沙皇時代，中農有多少多少，而現在，是比較少些了。我不想把話說得太重，但是需要說：這些數字比反革命還要壞些。一個按馬克思主義想問題的人，怎麼會弄出這種玩藝，並且還印出來，還印在教科書裏？我是中央委員之一，自然，我對於這一無比的疏忽也負有責任。如果在沙皇時代，曾實行培植富農的政策，曾存在土地私有制，曾存在土地動員（使分化特別尖銳），如果當時的政府曾是這樣完全急於使農民分化的政府，而貧農還不過百分之六十，那末，在我們的政府之下，在蘇維埃的政府之下，這時，土地私有制沒有了，就是說，土地不能買賣了，因而，存在着對分化的障礙，我們從事徵收富農已有兩年，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放棄徵收富農的一切方法，我們現在正在實行一種不利於分化的特別的信貸與合作社政策，怎麼能夠發生在所有這些障礙之下，我們這時的分化好像比沙皇時代更大，富農與貧農似乎比過去還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怎麼能說出這種荒謬的話呢？這簡直是一種笑柄，一種不幸，一種悲哀（笑聲）。

關於中央統計管理局在六月所作的不幸的糧秣差額統計，也可以這樣說。根據這一統計：富農所有的商品剩餘似乎是百分之六十一，貧農——一無所有，而中農——便是餘下的百分數。這裏可笑的，是過了幾個月後，中央統計管理局又得出了另一個數字：不是百分之六十一，而是百分之五十二。而不久以前，中央統計管理局供給的數字，又不是百分之五十二，而是百分之四十二了。怎麼，難道能够這樣地計算嗎？我們相信，中央統計管理局是科學之堡壘。我們認為：沒有中央統計管理局底數字，無論那一個管理機關，都是不能計算與計劃的。我們認為：中央統計管理局應當供給客觀的、擺脫任何成見的材料，因為使數字適合於某一成見的企圖，是一種刑法律質的犯罪。可是，如果中央統計管理局自己就停止相信自己的數字，今後還怎麼能够相信它的數字呢？

扼要地說，我們土地革命的結果，既使農村中農化，中農既構成農村中的多數，儘管有分化過程，而我們的建設工作與列寧的合作計劃正要求吸收農民底基本羣衆來參加這一事業，那末，同中農聯盟的政策，便是新經濟政策條件下唯一正確的政策。

問題底實際方面，就是如此。

請看一下，列寧在論證新經濟政策時怎樣規定了我們的任務。我眼前放着列寧所寫的論糧食

（視小冊子底草案，在這裏他簡單明瞭地說明了基本的領導路線。

『現在，增加生產品正成爲（已成爲）中心。試金石……因而，在農業中要「依靠」中農。辛勤的農民——是我們經濟高漲底「中心人物」。』（全集第二十六卷，三二一—三二三頁）

因之，在農業中依靠中農，辛勤的農民是我們經濟高漲底中心人物，列寧在一九二一年是這樣寫的。

同志們，這種觀念曾作了我們黨四月第十四次代表會議上所通過的那些決定與那些對農民的讓步之基礎。

四月第十四次代表會議底決議，對於中央委員會在十月所一致通過的關於在貧農中間工作的決議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因爲它也一致地通過了第十四次代表會議的決議？在中央委員會十月全會上，擺在我們面前的基本任務，是不讓破壞我們在四月代表會議上所製定的政策，即與中農鞏固聯盟的政策，所以要不讓破壞這種政策，是因爲我們在黨內可以看出一些情緒，這些情緒認爲：與中農鞏固聯盟的政策是不正確的，或者是不能接受的。同樣，還可以看出一些情緒，即認爲與中農鞏固聯盟的政策好像意味着忘掉貧農，好像是有誰經過貧農頭頂去努力建立與中農的鞏固聯盟。同志們，這是愚蠢的，但是這是事實，因爲這些情緒確是有的。當我們開十月全會的

時候，貧農的問題是否對於我們提出了什麼新的東西？自然，是沒有的。祇要一天有貧農，我們就應當與貧農聯盟。從一九〇三年起，從第一次出現列寧小冊子告貧農書的時候起，我們就知道了一這一點。祇有在農村中依靠貧農，那我們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我們才是共產主義者。還更能依靠誰呢？這一問題並不是新問題，無論是在四月，無論是在十月，無論是在代表會議上，無論是在中央全會上，它對於我們都沒有構成也不能構成什麼新的東西。如果說不管怎樣總是出現過貧農的問題，那末，它是因蘇維埃改選期間我們所積下的經驗而出現的。結果如何呢？把蘇維埃活躍起來了。開始培養了蘇維埃民主。可是爲了什麼呢？要知道蘇維埃民主——這就是說工人階級底領導。要知道，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底領導，那末任何蘇維埃的民主都不能稱爲真正蘇維埃的民主與真正無產階級的民主。什麼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蘇維埃民主呢？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應該在農村裏有自己的代理人。這些代理人應該由誰構成呢？由貧農底代表。當我們活躍蘇維埃的時候，貧農處於怎樣的地位呢？是處在一種最支離破碎、最散漫的狀態中。不僅一些貧農份子，並且一些共產黨員，也都覺得放棄徵收富農與放棄行政上的壓力，就是放棄貧農，就是忘掉貧農底利益。於是不是與富農進行有組織的鬭爭，而是無聊的埋怨了。

要克服這些情緒，須要作些什麼呢？第一，必須執行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所提出的任務，即

確定對貧農所作物質幫助底條件、方式與辦法。第二，必須提出組織特別的貧農團或貧農小組的口號，以便在蘇維埃選舉、合作社選舉時，進行爭取吸引中農與孤立富農的公開的政治鬭爭。

這正是莫洛托夫同志在其關於貧農中間工作的提綱中所作的供獻，這一提綱是他自己在中央農村委員會裏三個月工作的結果，並由中央十月全會所一致批准的。

看吧，中央十月全會的決議是第十四次代表會議決定底直接繼續。

第一，必須具體地提出物質幫助的問題，以提高貧農底物質狀況；第二，必須提出組織貧農的口號。這種新的東西，是完全屬於莫洛托夫同志的，這是他的思想——組織貧農團的口號。

爲什麼組織貧農團底口號是需要的呢？它之所以需要，是爲了消滅貧農底散漫性，並使他們有可能在共產黨人底幫助下組織成爲獨立的政治力量，這一政治力量可以成爲無階級在農村反富農鬭爭中、爭取中農鬭爭中的有組織的支柱。貧農還依然充滿着依賴心理：他們希望於國家保安部，希望於政府當局，希望於他們所想希望的一切，祇是不希望於自己，不希望於自己的力量。這種被動性與依賴心理，應當從貧農底意識中拔除掉。必須向貧農提出口號，要他們最後用自己的腳站立起來，要他們在共產黨底幫助下和在國家底幫助下組織成爲團體，在蘇維埃底舞台上，在合作社底舞台上、在農民互助委員會底舞台上、以及在農村社會性活動底一切舞台上學習與富農進

行鬭爭，但不是用向國家保安部呼籲的方法去鬭爭，而是用政治鬭爭的方法，用有組織的鬭爭的方法去鬭爭。祇有這樣才能够鍛鍊貧農，祇有這樣才能够組織貧農，也祇有這樣才能够把貧農造成無產階級在農村中的支柱，而不是依賴團體。

這就是爲什麼在十月曾提出了關於貧農的問題。

六 關於農民問題的兩種危險與兩種偏向

與農民問題相聯繫，我們黨內出現了兩種偏向。小視富農危險底偏向與誇大富農危險並小視與低估中農作用底偏向。我不是說，這些偏向對於我們是什麼致命的危險，偏向是偏向，偏向是一種還未定型的東西。偏向是錯誤底開始。或是我們讓這一錯誤發展下去，——那時事情就糟了；或是我們把這一錯誤從根剷除，——那時危險也就被消滅了。偏向是某種錯誤的東西，如果你不即時制止，它過後將要產生後果的。

關於輕視富農危險說兩句話。有人說是富農偏向。自然，這是愚蠢的。黨內不能有富農偏向。這裏所說的不是富農偏向，而是輕視富農危險底偏向。即使還沒有成了這種偏向犧牲品及站

在這種偏向基礎上的，但是他們總會出現的，因為我們的發展是在走向資本主義若干復活的面，而資本主義底復活，不能不在我們黨底周圍產生混亂。另一方面，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在發展着，它與私人資本之間的鬭爭正在進行着。誰將超過誰呢？現在，優勢是在社會主義成份方面。我們將使富農與城市的私人資本家服從自己。可是事實總是事實：富農在增長着，我們在經濟上還遠沒有粉碎他。富農正在積蓄力量，這是不可爭辯的，誰要是不注意這一點，硬說這是小事情，說富農是草菅陸，誰就使黨在危險面前喪失警覺性，在與富農鬭爭中，與資本主義鬭爭中被解除武裝，因為富農是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代理人。

有人在說鮑古雪夫斯基。自然，他並不是富農偏向。他是輕視富農危險底偏向。如果他是富農偏向，他便應該被開除出黨。可是到現在為止，好像無論誰，據我所知，都沒有要求把他逐出黨去。這一種偏向——輕視農村中富農危險底偏向——是妨礙黨能夠處於經常準備鬭爭狀態中的偏向，它使黨在與資本主義成份鬭爭中解除武裝，這一種偏向：大家都知道，已被黨中央底決定所叱責了。還有另一種偏向——誇大富農危險，在富農危險面前驚慌失措、狼狽不堪的偏向：「富農起來了，救救吧！」。怪事！人們在實行新經濟政策時，就知道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之復活，富農之復活，就知道富農必然要抬頭的。而現在富農一出頭，却喊叫「救救」，昏了腦袋。並且黨

惶迷亂達到如此地步，以致把中農忘記了。可是，現在農村中的基本任務，就是爭取中農，使中農脫離富農，與中農建立鞏固聯盟，孤立富農。關於這一點，那些在富農危險面前驚慌失措的同志們常常忘記了。

我認爲，如果探求出這兩種偏向底根源，那末，把它們可以歸結於如下幾種出發點：

第一種偏向在於小視富農與農村中一般資本主義成份底作用，在於掩蓋富農底危險。它是從一個不正確的假定出發的：認爲新經濟政策底發展不是導向農村資本主義成份底復活，富農與一般資本主義成份正在脫離或已經脫離了我們而進入歷史領域，農村中的分化沒有在進行，富農——這是過去底餘波，是草菅蕩，祇是如此而已。

這種偏向導引到什麼結果呢？

在事實上，這種偏向導引到農村中階級鬭爭之否定。

第二種偏向在於誇張了富農與農村中一般資本主義成份底作用，在於在這些成份面前驚慌失措，在於否定無產階級及貧農與中農鞏固聯盟是可能的與合目的的。

這種偏向是從下面一點出發：好像我們農村中是正在進行着資本主義之單純的恢復，這一資本主義恢復的過程是一種吞沒一切的過程，全部或絕大部份包攬了我們合作社的過程，在這種發

展底結果，農民分化一定不斷地大規模地增長起來，兩端的集團，即富農與貧農，一定逐年加強與增長起來，而中間集團，即中農，一定要逐年削弱與洗刷掉的。

在事實上，這種偏向導向農村中階級鬭爭之燃燒起來，導向貧農委員會的徵收富農政策之回復，導向我國內戰之宣佈，這樣一來，也就導向我們全部建設工作之破壞，因而也就導向列寧吸收千百萬農戶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體系的合作社計劃之否定。

你們要問：那一種偏向更壞呢？決不能這樣提問題的。無論是第一種偏向，或是第二種偏向，兩者都是一樣壞的。如果這兩種偏向都發展起來，那末它們就都能够瓦解和使黨滅亡的。幸而，我們黨內有着能够打破無論第一種和第二種偏向的力量（鼓掌）。雖然兩種偏向都是壞的，提出二者之中那一種更危險的問題，也是愚蠢的，但是有另一種觀點，須要從這種觀點上處理這兩種偏向。黨是在反對那一種偏向的鬭爭中最有準備呢？——是在反對第一種偏向的鬭爭中，還是反對第二種偏向的鬭爭中？——這就是如何須要實際地提出問題。兩種偏向都是危險的，兩種都是壞的，不能說其中那一種是更危險些，可是講到在反對那一種偏向的鬭爭中黨最有準備——是可以的，也是必需的。如果給共產黨員們提出一個問題：黨準備更多地幹什麼，——是準備剝去富農底衣服呢，還是不做這個，而是去與中農聯盟，我想，一百個共產黨員中有九十九個將說：黨最有準備並走向

這一口號：打擊富農。祇要一提出這一口號，——瞬間就會把富農底衣服剝光。可是要說到不做收富農，而是進行經過與中農聯盟以孤立富農的複雜麻煩的政策，那末，這件事情就不是這樣容易消化了。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認為：黨在自己反對兩種偏向的鬭爭中依然應當集中火力於同第二種偏向作鬭爭（鼓掌）。無論何種馬克思主義或列寧主義，都不能掩蓋富農是危險的這一論題。富農總是富農。他是危險的，不管鮑古雪夫斯基是如何背誦草莽薩。不論用任何引證，都不能動搖共產黨員的這種認識。可是必須同中農鞏固聯盟的這一論題，因為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決議案中寫過中立中農的話，就常常可以用列寧主義、用馬克思主義底詞句把它掩蓋與塗抹起來。這裏可以引證的地方多得很：凡想使黨混亂，凡想使黨看不見真理，凡想使黨看不見列寧關於農民問題不是一個口號而是三個口號的真理的人，在這裏活動的舞台寬得很。在這裏，關於馬克思主義可以作出各種各樣的竄改。正是因為如此，所以必須集中火力於反對第二種偏向的鬭爭。

關於蘇聯內部形勢、關於它的經濟、關於工業與農業、關於各階級、關於各階級底積極性、關於活躍蘇維埃、關於農民以及其它等等的問題，就是這樣。

關於正在生長與力圖逃避黨底領導但是自然不能成功的國家機關底一些問題，我不詳細說了。

關於我們國家機關底官僚主義，我也不說了，我不說了，因為那會使我的報告拉得太長。我

不說這一點了，因為這一問題對黨不是什麼新的問題。

七 黨底任務

現在來談黨在對內政策方面的任務。

在發展全部國民經濟方面，我們應當根據下列方針進行工作：

- (1) 進一步增大國民經濟底生產品；
 - (2) 把我們的國家從農業國變為工業國；
 - (3) 保證國民經濟中社會主義成份比私人資本主義成份佔決定性的優勢；
 - (4) 保證蘇聯國民經濟在資本主義包圍環境中必要的獨立；
 - (5) 增大非稅收在國家預算總體系中的比重。
- 在工業與農業方面根據下列方針進行工作：
- (1) 在提高技術水平底基礎上發展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提高勞動生產率，減低成本，增大資本流轉底速度；

中。

在貿易方面根據下列方針進行工作：

- (1) 進一步擴大與在質量上改善商品輸送網（各種合作社、國營貿易）；
- (2) 最大限度地增大商品流轉底速度；
- (3) 減低零售價格與進一步提高蘇維埃合作貿易對於私人貿易之優勢；
- (4) 在所有採購機關中建立統一戰綫與硬性的採購紀律；
- (5) 增強與國外的商品流轉，同時保證出超，即積極的支付差額，這是衛護硬幣之最必要的條件與避免通貨膨脹的必要保證。

在計劃辦法方面，從務必保證必要的後備力量的方向上來進行工作。

順便，關於後備力量底來源之一——酒，說兩句話。有這樣的人，他們認為：可以戴着白手

套來建設社會主義。同志們，這是極大的錯誤。如果我們沒有借款，如果我們缺乏資本，如果，除此以外，我們不能受西歐資本家底奴役，不能接受那些他們提議而經我們拒絕的奴役條件——那末，就祇剩下了一條路：在其它方面尋找來源。這總比奴役好一些。這裏就必須在奴役與酒之間來選擇，而那些認為可以戴着白手套建設社會主義的人，是大大錯誤了。

在各階級底相互關係方面，根據下列方針進行工作：

(1) 保證無產階級及貧農與中農底聯盟；

(2) 保證無產階級在這一聯盟中的領導；

(3) 在政治上孤立與在經濟上排擠富農與城市資本家。

在蘇維埃建設方面，根據與官僚主義進行堅決鬭爭底方針，根據吸引工人階級廣大羣衆參加這一鬭爭底方針進行工作。

我想關於新的資產階級及它的思想家們——目標轉換派，說兩句話。目標轉換派——這是日漸增長並逐漸與富農和在職知識份子相結合的新的資產階級底意識形態。新的資產階級提出了自己的意識形態，即目標轉換派的意識形態，這種意識形態在於：據它的意見，共產黨一定要脫化，而新的資產階級一定要鞏固起來，並且對我們不知不覺地，我們布爾塞維克一定走到民主共

和國底門限跟前，然後靠着從軍人或官僚中選拔出來的什麼「凱撒」，跨過這一門限，我們一定要陷於普通資產階級共和國底地位。

這就是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它力圖愚弄我們的在職知識份子，並且不僅愚弄我們的在職知識份子，同樣還要愚弄與我們靠近的一些集體。我不打算駁斥我們黨蛻化的論據了。這種愚弄是不值一駁的。我們的黨現在沒有蛻化，並且將來永遠也不會蛻化的。它不是用還要蛻化的材料粘起來的，也不是用還要蛻化的人鍛鍊成的（鼓掌）。我們的幹部，不論是年青的與年老的，都在思想上漸漸長成了。我們印出了幾版列寧全集，這是我們的幸福。現在，人們都在讀、在學，並開始理解了。不僅黨的領導者，並且一般黨員，也都開始理解他們應當提高警惕心了。關於蛻化的叫喊，你吓唬不住誰了。人們自己會辨別是非了。他們可以隨便叫喊，他們可以隨便用什麼引證吓唬人，可是一個普通黨員都會聽取和辨別了，因為他們現在有了列寧的著作在手了（鼓掌）。

這一事實，是我們黨將不會離開列寧主義道路底基本保證之一（熱烈的鼓掌）。

如果不管怎樣我還是講了目標轉換派，那末，這是爲了用兩句話回答那些期待我們黨和我們中央蛻化的人們。烏斯特拉洛夫——就是這種意識形態底著作者。他是在我們運輸部門服務的。據說他服務得很好。我想，如果他是在好好地服務，那末，就讓他去幻想我們黨底蛻化吧。我們

是不禁止人幻想的。讓他自己儘量去幻想吧。但是要讓他知道：在他幻想蛻化時，他應當同時向我們布爾塞維克的磨坊中運水，否則，他將會倒霉的（鼓掌）。

斯大林論新經濟政策及國家資本主義

——摘自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關於聯共（布）

中央在第十四次大會上政治報告的結論」——

（前略）

一 論新經濟政策

新經濟政策問題。在克魯卜斯加雅同志關於新經濟政策問題所發表的意見中，我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她說：「新經濟政策實際上就是在某種條件之下所許可的資本主義，是鎖在無產階級國家鎖鏈上的資本主義。」這句話對不對呢？可以說它是對的，也可以說它是不對的。我們把資本主義鎖在鎖鏈上，而且它生存一天我們就要鎖它一天，這是事實，這是對的。但如果說新經濟

政策是資本主義，這就完全是胡說了。新經濟政策是在一切經濟命脈都操於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條件之下，允許資本主義存在的無產階級國家的一種特殊政策，這個政策底目標就是：使社會主義成份去與資本主義的成份鬭爭，發展社會主義成份底作用以排擠資本主義的成份，使社會主義的成份戰勝資本主義的成份，澈底消滅階級，建築社會主義經濟的基礎。誰不瞭解新經濟政策這種過渡的兩重性，誰就是背棄了列寧主義。如果新經濟政策是資本主義，那末，列寧所說過的『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就成了資本主義的俄羅斯。但是現在的俄羅斯難道是資本主義的俄羅斯而不是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俄羅斯麼？爲什麼那時列寧不是簡單地說『資本主義的俄羅斯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而偏要說『新經濟政策的俄羅斯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羅斯』呢？反對派是否同意克魯卜斯加雅同志說新經濟政策就是資本主義的這種說法呢？我想，在代表大會上是沒有一位代表同意的這種說法的。克魯卜斯加雅同志（請她原諒我！），這種說法完全是胡說亂道。決不能用這種糊塗說法到這裏來擁護列寧攻擊布哈林。

二 國家資本主義

布哈林底錯誤是與這個問題關聯着的。他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列寧在什麼問題上曾經與布哈林爭論過呢？列寧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是與無產階級專政相容的。可是布哈林否認這一點。他認為——左派共產黨人沙法羅甫等也都認為——國家資本是與無產階級專政不能相容的。當然，列寧是對的，布哈林是不對的。他自己也承認了這個錯誤。布哈林底錯誤就在這裏。但這已經是過去的事了。如果在現在，在一九二五年五月，他還是重複地說他在國家資本主義問題上還與列寧有不同的意見，那我認為這完全是一種誤會。或者他應當直接放棄這種主張，或者是出於誤會，因為他現在在國家工業的實質問題上所擁護的路綫就是列寧底路綫。並不是列寧同意了布哈林，而是布哈林同意了列寧。正因為這樣，所以我們要擁護布哈林（鼓掌）。

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兩位的基本錯誤，就在他們是完全學究式地而不是辯證式地觀察國家資本主義的問題。他們沒有把國家資本主義問題與歷史環境聯繫起來。這樣觀察問題是完全違背列寧主義的。列寧是怎樣提出這個問題來的呢？一九二一年列寧知道我們的工業不很發達，而農民又非常需要商品，他知道工業是不能立刻發展起來的，同時工人在當時環境之下，主要的不是從事於工業而是製造火器——在這種情形之下，列寧認為在所有一切可能方法中最妥當的一個，就是吸收外國資本，藉外國的資本來整頓我們的工業，就是說採用國家資本主義制度，經過

這種制度來建立蘇維埃政權與農村的聯合。這種方法在那時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那時候我們絲毫沒有其他方法可以滿足農民意要求，因為那時候我們的工業是很衰頹的，運輸事業差不多完全陷於停頓的狀態，燃料也非常缺乏。在那時候，列寧是不是認為國家資本主義（我們經濟的主要形式）是可以容許的呢？是的，他認為是這樣。但這是在一九二一年。現在怎麼樣呢？現在我們可否說我們沒有自己的工業、運輸工業停頓、燃料缺乏等等話呢？不，不能這樣說。現在我們能不能否認我們的工商業已經依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建立了工業和農業間的聯合呢？不，我們決不能否認這件事實。我們能不能否認『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者的作用在工業方面已起了變動呢？（因為社會主義的工業已佔了統治的地位，而租界和租借事業底比重已經降到最低限度，前者有五萬工人，後者祇有三萬五千工人）不，決不能否認這件事實。列寧在一九二二年就說租借事業已經不行了。

由此可知，從一九二一年起，我們的環境已起了很劇烈的變更，在這時期內，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和蘇維埃合作社商業已經變成了主要的力量，我們已經能用自己的力量來建立城市和農村的聯合，國家資本主義之最顯著的形式——租界和租借事業——在這個時期內也並沒有好好的發展起來，在現在，在一九二五年，說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經濟中的主要形式，就是曲解我們國有

工業底社會主義性，就是不瞭解過去和現在兩種環境中間的一切區別，就是不能以辯證法去觀察國家資本主義問題，而完全是以學究式、玄學式地觀察這個問題。

你們要不要聽一聽沙珂尼考夫所說的話呢？他在發言中說：

『我們的對外貿易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營業……我們的內部貿易——也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的營業。同志們！老實說，我們的國家銀行也同樣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我們的貨幣制度是什麼呢？我們的貨幣制度是建築在下面的基礎上的：在蘇維埃經濟中，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條件之下，採取了根據資本主義經濟原則的貨幣制度。』

沙珂尼考夫是這樣說的。

他恐怕把人民財政委員部也快要當作國家資本主義的企業了。我們大家一向都認為國家銀行是國家機關底一部份。我們大家一向都認為對外貿易（如果把對外貿易中的一部份國家資本主義的營業除外）是國家機關的一部份，我們的國家機關是無產階級式的國家機關。我們大家一向都是這樣想的，因為無產階級政權是這些營業之唯一的主人翁。可是如今照沙珂尼考夫的說法，這些國家機關底部份都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機關。大概我們的蘇維埃機關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機關，而並不是像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式的國家機關了吧？怎樣會不是呢？難道我們蘇維埃機關不使用

着『根據資本主義經濟原則的貨幣制度』麼？你們看，這樣的說話，可得出怎樣不通的結論。

讓我先來引證列寧關於國家銀行的性質與意義的問題所發表的意見吧。同志們！我所要引證的是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所著的布爾塞維克能否保持政權那本書裏的一段話，列寧在著那本書的時候還祇主張監督工業（而不是使之國有化），可是那時候他就已經認為操在無產階級國家手中的國家銀行十分之九是社會主義的機關了。他關於國家銀行問題曾經這樣寫道：

『大銀行，就是我們實現社會主義所必需的國家機關，這種大銀行，是我們從資本主義方面現成地奪過來的，我們底任務祇在把損害這個優越機關的一切資本主義的妨礙物除去，使這種機關成爲更龐大、更德謨克拉西、更包羅盡致的機關。數量變成質量。從許多非常巨大的國家銀行中形成一個統一大銀行，再在各工廠中分設銀行的分行——這就已經是十分之九的社會主義的機關了。這就已經成了全國的核算局，這就已經成了全國生產與分配的統計局，這也就已經成了社會主義的骨幹。』（列寧全集第十四卷，下冊，二二一頁）

你們祇要把列寧的話與沙阿尼考夫所說的話比較一下，你們就可知道沙阿尼考夫是錯誤到什麼地步了。如果他把人民財政委員部也稱爲國家資本主義，我是毫不驚奇的。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沙阿尼考夫的這種錯誤是從何而來的呢？

是的，就是因爲他不瞭解新經濟政策的兩重性，不瞭解我們商業在現時社會主義成份與資本主義成份鬭爭的環境中之兩重性，他不瞭解無產階級專政的環境中、過渡時代的環境中（那時社會主義的成份利用資產階級的方法和武器來克服和消滅資本主義的成份）之辯證法。問題並不是在於商業和貨幣制度是『資本主義經濟』底方法。問題是在於社會主義的成份在與資本主義的成份作鬭爭的時候，就利用着資產階級的這種方法和武器來克服資本主義的成份，我們正節節勝利地利用着資產階級的這種方法和武器來反對資本主義，來建築我們經濟底社會主義基礎。因此，問題就在資產階級的這種工具底功能與任務因我們發展的辯證過程而起了原則上的、根本的變化，這種變化是有助於社會主義而不利於資本主義的。沙珂尼考夫的錯誤，就在於他不瞭解我們經濟中所發生的過程底一切複雜性與矛盾性。

現在讓我再把列寧關於資本主義的歷史性問題，關於什麼時候、爲什麼及在何種具體的條件之下他不得不把國家資本主義當作主要形式的這個問題所發表的話，引它一段出來給你們大家看。（座中叫聲：『請吧！』）

『我們無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忘記這件事實：我們在國家工廠的工人中間時常可以看到一種社會主義的制度，在這種工廠中工人們自己搜集燃料、原料和食品，工人們用運輸工具把工業品送到農村中去，並

量把這種工業品正確地分配給農民。這就是社會主義。但除了這種社會主義的經濟之外還存在着小經濟，這種小經濟的存在是完全不依賴於社會主義的經濟的。爲什麼它們能夠不依賴於社會主義的經濟而存在呢？因爲大的工業還沒有恢復起來，因爲社會主義的工廠還祇能得到它們所應得的成份的十分之一。它們所沒有得到的許多成份便依然不受社會主義工廠的管轄而獨立地存在着。我們的國家曾遭受了強烈的破壞，燃料、原料和交通工具又非常之缺乏，因此，使小的生產還離開社會主義而獨立地存在着。在這種條件之下，國家資本主義是什麼東西呢？我說：這是小生產的聯合。資本把小的生產歸併起來，資本從小的生產中生長起來。關於這一點是用不到隱瞞的。當然，自由貿易就是資本主義的增長；這一點是決不能否認的，誰要是否認和撇開這一點就是自己空安慰自己。如果有小經濟和自由貿易的存在——就有資本主義的存在。但如果在我們的手中掌握着工廠、製造廠、運輸事業和對外貿易的時候，這種資本主義的存在對於我們是不是非常可怕的呢？我以前曾經說過，我現在也不妨再說一過：這種資本主義對於我們是並不可怕的。租借企業也就是這樣的一種資本主義。=（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上冊，一九七——一九八頁）

列寧對於國家資本主義問題的意見，就是這樣。

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我們自己的工業差不多還完全沒有，那時候原料非常缺乏，交通完全陷於停頓的狀態中，列寧在那時候就主張採取國家資本主義作爲農業與工業聯繫的工具。這是很

正確的。但列寧是不是把這種方法當作了在任何條件之下都可採用的一種方法呢？當然不是的，他之所以主張採取國家資本主義作為工業與農業聯繫底工具，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沒有很發達的社會主義的工業。可是現在呢？我們現在可不可以說我們還沒有很發達的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呢？當然決不能這樣說。發展的方向完全不是如此。租借的企業差不多絲毫沒有進展，國有工業已日漸發達起來，國家的商業、合作社也日趨發展，城市與鄉村的聯繫也經過社會主義的工業而開始建立起來。我們現在所處的情況比我們自己所預料的還要好多。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怎麼可以說國家資本主義還是我們經濟的主要形式呢？

反對派最糟糕的地方，就是他們根本不願意瞭解這些簡單的道理。

（後略）

簡要註釋

【一】這是一九一七年九月間由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召集的。出席這次所謂民主會議的有各社會黨，各蘇維埃，各職工會及其他組織底代表。該會議上推舉了所謂預備國會，即共和國臨時議院。召集這次民主會議乃是想把國家由蘇維埃革命道路轉到資產階級國會制道路，即阻止日益逼臨的革命而沒有成功的一種嘗試。——（見正文第二二頁）

【二】啓特·啓對奇是工商業界富豪之綽號，這人原是俄國戲劇家奧斯特羅夫斯基所著滑稽劇無端遞禍中的典型富商。——（見正文第二二頁）

【三】自由生活報是孟塞維克的報紙，一九一七年九月在彼得格勒出版。——（見正文第五三頁）

【四】交身所公報是資產階級的日報，一八八〇至一九一八年在彼得堡出版。——（見正文第五四頁）

【五】『煤炭銷售公司』，即『俄國頓涅茨煤區礦物燃料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六年。

【六】『五金銷售公司』，即『俄國五金冶煉廠產品銷售公司』，成立於一九〇一年。——（見正文第六一頁）

【六〇】拜林斯基（一八一——一八四八）是俄國一位卓越的批評家、政論家和激烈揭露農奴制度的人。他在俄

國革命社會思想發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見正文第八五頁）

〔七〕 見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馬克思致伯拉虎的信（哥達綱領批判）。——（見正文第九一頁）

〔八〕 這是哥德著的浮士德（第一卷）中米費斯托法爾所說的話。——（見正文第九一頁）

〔九〕 這宣言草案是列寧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初寫的。斯大林得到列寧底同意，在這個草案中加上了幾處修正。本草案就以這樣的形式成爲全俄中央執委會宣言底基礎，宣言於一月五日在立憲會議上宣讀過。立憲會議中佔大多數的反革命派竟拒絕加以討論。一八一八年一月十一日舉行的第三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將這宣言批准了，後來包括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舉行的第五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通過之蘇俄憲法中，成爲其組成部份。——（見正文第九五頁）

〔一〇〕 這是指列寧所起草，而爲第四次全俄蘇維埃非常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關於批准布列斯特和約的決議案。在該決議案第四段上說：『代表大會向全體工人、兵士、農民，向全體勞動者和被壓迫羣衆，極力決地提出目前最主要迫切和必需的任務，要提高勞動羣衆底積極性和自我紀律，到處建立起鞏固而嚴格的組織，使其儘可能包括一切產品之生產與分配事宜；要與各種混亂現象，搗亂組織現象和經濟破壞現象作無情的鬥爭，這些現象是痛苦戰爭遺留下來的歷史必然產物，同時也就是妨礙社會主義獲得較終勝利並鞏固社會主義社會基礎的主要障礙』。這個決議案發表於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六日的真理報上（參閱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一〇頁）。——（見正文第一〇〇頁）

〔一一〕 博加也夫斯基（一八一八——一九一八）是頓涅茨域哥薩克反革命勢力的領導人之一。——（見正文第一〇四頁）

〔二二〕 新生活報和前進報是孟塞維克底報紙，人民事業報是社會革命黨底報紙，我們時代報是立憲民主黨底報紙。——（見正文第一三七頁）

〔二三〕 新生活派是團結於一九一七年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新生活報周圍的所謂『孟塞維克國際主義者』集團。——（見正文第一九一頁）

〔二四〕 是指第二國際而言，它從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起，就分裂爲許多單個的社會沙文主義政黨，而不復是國際組織了。大戰後，正式恢復第二國際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是於一九一九年二月在伯恩城舉行的。——（見正文第三三四頁）

〔二五〕 是一八六六年七月三日普魯戰爭中的一次搏戰，這次搏戰決定了普魯士勝利的戰爭結局。——（見正文第二三八頁）

〔二六〕 見恩格斯所著反杜林一書，一九三九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德文版第九七頁。——（見正文第二六五頁）

〔二七〕 奧布洛莫夫精神是以俄國作家甘察洛夫所著長篇小說奧布洛莫夫中的主人公得名，以因循守舊，迂滯頑固爲特色。——（見正文第三六六頁）

〔二八〕 是指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至五月十九日舉行的蘇聯亞代表會議而言。這是有蘇俄參加的第一個歐洲國際經濟代表會議。在這次代表會議上，蘇俄代表對於一切想強迫年輕蘇維埃國家來接受其洪權和財政制度這種實際是完全奴役蘇聯的企圖，都給了堅決的回擊。——（見正文第四一五頁）

〔二九〕 列寧此地是指他在全俄五金工人第五次代表大會布爾塞維克黨團會議上所作『論蘇維埃共和國國際和國

內狀況』的報告而言。——（見正文第四一五頁）

【二〇】改換路標雜誌，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三年俄國僑民集團在巴黎出版的雜誌。——（見正文第四四五頁）

【二一】這裏列寧是指糧食人民委員部而言。——（見正文第四七一頁）

【二二】一九二二年十月，因遠東共和國軍隊勝利進攻的結果，海參崴的白匪和日本武裝干涉者全被肅清了。

——（見正文第四八一頁）

【二三】、本文是列寧所寫的最後一篇論文。——（見正文第五〇三頁）

379.04

4844

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注 意

本書為公共財產，請加意愛護，不要污損，

不要用唾液翻書或折角，不要在書上圈點、劃

道、註字，不要裝入衣袋裡，最好請包上書皮。

閱後請立即返還，便利他人閱讀。

東北貿易部圖書館

• 列 寧 著 •

列 寧 著

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

• 上 冊 •

出 版 社
解 放 社

新 華 書 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出版三版

20,001--23,000 (b)

根據一九四九年九月北京版排印

